



华章经管

金融历史经典巨著
再现华尔街沉浮始末



华尔街50年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

华章经典 · 金融投资

H E N R Y C L E W S

〔美〕亨利·克卢斯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遍历华尔街之经典传奇 书尽百年货殖之术 传统股情筹谋之诸般理念

一位颇具名望的作者，一段跌宕起伏的鲜活历史，数位曾经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成就了这部不凡的金融历史巨作。

亨利·克卢斯披沙拣金，以自己在华尔街的耳闻目睹和许多亲身经历，用鲜活的语言和史料翔实地再现了自1857年开始到1907年发生的历次恐慌的真实场景，并披露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五的史实本末，揭开了对华尔街的发展和转型极其重要的历次重大垄断案的内幕。

在金融界，也存在一种自然选择法则。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

丛书微博: <http://t.sina.com.cn/hzclassic>

客服热线:

(010) 88379210,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收藏性: ★★★★★

实战性: ★★★★★

专业性: ★★★★★

阅读提示



入门

进阶

专业

华章网站 <http://www.hzbook.com>

网上购书: www.china-pub.com

上架指导: 投资 / 证券 / 股票

ISBN 978-7-111-30630-6



9 787111 306306

定价: 38.00元



华尔街50年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

华 章 经 典 · 金 融 投 资
H E N R Y C L E W S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本书以作者自己在华尔街的耳闻目睹和许多亲身经历，用鲜活的语言，史料翔实地再现了自 1857 年开始到 1907 年发生的历次恐慌的真实情况，并披露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五的史实本末，揭开了对于华尔街的发展和转型极其重要的历次重大垄断案的内幕。在书中，将华尔街的风云人物的生平及他们的得失沉浮穿插其间，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本书所讲述的华尔街的发展历程，从问题重重到走向自律有序发展，对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发展有很大的启示。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尔街 50 年 (珍藏版) / (美) 克卢斯 (Clews, H.) 著; 余向华, 张琨, 陈雪娟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5

(华章经典·金融投资)

书名原文: Fifty Years in Wall Street

ISBN 978-7-111-30630-6

I. 华… II. ①克… ②余… ③张… ④陈… III. 股票-证券投资-经验-美国
IV. F83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5181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胡智辉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0mm × 242mm · 17.25 印张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1-30630-6

定价: 38.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88379210; 88361066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译者序

Foreword

金融，堪称高坐在现代社会背后最具控制性和影响性的力量，而华尔街则可以说是金融资本市场的代名词。一部华尔街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现代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史，透过华尔街早期的发展史，也可以窥见或者说微缩地见证美国如何从一个刚刚独立不久的拓荒之国发展壮大为世界强国的过程。

一位颇有名望的作者，一段跌宕起伏的鲜活历史，数位在华尔街曾经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成就了这部不凡的金融历史巨作。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著名银行家。1857 年大恐慌以后，这位银行家在华尔街初次亮相。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发起帮助联邦政府筹集战争所需的资金，为内战期间的政府融资付出卓绝的努力，使百万士兵得以衣食无忧地在战场拼杀；南北战争结束后，他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亨利·克卢斯公司（Henry Clews & Co.）成为了华尔街的代名词；也是他，在格兰特将军第一届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新闻界出现了很多反对格兰特连任的呼声时，设法为格兰特争取到连任；鉴于他为战争筹集军饷所提供的公益服务，格兰特总统意图授予他财政部长职位，而他宁愿选择在华尔街；还是他，发起组建了纽约 70 人委

员会，推翻了从纽约市民手中掠夺了数亿美元的腐败的特威德集团。“他是华尔街上对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无耻形态最直言不讳的人之一，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阐释自己对经济和社会的看法。”他就是亨利·克卢斯。

这段历史是华尔街金融发展中最跌宕起伏的阶段，也是美国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段历史。19 世纪后半叶，从美国的西部开发到伊利运河的修建，从铁路的兴起到南北战争，华尔街从一条僻静的小街，发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在《华尔街 50 年》一书中，亨利·克卢斯披沙拣金，以自己在华尔街的耳闻目睹和许多亲身经历，用鲜活的语言，史料翔实地再现了自 1857 年开始到 1907 年发生的历次恐慌的真实场景，并披露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五的史实本末，揭开了对于华尔街的发展和转型极其重要的历次重大垄断案的内幕。鲜活的文字、真实的场景、翔实的资料，作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读者从中可以体悟到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腥风血雨，恍若亲临。作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简单讲述华尔街的历史上，而是把它放在美国经济起飞的大背景下去描述。19 世纪中期大量美国铁路公司相继成立，在纽约掀起了购买铁路股票的热潮，华尔街作为美国的金融中心，推动了美国由铁路带来的第一次重工业化浪潮。在政治上，华尔街不仅通过政治捐款影响大选，还输出精英影响政治决策。在南北战争时期，它支撑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中的战争融资，最终帮助联邦军队锁定了胜局。

华尔街是财富和奇迹的别名，但它本身并不创造产值，只凭买空卖空、低进高出点石成金。“贱买贵卖”是在资本市场上赚钱的唯一法门，由此华尔街制造了无数一夜暴富的神话，也制造了无数瞬间赤贫的悲剧。在华尔街，活跃着的总是像火箭一样跃然腾空，又像火箭上的燃料箱一样轰然坠落的昙花一现式的明星们，很少有能时刻受幸运女神眷顾的华尔街幸运儿。《华尔街 50 年》一书将华尔街风云人物的生平以及他们的得失沉浮，穿插其间，成为贯穿始末的一条主线。书中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每每遭人暗算，却仍长袖善舞的工业巨头范德比尔特船长；华尔街经历最富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精明狡

诈、声名狼藉的丹尼尔·德鲁；老谋深算、具有近乎完美的冷静沉着的特点、擅长幕后操纵的杰伊·古尔德；油腔滑调、寡廉鲜耻、善于利用朋友，有伊利王子之称的小吉姆·菲斯科。以这些人物为主线，19世纪后半叶上演于华尔街的资本市场沉浮始末跃然纸上。

以人为鉴，可以辨得失。那些意图在资本市场上—显身手的人们，听听亨利·克卢斯给年轻的投机者们的金玉良言吧：“我要提醒年轻的投机者们，务必要仔细关注老人们对华尔街的预兆性进出。在恐慌来临的前夜，他们肯定会像幽灵般出现，就像下雨之前，蜘蛛们总要蹑手蹑脚、悄无声息地结网一样。您只要坐观他们买进，然后为自己设置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就行，这样既不用去各种“投机商号”，也不用到那些“样品陈列室”，上班时间你只须到代尔莫尼克（Delmonico）那里吃上一顿便餐，那么大把大把的可观利润几乎可以说就手到擒来。”“许多进入投机行业的人实际上从各方面看都不适合，因为这一行业需要冒险去面对这样一些不得不面对的对手，这些对手个个可以说老谋深算。”“一个人如果想要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投机者，他必须拥有过人之处；他必须是一个紧盯大势的聪明的观察者，同时又是一个对交易迹象的有力解说者；他能对当前的形势以及未来趋势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他必须拥有勇于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的冷静和魄力。谁在最高层次上拥有了这些特质，谁就注定能成为投资之王，而其他人，其层次的高低则取决于他们对这个理想标准的遵从程度。”

以史为鉴，可以明兴替。美国，这个曾经只是一个脱胎于殖民地的拓荒之国，之所以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赶超欧洲国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贡献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其作用居功至伟。当然，华尔街不是一帆风顺，华尔街带给社会的也不都是一片光明祥瑞。实际上，在早期的华尔街，庄家炒作、上市公司欺诈、内幕交易等层出不穷，它们与政府官员的腐败、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国际形势等结合在一起，都给资本市场带来了接连不断的冲击扰动，并通过资本市场的波动又反过来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推波助澜、扰动不已。了解华尔街自身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并最终走出困境，走向自律有序发展的，从中可以给各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巨大的启示。

当前，中国也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空间、影响和作用可以说也是越来越重大、越来越关键，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水平、金融工具、操作方法和监管水平等，都还处于远未成熟的阶段，而且，中国资本市场开放以来的这段不长的时间内，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能看到华尔街历史的缩影：它迅速地吸引了无数的目光，也引来了无数一试身手者，牛市熊市、买进卖出、抛售套牢、庄家操作、散户沉浮、内幕交易等，成了无数人日常谈论和关注的主题；股票指数的上下变动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和脉搏，可以说引无数人竞折腰；此间确确实实上演了无数的悲喜忧欢，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总起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之路，比照本书所叙述的华尔街早期历史而不是已经成熟的当代华尔街发展志录，对于无论是平民、资本大鳄抑或政府监管者，也许更能使我们深刻地理解或预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资本市场中这些已经上演、当前正在上演而且未来将要更加普遍地发生于我们身边的故事。本书不仅可供学者案头参考收藏，亦可给意图在资本市场上大展身手的操盘手和潜在操盘手们以巨大的启示和灵感，还可以给下到平民、上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相关人员以相关历史和知识启迪。

本书为原书的选译本，原书篇幅巨大，达千页之巨，可谓煌煌巨制，堪称一本全方位多角度生动翔实阐述华尔街金融王朝早期历史的书籍，内含许多珍贵的史实资料。本书的选译，力求在不打乱原书体系的前提下，主要选择那些非常关键的章节和人物，当然，考虑到原书体系本身的连贯性，而选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打乱这种连贯性，因此我们在选译后的编排以及部分语言上的指代以及起承转合方面相应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相信也但愿本书的这种选译和细微调整不会影响原书的风貌。通过这些内容，读者依然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通过华尔街所发生的传奇故事管窥美国早期历史、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脉络。

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由余向华博士负责翻译序言及前 10 章，张珺副教授负责翻译中间 10 章，陈雪娟博士负责翻译后 10 章，最后由余向华负责统校定稿。由于原书成书较早，用语也比较独特，有些地方比较晦涩，许多语言和俚语的用法现在理解上有一定难度，因此给翻译带来了不少困难，如果书中还有什么翻译不当之处，请各位读者原谅。

余向华



致读者

To My Readers

百老汇 15 ~ 17 号

纽约

致读者：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为您披露一些与华尔街投机和投资活动有关的内幕故事，这些故事尚未完全公诸于世，本书将从金融的角度揭示美国这 50 年（也是我在华尔街这个大金融中心度过的这 50 年）的现状和发展。

这个主题值得学术家们仔细雕琢，我作为那个年代金融活动的活跃参与者，由于缺少美国金融史的相关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冒险地对此进行一些平白的描述了。

同时，我对纽约股票交易所成立之后，华尔街的历史及与之相关的金融事件也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在描写华尔街的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我选择了最能反映其真实特征的一些本国投机业同仁为对象，尽管这样做也许不能与著作规范最好契合。

我所做的只是想从我的经历和可信赖的叙述者那里收集材料，还原历史的本貌。

亨利·克卢斯

1908 年 3 月 31 日于纽约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致读者

- 第1章 我在华尔街的首次亮相 / 1
- 第2章 如何在华尔街赚钱 / 7
- 第3章 投机失败的原因 / 12
- 第4章 战时华尔街 / 18
- 第5章 我在推销美国国内战争贷款中的角色 / 22
- 第6章 蔡斯部长和财政部 / 37
- 第7章 “垄断”及其对价值的影响 / 43
- 第8章 范德比尔特船长的“垄断” / 51
- 第9章 德鲁和伊利垄断 / 59
- 第10章 恐慌、恐慌的原因及如何规避
大恐慌 / 67
- 第11章 旧时的恐慌 / 78
- 第12章 首次披露黑色星期五的史实 / 82
- 第13章 美国所经历过的几次大恐慌 / 96
- 第14章 华尔街的繁荣景气 / 104

- 第 15 章 1900 ~ 1904 年间华尔街的投机风暴 / 114
- 第 16 章 华尔街沉浮录 / 125
- 第 17 章 格兰特连任 / 137
- 第 18 章 特威德集团和纽约 70 人委员会 / 150
- 第 19 章 丹尼尔·德鲁 / 156
- 第 20 章 德鲁一生中的有趣片断 / 164
- 第 21 章 威廉·范德比尔特 / 171
- 第 22 章 “小柯尼尔” / 184
- 第 23 章 德鲁和范德比尔特 / 192
- 第 24 章 杰伊·古尔德 / 199
- 第 25 章 肯尼的投机事业 / 230
- 第 26 章 维拉德和他的投机事业 / 239
- 第 27 章 费迪南德·沃德 / 244
- 第 28 章 亨利·史密斯 / 249
- 第 29 章 查理斯·沃里奇霍夫 / 254
- 第 30 章 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美国人 / 263

第 1 章

Chapter 1

我在华尔街的首次亮相

我在华尔街的冒险之旅始于 1857 年的大恐慌之后，那次大恐慌被称为“西方暴风雪”。它之所以获得这一称号，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巨大的破坏力以及冰冻效应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曾经在华尔街风行肆虐过的金融风暴。由其致命力量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俄亥俄州生命与信托公司（Ohio Life and Trust Company）的破产，这在当时可以说成了无数人关注的焦点。

该公司在华尔街有一个营业处，在其破产倒闭公告中，已经明示其业务完全陷于瘫痪。紧跟这一失败而来的是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许多大公司相继暂停营业，这些大公司曾经受住了所有一般冲撞带来的震荡，也成功地挺过了许多金融风暴。

这次恐慌，部分归因于对国外商品的过度依赖，部分归因于迅速发展的铁路建设所需资金过于倚重借贷资本。还有许多其他原因，那一年的农作物产量非常低，国家已经无力为其在生产领域上的进口买单，国内硬通货也因此纷纷流出；在 10 月份，纽约城的许多银行暂停支付，然后由此波及全国各地；银行信贷又被不适当地到处扩张，导致整个时代自然而然陷入一种矛盾境地，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金融危机浮出水面，就像旋风一样扩散开来并吹向四方。

在这次灾难前，证券交易备受瞩目已达 10 年之久，所交易的证券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量，都得到了迅猛发展。交易所的员工们富裕而又保守，有着强

烈的早期荷兰籍纽约人的特性，并混杂着南方人的特质，还带有少量英国人和其他外来者的特质。

这次危机对证券交易所大多数资产的影响堪称是毁灭性的。在短短几天中，价格下降了 50%，经纪人委员会（Broad of Brokers）的大部分经纪人都被迫陷入非自愿的清算。可谓哀鸿遍地，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震荡效应随处可见。

接着，恢复和重组的时期终于到来，人们日渐恢复信心。年轻的金融从业者们蕴藏着巨大的恢复力，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重建工作当中。许多旧的保守力量经这一剧变的洗礼之后，纷纷被淘汰出局，难以东山再起。这些保守势力被淘汰之后，他们的位置便由更优秀的资源取而代之，原有的机体因更年轻血液的融入而重新焕发生机，在 12 月份，银行重建工作完成。

这次恐慌和它的即期后果给华尔街的运营方式带来了一次全新的革命。在此之前，保守的旧势力把持着金融、投机和商业领域，而这次危机，可以说在华尔街上为那些保守势力敲响了丧钟。老顽固们偃旗息鼓黯然退场，年轻的金融家们则活力迸发浮出水面，填补了那些顽固守旧派领袖的位置。

这次变革，可以说最好地印证了达尔文的法则——适者生存，它表明了金融界也存在一种自然选择法则，旧的保守主义终将被淘汰，因为他们的末日早已注定。

曾经有一种流行观念认为，那些从事金融业的人必须是年长者，甚至是耄耋老人。这种观念就像君权神授一样，从旧时的偏见中传续下来，学术圈中尤其如此。就像一位医生，不熬到青丝变白发，头发光秃和满脸皱纹，以表明他确已经过了“劳筋骨、饿体肤”的阶段，就不足以认定他的医术高明一样。在律师界和神职人员当中也存在着同样的观念。

这些不恰当的偏见，为古老的欧洲君主制环境所孕育，并得到旧时的国家政府管理传统的助长，结果在这里它们也生根发芽，甚至大部分被保留到了现在。这些旧派观念是如此之根深蒂固，直到 1857 年的大恐慌，仍然可以见到很多这样的观念主宰着华尔街，它们依然在积极地繁衍老旧势力、遏制新生势力。

终于，旧势力衰微，新生力量逐渐开始成长。

在华尔街，如果不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新生力量要得到成功发展是不可

想象的。因为华尔街的旧势力依然冥顽不化，在苟延残喘中延续着其破坏力，而它们的顽强生命力也实在不容易一下子摧毁，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那句谚语——毕竟“猫有九命”。这些老旧分子认为，那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试图跻身证券交易所的种种努力，正是对其传统权力的无礼侵夺冒犯。何况，在那个时期，如果没有足够有力的资金赞助，要想取得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成员资格，对于年轻人而言，几乎是天方夜谭。

这些老旧分子沆瀣一气，紧紧勾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交相为用的联盟，共同致力于阻遏年轻人。当年轻人试图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寸土必争。

由于前面我间接提到的各种原因，我的命运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游走于纽约股票交易所之外，多年来不得其门而入。正当此时，我不知从何处来了灵感，意识到其实对于年轻人而言，或许跻身于华尔街的前沿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要有艰苦卓绝的进取精神，改变经营策略，也许最终能够取得成功。于是，开始采取迂回战略，先干起了干货进口贸易，在这里我得到了早期的历练。

那时候的股票代理佣金是0.125%，买和卖都是如此。

在多次进入交易所的努力都宣告失败之后，我最终下定决心尝试新做法。我立即着手在报纸上登载了一条广告，提出代理股票买卖，代理不成分文不取，代理成功收取0.0625%的佣金。这在那些冥顽不化的守旧分子当中，不啻于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更令他们大跌眼镜的还在后头：他们实打实地不断流失着客户，而我却实打实地源源不断获得新客户。最终，他们不得不接纳我进入他们的圈子，条件是我不再标新立异，必须也谨遵他们的规则并按照他们的习惯方式办事。这样，我取得这一会员资格总共只花了500美元，还包括了入会费及其他相关零碎的开支。要知道，现时一个这样的席位价值可是达到35 000美元。当然，两者比较而言似乎变动很大，但实际上，要知道与华尔街相关的一切费用也都发生了同样规模的巨大变化。那时候的一些老会员，有雅各布·利特（Jacob Little）、约翰·沃德（John Ward）、大卫·克拉克森（David Clarkson）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名字今天依然可以从证券交易所的档案中找到。

作为一个案例，有一种享受交易所会员特权的方法可能经常会被提到：投

机者们经常要付出每周 100 美元或者 10 倍于会员费的代价，旨在获得在叫股期间从猫眼洞中偷听的特权。

尽管此次恐慌所引发的萧条波及全国，影响巨大而又持久，公众的信心可以说也降到了谷底，但是总体说来，它依然可以算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金融和投机时代的到来。正是它使得华尔街焕发了勃勃生机，年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否则，如果没有这种突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还过于猛烈的震荡将其唤醒，可能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休眠期。这一剧变不仅将“年轻的美国”迅速推到了金融投机、商业贸易和一般实业的潮头，而且给贸易和工业的各个部门注入了一种真正进取的推动力，从而形成了一种自衰退以来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有益影响。

这一新生力量，一经从这一前所未有的最重大变革的阵痛中涌现出来，便开始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各国不断成长壮大起来。其规模现在已经非常庞大，以至于纽约股票交易所再也难以蜷居在原来那个地下室了，它需要一整条街来作为其运营总部。股票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为应对这种局面，现正期盼一次大调整。真难以想象，我初到华尔街时的那些前辈们，如果面对这一突兀的观念巨变，又会是多么的震惊啊！

与其他国家同类人群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华尔街的上述这支新生力量可以说格外引人瞩目，这对于华尔街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发展阶段上领先的问题，实际上，只有在美国，年轻力量在金融事务中才可能取得支配地位，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而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历史选择的正确性。这应该感谢美国的共和制度所赋予的自由，尽管它受到了某些个体的影响及“异端分子”的阻挠，但是它依然为这支新生力量的发展壮大铺平了道路，令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尾随其后，竞相效仿。

此时，交易所还是位于比沃大街和交易大厅（Exchange Place）之间的威廉姆大街，此处发生过很多次重大投机活动。正是在这里，雅各布·利特赚得了巨额财富然后又失去了，也正是在这里，安东尼·摩斯（Anthony Morse）这位天才的“闪电算手”开始崭露头角和锋芒，他能够同时简单快捷地加总四列数据，就好像普通会计人员加总一列那样容易。他那时还只是一名小职员，利用在小圈子里的经济活动攒下了 700 美元，然后开始从事金融炒股业务。在那段时间，他的投机事业真可谓如日中天，比最近的肯尼（Keene）还

有过之。摩斯在一年的时间内就赚取了7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但也是在一年内他又破产变得一文不名。不过，这种失败依然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它没有涉及任何费迪南德·沃德（Ferdinand Ward）式的欺诈。

那时候，年轻的投机者并没有学会时下年轻人的那种欺诈方法。也是在那里，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开始积攒起了其百万家资，而之后又同样千金散尽。正是在那里，岩岛^①垄断案、普拉瑞·杜·希恩（Prarie du Chien）垄断案、哈莱姆（Harlem）垄断案等一些著名的垄断案相继被策划出来^②。也正是在那里，社会财富得到不断累积，横贯西部两千多英里^③的铁路得以建立，从而打破了鲍德利（Powderly）先生认为投机不能产生实体性商品的观点，这使得数以百万亩计的土地摆脱了蛮荒之态，繁荣发展了起来；同时，除了给商业和贸易领域带来了数不胜数的财富利益之外，也为乡村增添了大量的房地产资产。此外，这不仅为拓荒先驱们和东部各州的富余人口营造了舒适的家园，也使得这块土地真正成为了吸引各国的人们前来分享自由与繁荣之幸福果实的沃土。

由于首开为企业期权设定60天还款期限之规则的先河，雅各布·利特的金融投机事业因而具有了一种凝重的历史性。雅各布·利特之所以想到要设定这一规则，本来只是基于其操控市场的强烈企图。他作为伊利铁路股票最重要的投机者之一，也是德鲁早期交易这项资产和股票的重要对象。利特先生以由卖方选择交割日期的远期合同形式卖出了大量的伊利股票，还款期限从6~12个月不等。这时，管理股票交易的科学方法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盲资公司”（blind pools）^④也还仅处于萌芽阶段，这种远期合同形式可以说构成了垄断的早期形式。

伊利公司董事会的主要成员们组建了一家盲资公司，想逼迫利特平仓，并将伊利的股票价格抬高到一个相当高的价位。他们以为利特对他们的意图毫无

① 美国伊利诺斯州西北一城市，毗邻莫林，位于密西西比河上。——译者注

② 通过购买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可获得供应品，而对股票或商品的一种投机性控制，以期提高其价格。——译者注

③ 1英里=1.6公里。

④ 一种初创期的公司，它公开出售其股票，但不明确说明投资者的钱会被如何使用，相当于现在的基金公司的早期形式。——译者注

察觉，以为这场筹划万事俱备，只等着某日两点钟爆发，届时利特将遭致惨败，再无翻身的机会。但就在这个小集团准备公开宣布利特破产前的一个小时，利特走进了伊利股票的交易处，打开了一个满是可转换债券的袋子，要求转换成与之相当的股票。这些可转换债券他早已在伦敦购买好了，只是暂时将它们安全地锁了起来以备紧急之需，而这一天终于大大地派上了用场。他得到了股票，顺利交割了他的合同，打破了小集团的垄断筹划，大获全胜。

这种为企业期权设定的 60 天还款期限的规则，此后被广泛采用，以防止类似的空头投机得逞。

这一点在后续各章将会详细说明，利特先生的可转换债券策略后来在他的后辈伊利投机者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他们以实践证明：在有些场合，这种策略可以带来百万美元的收益。

利特先生慷慨好义，对那些走背运的投机兄弟们非常大度。他过去常常讲，经他所宽免的董事会成员的票据，可谓多如牛毛，可以用来垒起他的私人办公室了。此外，利特也以惊人的记忆力而闻名，他无需笔墨辅记即可轻轻松松地记住一天中依次做过的所有操作，而且丝毫不误。

像德鲁一样，利特也有点不修边幅，他对自己的服饰并不太在意，总是带着一顶帽子，像个农夫，显得似乎并不宽裕，但实际上，他在同时代的投机者当中，可以说冠绝群伦，无人能出其右。

第2章

Chapter 2

如何在华尔街赚钱

如何趁周期性的恐慌来大赚一笔 ◆ 给年轻投机者们的金玉良言 ◆ 从大投机者们的失败或不幸中汲取教训 ◆ 如何以及从何处获得最安全且最不需要花钱的专业建议

在华尔街，如果不是老到了一只脚已经踩进坟墓之时，很少有人能够累积起获取成功所需的足够经验。随着年华流逝，在老来之期，那些经验丰富的华尔街老操盘手们，大部分时间总是在其舒适的家中歇息，而当萧条恐慌到来之时（实际上恐慌发生的间隔有时甚至不到一年），这些年迈但经验丰富的老操盘手们就会经常出现在华尔街上，颤颤巍巍地拄着他们的拐杖，蹒跚着进出于其经纪人的办公室。

那时，他们通常不惜倾囊而出，将自己的全部银行存款投注于购买好股票，让当初专为应对这种关键之需而攒的这些钱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当这些用于股票购买的现金已经攒够，并足以让他们“大捞一笔”时，这种大恐慌的肆虐也就会慢慢停息下来。而当大恐慌慢慢停息之后，那些老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预期到经济生活将会出现季节交替似的周期性变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们就会先购买有升值前景的房地产做长期投资，而将利润及其剩余都存往银行，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期又退隐起来，赋闲于豪宅之中，安享平静生活，坐拥家庭幸福。

这些年长的投机先知们于家中与华尔街之间的周期性进出，实际上构成了其时代的一种投机信号，年轻者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观察，就一定能够挺过这段特殊时期大赚一笔，这比起年年都亦步亦趋地盲从于证券交易所的那些职业“消息者”们并不可靠的“秘密消息”获利更多。他们还会感觉到，根本就没有必要整天像跟昆虫似的为那些纸上谈兵、华而不实的骗子们马首是瞻，这些骗子们不过是假装与庄家大户们有深交而已。因此，我要提醒年轻的投机者，务必要仔细关注这些老人们在华尔街的预兆性进出。在恐慌来临的前夜，他们肯定会像幽灵般出现，就像下雨之前，蜘蛛们总要蹑手蹑脚、悄无声息地结网一样。^①您只要坐观他们买进，然后为自己设置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就行，这样既不用去各种“投机商号”，也不用到那些“样品陈列室”，上班时间你只需到代尔莫尼克（Delmonico）^②那里吃上一顿便餐，大把大把的可观利润几乎可以说就手到擒来。

对于年轻的投机者而言，下面所列的大操盘手们身上的一些恶习几乎总是会令他们一败涂地，而且，有时候这种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大操盘手们有一个通病，就是思维方式都非常盲从，自己的想法完全受其他人左右，他们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其他人是在为他们着想，从而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意识，而这种独立意识是任何成功都不可或缺的。

常常有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不在华尔街的人：“我如何能够在华尔街赚钱？”对于这个问题，老迈耶·罗思柴尔德（Meyer Rothschild）当时用来回答类似问题的一句话可以算是最好的回答，他说：“低买高卖。”

那些谨遵这种策略的人，一般都能获得成功。回想近 30 年的经济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华尔街每年都要发生两三次经济波动，只有一年例外，也只有在这一年，股票可以以低于其内在价值的价格买到。波动一般几天之内即可过去，接下来，以恐慌价买进股票的幸运儿得到了约合整个投资 5%~10% 的利润。

这样一来，赚钱的问题似乎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计算问题，它取决于特定年份发生的经济波动次数。

① 蜘蛛若大量地结网，在今后的一两天内将会有雨。网结的结实，风雨较大，反之，则较小。——译者注

② 代尔莫尼克·洛伦佐（1813—1881）出生于瑞士的美国餐馆经理。他将欧洲餐饮推广到纽约，并由于建立了信誉而成为美国城市的一个餐馆制度。——译者注

如果投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换句话说投资恰逢其时，且每一笔后续的投资也都很走运，这一点，对于那些能够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判断的人而言，实际上并不是难事，常常确实能够做到，那么，他们每年的年度累计投资可以实现50%的净收入。

按此方法，也就很容易明白富者是如何变得更富，穷者又是如何变得更穷了。

有时，华尔街上人们的财富行为好像受着一种上天注定的特殊轮回的左右，尤其当人们陷入极度落魄之时，也许这就应了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之说。

就我自己而言，就亲身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奇怪例子，那是1885年的夏天。

有一天，一位失魂落魄的人来拜访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他手中的钱由好几千美元缩水到了现在的数百美元。

“我看到了您7月3日的来信，”他说，“本来有心想按照您提供的建议去做，可是，自从在城市报上看到了一篇由一位非常知名的作者写的文章之后，就打消了原本的想法，这位作者有空头偏执，那时痴迷于此的人也占多数，然而，我最近获知这个人像我一样也几乎破产了。”

“我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样做，”他继续说道。“我现在只剩下了几百美元，干脆我把它们全交给您吧，您可以随意使用。这个夏季快过去了，在剩下的日子里，我打算离开这里到乡下去。我给您留一个地址，如果有什么好的消息，您可以告诉我。我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当然，我也很难要求您什么，如果真的血本无归，您也无需给我更多的钱。就这样顺其自然吧。”他失望地补充了一句。

这个男人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没有再见到过他。我将他全权委托给我的所剩无几的资金，根据自己的判断做了最佳的投资。结果还不错，他的账户开始有了积累。根据我们达成的业务合同要求，我及时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但是，我好几个月都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有一天，一位脸色红润、仪表堂堂的绅士踱进我的私人办公室，热情洋溢地向我致谢。

我很纳闷：“谢谢。可是，您认识我吗，我怎么对您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呢？”

“您大概忘了吧，”他说，“我在夏天的时候拜访过您，那时我跟您说了自

己的情况，说了我的投机生涯是多么不幸。您记起来了么？”

“哦，您就是绝望地去了乡下的那个人么？”我非常惊讶于他的容貌似乎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他回答道：“是的，我就是，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我之所以能够有这般改善，就是因为听从了您及时的劝告。我把自己的最后一点钱都押注在这里，现在，我的这一点钱通过您的自由打理，轻轻松松就获利了。”

这个例子无疑是一个正面的例子，这个人听从了我给出的建议，很轻松地就赚到了钱。

有些人尽管也得到了非常诚恳的建议，但还是阻止不了他继续赔钱。

有些人一旦有了钱，就刚愎自用起来，他们听不进任何的劝告，所有的劝告只会令他们走向相反的方向，他们更喜欢听信外面每一个捕风捉影的谣言。

例如，有一天，一个人下订单让我无限制地买进 1 000 股的伊利股。这个订单在 94 的价位执行。我尚未进一步买进，股价就开始下跌了。

我的客户很快就返回来，吩咐卖出这些股票，那时的股票价格为 92.5 元。

半个小时后，他又返回，要求再次买进这些股票，就像最初那样没有限制地买进。那时，价格反弹到 95。

后来，他又咨询了他的几个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再次决定卖出这些股票。当时，市价是 90。

接着，他第五次返回，说：“我碰到的第一个人让我买进，而接下来的另外一个人让我卖出。我知道他们当中一个被称为‘牛’（多头），另一个被称为‘熊’（空头）。关于这些名称，我知之甚少，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头驴。”

这个故事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华尔街中普通的投机者是如何受到控制和困扰的。避免这种麻烦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他能够接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好言相劝，耐心等待适当的时机，不要轻率地盲从于那些大骗子们的“点金指”。唯有如此，他才能开始学习到底如何在华尔街赚钱。

正如我在另外一章内容中指出过的，投机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专业领域，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只要有钱，就能够投机。实际上，对于普通人，如果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那么这样的投机尝试可能导致非常大的失误，就像一个人自认为能够担当自己的律师，而实际上却对于诉讼知之甚少一样。

认为投机中无需专业知识的这种常见误区，已经使华尔街上的很多能达之士陷入倾家荡产、声名扫地之境，并且其危害和对它的错觉还将横行肆虐下去。

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有一个人急切需要一些法律方面的中肯建议，为此想找一位声誉良好的专业律师，假如此时，有一位律师在法庭中有着良好的口碑，而另一位则可以提供其他方面的证据说明他完全值得信任。只要有一般常识的人都会相信法律的证明，而不会相信那些在律师行里到处游说，宣扬自己认识阿朗 J. 范德皮艾尔（Aaron J. Vanderpoel）、罗斯科·科克林（Roscoe Conkling）和威廉姆 M. 伊瓦尔斯（Win. M. Evarts），由于他们的关照，他能获取很多与案子有关的机密信息等。这个人将遭人笑话，如果这个人还坚持这样说，那么很有可能就需要送到神经病医院检查一下看看他是否心智健全。但是在华尔街，大亨们每天都可以找同样的借口，却被认为是投机智慧的体现。

如果投机者因为盲从而被这些人套牢并被诈取了钱财，那么作为股票交易所会员的专业经纪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优秀律师一样，不应该受到什么指责。因为，对于一个由某些不负责任的人，假装有纽约律师界精英们的授意，所提请的诉讼案，其败诉的命运我们当然不能归咎于这位律师。

就像在法律诉讼中一样，来自华尔街的专业建议是值得为之解囊的，从长远来看，其代价也远远低于充斥于华尔街的各种廉价“股评观点”，这些观点就像瓦隆布罗萨^①秋天的落叶一样厚，它诱使无辜的投机者将自己的钱投入一个有去无回的无底深渊。

因此，我建议那些希望在华尔街有所斩获的人，不要理会那些律师行里的“消息者”，不要去那些所谓的“投机商号”，如果需要购买“投机建议”，则只到那些口碑较好的地方，找那些在金融领域有正确信息的充足资源，并且对于这份为他人赚钱服务的工作又有着良好个人兴趣的合适人选。

要在华尔街周围找到这样可靠的公司和人选，其实并没有多大困难，只要有心的投机者看看报纸，哪怕是问问他们随意碰到的第一个信差就可以了。

^① 瓦隆布罗萨（Vallombrosa），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佛罗伦斯省村庄，位于佛罗伦斯东南33公里的普拉托马诺山。——译者注

第3章

Chapter 3

投机失败的原因

信息不充分 ◆ 信息错误 ◆ 新闻媒介的缺陷 ◆ 没有足够的利润 ◆ 个人特质的危险 ◆ 投机操作的适时与不适时 ◆ 才智、判断力和魄力的缺失 ◆ 理想的标准 ◆ 是什么造就了投机之王

从长期看来，既然总是有那么一类投机者，其投机操作亏损多于盈利，因此我在此阐述一些自己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关投机失败的原因，还是有必要，至少不会显得那么多余和不合时宜。

毫无疑问，许多进入投机行业的人实际上从各方面看都不适合，因为这一行业需要冒险去面对这样一些不得不面对的对手，这些对手可以说个个老谋深算。而他们却不是太傻就是太聪明，不是太胆小就是太胆大，不是太悲观就是太乐观，不是太迟缓就是太草率，不是太谦虚就是太骄傲，不是太轻信他人就是太多疑。这些特质，无论哪一个都可以说是天生的缺陷，任何一个都会轻易地引起投机者的巨大损失。然而，如果能有足够的自知之明，能自我克制，也许就可以防范这些先天不足对成功造成严重阻碍。没有任何心理训练比投机的要求更严格和苛刻。而一旦陷入武断冲动或偏执极端，这给投机造成的损失代价要超过给其他任何工作造成的损失代价。一个好的投机者，对于自身行为可能招致的风险以及自己判断的完善性，必须像法官那样从容镇静又公正无偏。因此，我认为，成功所必需的第一法则就是，要求保持自己的判断不能被任何

天性所扭曲。只要这点能保证，一个人即便真有什么先天缺陷，他依然能够在投机事业中获得成功。

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确实没有什么比信息更能使人陷入危险境地了，因此信息这一事物事实上也构成了人们竞相追捧和极度重视的对象。很自然，如果对决定风险的情景缺乏基本了解，大多数人都会拒绝冒险。然而，很少有人真的关心过对于做出安全决策所需信息而言，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是否足够充分或者足够确定，是否足以据此做出安全稳健的判断。在有些情况下，要获取相关知识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这时如果进行仓促投资就好比是在黑暗中莽撞跃进。如果在此时参与投机，确实有点不够明智，除非他有足够的经验，并且在猜测方面天赋异禀。

投机者之所以失败，有些是因为他做出投机时所基于的信息不够充分，而更多的则是因为这些信息压根就是错误的。还有一些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即便其信息基础是正确的，却不知道如何去加以利用。

以上与信息使用有关的各种困难，构成了造成投机损失的主要原因；其中尤以信息不完全或不充分更为危险。片面化的知识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具有更大的迷惑性。举个例子，一个铁路公司也许会报告说其总收入增长了，这可以解读为是因为其股票市值比现在增长两到三个百分点。但是，这个收入增长也可能来自某些临时性的特殊原因，而且该铁路公司当前的开支增长速度可能更快，这样一来可能反而使其总的净增长下降。一家暂时陷入资金周转困境的公司也许会宣布说进行股东资产评估，这将会导致某些持有该公司股票的股东抛售股票。而稍后的进一步分析却显示，评估的过程可以改善公司的设备状况或者降低其固定开支，实际上使其股票的内在价值远大于其之前的价值，由此反而使得其股票价格出现大涨，那些短视的抛售者们显然因为短视大受了损失。由于某一只股票在伦敦的需求旺盛，导致其在纽约出现被大量买进的现象，而一两天后，有消息显示说，某些与该公司管理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大股东们，由于得到了对其资产预期不利的内幕消息，已经纷纷在海外市场抛售掉了手头的股份。这样一来，后买入者才匆忙意识到他们口袋中鼓鼓囊囊的股票其实非但没有为其带来什么收益，反而导致大损。实际上，这种由于信息不完全导致的投机失败案例，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上演着，而这些人之所以遭受惨重失败，归结起来就是因为，他们还未等到全面地了解到相关信息，而仅仅是

满足于少许事实就做大量假设，从而贸然仓促决策。

在投机领域，有一个最违反常规的特点，就是人们总倾向于根据错误的信息和人为捏造的“消息”去冒巨大风险。正是由于总有大量的“场外”投机者们在按照各种添油加醋的煽情谣言而时刻准备着出手，所以许多专业的操盘手们竞相为这个市场设置一些诸如此类的圈套，也就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了。那么，到底是谣言的轻信者该受到谴责呢，还是谣言的精心策划者更应该受到谴责，这实在难以判定。然而，还存在着另外的第三方，它比前两者更应受到谴责。这些第三方我指的是那些专门旨在传播错误和误导性信息的机构，其中最主要的，像什么金融新闻机构啦，《华尔街晨报》啦之类，这两者都非常热衷于证券交易所中的投机利益。这些机构就其目的而言应该说都很有用，但既然大量的交易正是基于这些信息而进行的，那么公众就有权期望他们所订阅的这些信息，是严格基于谨慎、细心和诚实的基础上得到并刊登的。如果缺乏其中的任何一条，这些机构就可以被斥之为服务恶劣、对订阅者缺乏诚信，就是欺瞒骗诈、流害四方。而且，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媒介传递给公众的很多所谓消息，实际上都应该受到谴责。那些满天飞的所谓“消息”、“吹捧文章”、警报和流言，实际上都是在公开地欺瞒和误导，但在这些媒体的大肆鼓吹和传播下，却都似乎轻而易举地就被正当化了。对于这些错误，到底有多少可归因于这些数据编辑的草率、有多少可归因于缺乏恰当筛选和审慎之心，又有多少可归因于缺乏周全的推理考量，我在此不予置评。但所有观察者都至少会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虚假信息的流传常常是造成无数损失的罪魁祸首。这不单单是那些兜售传播虚假信息者的错。那些为利益集团的利益炮制“消息”的习惯，那些对人们该买什么该卖什么指手画脚的免费建议，那些编辑们观点中所流露的对投机的强烈偏好，等等诸如此类，透过这些无不让更多人看到了新闻业真正功能的被极大滥用。不幸的是，尽管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在华尔街已经摸爬滚打过多年的人而言简直是小儿科，但还是有人偏信盲从这些肤浅蹩脚的东西，以至于很轻易地就中了圈套。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严重不足，但各层次的新闻机构并不是说因此就变得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它们还是能够向华尔街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服务，这里只是希望能够有一些经验教训使他们相信，通过践行更高的信息质量标准，他们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

导致投机损失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投机者没有预留足够的现金储备来防范价格异动导致的风险。通常，人们投机时都是满怀乐观、信心百倍的，所以，他们往往会在缺乏对有关意外事件的预防工作的情况下，就冒冒失失地行动。而那些没有经验的投机者往往更是倾囊而出，恨不得将他们原始保证金中所有可用的资源都投了出去。结果呢，如果价格出乎预料朝不利的方向变动，他们就很可能被强行平仓，从而损失惨重。因此，为保险起见，他们在交易初期投出去的资金最好不要超过其可用资源的一半，这样才可以将保留下来的另一半用做防止被强行“平仓”时的保证金，或者用来在价格发生异动时重复该交易，从而大致确保预期的平均收益。正是由于违背了这一基本法则，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差劲的股票投机者，也就是由于这类人的存在，不断诱惑着“场内交易者”在股市兴风作浪、推波助澜，展开对股市的冲击；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削弱甚至冲垮这些资金基础薄弱的保证金的防范功能，并从而造成价格大跌，引发抛售风潮，他们便可如愿以偿地从中渔利。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讲，如果所持有的保证金都非常充足，那么“空头”和兴风作浪者的破坏力将被大大减弱。“场外”投机者将可以减少一半以上的损失，从而投机的风险也至少有一半会被消除。

投机者中另一类特别容易受损失的是那些只知一个方向操作，缺乏随机应变之才、不懂变通的人。事实上，华尔街上的人从来就不是千人一面的，他们有的天性乐观，有的则天性悲观，他们任何时候都会有主唱“多头”，有的主唱“空头”。一般而言，那些不考虑市场过程和影响条件，总是随性而为进行投机操作的人，迟早会陷入破产的境地，这几乎是一个铁定的规律。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那种始终如一地坚持市场单方向操作的投机者就必然没有任何机会。实际上，当市场价格有望上涨时，在遏制价格过度上涨的过程中做“空头”，也还是会寻找到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同样，当市场价格普遍看跌时，做“多头”也可以在过度下跌的间隙中寻找一些获利机会。但是，要想在这种大风大浪中逆势而上平稳航行，只有那些真正训练有素的能手方能胜任，他们天性沉着冷静，善于克己自制，最重要的是，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操纵大量资金来掌控市场。无需多说，那些老套的投机者十有八九都不具备这些成功的要素。当别人都在为国家普遍繁荣而倍感欢欣鼓舞时，有些人则坚持认为国家正在走向衰退，并在别人都买进时坚决抛售。这些人最终也只落得个

面如菜色，步履蹒跚，夜不能寐的下场。他们也许不知道，正是他们看什么都不顺眼的脾性导致了他们的失败。与他们犯同样毛病的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陶醉于一厢情愿的繁荣梦想中，当整个国家的股市已经明显过了繁荣的顶峰，已经显露出要开始走向衰退的迹象时，他们还在不断买入和持有。这种人当然别指望能够在华尔街坚持多久，他们的口袋很快就会被掏空。他们既然不愿意去了解和适应那些调节价格运动的内在规律，那么最终落个两手空空黯然隐退的下场恰恰就是其愚蠢的反映。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次要的原因会引起投机损失，那就是总喜欢在市场处于风平浪静的平稳运行下进行投机操作，在这种情形中根本谈不上什么利润机会。而此时，投机者往往对市场的一潭死水般的毫无变化感到厌倦，因此不断变换手头的股票。而这样做，除了经纪人们红红火火之外，投机者自己根本得不到一点好处。他们的月度投机报告书上，连篇累牍地写满了各种沉重的佣金和利息开支，却几乎很难找出点什么收入来作为补偿。这种风平浪静的停滞状态有时可能只是持续几个星期，有时却可能持续几个月。此时，投机者的明智之举应该是离市观望，并随时准备着应付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

要避免损失，投机者应该对那些左右着市场的影响因素保持密切关注。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市场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前者包括那些与市场活力根源和市场供求状况相关的因素：如各市场同盟的立场和倾向；股市大鳄们的动向；由股票的买入速度所表示的股市超买超卖状况；当前股票价格上下急速波动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停止交易”^①或保证金不足所引起的股东被强行平仓的可能性；有影响力的集团的抛售和对卖空的重要股票的补仓，等等。这类影响因素往往能够朝着与外部条件显示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方向控制市场达相当长一段时间。即使如此，要对这些因素所形成的趋势做出正确结论却不是件易事。它们非常隐秘和易变，出现时的征兆也很模糊，需要长期的经验以及非凡的才智才能找出这些条件间相互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所形成的趋势。一些非常优秀的投机者，几乎天生就具备了这种能够不差分毫地权衡这些隐晦迹象的能力。这样的人往往很少关注外部的影响，除非它们会影响到当前市场。从交易的性质上看，他们倾向于短期交易并能迅速跟踪市场的短暂趋势。

① 证券行情上涨或下跌到某一价格时，指示经纪人立即买进或卖出的命令。——译者注

他们属于那些最有天分的投机者，而且往往非常成功。但他们的成功来自于天生的特殊才能，所以很难通过后天努力达到。

上面我顺便提到的第二类影响因素——市场的外部因素，具有广泛多样的特点。它们几乎囊括了所有影响国家福利状况的因素。然而，它们又极具影响力。它们包括：农作物状况；制造业状况；贸易现状和展望；运输公司的盈利状况；进出口方向；外国市场对美国债券的态度；贵金属的流动；伦敦和欧洲大陆货币市场的状况；纽约银行的立场和资金流向；国会、议院和法院在影响投资价值的事情上的举动；工会的行动和劳工骚乱的趋势以及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过程。对于那些指望时刻保持消息灵通的人，面对以上如此之多的因素也可能目眩口呆，但它们中却没有任何一项能够有朝一日独自左右股票市场。因此，谁要想跟得上发展，保持对所有各项因素的密切观察是很有必要的。毫无疑问，几乎没有什么人真能掌握如此广泛的信息，并且大多数人认为当事件发生时，他们有能力获取他们所需的信息。这样一来，很不幸的是，那些信息灵通者可利用这些事件，而其他人则只能走马观花。由于在许多投身于投机事业的人当中，有一些虽对信息一知半解或完全不知，却也取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所以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关注这些因素的动态变化到底对于投机成功有多大的重要性。然而，必须坚持的是，这类信息本身确实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相对于其他人而言，拥有这些信息者的行动往往处于一种更加明智、安全和成功的位置。对于那些渴望了解未来所有的变化，并时刻做好了好坏两手准备的人来说，洞悉所有这些影响或不影响价值的因素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当然，掌握信息只是第一步，其他步骤还包括：知道如何从这些信息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以及如何最有效地运用于投机领域。少了其中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功亏一篑。

总而言之，一个人如果想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投机者，就必须拥有过人之处；他必须是一个紧盯大势的聪明的观察者，同时又是一个交易迹象的有力解说者；他能对当前的形势以及未来趋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也必须拥有勇于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的冷静和魄力。谁在最高层次上拥有了这些特质，谁就注定能成为投资之王。而其他人，其层次的高低则取决于他们对这一理想标准的遵从程度。

第 4 章

Chapter 4

战时华尔街

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华尔街的金融家给予政府的支持 ◆ 财政部下达的指示 ◆ 杰伊·库克的北太平洋计划加剧了 1873 年的恐慌 ◆ 华尔街在近代的发展和进步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国内战争爆发之际，华尔街人奋起救国难于当头。那时的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还外债的利息，为此一时挠头不已。当时的财政部长蔡斯阁下（Hon. S. P. Chase）给纽约的财政部次长西斯科（Cisco）先生发话，令他尽全力筹集一些钱财以支持国家的信用。

收到华盛顿关于国库空虚的指示，西斯科先生即刻给华尔街下达了如下指示。他向一些很重要的操盘手和金融家解释说，在几天之内，外债自然增加的利息必须得到支付，否则政府债券将面临拒付的危险。显然，如果未能筹集到资金，政府将陷于困境，从而非常可能局势恶化，并大大增加为国家存亡而付诸的努力。在共和政府的整个历史当中，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时刻，情况紧急，要求采取明确、果决、迅捷的行动。

华尔街人一看便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如果政府的信用崩溃，那么美国整个政治体系框架也将濒临险境。

所有有价值证券的基础陷入了一场破坏性的动荡，接踵而至的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威胁到所有资产价值的缩水。前景非常黯淡，整个美国都笼罩在一

片乌云压顶的气氛中，阴郁而又低迷，看不到一丝希望之光。美国人民的内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任何损伤，都会使美国的欧洲朋友和敌人们幸灾乐祸，兴致盎然地坐壁上观。而这其中，敌人在数量上还占绝大多数，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机会，给予他们心中的瓮中之鳖最后的致命一击。

命运鲜明地摆在每个人面前，所有反对我们的势力似乎都因此沆瀣一气了。一想到国家有难，即便是最坚强的心也禁不住要颤抖。

在此重要关头，实在无暇伤情，考虑到没有其他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力挽狂澜，华尔街人此时责无旁贷。他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决心帮助政府摆脱窘境。确实，他们也得到了很高的收益。他们收取的贷款利率为12%，但考虑到贷款的风险，这点利率也不算什么。那时候，不管多高的利率都无法贷到款。在某些欧洲大国看来，那时候美国人民眼中的此类贷款的风险，就像后来他们对于统一欧洲区纸币或旧时发行的乔治亚债券一样，需要谨小慎微地应对。

在这种群情低迷的状态下，伦巴底大街^①(Lombard Street)在与美国政府进行贷款谈判的时候没有摆出好的姿态，罗思柴尔德^②“兄弟”也拒绝了闪闪发光的钱币的诱惑，一提到拨贷款给英雄末路的共和政府，他们就消极和厌恶地摇头。

当时，钱非常之宝贵，政府必须东挪西借寅吃卯粮，将本来应该在其他时间所能够获得的利息提前支用。非常奇怪的是，那时切实地拥有私人财产被认为比得到政府背书承诺更安全。尽管不是很爱国，但却非常现实，它基于共和政府可以自己力挽狂澜。总算天幸，这个全世界被认为是最佳的政府形式终于在波动中幸免于难，保住了自主权。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反击战一开始，华尔街人就及时地筹集到了“战争军饷”。他们要是未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种状态，布尔朗战役就将可能被证明是对共和政府的一次毁灭性打击，会将美国推向一种无政府状态，恐怕只有通过专制的方式才能重新回归政府统治。

① 英国著名的金融街，位于伦敦。——译者注

② 发迹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罗思柴尔德家族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德国、法国、英国政府都要找他们家筹措战争费用。——译者注

经过谈判，贷款利率定为 12%，财政部记录在案。债券发行之后，利率下跌。当时债券发行利率为 11% 和 10.75%，接着，便是财政部闻名遐迩的 73-10 中期债券。^①

待此债券发行下去，成功地销售一空，并最终以后 5-20 贷款到期认购之后，杰伊·库克（Jay Cooke）很快仿照他们的方式自己发行了著名的 73-10 北太平洋铁路债券。很显然，当危机来临之际，他有能力来为著名的 73-10 铁路贷款进行谈判，因为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神职人员、周日学校老师和公益事业捐助人都投资。尽管这条铁路是他经济衰微的源头，也殃及了无数无辜，他们被无辜地拉下了同样的投机陷阱，但是，这次不幸事件并不完全是纯粹的不幸。

确实，这一事件是促成 1873 年恐慌的主因和显因，但是，太平洋铁路是开启远东市场，挖掘远东市场资源的先锋，是西部铁路系统的重要通道，为拓展落基山脉之外的工业经济注入了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反思我在华尔街走过的 28 年历程时，我发现这样一条规律，正如一首拉丁诗歌中所描绘的那样：厄运过后，风过云开，好运将接踵而至，风水轮流转。正如我前面观察到，在 1857 年的恐慌之后确实如此。1873 年的经济震荡之后亦是如此，尽管关于华尔街的较早期历史，我仅仅有历史证据相佐证，但是我发现 1837 年之后亦如此。因此，历史总是不断重演，这句格言在华尔街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既然我已经在这一主题上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就使我不禁浮想联翩起来。而与此同时，更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呼之欲出了。我打算在这部编年史中，记录下战时华尔街闪电般迅速而瑰丽的发展历程。不仅如此，还有当时周围一切的快节奏，几乎无所不包，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广阔主题。在此强大的演进过程中，华尔街人所经历的问题正是我现在最为关心的话题。在我试图拓展我的话题时，我发现这方面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广阔，此时，我感觉自己体会到了那个爱尔兰人的境界，当他爬上山顶，从第一眼的惊讶感觉中一恢复过来，他就惊讶地叫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竟然这么大！”

我也有类似的感觉。直到我开始动笔为止，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华尔街竟然这么大，华尔街事务竟然如此繁杂。而随着进一步的深入，内容不断改进同时

① 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中期债券，期限不超过十年。——译者注

也不断膨胀。我只是希望我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更为生动贴近地灌输给我的同事朋友们，还有其他一些在这方面受谣言和不负责任的证据误导过的人们，以及（这一点，我很抱歉但不能不说）那些被虽然善意但过分热情的误导手段误导过的其他人们。

从事实当中，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结论。我认为，在过去30年间，高度文明带来了高度的物质丰富，最大多数的人得到了最大多数的商品。这相对于自历史学之父——老希罗多德（Herodotus）起所有过去的任何时代来说，似乎真的又要使老希罗多德着手以自己诙谐的笔墨和方式，将一些人类大家庭真实和虚构的事件重新编入编年史了。

华尔街在这个令人震惊的进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如果充分调查，全面论证，实际上要远比我这本书目前所能够提供和容纳的篇幅要大。

我只是把华尔街悠久、瑰丽而壮阔的历史当中最为重要的话题和主要的事件浮光掠影地过了一下，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简单描述了一些在投机历史中曾经闻名遐迩以及在美国投机事务中占据突出位置的知名人物的生平。

第 5 章

Chapter 5

我在推销美国国内战争 贷款中的角色

对于现在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1861 ~ 1865 年的南北战争只是一段历史。但是，这是一场举世罕见的重大战争，战争中损伤了近百万人。我鲜活地记得南北战争从头到尾的全过程，因为我就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我甚至为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些推动这场战争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没有这些原动力，就不可能挫败脱离联邦的敌人，保卫联邦国家。

从亚伯拉罕·林肯 1860 年 11 月被选任美国总统时起，南方开始准备从北方脱离，如果北方默许的话，就和平脱离，如果反对的话，则通过战争的方式脱离。由于预见到如果在华盛顿共和党的治理下，它将实际上丧失对国会的控制和作为当权者（此前一直都是民主党执政）的政治报酬（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本身），所以他们倾向于第二条路线。1861 年 3 月 4 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总统任期即将到期，亚伯拉罕·林肯宣布接任他的总统席位。看到共和党人接替了民主党人主白宫，南方感到恼火，以此为导火索，引发了紧接下来的重大冲突，莫尔特里（Moltrie）要塞被攻陷，现在向萨姆特（Sumter）要塞发起进攻。莫尔特里要塞的枪声惊醒了北方，促其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要在保卫这面受到打击的旗帜方面担当中流砥柱，它发起的口号是：“联邦政府必须而且应该得以保持！”

可以说，自 1776 年建国以来的美国历史中，这是一段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时期，而很多人都只是从读书中了解这段历史，所以我将要总结一下与政府金

融和战争贷款有关的一些突出特点。

1861年4月14日，莫尔特里要塞攻陷之后，萨姆特要塞遭到袭击，联邦政府军指挥官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少校迫于形势的严峻，接受了博雷加德将军（Beauregard）撤退的条件，木已成舟。

北方以饱满的爱国热情迎接战争的严酷考验，此时，大冲突开始了。但是，当我们的队伍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地开出联邦中已经拆除的据点时，可以有把握地说，无论在北方或是南方，当时都很少有人会预计到，自袭击萨姆特要塞开始，战事竟然会连绵持续达4年之久，这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在袭击萨姆特要塞的这一年年底，黄金作为通货的地位被废止。也就是在1861年12月30日战争最为惨烈的时候，当时的法定流通纸币升水高达185%，从而使其换算成黄金的价值仅为54.05美分，而当时，美国债券按照黄金美元计算其销售价格约为60美分。

当纽约票据交换所同意在指定的某天，暂停硬币支付，美国所有银行都立马纷纷竞相效仿，黄金立即开始小幅升水。那时，没有人想到这一暂停，可就“暂停”了18年之久。

在英格兰，自1797~1821年的最长的暂停期间，中间经过了拿破仑战争，黄金的升水也从来没有超过51%。那是发生在1814年，也就是战争结束的前一年，究其原因，可归咎于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首相及其继任者在管理英国财政问题时所采取的政策。他们通过税收和贷款的手段筹集到了战争所需要的全部资金，因此，为了预防通货膨胀，开始限制纸币的发行。当时，我们的目的和过程与此都完全不同。

当袭击萨姆特要塞的时候，我的公司——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Livermore, Clews & Co.）已经在华尔街上颇有名气了，我意识到这次袭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战争，因此，立即开始设法帮助联邦政府筹集我认为所需的资金。莫尔特里要塞的枪声令北方团结一心、同仇敌忾，从缅因州到印第安纳州，数以万计的人离开了农村，离开了织布机，离开了办公室，离开了商店，参加了联邦军队。

因此，美国政府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来添置军用物资，购买战争军火。

当时，担任总统的是詹姆斯·布坎南，他是民主党党员，就像此后一连

串的继任者一样，在他的内阁中还有好几个南方人。战事一开，这些人马上辞去职务，去往南方，这里面包括了财务部长豪厄尔·科布（Howell Cobb），他出人意料地迅速离开了，临时接替其职务的是代理部长约翰·迪克斯（John A. Dix）。

但是，在离任之前，豪厄尔·科布已经按照旧法律授权允许的条件，为华尔街银行家提供和销售了价值2 000万美元利率为5%的美国债券。然而，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陡然下跌，战争爆发之后又出现大范围的萧条，其中只有约1/4的债券因为募捐者持有而得到了支付。政府也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强制那些迫于当时严峻的压力而弃权的人购买。

对于那时的政府，弃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使得财政部的资金衰竭，公债的利息马上要到期支付，但是国库里却没有钱。值此危急时刻，纽约的联邦财政部次长约翰·西斯科（John J. Cisco）临危授命，接受了华盛顿的指示，在财政部分局召开了一个由华尔街重要银行家组成的会议，在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后，他请求大家提供一年期的美国国债式紧急贷款，并让他们根据货币市场的现状自行确定利率。

于是，华尔街贷款年利率确定在12%左右。当响应西斯科先生号召的银行家（这里面就包括我在内）在财政部分局中聚会的时候，他们经过充分的讨论，同意以这个利率认购这些债券。对于政府而言，所要支付的这个利率确实是高利率，相对于一般情况而言实在太高，但是，鉴于当时情况是如此紧急，这也就情有可原了；考虑到市场利率水平和债券期限仅为一年，西斯科先生表示同意。我的公司认购了其中相当大的份额，同时还劝说了其他一些人这样做，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绝不仅是因为协定的利率水平很高，主要是因为我们感觉到有责任助政府一臂之力；此后只要是危难时刻，我们都毫不懈怠地支持公共信用。

政府意识到，拖欠债券的利息支付对于公共信用而言将会是灾难性的，它是妨碍战争筹资过程的一块巨大绊脚石，而且还会导致经济的总体萧条，因此，必须预防任何的危险。

如果这些债券未能卖出，那么毫无疑问，财政部就连到期支付利息的钱都别无出处。因此，我感到很欣慰，自己能够成功地劝说他人认购这项紧急政府贷款。

此后不久，萨蒙·蔡斯（Salmon P. Chase）先生被林肯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部长。

又过不久之后，蔡斯部长来到分局，邀约认购利率为6%的政府债券2 000万美元，此债券将于1884年到期。这些都是旧法下授权的。他接受了94及以上的出价，但是拒绝了所有低于94的，结果，1884年的债券中大约有1/3以上的部分没能卖出去。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财务部非常需要钱。因此，我很快说服自己积极地去组建一支购买团，准备以94的价格购买未售出的1884政府债券。而我的公司将不拘数量购买，最终，我成功地使一些银行和资本家们认购了未售出债券，这些人此前未曾买进过一分钱这种债券，待我去华盛顿与蔡斯部长协商之后，现在都倾向于认为我个人关于买进这些债券的判断非常明智。

接着，我立刻坐晚上的火车赶到那里，看到部长很早就任在财政部，我告诉他说，我这次来是为了我所组建的购买团的事，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以他自己的要价——94购买这些未售出的债券。债券需求的突然显著提升，让他显然感到惊讶，也非常高兴。但他还是以一种非常坦诚、非常考虑他人权利的方式说，对于我到华盛顿来商讨这一事宜，他非常高兴和感动，并提出了一种平衡折中的建议，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出价和出价被拒的人来说，剩下的那些债券，如果未事先告知他们卖价就卖出，那么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因此，也要给他们机会以我的出价（94）选择所希望购买的数量。

他请我第二天早上再给他打电话，他需要进一步考虑一下，我照他说的做了。但与此同时，我接触和会见了很多南方的政治家和官员，皮特·华盛顿，维吉尼亚华盛顿家族的成员，就是其中之一。我看到在华盛顿内外都有太多太多的战争准备要做，我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取胜道路还曲折遥远，虽然蔡斯先生前一天已经向我保证，战争很快就要过去，和平在60天之内就会到来，他的这一预言稍后也得到过国务卿苏华德（Seward）的响应。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华盛顿先生本人，他是一位杰出的政府官员，他向我大谈了南方的对战情绪和无论胜败如何都要一决输赢的决心，按照他和其他南方人所持有的绝对但却错误的信心，他们认为无论这场战争需要耗费多长时间，战后南方都将建立自己的联邦。南方之所以想从联邦中正式脱离，根本目的是想建立奴隶制的寡头政治，而林肯在选举中，就预言了奴隶制的覆亡命运，并且他本人及

其共和党都致力于消灭奴隶制。扬西（Yancey）和南方其他主要的主战派成员，要对这种错误的想法负责。

当我第二次拜访蔡斯先生的时候，我说：“部长先生，昨天我拜访您之后，又在与南方政治家和官员的交谈中获悉了不少消息，看到和听到了双方的诸多战争准备，这使我相信，这次战争绝对是一场持久战，我感觉我们恐怕应该预期到政府的各种债券和有奖证券将会持续在一个更低的价格上。鉴于我本人的这种想法，为了对那些我所代表并交托我全权处理的人有一个公道的交待，我必须收回昨天给您的提议。如果您当时接受我的提议，当然我会认可交易已经完结，并毫不犹豫地认购这些债券，但情况既然如此，您应该承认我本身并没有这种责任，随时都可以退出。”

“哦，确实如此，”蔡斯先生说，“但是，我认为您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战争将在60天内结束，随后这些债券价格将很快恢复到面值！”

但是，基于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我在华盛顿所收集的信息，经过审慎地思考和预见，我信心百倍，而认购团中的同僚们也有理由感谢我的大胆做法，因为债券此后很快就下跌到84。1861年7月21日，在马纳萨斯的布尔朗一役中，联邦军惨败，这件事使得北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和冲突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次战争；同时，北方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决地想要斗争下去，直到南方被联邦军征服。

蔡斯先生筹措补充财政部资金的第二项举措是提议发行年利率为6%的美国政府债券，可接受任何方式支付，包括关税和已经存在的发行权。然而，他在与分局长约翰·西斯科先生协商后感到很困难，西斯科先生推荐了三家华尔街银行作为授权的政府债券销售代理，即莫里斯·克卡姆公司（Morris Ketchum & Co.）、里德·德克塞和范维勒克公司（Read, Drexel & Van Vleck）以及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Livermore, Clew & Co.）。这些公司就这样被选出来了，它们是最早也是仅有的专门处理有奖证券销售的政府代理机构。这些公司对于政府对自己的赏识和垂青都非常感激，它们的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很快就销售完了所有财政部提议的有奖证券。

蔡斯先生自始至终一直在努力设法给政府提供战争给养，他受到了纽约商界的衷心支持，他意识到这个事实并对我和其他人表示了感激之情。

随后在1861年夏天的一个非常值得记住的场合，蔡斯部长召见了财政部

次长西斯科，应他的邀请，很多重要的银行家和资本家汇集一堂，相互磋商。他以自己那种严肃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安排我们在他指定的位置上坐下，他说：“各位，政府需要5 000万美元，立马就要，以满足战争所需。对此，我准备发行这么多数量的财政部债券。在总共发行的2 500万美元债券中，这些数量的财政部债券是由国会授权的，依据的是1861年7月17日颁布的法案，年利率为7.3%。我不是金融家，因此，我不能告诉您如何筹集资金，但是，您可以看到在金融界，有一些领袖非常精通此道。因此，这些问题我就要全权托付给您了。我要重申的就是，政府必须获得5 000万美元，至于如何设法筹集到这些钱，就拜托各位各显神通了。”

蔡斯先生说完坐下，我们这些出席会议者开始自由会谈，并彼此对照了这次谈话的笔记，讨论大约进行了20多分钟后，我们的发言人摩丝·泰勒（Mose Taylor）宣布讨论的结果，他向蔡斯先生致意说：

“部长先生，我们已决定认购您所提供的美国政府债券5 000万美元，并立即会将这笔钱交到您的手上！您明天就可以提用了！”

这个简单的发言博得了大家的鼓掌，蔡斯先生回应道：

“各位先生，我代表政府感谢你们热心公益的精神，感谢你们慷慨而及时地为政府化解危难。”

整个场面非常激动人心，其重大的影响源自于最终的结果。这就像来自现实生活的一出戏剧，如果将它舞台上编排出来，有这位身材魁伟、头脑机智的蔡斯部长作为领袖人物在台上表现，定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批7-30的财政部价值2 500万美元的债券就这样上市了。

这其中，部长有发行500万美元的无息硬币支付的票据之特权，这些票据可分别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分局发行，可以用作通货。

在安排了我所认购的第一笔价值5 000万美元的7-30债券之后，蔡斯部长与银行沟通了剩下的债券如何销售的事宜，主要考虑如何节约给代理公司的佣金。但由于无法以这样的方式与代理公司达成一个令其满意的交易，因此，他在最初指定的三家代理公司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几家销售政府债券的代理公司，分别是纽约的非斯科·哈齐公司（Fisk & Hatch）、弗米利公司（Vermilye & Co.）和费城的杰伊·库克（Jay Cooke & Co.）公司，并告诉它们，只要纽约分局一要求，7-30债券就将尽快交付给它们。

于是，纽约代理公司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同意费城的杰伊·古尔德公司担任这些代理公司的负责人，负责 7-30 债券的广告宣传，换句话说，杰伊·古尔德公司将担任全部代理公司的主席。协议还规定了佣金率，以及为预防代理公司之间互相拆台和发生冲突的其他一些细节。对于这个组织和协议，蔡斯先生默许。这个指示一下来，所有代理公司就马不停蹄地为销售这些债券而展开忙碌。

杰伊·古尔德公司当时在纽约并没有办事处，也一直没有去组建一个，直到战后。这实际上正是他们被选为代理公司负责人的原因，因为如果选举一个纽约的公司担任负责人的话，将会造成纽约公司之间的相互嫉妒不和。

待所有授权发行的 7-30 债券销售出去之后，接下来的是 5-20 债券，它仍然是由同样的一些代理公司承销，5-20 的销售就像 7-30 一样成功。

蔡斯手下的财政部部长助理芒森·费尔德（Munson B. Field）先生应我的请求，对华盛顿的花名册做了一项调查，看看哪家政府代理公司所销售的 7-30 和 5-20 最多，他报告的结果是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名列榜首。但是，我更乐意说，四家美国战争贷款银行公司实际上应该是平分秋色，它们是杰伊·古尔德公司、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弗米利公司（Vermilye & Co.）和菲斯科·哈齐公司（Fisk & Hatch），它们做得都同样出色，都为内战期间的政府融资付出同样卓绝的努力。无疑，这四家公司应该授予同样的荣誉，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比另外的公司做得更为优秀。这四家公司所做出的崇高爱国奉献足以让它们赢得荣誉，因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它们为国家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奉献，也为它们自己赢得了一个骄人的爱国记录，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时刻心存感激，就像当时华盛顿政府当局的心态一样。政府正是因此才得以让上百万士兵衣食无忧地在战场上为拯救美国而战斗，从而带来了战争的最终胜利，也使得这种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佳政府形式保存了下来。

我在这里要提一下蔡斯部长的一句话，他说：

“如果不是有杰伊·库克和亨利·克鲁斯，我永远都难以卖出足够的 7-30 和 5-20 债券，来为这场战争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他的这句评论在当时的报纸上到处刊载。

在 7-30 硬币支付暂停之前，政府通过代理共卖出了 15 000 万美元。蔡斯部长将大部分销售收入从银行中抽出，转入财政部分局，这加速了 7-30 硬币

支付的终止。他要求从代理公司转入财政部的硬币支付分为三次进行：8月19日、10月1日和11月2日。此外，民众对于硬币支付将暂停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黄金的储藏和出口。结果，事情发生之后，黄金突然从流通中消失了。

这显然导致了流通中货币媒介的相应收缩，蔡斯先生为了消除其负面影响，又提供了一个使黄金货币废止使用的平台，发行了价值5 000万美元的无利息票据，称为美国即期票据（United States Demand Notes）。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出于国家银行要发行更多自己的票据的需要以及筹资满足财政部迅速增长的资金需求的需要。

考虑到这样的缩水可能会造成货币市场银根紧缩，会反过来妨碍政府代理公司有关证券的销售，国会1861年8月5日废止了1846年8月6日“关于改善财政部组织，及财政收入的征收、安全保护和支出问题的规定”法案。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要让财政部长能够选择有黄金偿付能力的银行，将授权贷款所获得的资金存储下来，此外，它在一个决议案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蔡斯部长迅速执行了这一决议案，这项决议案以及此后的一项法律，主宰着此后财政部的相关政策。由于财政部尽可能将钱都存在银行，而尽可能少地放在财政部和财政部分局，从而避免了银根紧缩问题。财政部分局系统在将货币挤出流通过程这种不良的副作用，就这样实际上得到了承认，同时也被预防住了。

当政府代理公司完成了7-30的销售时，全国上下的银行都陷入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之中。很多有影响的新闻报纸都支持银行一方，赞成将5-20交付给银行而不是政府代理公司来销售。蔡斯部长的压力变得非常巨大，以至于他只好做了一次试验，授权美国所有银行来销售5-20。尽管银行得到了一切替代代理公司的机会，就像前面提到的6%利率国债和7-30财政部债券一样，不过，蔡斯部长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银行，回头再找代理公司，因为代理公司更有活力，它们销售5-20就像前面销售7-30一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我们虽然在欧洲没有朋友，但是我们凭借爱国激情和精诚团结的精神克服了这个困难。

一段时间过后，有些银行，那时只有各国银行，抛售出了即期票据，因此，强制流通就显得有必要了。为此，蔡斯部长请求国会变即期票据为法定货币，可以支付所有债务，包括公债和私债均如此，只有关税和公债利息必须以硬币支付。

因此，为解决这一困难，1862 年 2 月 25 日，国会通过了法定货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变这些票据以及美国所有票据为法定货币。在同一个法案里面，还授权发行了新的无利息法定货币票据 15 000 万美元，关税和公债借款的利息必须以硬币支付的条款显然是既明智又必要，因为关税完善了硬币支付利息的方法；而硬币支付的事实则为我们其他国家贷款和国内的贷款创造了一个需求，这在纸币利息的条件下是不存在的。

不久之后，授权发行的 25 000 万美元 7-30 票据全部由政府代理公司卖给了公众；此后，国会不断地授权加大发行量，直到 1865 年 8 月达到了顶峰，此时公开发行并销售的票据高达 83 000 万美元。

在同一天，与 7-30 齐头并进的政府贷款的发行量也同时达到了它们的最大值，显示出一个惊人的总量。那时公开发行并销售的 5-20 票据为 514 880 500 美元，10-40 票据为 172 770 100 美元。爱国激情和利润的结合使得这些伟大的美国公债有了双倍的吸引力，政府代理公司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刺激国内外对债券的需求。特别是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销售了大量的此类债券，在那里它们被最终证实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投资。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我们这些政府代理公司就像财政部长一样焦急，就目标和工作完成情况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够与我们相媲美。其爱国主义精神和产生的公益可与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相提并论。对于其通过政府代理公司形式，在联邦处于危难之时为政府所提供的最优服务，华尔街再如何极尽自我夸赞都毫不为过。

正如格兰特将军^①（Grant）很久以后对我所说的，我们虽然没有像战场中的士兵那样为国家而战，但是我们像战士一样，通过为国家筹集战争资金的方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对于自己积极参与了这场爱国主义运动，帮助联邦保存了军事实力，而感到非常自豪。

鉴于维吉尼亚战役所造成的对联邦军队的诸多灾难和不幸已经实实在在地显示出来，1862 年 7 月 11 日，国会授权发行了 15 000 万美元无息的美国法币。1863 年 1 月 17 日，又发行了另外 1 亿美元，而同年 3 月 3 日，又追加发

① 格兰特，美国内战时期的著名将领，1864 年被任命为联邦军队总司令，1869 - 1877 年担任美国第 18 任总统。——译者注

行了5 000万美元，在这一年内总共发行了45 000万美元的法币（绿钞），其中一半要作为财政部储蓄，用于兑付临时债券证明。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发行无息法币量最大的一次，到1865年1月28日，国会通过法案将总量限制为4亿美元，并一直保持到修·迈克卡罗西（Hugh McCulloch）1865年初接任财政部长为止。

蔡斯部长同期成为美国高等法院院长，接替其职位成为下一任财政部长的托马斯·费逊登（Thomas Fessenden）则辞职了。迈克卡罗西先生开始收缩法币，在国会插手禁止进一步缩减法币之前，他已经收缩了4 400万美元。国会之所以插手，则是出于公众反对进一步削减流通中的绿钞的呼声。

从那时起直到1873年的大恐慌，法币总量一直保持在35 600万美元。在这一期间，先是鲍特韦尔（Boutwell）先生接替迈克卡罗西，然后理查德森（Richardson）先生又接替鲍特韦尔担任财政部长这一职务。理查德森任职期间，由于关税和税收收入锐减，迫于大恐慌的压力，又将迈克卡罗西所收回的4 400万美元中的2 600万美元重新投入流通，于是，1874年6月22日，国会规定进入流通的绿钞要保持在当时的总量水平38 200万美元。

鲍特韦尔任财政部长期间，签发批准的一项法律允许这2 600万美元法币重新发行，还是这一法律，同时也废止了国家银行储备，银行票据流通在此前要求特定储备，被替代的这个条款要求银行储备相当于发行总量5%的法币，根据这项条款法币由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兑付。

因为这项法律仍然有效，由此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兑付局。此后，除了由于银行流通法币增减所造成的数量增减之外，每天接收到的残损银行票据将由新法币取代。法币5%的存款利率被算作法定储备的一部分。但是，由于需要给华盛顿发送票据再从那里接收票据对于银行来说，既麻烦又浪费时间，并且也阻碍了银行在货币需求减少时的收缩，而在需求增加时则急速增加货币。只要每所财政分局都成为国家银行的兑付网点，那么货币的增减就可自由迅速地进行。国会因此应该授权财政分局在各自辖区的机构设置中开设一个兑付局，以推动银行票据的自然增减，从而，提供货币最需要的弹性。

除了美国法币之外，大量有息的法币在战争期间发行了。1865年9月1日，当通货像整个国债那样到达膨胀极点的时候，无息的法币和辅币徘徊在459 505 311美元，3年期年利率6%的复利法币超过了217 000 000美元，1年

期和 2 年期年利率 5% 的法币几乎有 34 000 000 美元，财政部累计发行量达到了 685 236 269 美元。

此外，还有未付清的临时债券证明 107 000 000 美元。这些见票后十天支付的票据被银行视同为绿钞，并计入法定货币储备的一部分，而剩余部分则像货币一样流通，因而它实际上增加了纸币的总量。与此同时，新的国家银行法将价值 170 000 000 美元的国家银行票据投入流通领域；超过 70 000 000 美元的国家银行票据仍然在流通。然而，后者很快就被国会取消不复存在了。总计流通发行的货币量为 106 700 万美元。这也并不是全部，因为那时未付清的一年期公债有 8 500 万美元；未付清的 7-30 票据（又称 7-30）有 83 000 万美元，被广泛地用作货币，并造成了通货和价格的膨胀。

因此，可以发现，当时实际的通货膨胀状况事实上远远大于公债声明中所显示的通货膨胀。但是，在接下来的 8 年中，由于有息票据和证明的贷款期限快到并即将取消了，所以通货膨胀的收缩非常迅速，以至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相对于 1865 年 9 月的时候，始于 1873 年的大恐慌时期，在流通中所使用的纸币（用做通币）要少了 60% ~ 75%，也由于交易媒介的这种大幅收缩，美国历史上所遭遇的最严重的灾难性恐慌已经大限将至。我再重复一遍，它在美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至为恶劣，这里甚至不排除 1837 年和 1857 年的两次恐慌，而法德战争更是加剧了这种恶劣的影响，它实际上封闭了美国有价证券在欧洲的市场，而此前的欧洲本来可以自由买卖美国证券。对于美国银行家们来说，这不啻于晴天霹雳。当时，他们已经着手为美国各地新建中的铁路融资，他们本来打算随着铁路一点点修建好，一边再为发行的铁路债券同时寻找国内外两个市场。紧接着 1873 年的恐慌（在 1873 年的恐慌中，杰伊·库克公司由于要为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筹资而破产）之后，萧条的时间延长，直到 1879 年恢复硬币支付为止，才真正有回报给这些美国国民。与此同时，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注销了数亿美元债务，美国重组了几乎所有未完工的铁路。

美国的国债从 1860 年 6 月 30 日的 64 000 000 美元和 1861 年 6 月 30 日的 88 409 387 美元，增加到 1865 年 9 月 1 日的 2 845 907 626 美元。到了 1873 年 9 月 1 日，国债有了大幅度减少，仅为 2 140 695 365 美元。在同样因素的影响下，债务和货币也一并沉浮。直到政府和银行家开始硬币支付，金价才停止支

配货币的贴水。就这样，“黄金屋”^①成为了明日黄花。

政府代理公司的重要活动和卓越的销售业绩，从我前面的最大数值引用中可以推断出，1865年4月9日，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李将军向格兰特将军投降的5个月后，7-30 票据、5-20 和 10-40 债券已发行。

那时候，利息需以硬币支付的债务总值为 1 116 658 100 美元，而法币的利息为 1 874 478 100 美元，第一次缴付为每年 65 001 570 美元黄金，其余的为 72 527 646 美元绿钞货币偿付。

李将军向格兰特将军投降，这件大事总算结束了这场战争，它也适时地成为了格兰特将军当选总统的序曲。毫无疑问，在与之角逐美国总统宝座的共和党候选者当中，没有人在下一次大选中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当然，更不可能有民主党候选人被选。格兰特成为了美国伟大的民族英雄，美国也鉴于他的赫赫战绩而给予了他崇高荣誉。

但是，在阿波马托克斯难忘的一幕过去不久，当美国举国欢庆和平终于又复归的时候，在美丽坚合众国逐渐恢复元气的时候，在华盛顿的福特剧场却上演了一出可怕的悲剧，1865年4月14日，林肯总统被约翰·威尔克斯·布恩（John Wilkes Booth）暗杀，第二天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被委任为总统。

那时，整个美国都沉浸在哀悼之中，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致哀的标志不绝于眼，到处见证这国民的哀恸之情。

这里我不再详细介绍安德鲁·约翰逊作为总统不平坦的仕途，以及人们对他的指责攻击，实际上长期以来，国会两院已经为此备受煎熬。但是，对于美国人民而言，1869年3月4日，他的下台和格兰特的续任及斯凯勒·柯尔法克斯（Schuyler Colfax）担任副总统，不啻于是天籁福音。在1868年11月的竞选当中，由格兰特将军对民主党候选人霍雷肖·西摩尔（Horatio Seymour）和弗朗西丝·小布莱尔（Francis P. Blair, Jr.）将军，最终格兰特将军胜出。格兰特的人气非常旺，他的胜出自然是预料中的事。

就是到了战争即将结束前的不长一段时间内，战争到底还要持续多久都还

① 伦敦的黄金定价是在“黄金屋”（Gold Room），即一间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洛希尔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是个未知数。由于很多人没有能够看到北方强大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足以保证最终胜利，并圆满完成联邦的最后统一，所以对于他们而言，战争的最终结果一直是扑朔迷离、令人沮丧。我们的货币，尽管膨胀了很多，但是在这场严酷考验中，它仍然保持良好，而南方各州的货币则完全丧失了信用，并且变得一钱不值，真正重演了法国大革命所发行的券^①的历史。

战争结束，美国历史迎来了新的纪元，我们的货币此前在南方并不流通，现在无疑要开始流通了。这本身相当于大规模缩减和稀释货币。原来只提供给一方使用的货币，现在要满足两方面的货币需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货币从北方转往南方，这一变化在货币市场中可明显感觉出来。

美国现在就像是一位久病初愈的病人，已经习惯和倚赖于各种外部刺激，突然缩减货币，将会非常危险。国会中很多人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因为国会辩论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围绕这一主题：不少人强烈反对在战时过量发行纸币，认为这不亚于是饮鸩止渴，激烈波动是比这一疾病更为严重的治疗方式，他们警告政府不能过量发行纸币。然而，主张缩减货币的人却看不到甚至拒绝承认，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货币不断上涨确有其论据，但是，通胀那种现在看来还遥遥无期的危险，怎么能够与现在正急剧变化的事务和情势的压力相比呢？

尽管激进的货币紧缩计划被拒绝，但即便是最终采取的温和紧缩政策也证明是严厉过头，难以承受，商界企业怨声载道。货币紧缩的过程是痛苦和艰难的，而通胀则总能令人愉快且易于接受。

近些年，我与格兰特将军已经非常熟悉了，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新闻界出现了很多反对格兰特连任的呼声，包括纽约《晚邮报》(Evening Post)，我则想方设法为他争取连任。为此，我在库珀大学(Cooper Institute)组织了一次公开会议，说服威廉·道奇(William E. Dodge)担任主席。这是一次非常受欢迎的会议，格兰特的连任受到了空前热情的一致拥护。《晚邮报》说，在这样一个势如破竹的大会之后，很显然，公众的感情向格兰特一边倾斜，因此，再反对格兰特的连任就毫无用处了。顺理成章地，由共和党提名，他再次成功地获得了任命。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于1873年3月4

① 1789—1796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由革命政府发行的纸货币，并以此作为没收土地的担保证券。——译者注

日，也就是他从总统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的第四年。

格兰特将军非常清楚我在这次会议中所做的努力，很多人说，这次会议实际上将其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连任前景之天平又朝向有益的方向倾斜。他还知道我在政府战争贷款中，在组织各种公开会议庆祝合众国胜利，在激励士兵应征入伍当中所做出的贡献。他说鉴于我为战争筹集军饷所提供的公益服务，我理当受到公众的认可。他问我是否想当财政部长，但是我说我宁愿选择在华尔街。因此，他任命我接替伦敦的巴林兄弟为美国政府外国银行的财务代理人。自英格兰银行以此身份活动起，直到此前，巴林兄弟就一直担当这个财务代理人的角色。

当格兰特总统即将撒手人寰的消息已经得到证实的时候，我非常焦急地想再见他一面，同时强烈地建议他葬在纽约市，在这里他的坟墓将成为一个醒目的纪念碑，所有人都能够瞻仰，而不是葬在众说纷纭但遥不可及的阿林顿国家公墓或者西点军校，俄亥俄州和伊利诺伊州也主张他过去，圣路易斯市也要求他过去。他们都竭力想通过委员会向迈克乔治山（Mount McGregor）传达消息，并征得格兰特家庭及其本人的应允。

有鉴于此，我动身前往格兰特所在的迈克乔治山，将这个建议尽可能细致地解释给他和他的家人听。格兰特的家人都表示赞成，而将军本人虽然不能说话了，但在听到我的一席话时还是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当他坐在轮椅中行走于游廊，由道格拉斯医生陪同前往山脚边例行每日的日光浴的时候，他在一叠纸上写下了他唯一要求的条件就是，他的太太在百年之后也能够葬在他的身边。我很了解他们的感情，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与将军和他的家人一起聊天，在接受了他简单而唯一的要求后，我此行的结果已经揭晓，引导他们选择纽约作为埋葬这位伟大战士的地方。三天之后，这位伟大的将军就逝世了。我在星期一下午的时候拜访了他，他就在随后的星期三去世。他的逝世令举国悲恸。

这里附带提一下，我发起组建了纽约70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Seventy），推翻了从纽约市民手中掠夺了数亿美元的腐败的特威德集团（Tweed Ring）。这个委员会的70人当中，由我推荐的成员有65名，由于我在组建纽约70人委员会中所做出的贡献，将这些热心公益事业的杰出市民组织起来，我获得了很多赞美。这个委员会不仅将“小偷”驱逐出办公室，还让所有那些没有逃

离美国的人联名起诉，最终抓回了特威德，将其绳之以法，特威德最终死于监狱。与此同时，委员会还重新组织了“市部”，选拔新人，由安德鲁·格林（Andrew H. Green）任监督人。“市部”通过控制政府，一时净化并实际上统治了纽约市。

但是，就我一生所有的经历而言，我最为满意的还是我在推销伟大而光荣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内战争国债时所做的工作，还有我不仅作为一名银行家，还作为爱国的美国公民，以其他方式，竭尽所能，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增强国力的行为。四年令人难忘的战争过去了，联邦作为一个重新组建起来的国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和平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它使得一个人类所知的最优政府，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得以巩固，并有希望常青。

第 6 章

Chapter 6

蔡斯部长和财政部

当蔡斯先生接手财政部的时候，财政部陷入国库空虚的状态 ◆ 为战争做准备，华盛顿为之兴奋不已 ◆ 勇武的南方人激动难耐 ◆ 官员们诉诸武装斗争来护卫他们岌岌可危的地位 ◆ 关于战争持续的时间，预期有误 ◆ 华盛顿之行以及与蔡斯部长的一次会面 ◆ 对政府债券销售情况的不满 ◆ 华尔街骤然陷入恐慌 ◆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百万富翁变成了穷光蛋 ◆ 奇迹般化险为夷 ◆ 它是怎样发生的

蔡斯先生入主财政部之后，他发现资金成了最紧迫的需要。实际上，财政部囊中羞涩，几乎空空如也。1861 年的财年于 6 月底结束，财政支出总金额为 6 200 万美元，而能够实现的财政收入充其量只有 4 100 万美元。但即便是这 4 100 万美元财政收入，也由于南方的背叛和抵抗态度而面临大幅度缩水的威胁。

当林肯总统号召国会为征兵 40 万人做准备的时候，政府财政支出很快就攀升到每日百万美元的高点。财政部长算了一笔账，并将结果递送给了总统。结果显示，接下来的一年预期财政支出将达到 31 800 万美元。他建议其中的 8 000 万美元通过税收解决，24 000 万美元通过贷款解决，而剩下的 5 000 万美元则可以通过发行财政部债券的方式筹集。

蔡斯部长得到国会授权，可以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借不超过 25 000 万美元

的款项，而作为这笔贷款的一部分，用法案的话来说，他将“发行不超过5 000 万美元的无息财政部债券，这些债券可在纽约、费城或波士顿凭票要求赎回，以换取黄金或支付工资，或其他美国政府应该支付的款项”。

蔡斯先生开始刊登广告，发出为第81期国债出价的邀约，当时，凡是出价在94及以上的都被接受，而低于94的则被拒绝。

我立即组建了一个辛迪加，准备以94的出价买进其余所有剩下的国债。接着，我前往华盛顿去拜会蔡斯部长。这个辛迪加由一些纽约的银行家和很多的大资本家组成。我一抵达华盛顿就立马去拜访蔡斯部长，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准备向他以94出价全盘买进这些剩余国债。

他支持我的提议，但是请我暂时先缓一缓，容他先考虑一下，第二天早上给我答复。他犹豫的主要原因是他是否也应该给那些已经出价被拒的人一个平等机会，让他们也加入到这个辛迪加中。

我永远难以忘记那天早上去华盛顿给我的印象。我透过火车的窗户玻璃，看到一整列装载着铜制大炮的列车。列车至少有一打以上平板车厢，每一节车厢上都装有一挺这样的大炮，似乎随时就要出发冲向敌人。我时常回忆起当时那种感觉。战还是不战的问题鲜活地摆在我的面前，这是华盛顿之行感触最深的事情。

列车一宣布到达首都，我就从座位上下来，前往维拉德饭店。对于旅客而言，这家饭店是当时最重要（实际上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家饭店）的饭店，它风格古朴，非常具有历史感。我赶到自己的房间，迅速洗漱完毕，然后向暗黑的餐厅走去。一询问，我得知各政府部门的领导，包括蔡斯先生在内，通常10点钟都待在财政部。于是，我赶紧趁这个时间准点去拜访他。我递上名片，然后片刻没有耽搁地被引见给蔡斯先生。他身材高大，有点鹤立鸡群之感，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个超凡脱俗的人面前。

我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蔡斯部长，结果前面已经说过。

那时，华盛顿有78%的人是南方人。各办公室很大一部分人也都是南方人，他们随时有可能背叛。一切都令这个地方好像充满了阴谋和背叛。

在四处打探信息的过程中，第一眼所看到的那些大炮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时刻萦绕于心。关于战争的谣言满天飞，每个人都像紧绷了一根充满敌意、一触即发的弦。

混杂在这些人当中，使我深刻地感觉到一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局势无可避免地会陷入刀兵相见的境地。而且我感觉到这场斗争将是长期的和血腥的。

我离开纽约公司的时候，把自己对此的感想透露给了公司其他人，建议他们就此做好准备。我敦促他们赶快将手边所有的商业流通证券脱手，并请他们转告辛迪加的所有成员，之前我之所以组建它是因为要购买国债，但是现在我建议他们收回成命，因为我相信一场殊死战争即将上演，政府债券接下来肯定会有一个剧烈的下跌。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蔡斯先生，告诉他说，由于我感觉到一场长期的血腥之战即将触发，我在良心上不能无视辛迪加成员的利益，因此我收回前一天所提出的出价。

对于我关于战争持续长短的观点，蔡斯部长非常坚定地反对我的立场。

但此后，事实证明蔡斯先生是一位非常热情和珍贵的朋友，正是因为在他很大程度上有他的帮助和认可，才能使我在早年的战时华尔街经历中一开始就取得辉煌的战果。

蔡斯部长的观点是，他认为债券至少要取得面值，而它们将很快就會达到并超过面值。他之所以坚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预期眼前的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很快就要有所改观，在60天之内，所有的问题都将最终解决。

蔡斯部长如此乐观地估计南方坚持不了多久，这并不像现在的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奇怪，现在的人能随时全面地了解周围发生的情况，而蔡斯部长只是受到多数人的观念的影响，他们都大大低估了南方的耐久力。

部长以自己独特、高贵的方式，就像对待任何人一样，对我照顾非常周到。对于任何一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人而言，他待人接物的方式都能够给他们留下一个难忘的好印象。告别蔡斯部长之后，我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与他见面。实际上，他细致而富于魅力的举止，具有一种能够赢得几乎所有人（只要有此荣幸能够见到他）敬重的特征。他非常善于制造良好的第一印象，与其他印象相比，第一印象更为持久。

如果那时我没有去华盛顿，如果我未能正确理解和预见当时就已迫在眉睫的危机，那么我的公司就会像很多已经在当时的政府债券、商业流通证券、股票和其他价值易波动之产品上做过投资的人一样，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我完全有理由庆祝自己的好运气，庆祝自己能够在华尔街发展的开始阶段就逃脱

了这不死也脱一层皮的厄运，这也让我能够在此后国家危难之际，通过财政部，为保证联邦军的胜利，募集军饷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做出较大的贡献。

我第一次涉足国债交易是在林肯当政之前不久，那时科布先生是财政部的部长。他公开招募出价最高者发行利率为 5%，20 年期的美国国债，我的公司投标了 20 万美元，希望能很快周转并从中获得微薄之利。根据客户的要求，所定的利率为 5%。

包括我在内，这笔国债对大多数的投标者而言都有赚头，其中很大一部分利益归了洛克伍德公司（Lockwood & Co.），它当时被认为是华尔街上最大、最繁荣的股票交易公司。

乔治 S. 罗宾斯公司（George S. Robbins & Co.）、约翰·汤普森公司（John Thompson）、玛丽-考斯公司（Marie & Kaus）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现在我已经忘记了，总之有很多投标人。

因为政治事件的恶劣影响不久就迅速出现，导致了政府国债的贬值。有鉴于此，在上述公司当中，就认购这些债券而言，只有我的公司特立独行。这些认购者最初约定的 5% 利率都被损失掉了，这笔国债被允许保持现状，政府不再起诉这些拖欠债务者。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蔡斯先生在位期间财政部的困窘状态，而在这件事上，科布先生成为了备受责难的对象，他也确实难辞其咎。

我以面值认购的 20 万美元债券大部分都以 95 及以下的价格卖出，但是，我认购并接受这些债券的事实本身，无疑在战时一开始就为我的公司与政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它对于公司此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待到我再去华盛顿的时候，相对于公司其他的华尔街业务而言，此时业务更为集中在商业流通证券上。

我一到“街”上，就开始以货币的主导性市场利率加上通常的佣金率决定的价格水平，来大量买断各种商业承兑票据和应收账款，从而开创出了上面的这种局面。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公司很快成为商业流通证券的最大经销商，这项业务此前至少有 25 年都是由其他两家公司控制的，而它们固守的那套僵化老套的方法很容易就被我的新策略击溃。

那时的商人要到这些折扣公司，将他们已经背书过的应收账款放在那里销

售，只有将这些应收账款分拆开来销售，他们才能在那里有所收益。

我则采取了较为快捷的做法，就是给这些前来协商者一张即期支票，看起来一般都能博得他们的认可，这让我从大局上迅速地掌握了这类交易的主动性，这令我的竞争对手大为懊恼。

通过这种方式，我的公司累积了大约 50 万美元的票据，它们都分别在不同的城市银行和国家银行做了抵押担保。

待华盛顿之行得出了上述关于战争的持久性和艰巨性的结论之后，我立即回到纽约处理自己的流通证券。我马不停蹄、不知疲倦地工作，最后成功地卖光了所有的票据，只留下了莱恩·波奥斯公司 10 000 美元的短期票据和爱德华·兰波特公司 500 美元的票据。

我从华盛顿回来不久，就以比买入利率更高的利率水平，成功地完成了出仓卖出的任务，将它们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分担到更多其他人肩上。不到一周的时间，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萨姆特要塞第一声对抗的枪声响起来了。

公开开战的消息像野火一样很快蔓延传播开，在华尔街和整个商业界，随处可见各种令人兴奋或令人惊悚的疯狂景象。整个国家很快就陷入恐慌冲击之中。

股票价格下挫到恐慌价。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财富不翼而飞，百万富翁转眼就变成了穷光蛋。赚钱谈何容易，到处都充满了不信任的气氛。

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及时处理的那两家公司的股票大概是第一批要跌价的股票。那些我已经成功地协商好了票据开立人和背书人的有价证券还尚未到期，它们都无一幸免、全军覆没。

要不是我的运气好，像现在这样做到了及时清仓，恐怕我就可能着实实在地摔个大跟斗，其程度较之吉尔诺风箏从其所达高度摔下来，恐怕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个例子中，我之所以能全身而退，是因为我自己的灵感。我相信自己之所以能够在华尔街一直安然走到现在，也首先要归功于灵感，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我并非唯心论者，也不是什么泛神论者，但是，灵感或者说上天偶或的眷顾，随便您怎么称呼它，我不时要听命于它。是灵感让我用一只耳朵收集市场的“消息”，用另一只耳朵过滤掉其中有害的信息，而避免了它对自己的任何

伤害。看到那些到处泛滥地散布着所谓重要的“秘密消息”的朋友，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不论消息来源何处，凡人或是天神，我的灵感每年都有两三次能够救助我脱离经济险境。

我并没有像老范德比尔特那样沉迷于“敲桌子”或“问神”^①，但当濒临大风暴的时候，这种奇怪、特殊和告诫性的影响确实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

我还认识其他一些也有此神秘预兆能力的人，但他们却总是对自己的这种能力置若罔闻，轻易摒弃，这就导致了他们碰到投机突发事件，总会陷入无所适从之境。

因此，我再次重申要当心这些“消息”。它们就像是诱惑不幸的投机者自毁前程的“鬼火”，任何其他因素合起来都难以赶得上它的恶劣影响。

① 原文为“dark seances”。——译者注

第7章

Chapter 7

“垄断”及其对价值的影响

参议院“垄断”和期货委员会 ◆ 投机总体而言有利于国家 ◆ 价值的调节器和防止恐慌的重要手段 ◆ 各行业中的“垄断” ◆ 斯图尔特怎样制造“垄断” ◆ 所有的进口公司都做期货贸易 ◆ 反对“垄断”的立法会使企业驻足不前并造成经济滞胀 ◆ 只有阴谋家自己会在“垄断”中受到伤害 ◆ 黑色星期五“垄断案” ◆ 谷物投机有利于消费者

纽约股票交易所是由社团自发组织起来的，就像工会联盟、曼哈顿联盟一样，它并不受制于立法机构议会的特别宪章规定。因此，它不受议会的干涉。

虽然，在奥尔巴尼^①，总有人一次又一次企图以各种方式对股票交易征税，干预投机和投资生意，但幸运的是这些立法企图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1881年，汉尼拔和圣约瑟夫（Hannibal and St. Jo.）值得注意的“垄断案”后不久，议会又一次试图迫使华尔街臣服于奥尔巴尼的政客和说客的司法控制之下。

关于“垄断”的新闻文章不断吸引立法当局的注意力，这很自然地唤起一些高贵纯洁的有识之士，在公众群情激愤的时候，抓住这次“垄断案”的好机会，大声疾呼反对此类巨额投机中的令人震惊的不道德行径。

① 奥尔巴尼，美国纽约州的首府。——译者注

由此，参议院专门任命了一个“垄断”和“期货”委员会，召集华尔街各色人等前来，各自就这个焦点话题陈述自己的观点。我很有幸能够成为其中一员。我想都没想就立马接受了委员会的召集，我可不愿冒因蔑视委员会而停业并被非法监禁的风险。在大都会饭店，我镇静地在他们面前，丝毫不差地以金融家的特定方式回答了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而且我还给他们做了一个“垄断”研究的小小学术演讲。后来，我收到了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给我写的信，他们称赞我把这个问题解释得非常清楚明白。所以我能够说：“来自休伯特爵士的称赞才是真正的称赞。”因此，我之所以有勇气在这里以这样大的篇幅来再现当时的努力，并不是基于想作为一个成功的演说家而载入史册的强烈愿望，而是基于希望以一种较永恒的方式，记录下委员会对我关于“垄断”解释的合理性的认可。

待表示欢迎的掌声平息下来，我进行了如下的发言：

“垄断”和“期货”委员会的各位先生：投机现在作为一种方法被用来调节各方关于产品或证券的未来价值预期。投机这些年比前些年更普遍，其原因在于获取信息的设备更为智能化和快捷，并得到了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同时由于信息能够通过电报和电话传递，它的传递速度得到大大的提高。

在前些年，只有当农产品进入市场后，人们才能知道他们的收成。现在在农产品收获之前，影响它们未来价值的所有因素都能相当精确地了解。这些远景信息自然就成为投机交易的内容，而此前投机根本不可能存在。

投机开启了关于未来价值预期的博弈。它总是有两面性。真正关注事实和条件的一方最终会取得胜利，并且冲突的结果最接近正确价值。总的来说投机会给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利益。

看跌的投机基于供过于求的假定。如果供过于求的情况继续，那么这种产品的生产将受到遏制直到价格恢复，与此同时生产将会转向那些相对不丰富的物品。这样投机就成为价格和产量的调节器。看涨的投机则是基于稀缺或供不应求，它的直接影响是加速生产和恢复价格平衡。

“垄断”通常是由于过度投机，销售者所保证的交付量超过了他所能够交付的量。因此，他将自己置于合同对方的支配之下。这些紧急情况通常主要影响投机者自己，而对大众的影响却是很小的。

极端的价格通常产生于过度投机，但它仅仅是短暂的现象，对常规交易或现金交易的影响甚微，常规交易或者现金交易无碍于这种暂时、人为的价格水平。

评判投机不应该是基于它偶尔的极端性，而应该基于它的一般影响来判断，前面我们的分析表明投机是有益的。投机能调节产量，当稀缺出现时，通过即时的调高价格来刺激产量；当产量过高时，平抑价格。这样在商业世界中，它变成了预防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有益手段。

更重要的是，投机造就了证券市场，如果没有投机，证券市场就不会存在。铁路股票的畅销，使得铁路得以修建，从而实质上增加了整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并且为劳动者打开了一个更有利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它成为经营活动中企业和物质财富的先驱。

就像在华尔街的投机中一样，在各行各业中都存在“垄断”。斯图尔特先生，这位伟大的干货商人，在他的后半辈子中，他所制造的“垄断”超过了所有其他企业社团总和的一半。他主要采用签订针对特定种类商品的排他性生产的整体合同来达到目的。由于这些商品只能在他的干货店才能买到，所以他近似于“垄断”，并相应地制定了他自己的价格。

大部分大型商业公司也是这样做的。所有的进口公司都做期货贸易。销售产品的方式是，以样品为蓝本，协定在将来某个规定的时间交割，跨期从30天到12个月不等。同时工厂必须生产商品，大多数情况下，采购方必须等待它们生产出来，从千里之外运入本土。

如果不是在萧条期，我们的国家经常发生这种周期性萧条，谷物空头头寸及相关的一般活动所提供的支持，那么欧洲的大谷物投机交易商将会有能力操纵价格下降，集体抛售，每年都以远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采购我们的谷物。

在我们将自己的谷物卖给欧洲的时候，我们必须赚取一定的利润，否则我们的谷物贸易并不能增加我们国家的财富。

关于“垄断”的另一件怪事是：组织和操纵垄断的人往往会在垄断中受到最大的伤害。汉尼拔和圣约瑟夫的“垄断案”就是一个例子。波士顿的约翰·达夫先生（John Duff），以天才的智慧创造了“垄断”这个概念，结果他破产了。股票价格飙升到350，虽然卖空的数量只有1200股，但是这次不得不在280平仓。

在1872年由杰伊·古尔德在西北股票操纵的“垄断”结果也类似。股票价格由80开始，一路上扬到280，然后又跌回到原来的数字。我相信杰伊·古尔德在独自操盘。尽管他有无可比拟的逃出困境的能力，但那次操盘几乎毁掉了他。

专利是被法律明令保护的“垄断”。专利发明者对自己的发明有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通行的17年垄断权，这给专利发明者一个制造和销售专利所覆盖产品的权利。相对于原始成本以及像谷物和股票那样置于公开市场竞争中的价格，其销售利润经常高达百分之几百。

如果说委员会的目的是使企业停止经营活动，那么你们这个委员会确实有用，但是我认为你们的成功将是公众的灾难。

我既不相信法律能够规制企业经营，也不相信通过法律的力量能阻止竞争，结果只能是经营活动令人遗憾地陷于停滞。它将摧毁经营活动的动因，并抑制促进社会繁荣的创造力。

供求定律是最好的调节器。

国会在战争期间试图抑制黄金投机。但制止这类交易的法律一颁布，黄金马上就升值100%。这可吓坏了这些制定金融措施的聪明政客，所幸他们很快就表现得聪明一点了，急忙废除了这项法案。

这项法案失效的直观原因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哪里有政策，哪里就有规避它们的方法。这项法案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以高利贷法案为例。规避它的方式简直不胜枚举，并且实际上除了高利贷者的良知之外，利率是没有上限的，而高利贷者的良知又往往具有非常大的弹性。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说他能够钻任何一部国会法规的空子。杰克·夏普（Jake Sharp）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他能够钻奥尔巴尼州议会所制定的任何一部最好的法律的空子。杰克后来的事业遭遇到严重困难和成本问题而受挫，但他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真正好的法规仅仅存在于法律文本当中。

然而，除了阴谋家自己，很少有人会在“垄断”中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个事实就是对普通大众的最好保护，并且如果立法者想在他们的立法能力范围内有所作为，那么立法者应该选择无所作为。

“垄断”中的阴谋家通常会为他们的产品制定非常高且不受市场供求决

定的歧高价格。这也通常导致交易标的长期脱离于投机市场。汉尼拔和圣约瑟夫的命运为那些进行垄断操作的人提了一个醒：股票市场的报价很少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内持续在同一水平（被垄断的股票在垄断后的几个月将很少有人问津）。

以“黑色星期五”为例。黑色星期五对于那些与之密切相关的部门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大的灾难。它几乎导致了古尔德的破产，而且至今古尔德也没完全摆脱黑色星期五对他造成的道德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会在这个家族中延续下去，并成为家族丑闻而影响后代人。在许多人心目中古尔德已经成为“黑色星期五”的代名词，而且距离华尔街越远，人们心中对于两者的区别也越模糊。

在说这一席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评价乔治·古尔德（George Gould）先生，他是一名富翁的儿子，也似乎是一名非常有前途的青年。毫无疑问，他优良的教育背景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作为富家子弟的缺陷（我在本书的另一个章节将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古尔德在学校所接受的那种很常见的学院培养方式——填鸭式教育，这种教育方式会弥补他事业发展中潜在的劣势。这种劣势，依据我的理论，是由于他出生在富裕家庭而不可避免要存在的。如果他真正具备一个成功金融家的潜质，他就应该会试着去忘却他所生活的优越环境，就会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回头思考他的父辈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如果他足够明智的话，他也会更加自豪地去回味当初培育自己的父亲一举成名的艰苦环境，而不是安逸地去享受在纽约州阿尔文顿第五大道的华丽住宅，以及他父亲的豪华游艇和房车。所以我非常希望乔治将会是个例外，将会不同于我在其他场合所谈论的其他富家子弟。

当一个大商贸公司买断了某种商品的所有产品，从而使得其他人买不到该商品时，这样就形成了对该商品的垄断。

就垄断对其组织者的影响来说，商品垄断不同于华尔街（股市）垄断，它们不像华尔街股市“垄断”那样会让垄断者自食其果。正如在斯图尔特先生垄断操作的案例中那样，有时候商品垄断操作需要耗费操盘者毕生的精力。

有时操盘者的接班人能够维持垄断，但在这个案例中，斯图尔特的接班人希尔顿显然是失败的。尽管从某些方面来说，他比斯图尔特先生更有能力，但是他在垄断操作方面不像前任斯图尔特先生那样有天赋。可能是因为他太精通

法律，所以他有很强烈的规避“垄断”的倾向。

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很少有超级富豪能够通过“垄断”的手段而成为富豪。不管那些诡辩家和吹毛求疵的道德家们会说些什么，会如何看待垄断操作，它都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同我们的许多经营方式交织在一起，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不对这个世界上最完备的政治智慧（我这里是指美国的宪法）做些改变的话，我将不知道以后的路该如何走。任何敏锐老练如专门钻法律漏洞的精明律师那样的人，都难以从宪法条例中找出任何有关反对自由“垄断”的内容。

格雷斯通先生如是说：“这部法律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巨作，它在一段时间内经受住了无数聪明的头脑绞空心思地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完备的法律。”

我认为在宪法中并没有任何反对自由垄断的内容，所有那些出于投机目的的罪恶，都可以通过商业方法和普通法（无需诉诸于任何特权或特殊方法来管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得到抵制和控制。

处置垄断行为或者就像我在前面暗示的那样大规模地取消垄断，可预料地，这将会导致一场我们整个社会系统的变革。就像我们的立法者经常做的那样，大规模地取消垄断，这种行为方式体现了一种明显的歧视，也违背了我们的宪法精神。事实上，这种行为几乎等同于一种不道德的恐吓。

事实就是这样，试图通过立法来禁止垄断行为而又不影响商业投机行为这几乎是不可可能的。正如我前面所讲的，商业投机是调节价值、维护稳定和预防危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

我认为市场尽管会因为投机而使得价值急剧膨胀，但仍要比经济萧条更好。这种观点，我相信，任何经验丰富的人，不管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其他金融商务部门，都能证实。从长远来看，投机的结果对大多数人都是最好的结果。我相信杰里米·边沁的灵魂不可能死而复生，来始终如一谴责我关于市场价值的言论。

我认为，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投机是有利于消费者的。相对于没有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投机而言，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将逐年得到改善，不再容易受到周期性饥荒的威胁。

在结束“垄断”这个内容丰富的话题之前，我想讲一些我个人在这方面

的切身体会。那次的垄断，让我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唯一一次受到重创。那次垄断是由乔治亚州操纵的。

这个自治州发行了价值约 800 万美元的债券，所有这些债券都有很好的封印和正确的签名，并且是合乎法律程序的全额发行。我投入了 200 多万美元买进了其中的一部分债券。交易后不久，乔治亚州议会发布了一个委员会的歪曲事实的报告，这个报告经由该州议会送到我们的城市（纽约），大意是它所有的债券都被外州人持有。然后，他们通过了一项拒绝州外资本完全控制本州债券的法令，这导致了随后的债券价格下跌，并最终变得毫无价值成为一张废纸。当我意识到自己感觉投资良好的 200 万美元债券再也不能兑现成原来的 200 万美元现金时，我有一种被乔治亚州议会那些装模作样、虚情假意的矫情代表们垄断的不快感觉，他们利用立法者们的立法权，以州自治权的名义去损害临州友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行径令我愤怒。

在本书的另外一个部分，提到了一个叫哈莱姆（Harlem）的垄断案，这个垄断案合同签订价格为 110，而实际交割价格为 179。

这样就从空头手中搜刮走了约 300 万美元，一些著名的家族在这次斗争中倒下了。这次垄断案的结果就是使一些买进者被套牢，赔上了全部家当。

有一位经纪人，在股价为 150 的时候卖出买权，当价格涨到了 250 的时候被要求履行合同，他当时的状态与葛兰道尔如出一辙^①。他无奈地说道：“关于交割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可以要求我履约，我一点也不介意。”

在哈莱姆的这起垄断操纵案中，背后有两个垄断操盘手，一个是下议院，另一个是上议院。

在岩岛的垄断案中，多头买进了 2 万股股票，这个数量超过了实际的股票数量，导致股票价格从 110 飙升到 150 美元。

伦敦的金融家们对于垄断有着一种恐惧感，所以伦敦证券交易所不愿意冒风险去让美国的铁路股票在那里上市，尤其是那些发行数量非常大的股票。

垄断操盘手很少从中获得利润，相反那些相关联的操盘手往往很难避免因

① 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Henry IV）中有一个威尔斯的占卜者葛兰道尔，他自夸说：“我能召唤阴世的魂灵。”哈士伯（Hotspur）轻而易举地反驳他：“谁不会召唤？问题是鬼魂会应召而来吗？”重要的不是你的召唤有多崇高，而是有没有人回应。——译者注

垄断操作所致的伤害，除非他们打算拥有和控制所有的股票。即便是这样，他们也必须花费一段时间才能从投机市场中安全退出。

胡德森的垄断操作是其中最成功的操作之一。操盘手的利润率达到了 12%，比岩岛的垄断操作利润高出 4.5%。

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次垄断是由莫里斯·卡勒（Morris Canal）操作的，这个古老的魔幻般的操作除了垄断被人们记住外，其他差不多都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一切就像梦境一般，股票价格一路上扬，最后已经远远高出它实际价值的水平，然后有一些操盘手开始抛售股票。

这个操作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个旨在保护该股的操纵集团形成了。这个操纵集团买下了市场上所有同类股票并把它们封死在一个大箱子里面。这种操作手法对于华尔街的其他人来说还是前所未见的，空头对此也感到很惊讶。到了需要交割的时候，他们开始愤怒了，并控诉操纵家们犯了共谋罪。而此时，多头反问空头，他们为什么要卖出自己并没有真正占有的财产。

这场争议被交付经纪人交易所的仲裁委员会公断。这个知名的机构，对于垄断操作过程并不了解，他们以自己貌似公平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案子，结果最终的判决支持了操纵集团，他们以团体性共谋为由，被免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第 8 章

Chapter 8

范德比尔特船长的“垄断”

著名的胡德森垄断案 ◆ 范德比尔特船长是事件的主谋者 ◆ 他被迫对证券市场进行了垄断 ◆ 范德比尔特是怎样通过诡计使那些空头集团们变卖股票，之后又将其引入他所设的圈套里的 ◆ 他迫使空头在高价交割 ◆ 哈莱姆垄断案 ◆ 下议院设计出卖了范德比尔特，但是却陷入了自己所设的陷阱，从而损失了百万美元 ◆ 上议院也试图进行同样的操作，但最终遭到了与下议院同样的命运

在胡德森“垄断”中，股票价格从 112 飙升至 180，范德比尔特船长是此次垄断事件的主谋者。他不仅从与此有关联的所有其他方的手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而且更大的收获是他博取了人们的同情，因为他在获得垄断的过程中扮演的不是那种招人嫉恨的侵略者。在此次事件中，一开始他就处在一种迫于无奈的被动地位。他的反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自卫防范的一种状态，但这也使得他的竞争对手们为其草率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范德比尔特对莎士比亚了解不多，但是他自卫的行为却与年老的波洛尼厄斯^①给予他儿子的建议如出一辙——不要让对手有任何退路。

当范德比尔特掌握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就好像他惯常的做法一

① 波洛尼厄斯 (Polonius) 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译者注

样，很快进行了反击。

胡德森“垄断”故事的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点浪漫色彩。范德比尔特在横贯纽约的胡德森河的新泽西州岸边，躺在一堆原木上晒着太阳，而他的汽船则飘荡在河流当中，他享受着这应得的假期，试图抛开投机中的辛劳和对动荡状态的担忧。当他正沐浴着正午的阳光、颇有兴致地观赏着生长在河岸边的层林茂叶时，一个从华尔街来的信使将他从快乐的梦境中唤醒。这个信使给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有一个卑鄙恶毒的“卖空集团”正在谋划着把胡德森的股票卖空，伴随拍卖锤无情地锤起锤落，股票的价格飞速下挫。

范德比尔特起身抖了抖身上倦怠的气息，就像一头正准备一跃而起向敌人冲去的狮子一样，甩了甩头发上的露水。

范德比尔特迅速回到华尔街，命令他的经纪人买进所有的胡德森卖方期权（由卖方选择交割日期的远期合同）。于是，现金股票很快在市场上进行了交换，直到股票市场出清。通过简单的计算，表明除了少量不太可能出现在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之外，买方已经以现金的形式或远期合同的形式买空了所有的胡德森股票。

聪明的范德比尔特想出了一个新的博弈策略。由于有部分重要的空头需要交割胡德森股票，这意味着他们要从垄断了这只股票的范德比尔特那里买进股票，然后再根据买方选择的期限在10~30天不等的时期内，再卖回给垄断方。这个绝妙的策略旨在给空头集团造成一个认为垄断方气数已尽的印象，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垄断者缺乏现金一样。因此，据他们估计，很多重要的空头们都会抓住这个变卖几千股份的好机会，从而不断往市场抛入现金。这些都是由这位大“垄断者”的经纪人们秘密地进行的。

就这样，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这个计谋的方向进行，不明就里的空头们就要陷入这个圈套。卖方期权开始到期，空头们却找不到胡德森股价交割。

这个“垄断案”操纵得非常完美，股价上升到了180。而在几天之前，当范德比尔特正在享受着阳光，却发现空头集团在利用他的缺席而策谋诡计的时候，股价还只是112。这样一来，每100股的损失额达到了6800美元。

大约有5万股股票根据合同必须在这个价格上交割给“垄断者”。至此，一切准备就绪。

空头们霎时陷入火烧火燎之中。

但最坏的结果还没到来。那些已经变卖了股票的空头们被告知，他们必须交割了。他们抱怨多头的忘恩负义，空头为此不得不被迫交割股票。但是多头的宿怨难消，他们要求交割属于自己的资产。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妥协建议，那就是希望以每天5%的利率贷出股票。有些空头考虑到“垄断”只是暂时的，真的以这种信贷方式支付给了多头利息，但是股价上升的态势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这些可怜的受害者们，虽然连续几天每天都要以5个百分点的利率支付给多头利息，却仍然要高价买进股票来交割。

这种双向的股票交易策略是垄断操作中所使用过的最有效的计谋。这个策略成就了范德比尔特金融战略家的美誉。

此策略最妙之处就在于，多头避免了背负所有股票的局面，而是从来回的双向交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当一些空头在170上买进股票时，范德比尔特的私人经纪人在140上卖出，多头由此巧妙地以较好的卖价抛售了这些股票。在整个“垄断”操作史上，它都不失为是最好的内部转移方法之一。

通过这样的方法，多头避免了可能背负全部资产或者大部分股本的风险。在范德比尔特的高超操纵下，在交易尾声时多头所背负的负担相对较轻，资产维持在了此前一样好的水平，这在“垄断”中是最希望出现的结果。

哈莱姆“垄断”比起胡德森“垄断”来，操作上更加巧妙，但却没有胡德森“垄断”情况复杂。相对于前者，胡德森“垄断”太顺利了，但是，胡德森“垄断”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范德比尔特是“垄断”天才的事实。当他操纵哈莱姆“垄断”时，他在铁路方面没有任何经验，而他也已经是69岁高龄了。

在这一章中，我之所以首先介绍胡德森“垄断”，是因为在许多方面它都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垄断案，尽管它发生在哈莱姆垄断案之后。

在范德比尔特所涉入的几乎所有“垄断”案中，他最初都是处于一种自卫防护的地位，他并不是一个侵略者，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实。他经常要被迫为保卫自己的资产而努力抗争，否则他的资产就可能被抢食殆尽。

买进哈莱姆股票是范德比尔特在铁路股票投机中的第一次冒险行为。他在1863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投资者买了哈莱姆股票。而30年前，他曾经被邀请投资哈莱姆，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讽刺地评论道：“我是一名蒸汽船商人，而

您却告诉我们，这些蒸汽发明的竞争者^①要在干涸的大陆上奔跑。前进吧！我只能致以祝福，但是我自己决不会跟他们做任何事情。”

当范德比尔特买进哈莱姆股票的时候，每股卖价为 8~9 美元。这在我到达华尔街时已经下降了 3 美元。他将钱投入到铁路业，开始进行投资，股票价格迅速上升至 30。很多人预测范德比尔特在汽船业上赚取的钱会在铁路业上前功尽弃，全部赔光。

但是，股票逐渐上涨到了 50，此时投机者们开始察觉到内部正在发生一些变化。1863 年 4 月的某一天，纽约市下议院批准通过由范德比尔特承建由百老汇到百特里之间的电车道。因此杰克·夏普并不是首创，因为范德比尔特在他之前的 20 多年前就已经做过了。

那时候的市下议院并不是清廉无瑕，尽管杰尼斯（Jaehnes）和维特斯（Waites）都逃脱了惩罚。他们在得到范德比尔特的钱之后卑鄙地欺骗了他，而范德比尔特也对他们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当范德比尔特被赋予铁路经营特许权之后，哈莱姆股票提升至 75，这时市议员们开始卖空。他们以为范德比尔特已经被他们牢牢掌控，因此，将他们的朋友也拉进了此次行动。他们以为能够通过卖掉足够的股票轻松赚取几百万的利润。他们的计划是将市场拥有的所有哈莱姆股票都卖空，然后废除可能导致股票下降至 50 的法令。德鲁就是参与此次议员空头交易中的大空头之一。

当范德比尔特获悉此消息之后，继续买进哈莱姆股票，并动员他的朋友们也来参与其中助他一臂之力，最后获得了市场所能提供的所有“卖空”的股票。操盘手们已经卖掉了比实存数量还多的哈莱姆股票。当时，哈莱姆股票已经有 11 万股了。当市议员和他们的朋友以为几百万美元的赚头已经到手的时候，他们就废除了法令，同时民事诉讼法庭的布莱第法官下令禁止在百老汇街道铺设铁路。

每个人都认为范德比尔特这下在劫难逃，得彻底破产了，但是哈莱姆股票却仅仅下降了 3 个点，跌至 72。这令市议员和空头集团非常惊奇，他们认为股票至少会跌至 50。由于股票需要交割，空头不得不再次进入市场，于是哈莱姆股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攀升，从 100 到 150、170，最后上升至 179。市议

① 这里指火车。——译者注

员被迫在 170 上交割所有股票，范德比特由此获得了所有股票。市下议员损失了 100 万美元，被建议卖空股票的那些朋友们则损失了几百万美元。而范德比特则“一下子猛赚”了 500 万~600 万美元，继续按自己的既定方针高兴度日，并继续修建着他的哈莱姆铁路，而且，现在他作为副总裁，还拥有了“立法权”。

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市下议院在这次垄断中受到的惨痛教训，能教育其他人在股票投机交易中小心范德比特船长。虽然这样的说法对于船长来说太过新鲜，但事实上确实如此。一般来说，人们不会通过谚语或别人的例子来学习，他们必须亲身体验一些痛苦的经历。

上议院也立即陷入了同下议院一样的困境，这可是他们咎由自取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船长通过买入自己公司的股票获得了胡德森河流铁路运输公司的控制权，随后他又说服上议院的大部分成员通过了一项议案，来加强铁路同哈莱姆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赢得了政府官员在这项议案上签字的承诺。

1864 年初期，哈莱姆的股份又再一次上涨，从 75 涨到了 150。

上议院的成员之所以通过这一议案，其实只是想先把船长的钱据为己有，然后在下议院行动后，策划一场阴谋来击败他，这样就可从船长的垮台中赚上几百万美元。船长在上议院有一个精明的说客，不过，这个人也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他来纽约只是为了买股票升值，因而有必要促成这项议案的通过。他到华尔街没过多久，就了解到上议院正在重蹈下议院前一年惨败的覆辙。船长要他密切留意着奥尔巴尼，他也一直在华尔街买进股票。

这项议案最后以失败告终，哈莱姆的股份从 150 狂跌到 90。船长陷入了困境之中，并且还因上议院的贪婪而感到可怕的不安。如果上议院过去曾经买进并以 90 美元交割，就可以立即赚得船长损失的 100 万美元；但是，就像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一样，他们不满足于此，还想要更多。只有哈莱姆的股份跌到 50，他们才有可能满足，这样他们可以获利几百万美元，而船长也会被彻底击垮。这可能是船长生活中最黑暗的时候，他无计可施，根本不知道怎样来扭转目前的局面，几乎濒于精神错乱，常常向挚友可怜地倾诉他在这场危机中的感受。他几乎处在崩溃的边缘，于是派人去请老约翰·托宾（John Tobin）回来，约翰·托宾曾经是斯特登岛渡船候船室的一个看门人。托宾在之前的哈莱姆交易中已赚了 100 多万。船长告诉托宾这些背信弃义的上议院成员都做了些什

么。约翰也一直在买进哈莱姆股票升值。

“他们也让你进退维谷了，约翰，”船长说，“你感觉怎么样？”约翰叹了一口气，说他的感觉一点都不好。“难道就让他们这样吸我们的血吗？”船长问道。

约翰还是叹气，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约翰，难道那些家伙不应该遭到谴责吗？”船长强调道。约翰肯定地答道“应该”，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为在那一刻大局似乎掌握在“那些家伙”手中。

陷入一阵沉思后，船长很快又坚定地对约翰说：“约翰，只要他们不死，就让我们来教他们决不要贪食，我们试试再来一次‘哈莱姆垄断’。”

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试试再来一次哈莱姆垄断。约翰筹集了 100 万美元，伦纳德·佐罗米（Leonard Jerome）也加入了这场战争。在与上议院的这场“博弈”当中，他们大约拿出了 500 万美元，事实上他们每一次都有机会选择退出。从一开始就像是一场无声的战斗，船长是一个精明的玩家。除了胡德森垄断案之外，他从没有像这一次这样殚精竭虑，在这两个垄断案中，他充分地显示出了他的灵感。

上议院的成员们完全乱了方寸，不知所措。“如果上帝决定摧毁他们，他们会第一个发疯。”在哈莱姆垄断的操作中，这句古老又经典的格言似乎特别适合他们。为了卖空哈莱姆，他们中的一些人抵押了自己的房子和土地。他们说服所有的朋友相信失败是绝对不可能的，并且把所有能影响的熟人都卷入到这场哈莱姆投机中。

几周过去了，上议院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已经卖掉了数百万将要在今年夏季不同时期成交的哈莱姆股票，因为到那时他们预期哈莱姆的股价将会停止下跌，大概跌到 8~9 美元，也就是船长原先买进的价格。

此外，他们甚至猜想船长会自己或者指派他的游说议员代表他出现在奥尔巴尼，但事实让他们失望透顶了。船长从没有离开华尔街的经纪人公司，并且还一直在买进哈莱姆。上议院的成员们认为他一定是疯了，至少是老糊涂了。那时船长已经 70 岁了，按照《圣经》的说法，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了。

船长继续买进哈莱姆股票，这在一般人眼里似乎是荒唐之极、不可理解的，直到他买进了 27 000 股股票，远远多于哈莱姆实际的数量。

当初上议院的成员们想要陷害范德比尔特，现在他们却是咎由自取，当他们为了平仓想再买进的时候，股市上的哈莱姆已经被卖空了。范德比尔特和他的经纪人牢牢地将所有股票囤积在他们“坚固的盒子里”。

上议院的成员们已经完全束手无策，他们再也不能幻想着从船长那里得到一丝同情和怜悯了，因为他对他们什么也不亏欠，尽管他去世之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徒，但实际上那时他对伟大的基督教教条基本上一无所知。“以德报怨”或是“如果他要打你的右脸颊，把你的左脸颊也让他打”，那是基督教徒的教条。他倾向于接受教友派信徒的实用主义信条，当他们被打右脸颊，又被要求转过来打左脸颊时，教友派信徒会答道，“朋友，你还没有完全领会吧，书上还说‘把你欠下的通通还给我’”，然后把那家伙打倒。

这就是船长在哈莱姆垄断案中对付上议院的成员们一直严格遵循的行动规则。

当某种迫害是否会危及到他还不确定的时候，船长会回答说：“能忍则忍。这种把戏我见识得多了。”

毫无疑问，即便是仅仅为了他两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伦纳德·佐罗米和约翰·托宾的强烈请求，他也会先对上议院成员、政府官员及其同伙的迫害采取忍让的态度，然后将他们彻底打垮。

与范德比尔特一样，佐罗米先生对这些上议院的成员本身并无丝毫同情，但他有一颗爱国之心，期望好好“照顾”华尔街，于是当涉及到一系列投机问题和各种各样的不同利益的时候，他展示了作为一个能干的金融家所应具备的广博见识。

佐罗米对船长说：“如果您要实施威胁，那么您会摧毁华尔街上的每一间办公室。”

在佐罗米郑重的恳求下，就像法老王请求犹太人一样，船长不得不屈服于那种世界大同的本性，他最终同意让上议院以 285 的价格买进哈莱姆平仓。

一天之内，有 15 000 股在这个价格上成交。看到这里，投机商们可能会停下来踌躇三思。1857 年这只股票以 3 美元的价格卖出，1864 年涨到了 285 美元，甚至可以达到 1 000 美元。如此之大的投机空间，难道你没有感到惊讶吗？

再想一想，凭借一个人之力，就可以完成这场精彩的反击，战胜整个上议

院及其幕僚！尽管这里“藏龙卧虎”，聚集了美国最狡诈的律师，精通于各种欺诈骗术，他们诱导和教唆上述的上议院及其幕僚。

在这场反击战中，虽然船长没有接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这群训练有素的知识阶层。想一想这些，您对于船长的精明现在应该有所了解了吧。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天才，在金融界无人可以媲美。在他的一生当中，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够比这次对上议院的反击战更令他感受到无法言说的快乐。当人们过后提到这件事时，他会说：“我们战胜了整个上议院，很多绅士还没有还清他们的账单就不得不回家了。”就这样哈莱姆的第二次收购结束了。

许多大券商受到这起垄断的打击破产了，一些个体投机者也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丹尼尔·德鲁差点陷入泥潭中，由于在法庭的影响力，他最终逃脱了，只赔了 100 万美元。

这里不细谈著名的伊利垄断案了，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将对此做一个介绍。

第9章

Chapter 9

德鲁和伊利垄断

与范德比尔特达成友好互信 ◆ 双方协商的折中方案是如何实现的 ◆ 在范德比尔特的卧室，与菲斯科和古尔德的一次有趣会面 ◆ 理查德·谢尔是如何为范德比尔特筹款的 ◆ 德鲁获得的战利品 ◆ 他试图从华尔街隐退，但是做不到 ◆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伊利公司共花费了900万美元 ◆ 古尔德和菲斯科继续给伊利股票注水，使得股票发行量扩大到2300万美元，但将德鲁排挤在外 ◆ “丹尼尔大叔”回到华尔街 ◆ 他被菲斯科和古尔德诱骗联合坐庄，损失了100万美元，他从坐庄集团中撤资 ◆ 接着，他独自做“卖空”操作，并且扔掉了数百万美元 ◆ 他试图祈祷，但是“没有用” ◆ “这个没用，兄弟，股市仍然看涨” ◆ 他一直祈祷并注意着自动收报机 ◆ 绝望地“逼空”，被他以前的弟子和伙伴击垮

大约在4月中旬的时候，德鲁从他在泽西市的避难所出来，公开现身华尔街，显然是毫不害怕被逮捕的危险。伊利派的其他成员都正式开脱了藐视法庭的罪名，但是他们并没有与范德比尔特言归于好。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到了7月份，他们与范德比尔特达成了一个协议。

双方协定，范德比尔特的50000股伊利股票（此刻分文不值）必须以70美元（接近他当时的购买价格）脱手，为此他将获得250000美元的现金，以及单价为80美元总值1250000美元的波士顿·哈特福德·伊利（Boston

Hartford & Erie) 债券。并进一步约定，他还将收到 1 000 000 美元的邀约特权，在 4 个月内的任何时候，他都可以 70 美元每股的价格脱手剩下的 50 000 股伊利股票。范德比尔特在伊利董事会中安排了两个席位。曾经龙争虎斗的两个派系，如今所有的诉讼都将解决，所有与诉讼有关的冒犯都（用法律的语言来说）会被宽恕。

那么，双方是如何协商并达成折中的呢？这可以说是这场著名的伊利铁路股票交易案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德鲁与范德比尔特进行了一次有名的周日晚会面，德鲁眼泪兮兮地表现出对自己的泽西之行的深深悔悟，他的表现为他赢得与范德比尔特的伙伴关系铺平了道路。此后不久的一天早上，古尔德和菲斯科一大早就到范德比尔特在华盛顿州的住宅看望他。菲斯科用他那油腔滑调、厚脸皮而又活灵活现的方式津津有味地讲述了与范德比尔特见面的故事。菲斯科说：“古尔德想等到范德比尔特从床上爬起来，我可不管，我按了门铃，然后门一打开我就冲进他的房间。范德比尔特正坐在他的床边上，一只脚穿好了鞋，另一只还是光脚。他起床了，我看着他另一只鞋子穿好。我记得他的鞋子很特别，有四个带扣。我以前从没见过那种式样带扣的鞋子，我想如果这种人总穿这种鞋子的话，我也想去买一双。他说我既然找到地方躲起来了，就要藏好；还说，如果我还待在那里，他会继续叫他的侦探（律师们）去侦查我们的去向；还说如果我们不拿走他手上那些股票（此刻已不值分文）的话，他必然会让那些侦探继续追查我们，否则的话，他就不是范德比尔特。我告诉他说，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肯定不会买任何股票，否则的话，我就不是菲斯科；我还说，他这是咎由自取，是他应受的。这样的打击会让他变得成熟。我告诉他，他是一个强盗。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诉讼案就永远不会撤回。在达成协议之后，我说，这个方案简直是强取豪夺；还说，我们是自己把自己卖给了魔鬼，古尔德感觉就跟我一样。”

在这起“垄断案”的困难时期，支持范德比尔特的朋友中间，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之外，还有威廉·希思（William Heath）、理查德·谢尔（Richard Schell）及其兄弟奥古斯塔斯（Augustus）以及鲁弗斯·哈齐（Rufus Hatch）。理查德·谢尔非常有经验，也异常精明，他自愿为范德比尔特的投机战争筹钱。由于伊利股票发行量过大，银行彻底拒绝借款之后，他凭借自己的老练和机灵，设法为伊利争取到了贷款。在一次遭拒之后，他询问了各家银

行，结果发现他们中大部分都有纽约中央铁路的股票。于是，他到一个银行，说：“如果伊利铁路股票的股价为 50 美元的时候，您不借给范德比尔特 50 万，那么他明天就会把纽约中央铁路股票的价格打压到 50 美元以下，这条街将有一半的银行受到冲击。您应该知道自己会不会是其中的一个。”

这样的威胁他在其他各家银行都累试不爽，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这就给范德比尔特提供了投机战斗的动力，但他其实只是竹篮打水，浪费弹药。

过量发行的伊利股票毫无限制源源不断地流向范德比尔特，他试图垄断伊利的梦想最终完全破碎。

当这些赌徒们把掺了水的股票送给范德比尔特时，菲斯科说：“只要印刷机不坏，我要是喂不饱这头老蠢猪对伊利股票的要求，我就真是该死。”

印刷机没有坏，相反，它运转得很正常，直到范德比尔特快要承受不住了。要不是范德比尔特百折不挠的精神，还有他在法庭所拥有的支持，他早已破产了。对华尔街的人来说，范德比尔特的幸免于难简直是一个奇迹，古尔德和菲斯科也甚感惊奇，他们碰到了一个值得与之一搏的敌人。尽管范德比尔特向外泼水似的泼出了 700 万美元之多，但他总算还是设法支撑住了这个市场，他预防了一起金融风暴，至少对当地的影响，这场风暴像黑色星期五一样的损失惨重。

一些在这两个金融大佬的冲突中遭受了巨大打击的无辜持股人，收到了一笔安抚款，以安抚他们受伤的心，这笔款项共计 429 250 美元。以艾尔伽吉先生（Mr. Eldridge）为代表的波士顿派将脱手 500 万以前的伊利债券，收到伊利承诺的 400 万美元。

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伊利公司共花费了大约 900 万美元。伊利的股票和债券持有人都背负上了藐视法律和正义的责任。

古尔德和菲斯科假装反对这个解决方案，让公众以为这一切都是德鲁和范德比尔特搞的鬼。事实也确实如此，公众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恐怕也只有这个了，唯有如此他们才能从复杂的局面中解脱出来。毫无疑问，范德比尔特给德鲁的留言条（因为这张留言条，泰勒酒店解雇了传递留言条的服务员）是整个事件的玄机所在。

德鲁从这次的“垄断案”中分享到了净 700 万美元的果实，只是他还必须支付给伊利公司财务部 540 000 美元，清偿可引起伊利公司随时将他告上法

庭的欠款和利息。假装的友善谅解为古尔德和菲斯科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战利品，伊利铁路最终落入了此二人之手。

接着，德鲁从华尔街隐退，就像此后古尔德经常做的那样，只是德鲁可能确实有这样一个很诚实的想法，只要有可能，他就有永远离开华尔街的想法，但是可以看到他并没有这样做的能力。一日在华尔街，终生就别想离开华尔街。它就像写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声明中圣徒坚定不移的教条。当投机者完全陷入着魔的境界时，他就不可能走出来。

如果德鲁能带着《圣经》和赞美诗隐退到普特南镇平静的山谷中一个世外桃源，他本来可以凭借这几百万美元，很好地享受生活和信仰的慰藉。但是，某种潜在的神秘力量或吸引力，就像符咒一样迷糊了他的大脑，就像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描写的那个南茜·塞克斯，她在设法逃离杀人犯“比尔”时，牢牢地抓着那个符咒。

德鲁重新回到华尔街，观望等待着，他已经被符咒征服，一点都不像凯撒^①。

当他在消失几个月后回到华尔街时，景象完全变了。他的两个弟子已经展露出了精明的股票投机专家的潜力，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已经超越了能干的老前辈所能想象或反复灌输的对财富最疯狂的设想。在4个月中，古尔德和菲斯科将伊利的资本股票从3400万增加到5700万。毫无疑问，丹尼尔大叔对他们的进步很是吃惊，我们最好去想象而不是描述他此刻的感觉，面对财富巨幅的增长，他不认为自己还是伊利的财务主管，他无权也无份于伊利史无前例的财富增长。

然而，他仍然具有很强烈的投机意向，但是在再次涉足投机买卖时，他好像已经不再那么狡诈。就像瑞普·凡·温克尔^②(Rip Van Winkle)，在酣睡了20年之后，突然从断头谷的睡梦中醒来一样，他感到非常失望，他开始意识到欧文顿周围环境的变化，现在是古尔德故乡所在的位置。

他的投机操作战略已经发生了改变，很快他发现继续呆在空头的一边必将失败。他被他的老搭档邀请一起联合坐庄，玩儿了一把流行的蜘蛛抓苍蝇的游

① 凯撒返回罗马后，被罗马人民授予终身一人统治的权力。——译者注

② 美国作家欧文斯所写一篇故事的主人公，其思想、见闻等方面都非常落伍。——译者注

戏。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德鲁一直都在扮演蜘蛛的角色，诱骗那些易上当的苍蝇从各个方向飞到他的阴险的蜘蛛网里。现在，他被叫去扮演苍蝇的角色，然而他以前的学生扮演蜘蛛。简单地说，在一次冷淡的请君入瓮把戏中，他被邀请进入伊利的一个“盲资公司”，他存了400万，闭上眼睛，张开嘴，任由伊利公司的骗子们的喜好，把太妃糖或水果糖放进去。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持着幕后操纵或蒙蔽他人的特权，相反，他现在只是一个任人摆弄的傀儡，必须看古尔德和菲斯科的眼色行事，任由他们蒙蔽自己。他不能问任何问题，只能接受古尔德和菲斯科给他的任何东西，并为其付款。这些太伤人自尊了，简直令人颜面扫地，所以丹尼尔大叔开始奋起反抗。他不想再仅仅作为吹笛者付款，但却没有挑选乐曲权力的人了。所以，在付出了100万美元的损失代价之后，他撤回了资金，开始勇敢地考虑如何向狮子洞旁边的这两只年轻狮子发起挑战，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这个狮子洞正是他们打造的，这两只狮子也是他精心培养的，而他们现在却都忘恩负义，转而攻击他。古尔德和菲斯科对丹尼尔大叔这种欺诈伎俩也颇感恼怒，而实际上丹尼尔大叔的这种做法正反映了他拒绝受他们摆布的想法。无论如何，事实上丹尼尔大叔不可能忠诚地对待任何人，即使是他们也不例外，就像埃塞俄比亚人改变不了他的皮肤，美洲豹改变不了它的斑点一样。

德鲁虔诚地考虑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保持他以往的一贯作风，自己来操纵。预言家告诉他应该卖空。很明显，似乎上帝判了德鲁的死刑，他在市场持续上扬的时候，却仓促而疯狂地卖出，这注定了他的毁灭。

在这个紧要时刻，他接受了一位基督教徒的忠告，这位基督教徒建议他向上帝祈祷。他很虔诚而努力地这样做了，但是却忍不住时常看看自动收报机上的信息和行情表，这很明显分散了他祈祷的精力。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对虔诚祈祷产生了怀疑，他对那位基督教徒哭丧着脸说：“这没有用，兄弟。市场还是在上扬。”丹尼尔大叔不再祈祷了，他只能绝望地死盯着自动收报机。

在11月期间，德鲁签订了在当前价格（约为38美元）交割70000股伊利股票。他继续这样的操作直到无望地被垄断彻底逼空。然后，他向法院提出了诉讼申请。他以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的名义申请到了一道强制法令，但是被古尔德和菲斯科向他们忠实的法官巴纳德申请的另一道法令取消。这位正直的法官不仅签发了一道指令，禁止一切旨在反对古尔

德和菲斯科这两位杰出市民的诉讼，而且还任命古尔德接手掌管伊利公司。他还授权伊利公司主管者可以用公司的资金以低于面值的任何价格来购买和注销 200 000 股股票，而不管它们发行时的价格为多少，但这些股票发行的合法性曾受到质疑。

古尔德和菲斯科曾在熊市时以 40 美元的价格发行了这些股票，然后将股价逼落到 35 美元，随后他们就能够在这个牛市按面值价格把它们买回来。尽管法律禁止公司成员交易本公司的股票，但是在位高级法院法官的授权和准许下，他们还是成功了。就这样，这两位著名的操盘手通过合法地超越法律，逼空了他们的老朋友和老师德鲁。

通过这个巧妙的操作，伊利股票变得供不应求，它现在以 47 美元的价格卖出。而在这个价格上，德鲁则被迫绝望地全力买进他抛空的这只股票，可是股票价格在星期一和星期三之间就升至 57 美元。华尔街陷入了严重的骚动中，就如报纸说的，最振奋人心的时刻到来了。伊利股价又一次跃升到了 62 美元的高度。很明显它必然还会继续上升。当一艘可能载有大量伊利股票的蒸汽船驶往华尔街的时候，有迹象表明德鲁至少在两三天内恐怕是难以解脱了。但是，很明显，德鲁的百万美元已经基本上丧失殆尽，并且，随着他那些不义之财的流失，他的大部分信用也随之流失。他的对手们还在不遗余力地向他施压，很明显他们决定尽快铲除他。

到下午 3 点的时候，战争愈演愈烈，这两头投机的年轻狮子决定要毫不留情地收拾德鲁这头年迈的熊。

就在德鲁似乎濒临彻底破产的边缘，市场即将关闭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伊利公司有 300 000 股伊利股票是以 10 股一批的形式发行的，这些股票当初操盘手们以为能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秘密地保存好。但当股价达到 60 美元的时候，这些股票就开始外流出来了。而结果显示，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从未离开过国内，而是被安全地把持在零售商、机械工、食品商、小银行家和经纪人等的手中。随着实现可观利润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股票被抛向市场。伊利派想设法在股票落入德鲁手中之前全部买进，这种做法严重地削弱了金牌操盘手的资金储备。祸不单行，在这个关键时刻银行家也拒绝担保他们的支票。因此，德鲁总算得以以 47 美元的价格圆满地签订了合同。但是从投机的角度说，他可以说是溃败了。当然，尽管自己陷

入了可悲、可怕的衰败，但他也几乎扳倒了孤注一掷的攻击者。股票价格接着跌到了42美元，伊利股票变成了股市上的一只垃圾股。胜利者虽然实现了摧毁对方的目的，但他们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在接近胜利的时刻自己也濒临毁灭。他们以垄断价购买了自己的伊利股，并被迫持有这些股票，因为再也没人想要它们。更有甚者，伊利派一度被从董事会中排挤出来，要不是我们的英国表亲们太过轻信，这只股票就不会在股票市场上兴风作浪那么久了。

尽管年迈的德鲁遭到了恶劣的对待，但没人同情他，因为他不过是咎由自取，受陷于自己的贪婪、优柔寡断、背信弃义和诡计多端之下，否则，他会以同样的方式咬住其他人。

他根本没有资格抱怨他以前的搭档，菲斯科这样告诉他，不能归咎于他们的操作方法，毁掉他的伊利股票之所以会过度膨胀，正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是他设计了这套操纵机制，给它施加动力的，他以前的搭档们只不过是这套机制略加修改，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些新发明和新专利而已，他们将这些新专利融合到丹尼尔大叔发明的旧机制中，从而成为了华尔街有史以来用于制造和操纵“垄断”的最佳组合方式之一。

在所有伤害中，最过于冷酷刻薄的，要数在德鲁濒临灭顶之灾的前夕菲斯科对他的嘲弄，认为其关于伊利股票管理不当的抱怨非常荒唐可笑。

这位杰出的门生嘲弄性地对他亲爱的年迈导师说：“您将是最后一个对自己在伊利中的地位抱怨的人。”

这位宽宏大量的人无情地说，德鲁对别人没有丝毫的仁慈，也不能期望获得别人对他的一点点怜悯，这真是一个可悲的事实。

在菲斯科和古尔德对德鲁取得最终的决定性胜利前，两人与老德鲁私下在伊利办公室内会面的场面确实令人扼腕叹息，但是三人当中，德鲁自己更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贪赃枉法的政界人士中缺乏公认的荣誉。德鲁在反对伊利派的诡计时，曾经得到过范德比尔特在法庭和股市上的支持，然后他又将枪口直接转向古尔德，他背叛他的盟友及其为自己安排的计划，希望通过这种羞辱和欺骗的卑鄙行为能从他的老同事那里获得怜悯。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肯定晕了头，因为他应该比较了解古尔德。他乞求和恳求古尔德和菲斯科，准备屈服在他们的脚下。他哀求他们让自己加入，用他剩

余的财富，给老造纸厂再制造一次机会，印刷出更多的伊利股票，以便让他从这场残酷的“垄断”中脱身。在这场垄断中，他就像一只蝎子一样，被他自己的罪恶与不幸笼罩着的烈火围困。

但是，他的门生们却向他证明，他的做法已经让他们受益匪浅了。正如德鲁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做的那样，他们表现得非常无情。他们就像是人格化了的夏洛克^①的化身，或是丧失了良心和人类同情心的两个德洛米奥。再没有什么丹尼尔了，德鲁只能靠他自己来应对判决。没有漂亮的波西亚^②来为他辩护，即便此时存在这样一个天使般的人，即便她能够“征服”菲斯科，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古尔德能成功地抵御她的魔力。

当看到无法和他们和解时，德鲁只得黯然离去，第二天早晨他怀着绝望后的勇气回到华尔街，谈判的结果上面简单地介绍过了。在那场重大的投机战中，他损失了将近 200 万美元。

① 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是贪婪、残忍、追求钱财、不择手段的守财奴。——译者注

② 波西亚：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角。——译者注

第 10 章 Chapter 10

恐慌、恐慌的原因及如何 规避大恐慌

恐慌并非市场的偶然反常 ◆ 我们国家仍然是拓荒国度 ◆ 恐慌问题尤其是美国的恐慌问题 ◆ 大量有欠考虑的新投资导致了贸易的剧烈波动 ◆ 对财富的内在价值的不确定性 ◆ 铁路资产价值的突然缩水，恐慌产生的原因 ◆ 风险及恐慌与先驱企业如影相伴 ◆ 我们已日渐减少对欧洲货币市场的依赖 ◆ 恐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贷款人的审慎与自我控制力 ◆ 国有银行强制执行储备金的条款也是激起恐慌的危机之一 ◆ 乔治·希尼 ◆ 约翰·伊诺 ◆ 费迪南德·沃德 ◆ 票据交易所：经济恐慌的防护伞

当前，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学科，像研究恐慌的根源和治理这一学科那样缺乏理论体系了。对于恐慌，通常都将其归结为一种偶发的市场反常，它源起于之前的鲁莽投机，并受失去理性的银行和公众的行为控制着，恐慌很容易预防，发生后也容易治理。

这些说法都只是肤浅的泛泛之谈。对于那些有着悠久、成熟的经济发展历史，且成立新公司的风险也不大的旧有国家而言，这些说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比如在法国和德国，经济风险几乎全部由政治风波引起；这些国家也较容易避开由单纯经济原因导致的恐慌。而在美国，恐慌恰恰主要是由这些欧洲国家所能轻易避开的经济原因所引致。

虽然美国人口众多，各行各业已经进行了大规模、井然有序的整合，但我

们仍然是一个拓荒的国度。每隔十年，美国的人口约增加1 500万，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现已十分庞大的国度，每十年我们就要增加相当于一个一流发达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如此空前的国民数量增长，必伴随巨大的投机冒险，以及巨大的商业和金融风险。新增的人口必须开垦新的领地，新的土地必须清理，新的矿产必须开采，新的产业必须建立，新的铁路必须建造，新的银行与新的公司必须成立。这些新的冒险事业不可避免地都带有一定的试验性。它们有些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失败，而有些则可能取得巨大成功。它们为了取得经营利润首先必须垫付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借来的。这些贷款由于属于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投资，因此必须通过抵押来保障安全性，由此它们都缺乏那种良好投资所具有的价值稳定性。

结果，各种关于股市、抵押及商务文件的问题总是源源不断地出来困扰我们，使得我们随时都需要背负沉重的债务前行，承受源于这些债务产生基础之不确定性所极易导致的大幅价值波动。除了这些新的投资，那些仍处于不巩固或者实验阶段的公司还存在同样数量甚至更大的债务问题，所有这些都会加大价值的波动。这种价值的波动特性很自然地激发了人类的冒险本能并导致了更大程度的投机行为。

正是由于美国发展与贸易中的这些特殊性，致使我们的市场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面临恐慌，而且这些恐慌问题还带有浓厚的美国特色。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贸易都要面临繁荣与萧条的频繁交替波动。这种波动源于自然规律，或者说本身又构成自然规律。

经济活动，就像海洋和空气的流动一样，沿着一条波浪线移动。首先，由于经济活力的上升，导致价格也上升，因而出现一段经济的上升期；接下来当价格上涨到限制了需求水平时，出现一段谨慎和徘徊的持平期；然后借款人以及折扣方出现犹疑；接着出现下降的波动，而这时几乎所有的债权持有者都同时意识到了这点，这就加速了价格的整体下降。此时信用变得更易波动并逐步收缩，交易量减少，同时出现资产缩水带来的损失，最后，由于债权人承受的压力变得过于严重，以至于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清算，那些无力偿还的公司和机构必须破产。这一过程在每一个国家都会周期性地发生，至于危机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受影响的具体团体应对时的商业方法的稳定性和保守程度。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带有一点点恐慌意味的一般性经济危机（我更愿意说是自然

经济危机)之外,我不得不说,美国,还必须承受与我们的新建或不成熟企业的存在相伴生的更剧烈的波动。

在危机时期,为这些企业发行的债务不断遭受着由于其内在价值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折磨。债务持有者急于摆脱这些负债;那些投入大量资本于这类企业的银行,则竭尽所能地试图提前收回资本;它们实际上已经变为没用的资产。在美国,自从铁路时代开始以来所发生的每次恐慌,都被这类资产价值的突然缩水而放大了很多倍,而这正是美国恐慌恶化与主要危险的中心。

考虑到这些因素,讨论规避我们周期性恐慌的可能性又作用何在呢?大量开拓性企业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带来风险及恐慌,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随着历史较悠久和经营较成熟的企业在抵御风险和恐慌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恐慌的严重程度将逐渐减弱。我更倾向于这样想:在将来,商业活动引发的恐慌较之从前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抵制。在我们的金融中心,出于市场目的而可获得的金融资源的积聚正以非常快的比率增长。这点可从以下事实中看出,随着我们企业数量的逐年递增,我们对欧洲货币市场的依赖也逐年减弱,我们的大量企业贷款主要发生在国内。这些积累为我们的金融系统提供了弹性,成为应对巨大金融驱动的缓冲器。

我并不认为能用其他什么方法满意地解释下述现象:尽管自1873年的大危机以来,我们已遭遇过两次明显的经济萧条波动,它们也或多或少带有恐慌色彩,但我们并没有遭遇过任何可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恐慌。唯一接近于恐慌的是1884年5月由格兰特·沃德投机失败引起的扰动,但它只是一起范围有限且持续时间相对短暂的事件。

然而,尽管我认为像我们这样情况的国家,既然尚不发达,因此可以说恐慌不可避免,但我还是得说:当扰动确实发生的时候,也存在一些条件,会抑制扰动的恶化。每一次的恐慌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放款人的审慎及自我控制力。如果他们手足失措,不分青红皂白地拒绝所有的借款,或者只把款贷给少数确实实力雄厚的借款者,那么更严重的恐慌将随之而来;而如果他们充分调动自己的能力服务于那些较大型、较安全的借款人,则可以倚靠他们来保护那些遭到银行拒绝贷款的企业,从而可以将损害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一切取决于对信用良好者的保障是否可以制约鲁莽者的行动,也就是说取决于银行是否冷静与睿智。银行既能很轻易地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也可能恶化之,

这取决于它们到底是深谋远虑还是盲目自私。或许，我们可以放心地说，银行确实从来就没有完整地做到所有这些；但是，这个城市的银行在过去的 25 年里，面对不断发生的这类扰动还是表现得相当有远见，这点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结合自我保护与客户保护方面总体上是成功的，它们所建立起的先例将进一步遏制未来恐慌的发生。

然而，不幸的是，法律强加给国家银行的各种限制已经严重地影响到这些机构自身的理智判断。比如，目前的法律明确指出，如果政府允许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低于 25%，那么银行就容易受到政府指令的损害。这就形成了一条“底线”，这条底线非常可怕。以至于接近它时也就意味着接近了恐慌，因此成了一条“恐慌线”。当达到这个底线时，银行被迫缩小贷款，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贷款的紧缩意味着不考虑具体情况和后果的强行清算。这样，所有旨在用来保护银行的方案反而变成了严重伤害其客户及其自身的祸根。在金融紧张的时期，这构成了引起恐慌最直接的原因。假使银行在恐慌时能动用它们的储备，就能提供一种可缓和危机的基金，这样危机可能会逐步弱化并消失。然而，就目前的规定情况而论，银行在规避恐慌方面恐怕贡献甚微甚至无能为力。相反，法律会迫使它们采取一系列加速恐慌发生的行为；当产生与法律的冲突时，银行应该基于共同的事业而联合起来摆脱法律的束缚，并尽其所能来弥补荒谬的法令所导致的灾难。这只是强加于美国国家银行的不明智约束之一，此类约束为数还不少，它们都应该从我们的成文法体系中清除。不良企业的倒闭、无偿还能力的债务人的破产以及坏账的清算，这些永远不可能完全避免，而且完全避免也并非理想状态，因为它们的存在也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如果当涤除自身罪孽之日来临，法律仍不分轻重不辨是非，那么这可真就是对我们立法者的严重侮辱了。

乔治·希尼

正如善于观察的人所知，1884 年那次短暂的金融恐慌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有弗迪南德·沃德、詹姆斯·菲什（James D. Fish），此外还有少数一些较为次要的角色，他们与这次陷华尔街于危机的欺骗性融资有着一定的联系。

许多人认为沃德——人们一般尊称其为金融界年轻的拿破仑，能够愚弄所有人，包括他的同伙，他应该对所有后果负主要的责任。但这只是一个夸大事实的不科学的观点。

为以上两位金融家的操作所困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乔治·希尼（George I. Seney）。希尼牺牲了钱财，他的投资方向有误，未获得任何实质的回报。他是教堂和宗教机构的重要投资资助人。如果他吸取了丹尼尔·德鲁的经验，他可能会意识到投资此类事业是没有特别的利润可图的。当希尼陷入金融困境时，他显得孤立无援，没有一个朋友肯来帮他。由于希尼的不幸，他所全权代表的两家金融机构都市银行和布鲁克林银行不得不破产。遭同样灭顶之灾的还有布鲁克林的一家保险公司，它以都市银行的股票作为抵押，把公司的所有盈余都贷给了希尼。

在1884年的危机中不能幸免于难的投资资本家中，很少有人的投资经历比希尼先生更有趣。希尼先生是一位卫理会牧师的儿子，60年前他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长岛。他总是表现出对他父亲的教堂最深的热爱。在他事业的巅峰期，教堂是他投资事业的首选目标。他在纽约城市大学接受教育，22岁毕业后不久作为一名银行办事员进入都市银行。此后，先后担任了银行柜台营业员和出纳员。那个时候，威廉先生当行长，雅克先生为副行长。后来，雅克先生辞去他的职务去欧洲度长假，而威廉先生几年前已经过世，希尼先生便成为了银行行长的接班人。

希尼先生惊人的金融才能，比较而言应该说是他近来心智发展的结果。在60岁这样的年龄段，很少有人显示新发展的迹象。

在恐慌前不久，人们普遍认为希尼先生是个步伐缓慢、冷静的人，他此前一直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别的作为金融家的超常智慧。在投机狂热的1879年的华尔街，他却突然一鸣惊人，独自一人在投资领域开创了一种新颖的做法。事实上这个做法如此新颖以至于成为了他名字的代称，可以用来做企业的签字盖章。希尼的资产一下子变得同古尔德、范德比尔特和维拉德这些大佬们的资产一样为金融界所熟悉。

希尼先生的主要证券（投机买卖的礼貌说法）有俄亥俄中央铁路（Ohio Central）、罗切斯特和匹兹堡（Rochester and Pittsburgh）、东田纳西州（East Tennessee）、弗吉尼亚与乔治亚（Virginia & Georgia）和著名的“镀镍”路

(“Nickel Plate” Road)。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希尼先生的资产。在华尔街历史上，他操作这些证券的方法完全是独创性的，这引起了华尔街经验丰富的金融家开始关注希尼这种大胆和迅速的行动。

希尼的做法与大多数人习惯开始投资一定数额风险不大的证券不同。大多数人都选择铁路或电报资产，然后逐步做掺水的操作，而希尼一开始就大胆地做掺水操作，他毫不吝啬地大笔注入资金。他自由掺水的操作方法没有丝毫低劣或者吝啬之处，看到这种情形，一些老操盘手大为震惊，简直快陷入惊惶失措之境。这些股票被强有力地“吹大”了，而由于这些股票已经完全被掺水稀释，这就使得股票持有者能够以一个较低的起点成本入市。它们的未来收益简直可以说是光彩夺目般展现出来，股民们纷纷被这些诱惑所吸引，这些股票在金融市场的一些主要活动中马上成了关注的重点，备受瞩目。

希尼辛迪加股票之所以突然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惊人的活力，我们只能通过仔细审查希尼先生的支票本才能得以了解。如果这本支票本还能找到的话，它能显示出同一笔迹写给执行操作员买进和卖出的佣金记录。

这些交易用华尔街的术语来说就是做空头，用这种方式，人们普遍认为希尼先生赚了很多钱，从而由一个布鲁克林最穷的人一下子跃居为最富有者中的个中翘楚。但非常奇怪的是，正当他继续红火的时候，他的大部分金融朋友却好像陷入了衰退期。

后来，当希尼公司破产时，人们发现这些人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一堆孕育希尼辛迪加证券浮夸条款的证明。

希尼先生的社会关系有一些特点：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投机事业所殃及的朋友表现得缺乏同情心；另一方面，他又把大量的投机收益投向了慈善事业，他慷慨捐赠的总金额超过了200万美元。

希尼先生那时似乎想成为一名伟大的慈善家。如果不是恐慌带来的不幸后果，他可能像著名的慈善家皮博迪一样拥有崇高神圣的地位，而作为一名金融家，他甚至可能获得更高的名誉。如果拿希尼现在的结局与他巅峰时期的状态相比，这真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可以说天壤之别。希尼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具有如此美好前景的行业，而且自被任命为都市银行行长以来，他在华尔街的地位和声誉真可谓如日中天。

希尼的投机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希尼的投机活动

以一定的方式令我们反省我们最好的银行机构的稳定性。从中得出的教训，这个国家的金融家都应该牢记于心，并引以为戒。

然而，有必要指出都市银行的不幸不能全部归咎于希尼，尽管他是管理者中的灵魂人物，但显然银行董事们不可能无视他们的业务与希尼的投机买卖的关联性。都市银行与海事银行几乎没什么可比性，尽管海事银行也遭遇了类似的不幸。因为与菲什先生掌管海事银行不同，都市银行不是家族业务，希尼先生也没有任何亲戚与之关联。

看起来，都市银行的不幸可主要归咎于希尼先生太缺乏对都市银行的个人兴趣，以至于他总是急切地想将这一烦心事交付出去，由此便可将与之相关的损失也转移给他人。

然而，对于投机者和投资者而言，与其企业相联系的最重要一点在于，当时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股票交易价值严重缩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消极的股市预期所引致的，那时，一些精明的空头集团预期灾难迟早会降临到希尼和菲什先生所管理的金融机构。

通过这样的实例，我们给未来的投机者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有鉴于此，这些史料值得我们永久记录，以兹提醒或指导。特别是对于华尔街的人，他们常常易于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使他们总是重蹈覆辙，易于又一次陷入相似的困境。

在1884年5月的金融恐慌事件中起最显著作用的四位著名投机商，他们的交易应该记录下来以供类似案例出现时作为参考。尽管伴随其企业的是深深的耻辱和痛苦，但在以后许多年里，这些人都会有很多的模仿者。沃德、菲什、希尼和伊诺，可能菲什除外，很多人认为他们是灵活的人，他们只是不幸运才陷身其中，但他们都有相当的机会走出困境，成为百万富翁，并因为他们的能力和成功而受到公众的尊敬。

他们证实了投机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存在这一规则：“诚信是最好的政策。”但是，他们都只是例外，我们必须承认在金融界有许多的例子，他们的经历能够完全支持这个理论和信念。通过不诚实的手段表面上非常成功的这些人，无时无刻不担心他们鼓胀的资产随时会遇到麻烦。他们总是会遭到盘查，需要运用严格的诚实投机方法来报告他们所拥有的资产情况，其终身的交易都需要通过公共诚信标准来衡量。这就扫除了投机家编造的虚假故事，显示了那

些徒劳地认为不诚信的方式理所当然总会盛行的金融界大佬们的狡诈。

约翰·C·伊诺

在 1884 年夏季的恐慌中，有四位著名的“金融家”经常被提及，在此四人当中，约翰·伊诺（John C. Eno）的投机经历，从某种角度来看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引人入胜。

那时的伊诺，虽然不过是个不足 26 岁的年轻人，却是少年得志从而年少轻狂的投机一族的典型代表。这些人被公认为是：充满幼稚而乐观的幻想，用一些乐观的计划憧憬着财富和伟大，不计后果地参与市场投机。这些都是他们的共性，也给他们自身和许多同事带来了许多困难和尴尬。伊诺就是一个草率、冲动和功利的牺牲品。

伊诺不同寻常的职业生涯中，另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出现在他就任纽约第二国家银行总裁直至大恐慌发生的这段时间里。毕竟，很少有年轻人能像他这样，在如此稚嫩的年龄就承担了如此重要和尊贵的职务。他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本不属于他的资金的做法，还是不能实现他特殊的创意。

银行借出的大部分钱都是以抵押的方式运作的，这些抵押品为了方便也为了安全，并没有放在位于第五街酒店的银行本部，而是放在商业区的一个保险库中。

这家银行的股本为 10 万美元，并且有 400 万美元的存款，所有这些资金都被这位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挪为投机之用，这位年轻人后来与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一同逃往加拿大。

伊诺碰巧有一位富有的父亲，他在长期富足的生活中，勤俭节约攒下来不少钱。值得称赞必须一说的是，他迅速拯救了他那个任性而误入歧途的儿子，在其他董事支付另外 50 万美元的条件下，由他支付给这家他担任董事的银行 350 万美元。由于他们都是非常富有的人，董事们欣然接受这个建议。这样，整个亏空被这次慷慨的做法给填补了，以至于无一储户受损。

作为总裁的伊诺为了达到控制银行本部和分部的目的，采用的方法可谓是别出心裁、独一无二。以至于董事们完全相信他在审慎、诚实地经营银行的业

务，而没有对他起任何疑心。

他以将抵押品放在银行的保险库不安全为借口，认为应当放弃这个传统，建议应当在一家位于商业区的储蓄银行租用一个保险箱，应他的要求，这个建议得到了实施。他进一步指出，银行手中的现款大部分为家庭储蓄，而这些储蓄者并不经常要求贴现，所以这些钱不应该再将它放在银行了，那只是名义上的拥有，不能带来任何利益，应该将它用在安全有利的地方，通过利率来获取丰厚的报酬。因此，他被允许自由动用银行的资金，贷款给华尔街的经纪人以获取利息。

由于这家储蓄银行位于城市的北端二十三街，从银行到华尔街的长途跋涉使得抵押品来回运送非常危险，说不定哪天冒险的歹徒会拦路抢劫，在这座城市，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因此，他们渴望在离华尔街较近的地方建立一个安全的储蓄保险库。伊诺这一结合银行安全考虑的攻心战术，使得伊诺摇身一变，成为银行实际上的唯一主人。这样，为了与经纪人磋商贷款事宜，总裁本人就必须每天往返于两地。董事们为这个计划所折服，并确信通过总裁的精心设计，风险肯定不会比将银行设在华尔街大。而这些保险的办法，经过精心策划和可行性研究，更增强了董事们对于伊诺能干细心的管理能力的认可。因此，当后来真相大白，他们发现如此种种的表面“安全措施”，实际上是为了替始作俑者掩盖挪用巨额公款的行径时，他们的惊讶之情简直无以言表。

伊诺并没有像他向董事们声称的那样，将钱借给华尔街的经纪人，而是与自己的经纪人合作，通过多种投机活动来获取利益。而他挪用银行全部的400万美元银行储蓄的做法，并没有引起轻信的董事们的丝毫疑心。

像伊诺这样，利用自身作为银行官员的职务之便，将银行存款一窝端挪为己用的例子，在此类的操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堪称史无前例。

每天晚上，当这位总裁告诉出纳员，他借出了某项抵押物的某笔款项时，出纳员就会按照他的话作账，并及时给他开具支票，而没有丝毫怀疑。这样，在银行的账簿上逐渐显现了400万美元有优良抵押品的短期贷款记录。实际上，这些钱统统流入了总裁的个人腰包。

伊诺将这笔钱的很大一部分投机在股票，但股价却不断地下跌，最终到了该向他父亲摊牌的时候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阿摩斯·伊诺（Amos R. Eno）是一位老绅士，慷慨地出来挽救了儿子，也使这家银行避免了停业的浩劫。

当然，老伊诺身价仍旧高达 2500 万美元，这次损失远远不足以使他陷入贫困，但是儿子臭名昭著的行为给这位诚实、受人尊敬的绅士所带来的耻辱，要很长时间才能抹去。

票据交易所：经济恐慌的防护伞

在这次经济恐慌中，票据交易所表现出了有史以来最为大胆、备受瞩目的献身行为。1884 年的经济恐慌，在其爆发的早期就明显不同于此前的任何经济恐慌（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那些由于银行快速反应和自由政策带来的金融动荡。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次恐慌中银行家们的行为都是明智的，他们当中的管理精英们已经从此前的恐慌中汲取了很多经验，可以说受益匪浅。

首先，得益于银行娴熟老辣的管理，还有阿摩斯·伊诺及其在第二国家银行的董事同僚们的豁达高尚，这次的经济恐慌才得以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偃旗息鼓。倘若没有他们坚决和果断的密切合作，这次恐慌可能会演变成非常严重的冲突，其后果和影响恐怕也会更为深远。

在这次危机中，银行机构管理层的果断行动所取得的成果证明，经济恐慌并不是不能够通过恰当的方法加以阻止；它还证明，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坚决而果断的行动，可以将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这点是不可或缺的。像这个案例那样，如果银行家们（工商业界唯一能够依靠的力量）能够快速行动，并保持与广大工商业者的一致，这样就能够将令人窒息的经济恐慌的恐怖程度降至最弱。毕竟，人们到现在也避免不了对此类商业灾难可能随时爆发的担心。

在过去的经济恐慌中，银行管理层的行动表现往往缺乏系统性和判断力，做事情没有任何周详的计划。他们的方法和目标都非常教条僵化、缺乏活力，他们的意志力弱、性格软弱、优柔寡断，他们经常表现得很幼稚，很不职业。

如果 1873 年的经济恐慌一开始就能够得到类似于 1884 年经济恐慌时候那样的处理，那么 1873 年的经济恐慌就可能像后者那样很容易就被遏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严重的经济崩溃所引致的萧条效应，以及其他伴随而来的灾难性后果（它导致了连续几年的经济疲软）。从经济角度看，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当中，这几年留下的是一片空白。更确切地说，是污点。

1884年，对于票据交易所接受西奈先生的画作为抵押品的行为，在空头当中充斥着一片批评之声。在那个时候，这种融资方式是没有先例的。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充分地证明了票据交易所及其管理政策完全正确。在美国，当时已经涌现了很多有足够的财富能够满足自身品位要求的收藏家，票据交易所破例收藏这些油画，它刺激了市场对于奢侈艺术品的需求，也使得它们成为了市场上最好的抵押品。当西奈的油画拿出来拍卖出售时，很多人争相竞买，并以非常好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相对于此后几个月华尔街的任何一个级别的铁路有价证券都要更好。尽管西奈先生已经成为了一位像新近已故的摩根女士那样的艺术鉴赏家，但是，他并不允许自己对名画的热爱上升到痴迷的程度，因为这会令自己支付天价。而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位行为怪异的摩根女士几乎走到了毁灭的边缘。西奈先生从来没有忘记每一幅画都有一个“市场”的价值，也从来不允许自己因为对艺术的热情而沦为奸商的牺牲品。事实上，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位精明的油画买家而不是银行家，而他的特长与其说是投机，还不如说是买画。如果银行总裁未表现出前面那样的高风亮节，那么此次金融动荡所引起的恐慌可能会非常严重。在都市银行和第二国家银行，成百万元的存款被迅速地提取出来，然后立刻成为流通资金的一部分。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假借银行存款人名义来制造经济恐慌者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过去，他们碰到这种情况往往采取自保的策略，这样做只会煽动存款人的躁动情绪。现在，每个在这两家银行有存款的人都协调一致，他们有效地缓解了各种嫌疑，增强了信心，而没有猜忌。

猜忌，是那些恐慌制造者们用于制造恐慌的一个破坏因素。在经济困难时期，猜忌往往成为这些恐慌制造者们用在事务中的最有力的破坏因素之一，也正是由于猜忌，杰伊·古尔德破产的同时，引起了更大的麻烦。因此，当北太平洋债券的持有者发现这些有价证券变得不再像政府债券那样有价值（两者相当，以前就是这样教育他们的），从而显得一文不值时，他们遭到了损失，成为了经济恐慌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都反过来变成了经济恐慌的制造者，他们将自己的猜疑传播到他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就像一种致命的病毒，它到处传播，最终感染了整个国家。

第 11 章

Chapter 11

旧时的恐慌

1837 年的恐慌 ◆ 它是怎样产生的 ◆ 州立银行 ◆ 它们是怎样在政府的资助下扩大它们的贷款的 ◆ 刺激投机和通货膨胀 ◆ 杰克逊总统签署的《铸币流通令》促使了这一恐慌的发生 ◆ 银行业务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败 ◆ 商业和政治结合 ◆ 伴随着强烈痛苦的全面瓦解

1837 年的那次恐慌是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恐慌。这次恐慌起因于合众国银行（它的总部坐落在费城）和杰克逊总统（他在选举时遭到银行官员反对）之间的一场误解。

合众国银行于 1816 年获得营业许可证，并于 1817 年投入运营。该营业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20 年。起初该银行经营不善，直到 1830 年，才被认为已经站稳了脚跟。因此，美国参议院的金融委员会能够这样来证明该银行的效率：“国家有了统一的货币，货币本身不仅完善和统一，而且完全能够适应政府和社会团体的需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相比，美国的货币更加完善和统一。对此我们感到很满意。”

这是第二个合众国银行；第一个合众国银行于 1791 年获得营业特许证。

1832 年，该银行向美国国会提交申请，要求延长将于 1836 年到期的特许经营权。国会也通过了延长该银行特许经营权的法案。但是，由于上述原因，这一法案却被总统否决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财政部声称，根据总统的命

令，共计1 000 万美元的政府存款将从该银行撤出，因为存放在这里不安全。

政府将存款转移到州立银行一事，在政界和金融界产生了很大的震荡。州立银行在政府这次有力的资助下，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它们的贷款开始逐步扩大，流通资金开始增多。这刺激了国内各个方面的投机活动，特别是土地投机活动。大量的土地从政府手中卖出，他们使用州立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来支付。

由于土地销售很快，政府很快就还清了国债，而且财政部还有了5 000 万美元的盈余。这种表面的繁荣又持续了一两年，此时的货币也非常充裕，极大地刺激了投机活动，发生了通货膨胀。

1837年，危机开始露出端倪，是由《铸币流通令》的签署催生出来的。这个《铸币流通令》是杰克逊总统签署的最后一项法令，它将通货膨胀这个气泡捅破了，使其蔓延爆发了出来。该流通令由财政部于1836年7月颁布，它要求所有征收公共收入者在收款时只能接受金银。颁布这个流通令的目的只是遏制公共土地投机活动，但却导致了货币的迅速贬值，从而在商界引起了大范围的波动。

公众普遍强烈反对《铸币流通令》，以至于参众两院都通过了一项提案，部分要求废止《铸币流通令》。但是，“老山胡桃”^①没有向国会做出让步。虽然他没有否决掉该提案，但他还是等到国会休会后签署了这个《铸币流通令》，由于只是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因此它也未能成为一项法律。

这种典型的杰克逊式的做法带来了很多问题，为此州立银行想通过限定向特定的财政单位和个人贷款，来寻求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但这个计划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几乎是骤然之间，纸币发行量迅速增加，这鼓励了疯狂的投机行为和过度进口，向经济活动传导了一种反常的刺激。这种过度贸易和不计后果的投机行为，由于银行业务的萧条戛然而止。1837年春天，仅纽约一个市就损失了一亿美元。

① 杰克逊的绰号，他因做法强硬而闻名。杰克逊总统向他的内阁建议：土地办公室只接受铸币支付——金币或银币。但是，因为内阁的许多会员也卷入了这场投机中，所以总统的建议遭到了坚决抵制。出于同样的原因，国会也不同意这个建议，所以总统只好等到国会休会后的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作为一个行政命令签署。它要求，除极个别情况外，8月15日以后购买土地都必须用金币或银币支付。——译者注

冲击蔓延到整个国家，整个经济大范围的瘫痪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合众国银行继续在运营，即使在 1836 年其营业特许证到期的时候也没有暂停营业。它从宾夕法尼亚州获得了另一项营业特许证，该特许证标题为“一项关于停止对不动产和个人财产征收州税，继续拓延本州铁路和河道的改进措施以及特许一家州立银行更名为合众国银行的法案”。

尽管这家合众国银行在 1837 年的时候，就终止了与州立银行往来时用铸币支付，但直到 1839 年，其营业期限才告终止。它们当时就是用这个办法避免了银行的全面瓦解，从而勉强维持了两年。虽然流通的纸币和合众国银行的存款被全部付清，但是股东们损失了 2 800 万美元的资本，至于红利更是一点也没得到。这就是杰克逊将军^①和他的继任者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坐在总统宝座上的时候，融资活动者昔日的美好光景。

这家合众国银行的股本总额是 3 500 万美元，其中有 700 万美元由政府认购。

该合众国银行一败涂地的真正原因是，它错误地混淆了银行的正当业务活动与政治、投机活动的关系。这也表明，这三者各自要取得成功，其最大秘诀也就在于：三者应尽量保持独立。

1837 年的这次恐慌，更由于英格兰银行的举动而被进一步加剧。英格兰银行在一天之内抛出了与合众国银行有关的所有票据。而合众国银行这边则拒绝贴现这些票据，为了报复银行，商人和投机者把钱从银行里全部取出。这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进而最终走向衰竭。在他们自私的暴怒中，银行家和商人彼此葬送了对方，由于他们不能对形势秉持宽容、冷静和豁达的心态，所有这些加速了灾难的发生。

1837 年 5 月 10 日，纽约的银行普遍停业，在这之后的一周内，全国的银行也接连停业。这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的金融骚乱。国家正面临崩溃的边缘，要想摆脱这种影响，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在短时期之内恐怕实难办到。

经过长达两年的艰苦努力，银行重新获得了由于恶性投机而失去的信用和稳定，但此后，银行业又一次旧病复发、故态复萌，弱肉强食的过程又再次上

① 杰克逊在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奥尔良之役打败英军，成为举国闻名的英雄，后来当选为美国第七任总统。——译者注

演，有将近 1/3 的劣绩银行被淘汰。在全国 850 家银行中，有 343 家永久停业了。

第二年，也就是 1840 年，由于国会的一项法案，财政部分局在纽约建立。该法案规定政府官员应该保管好公共基金，美国政府只接受铸币支付，财政部不再支付和接受银行券。

尽管这一章内容很短，而且超出了我个人的经历回忆（这次恐慌发生的时间早于 28 年前我涉足华尔街之时），但是由于 1837 年的恐慌仍是这类经济骚动中的第一次，它对华尔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这一章的内容和这本书的主旨（记录大型商业震荡当中发生的主要事件）很契合。

因此，基于这个原因，我在这本书中给它留有一席之地，并赋予其相应的重要地位及它应得的笔墨。作为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些投机商、银行家和商人们回忆起这件事仍历历在目。我出现在华尔街后不久，很荣幸地结识了这些人，随后，1857 年的恐慌就来临了。

在此，谨向那些为我生动讲述了关于这次恐慌的故事的人致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因此，我很高兴我能为保存华尔街早期这段重要的历史尽自己的一份力。因为，亲身经历了那段令人兴奋的历史事件的人，在不久的将来将离我们而去，到那时，将没有人能将这段故事流传下去。

第 12 章

Chapter 12

首次披露黑色星期五的史实

著名的黑色星期五事件是出于爱国动机 ◆ 建议财政部长鲍特韦尔和总统格兰特卖出黄金 ◆ 吉姆·菲斯科在这场投机剧中所扮演的角色 ◆ “乱世横财” ◆ 华尔街处于一个全面的混乱状态 ◆ 这位犹太人是怎样晕倒的 ◆ “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啊！” ◆ 古尔德和菲斯科是这场黄金垄断阴谋的核心人物 ◆ 他是如何通过伊利公司来操纵市场的 ◆ 古尔德和菲斯科试图操纵总统格兰特，并且牵连他和他的家人 ◆ 这场著名的投机剧中的场景和事件

1869 年，美国迎来了庄稼大丰收，粮食供给远远超过了需求。很显然，此时任何一种可以刺激剩余产品出口（至少部分产品）的措施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

于是，成千上万封来自银行家巨头、贸易商和商人的信件涌入了华盛顿，敦促财政部停止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黄金出售，认为只有这样价格升水才可能达到一定程度，使农产品顺利出口，成为一种最便宜的黄金出口的替代品，否则，促进出口的愿望难以实现。当时的黄金被人为地压低了价格，成为了最便宜的产品，同时也是唯一一种不希望脱手的物品。因此政府决定不定期限地暂停黄金的销售。

杰伊·古尔德等人，对此项即将成为政府政策的决定感到非常振奋，立即打着要刺激棉花和谷物出口这个最单纯的爱国主义的名义，开始着手购买大量

的黄金。通过连续3个月的买进，他们以135~140之间的买价积累了大量的黄金。

以上就是引起著名的黑色星期五投机交易案产生的最真实背景。

而引起黑色星期五爆发的直接导火索则是小詹姆斯·菲斯科的古怪行为。在黑色星期五之前的一天，也就是星期四，他积极地、疯狂地恋上了高价买进黄金。星期一大早，他开始通过他的经纪人威廉·贝尔登（William Belden）和阿尔伯特·斯派尔（Albert Speyer）大批量买进黄金，这使得黄金的价格迅速上涨。

最初的辛迪加是由杰伊·古尔德、代表英国伦敦斯特恩兄弟公司的亚瑟·科尔宾（Arthur Kimber）、洛克岛有垄断寡头恶名的伍德沃德（W. S. Woodward）几人组成的。但是，后面这两个人将他们的股份都出售给了古尔德。在几位精明能干、声名狼藉的搭档的帮助下，古尔德一直坚持指挥交易直到最后。他们的办公室就位于百老汇大道，也就是现在的德克塞大厦的位置。

当人们还沉浸在上述疯狂买进所带来的兴奋感之中时，我发了一封电报给财政部长鲍特韦尔，另一封给总统格兰特，向他们描述了华尔街的确切情形，并且催促他们马上卖出黄金。我还发送了相似内容的电报，成功地说服了纽约财政部次长巴特菲尔德将军和港口征收员莫斯·格林内尔，他们确实及时地出售了500万美元的黄金。政府这个行为在道义上的影响严重地打击了黄金持有者，并且引起了一个出售黄金的高峰期，由此，驱使黄金价格在不到两个小时内从160下降到132。这种黄金价格大幅下跌所带来的兴奋程度，足以与前期黄金价格上涨阶段的狂热程度相当。阿尔伯特·斯派尔受到菲斯科的口头全权委托，数以百万计地买进了所有能以160的价格买到的黄金；而另一方面，在黄金交易室的另一处，交易正自由地按照数量适度的方式以140、145、147和150的价格成交；甚至当价格很快要达到135的时候，斯派尔却仍然一度坚持以160的出价买进，为此，他被认为是此生罕见，虽不能算是傻瓜，但至少是极疯狂和愚蠢的投机者。此后，菲斯科拒绝清偿斯派尔和贝尔登以他的账户所做的全部合约，方法很简单，他矢口否认自己委托了他们，而由于没有书面协议，这种委托关系也确实不能得到有力证明，因此这两个经纪人不得不破产，他们也给不计其数的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比如，有一个相当出名的公司从自己上百万的黄金中拿出一部分卖给了斯派尔，本打算在140的时候，他们再买

回这部分黄金，本以为能获得非常令人满意的 20% 的利润，但当他们买进之后，却发现价格正不断地下跌至 132，在这个交易日快要结束的时候，还公布了斯派尔破产的消息，他们也就随之破产，就像黄金交易所中半数人一样。由于严重的并发症横行和灾难迅速蔓延，不可能再通过黄金银行来继续票据交易。黄金管理委员会不得不立刻召集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所有的黄金交易暂停一周，目的是让所有的成员能借机私下里调节困境和彼此的差异。黄金银行还同时暂停了商业活动。当阿尔伯特·斯派尔乐此不疲地持续以 160 出价一个接一个地买入数以百万计的黄金的时候，这个财团正积极地参与黄金市场的卖出，他们以低于出价 10 个点的价位不断出售着此价位下市场所能接受的所有黄金，从而一直在忙着和卖空者们秘密清算。

流行观点认为，由于黄金交易在本质上完全属于虚拟交易，所以在这场投机竞赛中很多投机商其实并没有损失太多。但是，与这种流行观点相反，事实上，他们确实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用另一种方法，他们又成功地规避掉了这些损失。古尔德的损失估计超过了 400 万美元，菲斯科也遭受了差不多程度的损失，但是都被他一一赖掉了。当然，其他人就悲惨了，要代他受过。

在损失最为惨重的人当中也有进口贸易商，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被迫要高额为的损失平仓。

黄金委员会暂停黄金销售的决议引发了许多重大的破产案。在接下来的六天内，很多破产案都在妥协的基础上完成了私下清算。

当菲斯科听到财政部长鲍特韦尔宣布财政部已经指令卖出黄金时，他欢呼。此举将除去笼罩在虚拟的黄金交易上的污点，为他和其他黄金投机者带来他们长期期盼的“乱世中的发横财机会”。直到黄金委员会和黄金银行暂停交易并有大量重大的破产案被公布出来的时候，人们才更加全面地意识到了这次灾难的后果。当时，它看起来就像陷入了一种整体的混乱状态，如何破解这些复杂的因素构成了当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那个黑色星期五，凡是参与了黄金交易的人，没有一个能很肯定地告诉你，他们在这次恐慌中真正站在何种立场，也不知道如何去评估他们的损失或者收益；他们对未来持有不确定性，也不知道究竟谁受益而谁又受损了。委员会的房间拥挤得令人窒息，就像是疯人院开放的样子；事实上，那个星期五的白天和晚上都没有太大的不同。在傍晚的时候，一群愤怒、可怕的受害者聚集在史密斯、古尔德和马丁公司的办公室门

前，抗议者的拥挤和狂暴对公司的员工构成了威胁，结果派了一个警卫来保护他们。

对黄金的狂热吸引了一群犹太人来到华尔街，他们因为人数众多和精明能干，已经成为我们中间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在这群犹太人当中，有一个犹太人对贵重金属非常着迷，当黄金价格从160跌至140的时候，他晕了过去。人们很快取来水，在他滚烫的额头泼了一盆冷水，接下来又擦干。待最后他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他抬起头，睁开双眼，环顾四周，然后说：“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当他发现价格仍在下跌时，他再次闭上双眼，又一次晕倒过去。最后，他伤心欲绝地离开了黄金市场。但他是一个聪明的希伯来人，现在在东部从事“极好”的行当。

这些是有关黑色星期五的简短历史，那天的场景和事件能为我们提供更有兴趣的材料和内容。

尽管我对黑色星期五并没有很大的热情，但我还是收集了一些重要事件的详细资料。只要认定这本书本身可以很好地涉及到这方面内容，我就认为这些资料很值得以一种永久形式保存下来。

关于抬高黄金价格阴谋的内幕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为了利用外界因素和当时人们支持出口的情绪，这场阴谋隐藏的有多深。因此，我将简要地给大家呈现一些隐藏在此巨大的投机阴谋背后的主要事件，以及在此阴谋中将总统格兰特和他的家人拖下水的大胆企图。

正如我前面明确提到，小吉姆·菲斯科，或那时曾经被大家惯称为吉姆·朱比利·朱尼尔的人，最终成为了操纵黄金的阴谋中比较活跃的成员。在协调他们的计划时，这个财团也很好利用了他人。

菲斯科开始的时候，和他父亲一样，是新英格兰的一个小贩。在著名的黄金阴谋之前的许多年，他在华尔街是作为丹尼尔·德鲁的亲信之一出现的。因为在德鲁总部的经纪人办公室里，对一些人来说，他表现得太过精明，因此他接到了一个很礼貌的暗示：他在那里不受欢迎。于是，菲斯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与威廉姆·贝尔登合资经营，公司的名字就叫菲斯科·贝尔登，但是公司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他们显然很难找到合适的银行家能够达到他们的期望值，于是他们关门大吉。虽然这里菲斯科作为一个经纪人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的才能从任何方面来讲都远没有耗尽。他总是对德鲁先生显得很有作用，

德鲁先生也仍然支持着他。

由于这种友谊和他自己的聪明，他很快入选伊利铁路公司董事会，而尽管德鲁先生表达了自己对参加董事会的兴趣，却未得到菲斯科的理会。这可以说是菲斯科利用朋友的一个好例子。

由于菲斯科入选伊利董事会，40 000 股新股票得以发行。他们大胆地尝试以相同的手法吞并了其他几条铁路。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内容，我在其他几章关于德鲁、古尔德以及他们与范德比尔特的斗争的内容中将进行阐述。

在那个时候，菲斯科开始被认为是一个全能的天才，并且取得了伊利王子的美誉。虽然在他首次出现在华尔街的时候并没有钱，但在大量发行伊利股票后不久，他很快就开始显示富贵之气。据说他拥有几条铁路，几艘蒸汽船，一家歌剧院，至少控制着一排座的法官还有无数的律师以及一群芭蕾舞女演员。

这里我不再介绍黄金阴谋中的另一个核心人物古尔德了，因为在其他章节中，我已经尝试着对他做了一个尽可能中肯的评价。他同时是黄金垄断案和伊利铁路垄断案背后的实权人物。当菲斯科在前台扮演万众瞩目、令人仰慕的财务总监的时候，他在幕后牵线搭桥。他操纵着法院、法官和律师，而让菲斯科这个受他摆布的傀儡享用了本属于他的美誉。他还设法笼络立法机构，并且掌握了伊利。通过控制伊利，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些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野心和目的。

那个时候，伊利是一支实力股，起到了极好的融资杠杆作用。在需要现金来收买另外一条铁路、一个立法机构或者一个法庭的时候，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买进几十万股可转换债券，然后把它们转换为伊利的股票。因此，在古尔德先生挑大梁，尤其是在黑色星期五期间，由于他随时都有丰富的融资手段，所以他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尽管那个时候黄金阴谋已经万事俱备，但仍需要一位有极强的悟性，能审时度势，可统领全局共同实现目标的人。古尔德以其罕见的机智圆滑和绝顶的睿智灵性，担当了黄金阴谋的首领。

这里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个黄金垄断案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可能会更清楚。

那时的纽约市场黄金供给量不超过 2 500 万。政府控制的黄金不足 1 亿，并且大约 1/4 是以黄金流通券的形式存在的特种储备，这其中有一部分存在银行里，剩下的一部分则在全国流通。为了方便国家管理，促进国家繁荣，当时

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好的金融政策，财政部以每月100万的速度出售黄金。在总体上，价格下跌是趋势，但是在本章开篇时所介绍的背景下，这个出售黄金的政策，由于贸易关系，不能再认为实现了国家利益的最优，鲍特韦尔和他的财政部副部长，不得不考虑银行家和商人们关于贸易出口的观点。

尽管鉴于美国当时最优秀的金融家们的意见，关于停止黄金销售的政策已经达成共识，古尔德先生和他的谋士们认为最好还要另外加上一个双重保险，确保此次意义重大的投机密谋无丝毫破绽，他们要制造一个黄金“垄断”。然而，格兰特总统对此的观点非常保守。所以，这些共谋者们设计了一套方法，可使得财政部长鲍特韦尔无论发生什么紧急情况都难以避开这一政策。

这个大胆、恶毒的阴谋战略，必须首先骗得总统格兰特的信服才能得逞。他们必须让格兰特总统相信：在当时经济停滞和恐慌威胁的背景下，停止黄金销售是从经济上拯救这个国家的唯一办法。只要接受了这个理论，他就会认为有必要给财政部长鲍特韦尔下一道不准出售黄金的死命令。接下来，还要搞定一件事：在黄金垄断者们宏大的投机目标未达成之前，总统不会撤回命令。

从爱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个阴谋策划差不多就差通敌叛国了。然而，即便当时他们相信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其他并不那么邪恶那么令人震惊的方法，也不能肯定这些“作恶者”是否就会放弃这个计划。这些阴谋家们认为为了圆满地完成他们的计划，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某种方式来阻止格兰特的干涉介入。为了格兰特也为了这个国家的荣誉，所幸的是，这个计划还好不需要对格兰特采取任何暴力的手段就成功了。

在解释这个计划是如何得逞之前，有必要简单地描述一下这个密谋初期的一些序曲。

6月中旬的一个美妙的夜晚，格兰特总统安排接见了一群人，他们准备参加派屈克在波士顿哥尔摩的50周年纪念日。吉姆·菲斯科担任了执行工作。在波士顿船的甲板上举办了一个美妙的香槟晚餐，几位精通金融问题、对国事问题能言善辩的绅士出席了会议。席间，彻底地讨论了出口问题和停止销售黄金的政策问题。这是一个鸿门宴，那些原以为只是一次在节庆场合进行思想交流的人，完全没能正确地评价这次晚宴后面所隐藏的阴谋。这次晚宴由古尔德和菲斯科安排，而格兰特总统是个热心的听众，那天他倾听了有关那个最有趣话题的所有谈论内容，但是看起来当时格兰特似乎并没有完全确信，促进国家

繁荣的最好政策是停止销售黄金。他在这点上犹豫不决，必须组织一次逻辑严密的论证来获取他的信任。古尔德观察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用于明确阐释这个观点的对话内容，在加菲尔德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古尔德先生非常简洁地进行了描述。他说：“总统只是倾听。其他几位先生则在讨论。有些人赞成鲍特韦尔出售黄金的政策，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个政策。后来他们交换了各自的观点，有一个人问总统他是怎么想的。他说他认为关于国家的繁荣这个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空想成分，必须将这些泡沫成分像其他问题一样挤出去。他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说，我认为，如果执行那个政策，可能导致巨大的不幸，甚至会导致内战；它将引发工人罢工，很多工厂将倒闭，制造业也将被迫停止。我的立场是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市场，而应该让它自我达到商业水平；实际上，在这个秋季就应该推动黄金价格的上升。我们只对这个秋季和冬季感兴趣。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必须提请注意一点：我这里只是引用古尔德的证词，至于其思路和语法的混乱，我不负任何责任。

古尔德先生努力将总统引入自己的思想框架，让他支持这项与国家的利益攸关，对他们的黄金阴谋成功也至关重要的政策，这件事足以显示古尔德的辩才和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我的立场是，”古尔德说，“政府不应该干预黄金市场，而应该让它自我达到商业水平。”

这个“商业水平”的提法可是含义丰富，它是由这些密谋者的核心人物提出的，他们希望把黄金价格抬到 200。然后，考虑了一下，他说：“政府应该在秋季推动黄金价格上升。”

这个建议的提出是多么巧妙啊！它假借国家的外贸利益的名义提出来，清晰地显示了古尔德具有把自己提升到爱国主义高度的能力。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古尔德先生的这种能力的真实价值。在很多次的紧急事件中，他的这种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这让人想起了英格兰著名的老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一段无情而有力的评论：“爱国主义，先生们，”这个年迈的愤世嫉俗者说，“是一个恶棍最后的避难所。”

而且天赐良机，刚好在此时，财政部长的助理范狄克先生辞职了。那时古尔德的最大野心就是指派一个亲信接替他的职位，以便在黄金垄断时机成熟时

能够控制财政部。这时亚伯·柯宾先生（Abel B. Corbin）应时而出，他堪称是帮助推进古尔德阴谋的上佳人选。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无论在商业还是政治上都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在华盛顿当说客已经有一些年了。他熟知金融事务，又是一个相当好的作家，而且口才极佳。他的妻子是格兰特夫人的一个姊妹，因而他有很好的机会向总统递话，这就是请他来的最佳优势。

古尔德和柯宾为了财政部部长助理一职，刻意接近了一位叫罗伯特·卡瑟伍德（Robert B. Catherwood）的绅士，他娶了柯宾先生的继女。他们都非常希望卡瑟伍德先生能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只要他就任这一职位，就能以一种合法的手段赚到一大笔钱。

所以在调查委员会调查前，卡瑟伍德先生就在他的证词里声明了这些情况，但他补充说：“在关于什么是合法方式方面，我的意见与他们不同，所以我拒绝接受这个职位。”

于是，他们又物色到另外一位叫丹尼尔·巴特菲尔德的将军。他以一种与卡瑟伍德先生截然不同的心态接受了对他的秘密任命，说自己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职位。他写了一封信给柯宾先生，对他提供的机会表示感谢，并且说自己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希望以后在这个职位上干出一番丰功伟绩。巴特菲尔德将军如期收到了他的委任书。

就像古尔德先生所猜想的那样，这是他环环相扣的投机构想中又一个完美的环节。这也使柯宾和古尔德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了，这正是他们双方都非常希望的。古尔德先生这样赞美柯宾在公司里的真正价值：“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老绅士。他只要扫一眼整个事件，就能看出这是适合继续推进的真正平台，不管政府以何种合法、公平的方式做什么，只要能促进面包出口，给西方国家带来一个好的价格，那么政府就应该这样做。他非常希望我去见见总统，跟他谈谈我在这方面的看法。”直到柯宾得到了鲍特韦尔不再卖黄金的保证，柯宾才去见格兰特总统。古尔德和柯宾都出席了在格兰特家里举行的会议，总统在会上说：“鲍特韦尔下令要卖黄金，我听说了以后，下令撤回了这一命令。”

获得了总统的亲口保证后，古尔德才长舒了一口气，放心地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天衣无缝。现在整个计划中几乎所有的环节都已经准备就绪，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出于利益考虑，大部分银行家和商人在必要的时候都会支

持他，财政部分局他认为也已经搞定，如果格兰特不改变主意，那么美国财政部自身也会受法令的制约，不可能破坏这宗交易。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总统在紧急情况下也许会改变主意，因为不管他的诽谤者和政敌说什么，他对古尔德的阴谋从来就蒙在鼓里。

那时，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必须暂时避开格兰特，这是阴谋者们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在波士顿和平节^①后，这个阴谋小集团利用那个夏天剩下的一点时间完善了他们的计划。毕竟，干大事如果没有一些时间和耐力，恐怕是难以成功的。据说，“拿着警棍”的守门人、“犹太人”迈克以及其他江洋大盗都往往先要花上 6~12 个月的时间，研究一家银行所有进出口，然后，才能开始动手。

本来在这个阴谋小集团里，所有成员都应该对格兰特的目的与他对鲍特韦尔下的命令两者的关系有充分了解，了解他的想法依然停留在以促进出口来提高国家安全的角度。因此，大概在 8 月中旬的时候，即黑色星期五之前一个月或更早的时候，吉姆·菲斯科受命到纽波特拜访正在那里进行访问的总统。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格兰特已经下令鲍特韦尔不能卖出黄金，但他看起来依然是摇摆不定，他还是比较支持卖黄金政策。他似乎一直都在怀疑古尔德、柯宾对国家的关心是否完全出于真心。因此，对他继续施加更大的压力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谈到在纽波特的会面，菲斯科说：“我想格兰特将军是在 8 月份的某个时间开始前往纽波特的。那时，我就去见他。以前我也见过他，但都没有像这次那样是带着明确的目的去的。我拿着古尔德先生写的介绍信，信里说地中海有 300 条来自黑海的轮船，里面是销往利物浦市场的粮食。那时候的黄金价格是 34。如果黄金价格保持在这个水平，那么整个秋天我们出口农作物的机会就很小。我知道我们都担心这个。我与格兰特将军讨论这个话题，设法让他相信他的政策只会连累我们所有人。然后，他问我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接下来我们就确定了时间。他说：‘在这段时间内我会与鲍特韦尔先生会面，或者叫他来这里。’”

此后，总统总是很小心地躲避着阴谋小集团的“侦探们”，特别是那些对

① 1872 年，举办了波士顿和平节。——译者注

当今财政问题能言善辩，鼓吹刺激出口贸易并打着爱国主义幌子来提高黄金价格的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格兰特总统开始想，既然每个人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时意见都一致，那么他们的意见也一定是正确的。

大约是9月1日，总统的观点据观察已经很接近关键问题所在了，于是，古尔德以132.5的价格购买了150万美元的黄金给柯宾。但是，刚开始古尔德购买黄金比较保守，因为他听说许多手上黄金短缺的操盘手正在安排请鲍特韦尔吃饭。后来，他从柯宾那里吃到了定心丸，总统答应柯宾，说他已经写信给鲍特韦尔，没有他的指示，财政部不能进行任何非常规的黄金出售。于是，古尔德准备继续执行他的宏大计划。现在，整个计划已经快要大功告成，只要安全地避开总统的视线即可，直到金融风暴降临。

这件事操纵得如此胆大妄为，以至于连总统的声誉都处于被严重损害的危险境地；同时，这件事又操纵得如此严密，以至于他完全没有觉察到阴谋者的诡计。

接下来，总统（被古尔德劝说）去了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小华盛顿的无名小镇。古尔德设法让总统自然地相信，他去这个地方是为了拜访一个居住在那里的老朋友。这个小镇被切断了与外界所有的电报联系，其他的联系方式又不是很方便。总统在那里被“隐藏”了一个星期甚至更久，直到阴谋小集团充分地准备好了这次行动。

在总统去小华盛顿的那段时间，菲斯科购买了700万~800万美元的黄金。接着，古尔德对菲斯科说：“这件事全部搞定。巴特菲尔德很棒。柯宾搞定了巴特菲尔德，柯宾还搞定了格兰特，依我看，他们现在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利益息息相关。”

这是带有阴谋复仇性的爱国主义。想想这件事多么胆大妄为！古尔德设计了一个陷阱，将总统置于一种不能对黄金的“垄断”进行干涉的位置，然后他自己却掉转枪头，转而指控这位共和国总统对此次旨在造成恐慌的阴谋其实私下是知情的，在商业界造成了影响极大的灾难，并使总统成为了公众谴责的对象。

通过柯宾，古尔德和菲斯科还打算牵连格兰特的家人，以及他的私人秘书贺瑞斯·波特将军（Horace Porter）。这种想法在菲斯科对柯宾的访谈中可以充分看出。菲斯科承认说：“刚开始我看到柯宾时，他不太好意思谈这件事，

不过到最后他很坦率地告诉我，格兰特太太对此有意。他说价值50万美元的黄金以31和32的价格被拿走，然后又被以37的价格卖出。柯宾先生自己拥有价值200万美元的黄金，他将其中的50万美元给了格兰特太太，还有50万美元给了波特。我没有问他波特是否是将军，但我记得他的名字叫波特。渐渐地，事情就被抖出来了。当他发现古尔德已经对我和盘托出时，他也像我一样快速地揭穿了真相。我说：‘现在，我和您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了。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计划。但现在的情况是古尔德先生不明就里。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似乎这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问题。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政府是否会把担子卸给我们。’他说：‘您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我说：‘我想知道古尔德先生告诉我的话是否属实。我想知道您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送了25 000美元给华盛顿？’于是，他告诉我说，他送了，古尔德先生卖给格兰特太太价值相当于50万美元的黄金，卖给她时的价格为32，而 she 以37左右的价格卖出，为她赚取了27 000多美元，已经开了25 000美元的支票给他。我说：‘柯宾先生，您空口无凭，能拿出一些证据吗？’这位老人回答说：‘哦，好的，我不能跟您再讲什么了，我讲的事都千真万确。’他不断地重复道：‘我讲的事都千真万确。’当离开那里时，我已经相信柯宾告诉我的都是事实了。”

在加菲尔德委员会之前，投机团伙曾经尝试着要证明他们通过亚当斯快递公司将一个装有25 000美元的包裹寄给了格兰特夫人。但是，专家验证的结果是无法确定那是25 000美元还是250美元，因为后面的两个零被挤到了美分的位置，所以很难判定在250与后面的两个零之间是否还有一个很小的分位号。

然而，这个阴谋很显然只是想以某种方式将总统一家牵连进来，以便利用政府的影响来达到他们巨大的投机目的。但是，在加菲尔德委员会的报告中真实地进行了报道：“那些恶意中伤美国总统或其家人的阴谋狡诈的企图注定都会失败。”

如果菲斯科也像他的同伙一样冷酷而富有洞察力，那么这个阴谋也许已经成功了。正是由于他的急躁与不安引起了别人的猜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个阴谋。

菲斯科由于急于知道格兰特是否被成功搞定，以至于他过多地介入了这件事。他催促柯宾给格兰特写了一封信，让他坚定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准

许财政部出售黄金。如果任何人想要证明的话，它的结果已经清楚地证明，格兰特根本就对自己被利用的事实毫不知情。菲斯科差遣一名专门的送信人从匹兹堡骑马跑了28公里，将这封柯宾写的信亲手交给了总统。总统读了这封信，立即起了疑心。他简单地对送信人说：“就这样可以了，不用再回复了。”他开始看穿了这场阴谋，并且立即让格兰特夫人给柯宾夫人写信，要求她的丈夫不要再涉足古尔德和菲斯科集团。

格兰特夫人给柯宾夫人写信说，总统知道了你的丈夫在华尔街进行投机活动，为此他感到十分为难，你应该劝他立即与那个试图使总统落入陷阱困境的团伙断绝所有往来关系。

柯宾加紧执行小华盛顿的指示。他虽已开始犹豫不决，并且处于极度摇摆状态，但他已被贪欲冲昏了头脑。在与同党告别之前，与古尔德辞行之时，他要求古尔德这位主要的策划者把他应得的一份利益给他。关于这件事，古尔德说：“我告诉他，我将给他价值10万美元的银行存款，在我出售黄金的过程中，只要他愿意，我将给他一个平均数。那个时候，我其实并不想从他那里购进任何黄金。”

这就是这场反对总统的阴谋的最终结局，总统立即匆忙赶回了华盛顿。

现在，让我再次引领读者将目光暂时投向这个发生在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五投机闹剧的结尾部分。这个团伙极力遮掩他们试图操纵财政部部长助理巴特菲尔德的秘密。当这个秘密被公开之后，菲斯科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能够在那一天有能力控制整个局面。当有人发电报给菲斯科，试图从他那里获得政府方面的信息时，他说：“这只需要发电报问一下巴特菲尔德，就可以了解到所有信息了。”

这无疑只不过是菲斯科一个无用的夸耀而已。

9月22日，星期三，黑色星期五的前两天，人们还认为这个团伙所拥有的黄金，比这座城市的财政部分局金库之外的所有黄金还要多几百万盎司。贝尔登在那一天购买了大约800万黄金，同时，史密斯、古尔德和马丁公司也都是黄金的大购买者。这个团伙在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威廉·莫斯公司的一个办公室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会议得出结论，如果他们能保证没有黄金借出，并且能成功地迫使空头购进黄金，那么他们就有足够的黄金以迫使其价格达到200。但是，要为这3000多万黄金寻找一个市场实在也是一个难题，并且他

们也感觉到了存在着计划将被搁浅，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风险。

在星期四的早上，他们在贝尔登公司位于百老汇大街的一个办公室里召开了另一场战前会议。古尔德、菲斯科、亨利·史密斯和威廉·贝尔登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过程被严格保密，但是会议的一个结果是贝尔登指示其办事员将黄金价格升到 144 并保持这个价格不变。那一天，贝尔登购买了大约 2 000 万黄金，黄金开市价是 141.5，闭市价是 143.5。

团伙的几名首要人物那天晚上在市中心又召开了另一个秘密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第二天是否停止执行计划。这些操盘手手中持有 1 亿美元的黄金买卖合同。古尔德说黄金需求量是 25 000 万美元，而这座城市的黄金总供应量还不足 2 500 万美元，这个数量与该团伙手中持有的合同总金额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这个缺口必须通过黄金“垄断”来得到解决。

菲斯科建议集团将真实情况公布于众，并出价 150 与空头达成协议。他的建议立即遭到其同谋者的拒绝。

在那个即将上演梦魔般场景之日的早上，贝尔登和威廉·希思在位于第 15 号大街的旅馆里一起吃了顿早餐，之后立即回到了他们的办公室。贝尔登预言说黄金价格将达到 200，“这将是黄金交易所的末日”，他补充说。由于受贝尔登预言的刺激，很多人跑来兑现合同。用亨利·史密斯的话说就是：“他们过来要求立即交割。”他在史密斯、古尔德和马丁公司的办公室里负责处理交割事宜，价格在 150~145 之间，但同时作为菲斯科和古尔德代理人的阿尔伯特·斯派尔还一度将价格出到 160 来买进 100 万黄金。直到价格降到 133，斯派尔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十分荒唐。从早晨到这个时候他已按 160 的价格买进了 2 600 万黄金。

对利润的贪婪追求终于在那天中午时分导致了一场危机的爆发。当贝尔登来到奚斯办公室会见古尔德和其他同党，商议下一步怎样对付疯狂的要求交割者时，这里的场面很难形容。一位目击者这样描述奚斯办公室里的情景：“当贝尔登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走了出来，我来回踱着步等他出来，一位警长模样的人突然出现在那里，他在奚斯的办公室门口安排了一位警察，阻止人员进入。我感觉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杰伊·古尔德蹑手蹑脚地从后门走了出来，向四周看了看，确信没有被别人看到，然后从大楼后面的一个密道逃走了。不久，菲斯科也气呼呼地大声叫嚷着走了出来。他一开始走错了方向，差不多快

跑到百老汇大街上去了，但他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转身随着古尔德从后面的小道溜走了。不久，贝尔登蓬头散发地出来了，他的眼睛红红的，肯定是因为在里面哭过。他大声地问：“他们从哪条路走了？”在我给他指出方向后，他迅速地跑去追他们。后面的小道通向华尔街，在小道的出口处，这些同谋者跳上一辆马车逃走了。

他们没有顺着华尔街逃跑，相反他们去了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史密斯、古尔德和马丁的办公室，在那里聚集着骚乱的人群，很明显他们想向林奇法官申请法律裁决。对于这些聚集的人群来说，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把这个小小的建筑围个水泄不通。为了确保里面人的安全，一小队警察在外面筑起了临时的保护屏障。这伙同党在这个临时避难所里捱过了那个早上的几个小时，他们在这里竭力想弄明白在这次黄金投机中为什么会这样导致这样悲惨的结局，但他们越是反思这件事就越是怀疑自己是否晕了头脑。

虽然这次黑色星期五事件只是一件暂时的不幸事件，也许他们是咎由自取，但它也给了我们一个关于金融与风险投资方面的颇富教育意义的教训。在我论述“如何规避大恐慌”一章中，我认为我已明确指出了几点可供金融家、风险投资者借鉴的方法，即在面对将要发生的风险时，如何趋利避害。

第 13 章

Chapter 13

美国所经历过的几次大恐慌

1907 年的恐慌很自然地重新点燃了公众对此前一切恐慌的兴趣，因此，此时简要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是必要而及时的。在乔治三世时代，波士顿港口的倾茶事件^①之后，发生了一次小恐慌，它是独立战争（英国 13 个殖民地摆脱英政府统治）的序曲。这次小恐慌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因为当时的贸易很贫乏，银行业尚未发展起来，相应的信用也非常缺失。由于波士顿茶党的作用，它的影响也就是在茶壶中“沸腾”得最为厉害。

1812 年的恐慌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恐慌，造成这次恐慌的原因是过度贸易和各方面没有节制的扩张，但是，陡然激发了这场恐慌的是当年美国与英国发生的战争。那时美国的银行资本总量只有 7 000 万美元，然而接踵而至的是有 90 多家银行难以支配好其储蓄，因此政府很难筹集到战争贷款。同时，宣战之前本来很活跃和繁荣的贸易和制造业，突然之间变得几乎瘫痪了。

过度的膨胀和害怕心理造成的过度紧缩，是对市场价值和信用的巨大破坏。但是，政府的军费开支，在成功地安排了有价证券融资之后，逐渐地从恐慌的恶劣影响中恢复过来，那些陷于停滞的产业也恢复过来，那些赋闲的劳动力也重新上岗就业。

① 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进一步执行高压政策，1770 年波士顿惨案发生。1773 年通过了茶税法，引起波士顿倾茶事件。——译者注

对于 1823 年的恐慌，没有很多的记录。这次恐慌导致的贸易萧条一直持续到 1825 年为止。显然，这次恐慌较为温和，它的严重性要低于 1812 年的那次。这次恐慌没有任何战争或其他重要事件的刺激，它是过度贸易和信用过度扩张的一个反应的例子。

然而，1837 年的恐慌更为严重和恶劣，因为当时的美国在发展程度、人口数量和财富资源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它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正如前面几次那样，实际上其他各次恐慌也一样，其产生的原因都是由于过度贸易、投机和信用扩张，但是，美国银行所面对的问题和总统杰克逊对这些机构的敌意加剧了恐慌。

投机活动越来越狂热，尤其是土地和新铁路项目的投机活动，在当时的英格兰，它们还刚刚处于雏形阶段。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当地的第一个火车引擎制造者，他的成就迅速煽动起了美国铁路公司的热潮，他们的创始人为了在此建造和装备铁路而忙于筹集资金；顺便提一句，它也强烈地助长了土地的大规模投机。

当然，1857 年的恐慌在程度和影响上都无疑要超过 1837 年，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使得后者比 1812 年的恐慌来得强烈。这些原因即是：美国的疆域拓展、人口扩张和财富增长。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美国投机公司迅猛增长，尤其是紧随 1849 年加利福尼亚金矿大发现之后，铁路建设公司的大举兴起。但是，其直接原因是俄亥俄生命信托公司的破产（其主要机构在华尔街）所导致的大恐慌。

拿骚街的这个拐角，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金融界的重要支持力量，在美国没有别的什么机构有着更高的信用或更强的信心，虽然这种信用和信心并没有什么很好的根据。当俄亥俄生命信托公司宣告破产的时候，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坏消息瞬间在公众中传开。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给金融和商业界带来了惊恐，美国举国上下，信用遭到了全面的毁损。

这实际上就是恐慌。到处都不认可银行支票；很多人都要求兑现；于是，除了纽约的化学银行^①给予兑现之外，各处的银行都停止了硬币支付。紧接着，经济萧条，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数千家企业破产，几乎 3/4 的铁路和

① 又称汉化银行。——译者注

其他大公司都拖欠利息和其他费用，它们都转移到了委托代理人手中。恐慌之后一年多的时间，萧条逐月恶化，最好的一些铁路股票也跌到每股 3 到 5 美元，包括密歇根南和哈莱姆。与此同时，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公司出售以及公司重组，这些都在诉说着当时金融崩溃的故事。

1861 年 3 月 4 日，美国尚未从大恐慌中恢复过来多久，林肯就任总统，国内战争爆发。当时，出现了严重的萧条，即战争危机，但是它发展非常之缓慢、隐蔽和拖沓，以至于不能称之为一次恐慌。可以说，这次恐慌开始于 1860 年 11 月林肯入选总统之时，即预期到南北战争威胁的时候，并一直持续到政府 1861 年开始发行战时纸币流通券，停止硬币支付为止。

1857 年恐慌的一个特征，及紧随其后挥之不去的萧条，重复了 1837 年恐慌的特征，即普遍盛行所谓“小面额纸币”。小面额纸币实际上是 IOU（借条），是接受钞票或支票者所给出的零钱，他们接受的钞票或支票要高于自己为任何物品所支付的价格。在纽约，有偿付能力的纽约银行票据从来没有遭到拒绝支付，但是其他地方的银行则被禁止；在找零时，不找硬币，银行暂停硬币支付。因此，除非金额恰好，否则小面额纸币还是要用来找零。

纽约市充斥着这种小额的个人债务凭证，它可能是店主、旅店、饭馆、酒吧、理发店或其他各色人等开列的凭证，其中有很多都要不断易手，直到凭证变得太脏、太破旧，以至于不便持有。它们是最劣等的劣币，只有作为银行的硬币支付的找头时，才能由银行兑换。但是，当然，这其中大部分都根本兑换不了。它们的价值在 1 美分到几美元的范围，此类纸币在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的地域大范围地或多或少有所发行。

黑色星期五的黄金恐慌是华尔街的一次波动，不像其他几次恐慌那样年代久远。它发生在 1869 年 9 月 24 日的星期五，是以杰伊·古尔德为首的金融家合谋“垄断”黄金，逼迫空头和进口商以高价买进。杰伊·古尔德及其同党设法控制着拿骚街的第十国家银行，这家银行由于当天过度保付支票金额高达 750 万美元，而卷入这场垄断共谋案，结果被政府指派的银行检查员责令关闭。与此黄金垄断共谋案相关，还查出了几起丑闻；其中一起丑闻与纽约的财政部助理的辞职有关，还涉及了两家受雇于这伙黄金垄断者买卖黄金的经纪人公司。由于这伙人每天哄抬金价，金价从 119.5 上涨到 162.25。政府要卖出 500 万黄金的消息一宣布，金价暴跌了 30%。紧接着，黄金票据交易银行暂停

营业，股票交易所也关门歇业，以遏制接踵而来的股票恐慌。尽管黑色星期五不是一次经济恐慌，但是它对华尔街的很多公司都有灾难性的影响。

接下来的是1873年的恶性恐慌。这次恐慌起于9月13日的华尔街，当时几家知名银行和经纪人公司破产，包括豪·美希（Howes & Macy）、凯尼恩·科克斯公司（Kenyon Cox & Co.）（丹尼尔·德鲁为该公司的特别合伙人）、菲斯科·哈齐公司（Fisk & Hatch）以及当时的杰伊·库克公司（Jay Cooke & Co.）。破产迅速蔓延开来，并很快波及全国。自此，每天都有很多公司相继破产，从早到晚都有很多看客包围在华尔街周围。为了预防股票的抛售，股票交易所一直关闭了十天。

这次恐慌的严重性可以从9月19日22家股票交易公司暂停支付这个事实来推测。关于银行和信托公司困境的谣言四起，出现了严重的挤兑现象。当时的联合信托公司由于要筹资以满足挤兑的资金要求，而不得不关门大吉。据了解，由于有好几家银行不能够再忍受这种挤兑，在9月20日的晚上，纽约票据交易所决定依据旨在应对1860~1861年经济危机的决议，发行1000万美元的票据交易所贷款凭证。同一天，股票交易所由其主管委员会责令关闭。

9月24日，经授权再次发行了1000万美元的贷款凭证，27日，恐慌变得非常严重和流行了，以至于贷款凭证发行的所有限制条件全部去除了。银行除了小额存款给储蓄者支付现金支票之外，其他的都给凭证，通过票据交易所支付，该协会的银行周报表在9月27日暂停，直到12月28日才重新恢复。票据交易所的贷款凭证总金额10月20日达到了它的最高值22400000美元。期间，经过10天的暂停，9月30日，纽约股票交易所重新营业。在股票交易所歇业期间，百老汇存在股票和债券的场外交易市场，但是这里的硬币销售价非常可怕。1873年的危机远比1907年的要严重，其恢复的过程非常缓慢。1884年的恐慌不再局限于华尔街，只是在华尔街感觉最为严重。

1890年，由于伦敦发生了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s. & Co.）的破产案，由这家公司输出了大量黄金以缓解当地的恐慌，这就造成了1890年的股票市场恐慌。但是，它的影响并没有超出华尔街的范围，很快就结束了。然而，1893年的恐慌则非常严重和影响面大，美国全国有15000家企业因此破产。照例，导致恐慌的还是过度投机和过度贸易扩张、股票扩张和新企业扩张。但是，更为直接的诱因是关于黄金和白银的比价高达16比1的谣言的煽动。谣

言导致了美国财政部当时各方面所有的自由黄金（不足 2 000 万）被全部挤兑，而纽约财政分局的黄金总量削减到只有 870 万美元。1893 年 2 月，当时的总统克利夫兰从摩根 - 贝尔蒙特辛迪加为美国公债买进了大约 350 万盎司价值 62 312 500 美元年利率为 4% 的黄金债券，这是一笔非常有名的黄金购买案。在该辛迪加的努力帮助下，停止了黄金出口，重新补充了财政部的黄金供应，恢复了信心。这样，挤兑停止；大幅提高的关税逐渐增加了政府所有的黄金量，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轮到 1907 年的恐慌了，我们要讨论它的起因问题。1907 年的恐慌产生的原因是累积效应，但是，就像前面几次危机一样，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于它能够兑现的硬币来说，信用过度，即债务过度。贸易和投机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活跃，过度轻率地扩张，这种不成比例的扩张变得非常危险，它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就像我在危机真正到来的数月之前所指出的一样。我说，就像我在其他地方提到并批评过的那样，除非我们放缓脚步并修正方法，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的反应和强烈的波动。

就我所了解的银行业知识，和我对前面几次恐慌（自 1857 年起）的体验，我可以预见信用量和硬币量的这种巨大并不断扩大的比例失调，最终将导致经济的崩溃。这种比例失调往往是巨大的，在贸易和投机过程中还会不断扩大。但是，在美国，尤其是对于从事投机事业的华尔街百万富翁和投机的煽动者们来说，大量流动资金转换为固定资产的形式，不能用于筹资，此时的局面就变得难以控制了。

然而，人们直到 10 月 21 日才看到了危险，觉察到了警报。那天，商业银行通知纽约票据交易所，从第二天起，纽约票据交易所就不需要为纽约人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兑换票据了。与此同时，票据交易所调查了国家商业银行，命令它的所有官员和管理者马上辞职，筹备援助。

此时，公众突然感到害怕了，他们挤兑纽约人信托公司的存款，导致纽约人信托公司在第二天开张了两个小时后关门大吉。他们对银行的不信任更被这件事火上浇油，于是，对美国信托公司及其殖民地分支以及林肯信托公司的挤兑开始了。第二天，在布鲁克林的 6 家银行和 1 家信托公司及哈莱姆的汉密尔顿银行被暂停营业。

同时，所有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存款都出现了严重的挤兑，因此，被挤兑出

来的钱并没有再存在其他机构，而是被储藏囤积起来了。因此，严重的货币紧缩又接踵而至，它导致了股票交易所的短期同业拆借年利率一时高达 40% ~ 50%，到了年尾，则跃升至 15 ~ 25。

纽约票据交易所迫切需要马上加强协会内部银行，抵制对其存款的挤兑。于是，在 10 月 26 日，纽约票据交易所决定针对那些优质的资产，发行票据交易所凭证，这些凭证可代替硬币使用，用于支付票据交易所的日常收支差额。这样，银行的担子马上就轻了很多。这也给大城市的其他各家银行票据交易所传递了一个可依葫芦画瓢的信号。此外，很多国家银行也发行了自己的支票（从 1 美元起），用于支付兑取的存款。

关于此次恐慌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和细节，我在文中的其他部分将进行介绍。尽管这样，我还是要提醒，不要忘记（因为它的真实影响非常严重），恐惧加剧了感觉的情绪化，而恐惧产生于不信任。所有恐慌的直接根源均在于此，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外因，恐惧感将不存在。在我们这里，信用环境遭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其原因在于共谋案的层出不穷，它引起了人们的恐惧感，从而导致银行和信托公司出现挤兑现象，储藏的资金撤回，以及在不信任感不存在时，本来会储蓄的其他资金被收回。为了填补由于货币囤积造成的货币真空，我们付出了十二分的努力，输入了大约 1 亿黄金。

造成货币升水的原因除了总价值 8 100 万美元的票据交易所贷款凭证之外，囤积及其引致的紧缩也是其原因之一。有一段时间，货币升水据报达到了 4% ~ 5%，它实际上迫使银行局部暂停了要求通过票据交易所支付的支票的支付，除非他们乐意给存款人提供小额通币。但是，幸运的是，12 月 31 日升水缩减为 1/4 @ 3/8，并在 1908 年年初消失。同时，在整个危机当中，大部分雇佣劳动者都感觉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支付工资的需要，并且获得资金的成本非常之大。在匹兹堡^①和其他劳动力密集的城市，工资很多都是以银行或雇主公司所发行的凭证来支付的。这种凭证发行的范围非常之广，以至于在匹兹堡的所有街道，汽车排成长队领取凭证，以应付生活之需。

毫不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严重地阻碍了各类物品的买进，导致了工业企业职工士气低沉，陷入半瘫痪状态。由于磨坊和其他制造业企业的破产或裁员，

① 匹兹堡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城市，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译者注

使得数以十万计的工人被迫退出就业岗位。但是，暴风雨很快过去了，资金市场又恢复原状，且从其缓慢的恢复过程中，可以看出很有希望能够逐渐（如果不能够算迅速的话）恢复到贸易和制造业正常的财富水平。直到1908年1月11日，票据交易所才报告银行储备消灭了赤字，有了6 084 050美元的积累，1月3日的赤字为11 509 550美元，在过去赤字为81 000 000美元。

由于我们从欧洲输入了1亿黄金，来缓解危机带来的货币压力，我们不能就认为我们此时不再对其他国家负有债务了。我们输入的黄金，要用我们自己的资源去支付购买，这种资源相当于硬币，其形式为棉花、谷物、石油、铜还有其他美国制造的产品。

这些商品对于欧洲非常重要，甚至比此时黄金对于我们还要重要。因此，双方的交易只是你情我愿的公平契约，并没有对任何一方的偏袒。实际上，英国和法国都竭力设法限制我们的黄金输入。英格兰银行更是将利率标高到7%，直到我们停止买进黄金之前，利率一直保持着这个值，这就是一个明证。当然，作为对银行防御性和保护性的措施，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障碍。

英格兰银行申明自己的意图是防止我们从欧洲竭尽所能地输出黄金，然而，在这个高利率障碍面前，我们依然买进，支付，输入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黄金。直到我们停止买进黄金，英格兰银行才将利率降低到6%。这表明我们控制英格兰银行甚过英格兰银行控制我们。我们自力更生，没有接受援助而是自己援助自己，我们并没有请求也没有接受任何的帮助。

这个重要的事实证明了我们金融和商业资源的强劲和博大，经济地位及经济所依托的基础的稳固和健康。我们承受危机的巨大压力时所体现出来的坚定，以及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都同样雄辩地证明了同样的结果，它们都表明了美国是真正伟大的国家，无论是天然的物资资源还是后天努力所获取的财富，在所有国家中都是最棒的。

美国的强大所带来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享。我们有强大的国际贸易，每年美国都有很多游客到欧洲观光，他们要花很多钱。如果1907年，美国游客在欧洲所花的15 000万美元用在国内，那么我们本来可以无需输入黄金来化解这场经济危机。欧洲有很强的理由为其从美国所获取的诸多好处投桃报李。想一想，如果没有美利坚合众国，那么在这个现代社会

中，欧洲的贸易和商业将呈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美国人民在迎击 1907 年的经济大危机时，在总体上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决心和勇气，很好地预言了从危机的废墟上经济将迅速复苏，它为美国经济的继续繁荣和发展铺平了道路。较之 1812 年、1837 年、1857 年、1873 年、1884 年和 1893 年难忘的几次恐慌，这次的恐慌多半可能更快地从难耐的煎熬中摆脱出来，因为此时的财富、人口和一般资源都较之以往的任何时候要丰富许多，因此这样的比较是不适当的。

美国银行系统自 1873 年起的独特发展轨迹，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在 1873 年那次严重的恐慌中，纽约票据交易所只发行了 1 600 万美元的交易所凭证给其属下的银行，而 1884 年的恐慌中则发行了 2 100 万美元，1893 年的恐慌中发行了 4 100 万美元，在最后一次 1907 年的恐慌中发行的量不少于 8 100 万美元。这次的危机非常严重，但是经过了提炼，消除了很多银行、大铁路、工业公司的管理层的很多不健康和危险的投机因素（姑且不作欺诈论），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较以往更高标准的职业道德规范。因此，我们可以借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结果好一切都好。借用《圣经》的话，穿过恶就是善。至少我们已经从危险的荨麻中摘取了安全的鲜花。

对于美国和当下环境的看法在旧世界东半球^①的银行业界有着广泛共识，他们为总统罗斯福开脱责任，认为这次的危机不能责难罗斯福总统或让他负责。关于这一点，一位重要的伦敦银行家、国会议员、大不列颠最有影响、最受受欢迎的金融界人士拉斐尔先生（H. H. Raphael），在 12 月份说：

“我们认为罗斯福总统不仅是最有勇气的，而且是一位屈指可数的最为杰出的总统。我们钦佩他的勇气和独立精神。无疑，美国人的心是向着他的。他提供了股票交易所，您可能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场所。尽管，您现在已经遭受了金融风暴和压力，但是我们对美国人很强的恢复能力还是有所了解的。美国将在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上向前迈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洁净和强健。”

由于这个观点显然中肯，所以它非常值得引用。如果说在我们伟大的美国，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公共服务而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资格赢得国民的响亮鼓掌和欢呼万岁，那就是罗斯福总统。

① 常用来特别指欧洲。——译者注

第 14 章

Chapter 14

华尔街的繁荣景气

近来，华尔街已经持续享受了好一段的繁荣景气，与以往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关于这段繁荣光景，可能其最有趣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无论如何都难以让人感觉到有何壮观之处。从这点来看，它很独特。很多股票的价格更高了，其内在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增大了。这个市场具有所有的特质，可引起股票交易上的全部国民最强烈的兴趣和关注。然而，除了这些条件之外，华尔街还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对于一般大众，他们从新闻报纸上看到消息，甚至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意识到在华尔街出现了一段繁荣景气。我认为，这个不同寻常的情形是应该的，我们所享受的繁荣景气建立在一个深得人心的基础之上。它没有任何不自然或矫饰，华尔街只是反映了美国的整体繁荣情况。农民、商人、机械师、磨坊工人和矿工都在各自的行当内专注于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无暇顾及及其他。令股票繁荣的条件，同样令美国国内其他方面以同样的速度繁荣发展，因此，我们毫不奇怪或根本不值得特别关注。

在华尔街，防止人们对一个上升市场产生激动和骚动的另外一个因素也发展起来了，那就是，在华尔街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核心形象或控制力量。通常，繁荣都是集中于某一个在公开场合有突出表现或众所周知有操纵市场能力的人。目前，操纵在以一种既新奇、异常又平静的方式进行。市场正在被操纵，这样的事实即使对于最不经意的旁观者也是一看就透。但是，操纵的源头可能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而在华尔街的所有其他人就只能甘当学生了。他们知道

新秩序已经出现，它是华尔街当前所体现的最强劲、最势不可挡的影响力所形成的。这种影响大部分都是由美孚石油公司造成的，他们给华尔街引入了同样平静、不夸张，但势不可挡的方式。在其此前的公司业务运作中，他们就常常采用这种做法来处理公司事务。除了这个集团之外，在华尔街中经营过的团体和其他所有人实际上一比较就分出高下来了。迄今为止，那些星光闪耀的杰出操盘手，比之于我们现在的操盘手，显得相对较小。

杰伊·古尔德在自己的最佳状态时还总是被迫面对破产的可能。范德比尔特船长尽管常常将华尔街玩弄于股掌之间，也常常陷入困境，他一生都要为此挣扎。任何一个伟大的投机者或投机者联合都是这样，直到有一天控制美孚石油公司的人掌握了权，操纵就不再是投机了。他们的财力非常雄厚，以至于他们只需要部分资产，就能够做到满意的结果。股票市场，在旁人看来，应该是他们唯一关注的目标，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还涉足了很多不同的产业。对于很多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事实的人来说，这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操盘手，他们的方法美就美在平静和低调，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夸耀。没有哗众取宠，没有报纸上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没有混乱和骚动。整个过程有序、全面、稳定，没有任何的波澜或突变。这伙人到底赚了多少钱，我们不可能猜得到。反正这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金额，与之相比，华尔街历史上最冒进的投机者也只能相形见绌。这个事实令整个操纵变得温和，根本就容不下令人匪夷所思之处。这个集团几乎完全控制了华尔街，很多最抢手的金融机构都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便利服务。有如此实力和便利，很难想象这些人要做些什么，他们在市场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做些什么。幸运的是，迄今为止，他们的操纵都是单向上升的，为华尔街几乎每一个人都带来了大笔的金钱。

虽然我们到处都能听到有人亏损了，有些亏损额甚至还很大，但是，与总体赚钱的大趋势相比，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

华尔街上一一次的繁荣景气与现在的繁荣景气相比大有不同，这种不同令我们难以想象。它拥有这次繁荣景气所没有的很多要素。它围绕着一位卓然挺立于镁光灯下的人物。它使得股票交易处于一种持续的狂热躁动状态。报纸上一栏又一栏载满了耸人听闻的煽情故事。它所滋养的从业者从书面上看多达百万人，数月时间，市场上跌宕起伏。罗斯韦尔·弗劳尔（Roswell P. Flower），纽

约州前任州长，一位华尔街罕见的特立独行者，是这次繁荣景气的领袖，我们要说说他。弗劳尔先生有着非常朴实的外表。他惯用的语言以其有力、直接和强硬，而不是字斟句酌的风格，而格外引人注目。他步态从容，看起来像营养充足的农场主。他的嘴巴里面似乎总是少不了一嘴的烟草块，这几乎填满了他左边的嘴巴。痰盂是他办公室最主要的摆设之一。他的衣服就像是食品袋吊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帽子很少刷，充其量是多日才刷一次，显然他是忘记了。总而言之，从外表上看，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竟然是领导着一个以西装革履、衣冠楚楚闻名的地区的人。他所受教育肯定也不是学院派的；但无疑的是，在常人看来一切是缺陷的特点，一到弗劳尔先生身上就成为了他最为有力的工具。没有矫揉造作的字斟句酌，让人们对他的话感到很有信心。他很有限的教育程度，令他能够沿着一条没有精神干扰的路线思考，而这点可能伴随着更高创意的精神文化。

大概 20 或 25 年前，弗劳尔先生作为大舅子亨利·基普（Henry Keep）资产的管理者和经营者进入华尔街。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控制了大笔的资金，在保守而稳健的战略下，他的资产增长极为迅猛。他甚至很少涉足投机领域，直到他的纽约州长任期结束为止。当他从奥尔巴尼返回华尔街的时候，他很自然地有了相当高的声望。在股票交易市场内和周围，并没有很多个纽约的前任州长。他身边还簇拥了一大群党徒。在纽约州的两大派中，有很多达官显贵乐意在华尔街冒险尝试一把。弗劳尔先生在担任纽约州长期间结交了大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的朋友，对于每一个与弗劳尔先生发生联系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尽管这样，还是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对自己党派的忠诚度。他与很多大资本家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他步入商界之后，弗劳尔先生把政治抛在脑后，他挑选出几支股票作为特别股，这其中包括：芝加哥天然气、联邦钢铁和岩岛。在他的操作下，所有这些资产均有升值，并很快显示出巨大的优势、非同寻常的实力和极强的活动性。空头们总是频频向他发起攻击，不时将他推向死角，但他总是能够设法再次回到前台，在每一次的交锋中都能脱颖而出。待他牢牢地掌控了所操纵的特别股之时，他突然大举买进布鲁克林快运，几个月来他搅动市场的方式在华尔街尚属罕见。他最初捡起这支股票是在每股 6 美元，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时间内，股价跃升到了 138 以上。纽约州几乎每一位政治家都购置了证券资产。弗劳尔先生在华尔街报纸的记者当中，非常受欢迎。他们日复一日

的生动报道，帮助弗劳尔先生成就了他的繁盛。

在快运浪潮的推动下，华尔街几乎所有的资产都迅速升值，最后似乎看不到尽头。空头们只要一露面，就会被打击得目瞪口呆，他们进攻的唯一结果就是弗劳尔股票跳至一个新高。这位前任州长一直鼓吹美国主义和自信，直到所有人都相信，只要股票有凭据，只要资产是在美国，那么，你就能在任何价位上买进，而仍然会很安全。

这场繁荣并未导致恶性恐慌，其原因仅仅在于一个事实：弗劳尔先生突然去世。如果他能再活30天，那么这个泡沫就会被戳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弗劳尔先生去农村休一天假，他尽情地吃火腿和小萝卜，大口大口喝冰水，咽下这些简朴的饭菜。结果，很自然，他在急性消化不良来袭后的几个小时内就一命呜呼。他的死拯救了华尔街。

洛克菲勒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以及其他富豪朋友带着数百万美元仓促入市，并维持了价值。他们能够将先兆反应归因于他的死亡，并指出让这种意外事件影响股票价格是非常荒谬的。他们剔除了在前述过程中作为事件自然进程的突变。他们推论说，报纸的传播阻止了这次的突变事件。当结果要水落石出的时候，所有行业结果都只是出现了轻微的波动；之所以其影响结果没有很恶劣，是因为市场有美孚石油公司和及时出现并与之并肩作战的其他公司，他们阻止了一场大浩劫。那些押注于微利的小投机操盘手们当然被清除出局，但是很多大投机操盘手还是保存下来了。有史以来，这可能是唯一一次，大投机操盘手的去世拯救了一次大浩劫。遭到损害的是很多政治家和一些小操盘手，他们并没有侥幸获得利润形式的好收成，反而失去了他们所有的一切。

弗劳尔繁荣景气的一个有趣事实是年轻的乔·利特（Joe Leiter）无意间促成的。尽管利特自己在此前一段时间去过华尔街，但是，他间接地促成了极大地有益于弗劳尔先生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又极大地解放了数亿美元的农场土地抵押。当利特开始垄断小麦时，一蒲式耳的价格只接近于60美分。在他破产之前，他将价格大幅提升到1美元以上，让数千农夫得以以一美元或以上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小麦种植区仿佛一夜之间富裕起来。农夫们用他们卖小麦得到的钱清偿了多至两三亿美元的抵押。这些抵押以前一般都被东部人所掌握。如此一来，这解放了更多的东部资本，从而引起了大量资金需要寻求投资场所。当弗劳尔先生这次繁荣景气为他们打开投资之门的时候，掌握这笔资

金的人简直喜出望外。因此，此时提升价值相对就是比较容易的事。

皮尔蓬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现在是一位著名的人物，他曾经被闻名一时的邓肯·谢尔曼（Duncan Sherman & Co.）银行作为一名办事员培养。后来，他与安东尼·德克塞（Anthony J. Drexel），可能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银行家接触。交往的结果是创立了德克塞·摩根银行，摩根先生任该银行在纽约的执事股东。当德克塞先生去世时，摩根先生吸收了其全部业务。几年之后，他的父亲去世，摩根先生成为 J. S. 摩根伦敦银行的负责人。由此，摩根先生就获得了一个非常显赫的位置。此后，通过重组破产的里士满到西点的铁路与仓储公司，并改名称为南方铁路公司，他很快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影响。很多小铁路加入进来，其中大部分是陷入了财政困境，而实际上，所有这些铁路公司都管理混乱。他将这些小铁路合并到由一个头儿领导的一个系统里。合并的铁路是该州最大的一项资产。摩根先生接下来将注意力转移到瑞鼎（Reading）和伊利铁路的重组上，两者情况都非常窘迫。他很快重整旗鼓，并带来了长期以来铁路股票的一路繁荣。然而，他与一些大股份持有者之间发生了几次尖锐的矛盾。他们试图用賄购的方式，来公开与之抗衡。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计划太夸张。在争执当中，他并没有经常诉诸于可能损害价值的方法，而是在低价时买进，以便强化他的控制。

在这些交易当中，跟随摩根先生的人一般都赚了钱。

另一类的交易是由怀特（S. V. White）在几年前策划的。人们习惯上喜欢称怀特先生为怀特执事，因为他在普利茅斯教堂担当执事。怀特先生在华尔街是最年长的操盘手，也是非常惹人注目的一位人物。他在投机领域赚得了很多财富，又失去了它们，但是，他就像以往一样一往无前，尽管他现在已经年逾七旬，他仍然每天积极地出入于市场。

在华尔街上，最独特的一笔交易可能算是约瑟夫·班尼甘（Joseph Bannigan）交易，当时他是橡胶信托公司的总裁。这段交易的历史曾经一度带来了工业的巨大繁荣，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谈论过它，只有很少人知道，当然，顺便提一下，知情者大部分都是那场繁荣的受害者。

班尼甘是一位未接受过多少教育的爱尔兰人，他几乎目不识丁，更不会写字。他最初在新英格兰一家橡胶厂工作的时候每天拿 1.5 美元，最终去世的时候身家已 500 万美元。他精明机智，知道钱的价值。他节衣缩食只为了一个目

标，当橡胶信托公司创立之后，他要主宰位于普罗维登斯^①这个州最大的工厂。他了解的贸易知识非常之全面，尽管在写商业信函时他几乎总是会误用小写的I^②，但他还是成为了该信托公司的总裁，他所持股份高达约五万股。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班尼甘认定在该信托公司中有另外一个巨头对他有偏见，他所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退出。因此，他将自己的股权证明塞进手提包，乘晚上的船离开了普罗维登斯，一大早天刚亮便到达了纽约。他吃过早餐，抄近道直奔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他事先确保这位股票经纪人可以信赖，然后，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我希望全盘卖出，”他说。“我这五万股的股票一股都不愿意留。给你，把它们投放到市场，卖掉它们。”这位股票经纪人告诉他这样做不现实。如果他想实现股票的全部价值，那么他必须采取另外的做法，因为一旦他将自己的五万股股票投放市场，这只股票会变得一文不值，他也就不能从中获得收益，或只能获得很少收益。班尼甘先生觉得这点很有意思，就问他要怎么做。

“买进。”经纪人说。

“但是，我不想买进。我现在就是太多了。”

“好的，无论如何都要买进，这样就为这只股票营造了一个市场，然后待时机成熟，就可以脱手了。”

“我必须要买进多少股票？”

“嗯，大约25万美元。”

“但是，我没有25万美元现金去买进这支橡胶股。”

“哦，您可以做到。班尼甘先生，一位像您这样的人物，借个25万美元没有任何困难。”

这位老人最终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被说服按照经纪人的说法去做。大约两个礼拜之后，这个经纪人给他写信，要求他这次必须再追加买进20万美元。班尼甘先生先是严词拒绝，但是，就像以往一样最终还是屈服了。他借入了20万美元，交给了经纪人。有了追加的这些资本，这些经纪人又可以继续操纵市场。局内人很快发现有某些势力集团在买进；但是，他们没想到是班尼甘

① 普罗维登斯是美国罗德岛州首府和最大城市。——译者注

② 英文中，I（我）应该用大写字母。——译者注

先生，他非常谨慎地掩藏在幕后。他的经纪人娴熟地操纵这支股票，一天买进，另一天卖出以保持股票的活性。此后不久，经纪人开始大量借入这支股票，让局内人错认为这里蕴藏着巨大的短期利益，他们合谋排挤这些空头。这些局内人持有股票的绝大多数，他们联合起来排挤这些空头，因为他们想将价格提升到61，而正是大约在这个价格班尼甘先生就抛售了。班尼甘先生现在发现自己腰缠万贯，而另一些家伙则因他的股票而腰缠万“股”。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总裁会抛售到他们的头上，直到班尼甘先生的股票正式转移，他们还以为是买进了跌价时抛售的股票。待橡胶股的股价从61跌至16之后，股价就不再震荡了。此次交易可以说蕴含着一出喜剧所具有的全部元素，如果有哪位剧作家能够从中发现素材，并将它适当处理的话，这将获得永恒的财富和名望。我这里讲到但只是轻描淡写的都是其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当然，很少有初入华尔街者能够遭遇到的好结局。斯托克韦尔（A. B. Stockwell）就是这样的一个完好例证。他现在还在华尔街的某个角落，但他是“曾经辉煌人士”中的一员，就像无数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一样，他似乎预示着将要成为杰出的操盘手。他曾经腰缠万贯，但现在虎落平阳。他早年在伊利湖的汽船上当办事长；他的父亲据说在克利夫兰经营一家车马出租处。在一次旅行中，斯托克维尔赢得了埃利阿斯·豪（Elias Howe）的极大注意。陪伴豪先生左右的是他的女儿。斯托克维尔还赢得了豪小姐的好感，并有了美满的结局，他设法赢得了豪小姐的芳心眷顾，此后两人很快就喜结连理。当豪先生去世之后，斯托克维尔夫人掌管了父亲的百万家产。有了这些储蓄金，斯托克维尔开始步入华尔街，未等其他人回过神来，他就成为了这一地区人们谈论最多的人物。他将妻子所有的百万家私投入到太平洋邮递股票，获得了该公司的控股权。他刚进入华尔街的时候，是平凡的斯托克维尔；后来，由于他的慷慨和结交的关系网络铺开，他成为了斯托克维尔先生；待他掌管了太平洋邮递公司之后，人们都管他叫斯托克维尔船长。每个人都向他卑躬屈膝，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如此位高权重，以至于他骄傲得不屑于招手。斯托克维尔在股价大约40的时候掌握了太平洋邮递的控股权，此后将股价提升到107。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身价超过了1500万美元。但是，不幸的是，当他发现太平洋邮递的股价飙升到了107，想要退出为时已经太晚了，当他开始抛售的时候，已经远不值这个价格了。他为这支股票所累，被套牢，华尔街告诉他可以自由处理。他想要卖出，但是发

现没有市场。接着，他的许多短期债务债主开始向他要求清偿，为此，他不得不卖掉那些股票，而无法顾及这个价格是高还是低，这样一来，引起了股价混乱，最终股价回挫到最初买进时的价格水平40。在这场混乱中，他损失了所有的名义利润和妻子数百万美元的家私。这场灾难不仅剥夺了他的全部家当，而且使他再次沦为平凡的斯托克维尔，很多人甚至叫他“那个红头发的小混蛋”。这就是太平洋邮递公司历史上最辉煌的繁荣，尽管伦纳德·杰罗姆（Leonard Jerome）在前面这项离奇的资产上，有着令人瞩目的盛衰沉浮。

伦纳德·杰罗姆和阿狄森·杰罗姆（Addison Jerome）在太平洋邮递公司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几次将股价推到新高；但是，最后还是落了一个与斯托克维尔一样的结局。两位杰罗姆从华尔街最富有、最杰出的操盘手，到最后实际上被淘汰出局。伦纳德·杰罗姆是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小姐的父亲，他除了一所现由麦迪逊大街的曼哈顿俱乐部占用的房屋产权之外，没有任何遗产馈赠给自己的女儿。这项资产每年可收入约15 000美元，其中丘吉尔小姐获得10 000美元。

与肯尼（Keene）繁荣一样，有一些繁荣曾经搅动了华尔街，这其中包括古尔德繁荣和范德比尔特繁荣，这些繁荣在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过。

信托或贸易组合的问题在最近的几年激发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关于这点，最引人关注的就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他无疑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认为是19世纪商业史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必须注意的一点是：这里的历史主要是关注历史本身，而不是政府的活动；历史关注人们自身的生活，而不是君主、国王、总统或政治集团的个性特色。这点在诸如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和约翰·巴赫·麦克马斯特（John Bach McMaster）这样的历史学家那里体现的最为明显。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历史，洛克菲勒无疑会被认为是当下极具商业实力的最引人关注人群中的一员。他就像商业界的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①，领先闯入一个全新的、人迹未至的事业领域，冒着极大风险，遭遇着新奇严重的金融风险，最后，赢得了一个全面而持久的成功，他所取得的成就满载于商业史中，他的声望尽人皆知。从纽约州托加郡一个小农户，到他今天的生活工作之处，真是一个太大的跨越。他1838年出

① 丹尼尔·布恩（1734—1820）美国开拓者，民间传奇英雄和肯塔基州殖民运动的中心人物。

生，现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期。由于抚养他的是一位严谨的、经常上教堂的人，所以他的话就像他的债券一样，非常有信用。他堪称是努力正直的化身，是节俭、进取和坚持不懈的典范，对于那些似乎无成功希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这些都是成功的金科玉律。他的老校长似乎是第一个让这位年轻人涉足石油炼制的人。在不久的若干年前，他们使用鲸油；价格为每加仑 1.5 美元。如何炼制在宾夕法尼亚水域发现的这种浓厚难闻的石油，这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黑色的粘稠物质，洛克菲勒偶然发现了一个炼制的方法，并在家乡向全世界推广使用，他赚了大钱，这令人想起了迈达斯的神话^①。21 岁之前，他与一位名叫惠特的人合作，起初从事的是仓储和制造行业。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石油，因而引发石油狂热。许多贫穷的农夫一夜暴富，成千上万人聚集蜂拥到油田。年轻的洛克菲勒保持了冷静。当有克利夫兰的朋友邀请他投资自己的油井时，他劝阻了他们，因为他认为当时的石油狂热有些过火，随后，他与熟悉蒸馏总流程的萨缪尔·安德鲁斯（Samuel Andrews）一起，投入了石油贸易的精炼部门。后来，这个公司成为了洛克菲勒·弗莱格勒·安德鲁斯（Rockefeller, Flagler & Andrews）公司，它迅速拓展了自己的业务领域，到 1870 年斥资百万美元资本组建了美孚石油公司。它开创了利用管道向海港城市输送石油的先河。他在过去被认为一文不值的石油副产品上，为公司赚取了数以百万美元计的收入。在世界所有已知的地方，都有它的市场，生产成本得到了大幅降低，它远远地超越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因此，在 1899 年它的“额外”分红达到并超过了整个股本常规分红的 2 300 万美元，这就没什么稀奇的了。洛克菲勒先生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早期的训练和自己的坚持不懈。就像其他有着独特个性特点的人一样，他可以定位为相信宇宙因果定律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他相信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他自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坚韧。他相信坚韧的品质可以所向披靡，甚至挑战自然本身。秉持这种观点，这位老练的商人拥护古老的哲学。

他和他在美孚石油公司中的合作人在股票市场上自然构成了一支实力派力量。他们也诚然是铁路股票和债券的非常大的持有人，有时，他们的影响就像

① 迈达斯是传说中的佛里几亚国王，酒神狄俄尼索斯赐给他一种力量，使他能够把他用手触摸的任何东西变成金子。——译者注

磁石一样难以抗拒。洛克菲勒个人的影响可能可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因为他可能算是美国最富有的人，甚至可算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据说，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的财富比任何其他人积累下来的都要多。他感觉自己财富的获得，很显然应该归功于自己所受的出色教育和慈善机构，应该归功于教堂和其他值得称颂的东西。他向学校、大学和学院慷慨解囊，此慷慨之举可与另一位公益人士安德鲁·卡内基相媲美。他们同样坚持认为，最大的仁慈之举在于帮助他人实现自助。

第 15 章

Chapter 15

1900～1904 年间华尔街的 投机风暴

麦金利总统的连任和布赖恩主义的破产将投机的大球推向了股票交易市场 ◆ 大小资本家们投机的金额巨大 ◆ 新公司与大工业信托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合并风潮 ◆ 美国钢铁公司和其他公司合并的庞大资本超出真实价值 ◆ 新旧信托公司的迅速成长和普及，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对于迫使银行联合的影响 ◆ 西部的新富资本家们大胆而鲁莽地投机铁路股票 ◆ 1901 年 5 月 9 日北太平洋大恐慌 ◆ 约翰·盖茨获得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的控制权，J. P. 摩根公司代表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以及南方铁路的利益将其赎回 ◆ 1902 年 9 月之后，在银行和保守银行家的影响下，疯狂鲁莽的股票投机活动逐渐降温，从而避免了进一步的通胀和大紧缩 ◆ 由于此前繁荣期的拉长，很自然地出现了停业清算和 1903 年的萧条 ◆ 棉价大涨，丹尼尔·萨利引发了一场巨型多头投机的崩溃，他破产了 ◆ 1903 年，铁价突然大跌，1904 年的总体形势

几乎是奇迹般的突然，伴随布赖恩和他的白银神话的破产，及麦金利于 1900 年 11 月再次当选总统，华尔街从萧条与恐惧中一下恢复了信心和活力。全国的大资本家开始大举买进股票和债券，导致价格飙升，就像著名的吉尔德罗伊^①风筝一样扶摇直上。很快，各地的一些小额投机者开始源源不断地在股

① 吉尔德罗伊是苏格兰一盗贼。——译者注

票交易市场疯狂下单，一个股票大牛市就此形成，很多人连他们的最后 1 美元也押注在了价格上涨上面。

华尔街的投机资本家和大操盘手，当然还包括很多活跃的石油巨头们和詹姆士·肯尼，自然要利用这个时机来大规模操纵股票市场。他们以早期的低价大举买进股票，然后积极地提升股价；在投机狂欢开始之际，我们目睹了一场以工业企业、铁路公司或信托公司为对象的空前合并热潮，它们一般是利用这些公司来吸收几倍于自己原始资本或真实价值的资本。它们的股票在获准上市在华尔街交易之后，由发起人刺激和哄抬，价格涨到高位，以此吸引买家。而此时公众也开始疯狂抢购，买进了非常多的股票。买东西时头脑发热，静下心来就要后悔，很遗憾地说，大多数的买家都是这样；股价缩水所带来的总损失数以亿美元计。

对于华尔街和美国来说，一直肆虐到 1902 年 9 月的通货膨胀，在保守派的作用下，在诸多银行以及诸如我这类人的警告下，最终得以制止。如果这种通货膨胀再持续半年，那么它将导致毁灭性的收缩，经济泡沫的破灭。到时，整个美国各个商务部门都可以感觉得到，就像 1857 年和 1873 年恐慌及恐慌之后一样。我是首先发出警告的人，我在 1902 年 9 月 13 日的每周函件中呼吁停止这种危险的疯狂投机。信里是这样写的：

“一个人如果陷入一种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结果的状态，那么他不过就是一个酒徒。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有时会蔑视法律和命令。这是由于他放纵自己进入一种麻痹的状态。新近的股市就是由于大多数股民陷入这种状态而造成的。他们在直到现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买进、买进、再买进，他们以为只要是投机冒险就要获利，这使得他们像酒徒一样陷入一种麻痹状态，对于面前出现的各种负面因素视若无睹、充耳不闻。高价不能吓走他们；资金匮乏和高利率不能吓走他们；警告信号不能吓走他们；罢工不能吓走他们。对于他们，买进并持有股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不到强制清算开始介入，股票市场的这种状况就将继续下去，而货币的紧张形势迟早都将出现。我建议高度关注买方，最好不要在普遍高价时买进。我认为除非进口黄金，否则货币市场的窘境将难以缓解。全国的经济活动，加上农作物的收成情况，将使得资金的使用成本维持在一个高利率水平，直到新的一年。因此，那些买进股票后持有股票的人，

除非在现价的基础上做出巨大让步，否则他们将在感到难以以合理的利率水平获得资金的同时，为股票价值贬值而伤神。

亨利·克卢斯

大好时光就要过去，其时的陶醉痴迷已经慢慢清醒，股价缓慢但大幅下挫，我们侥幸躲开了威胁着我们的四处肆虐的猛烈恐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刹车”，那么这场恐慌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实际上，股价下滑要持续很长时间，也非常严重，数十万股民为此倾家荡产，其中也包括很多以前本来很富有的人。大小投机者都成为了股价骤跌的牺牲品：但是，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最终得以从一场严重的扰乱和萧条中全身而退，这可是威胁了华尔街几乎1903年全年的一种非常严重的濒于崩溃和破产的危险。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非常幸运的结局。我们要恭喜华尔街的保守派，他们非常成功地及时刹了车，从而阻止了一场本来将要席卷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广大区域的一场崩溃浩劫。

在美国金融史中，190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华尔街像一个战区，它的表现不仅震惊了整个美国，而且震惊了整个世界。它的表现前无古人，甚至在南北战争期间亦未曾见。那一段时间，股票交易市场连续不断地成为狂热振奋、鲁莽操纵和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的场合，要试图详尽地描述和反省那段特殊时期的重要事件，需要花费大量篇幅。

之所以说华尔街震惊了美国国民，令保守派商人目瞪口呆，这并非夸张。在那一年，在其中推波助澜的影响因素有六个，即铁路和工业公司以畸高的膨胀价格进行联合，包括北太平洋恶性暴涨“垄断”，席卷美国股民的无休止的轻率股票投机，过分宣传的奢侈，美国从欧洲的大贷款国向紧急的大借款国转型，玉米局部欠收，几乎所有原材料除谷物和铁之外的价格都下挫，很多新工业联合体的收入和分红都暴跌。这里面包括合并铜业公司，它的股票惊人暴跌，让数千股民血本无归或倾家荡产，操纵者们先抛售，然后又卖空，结果股价起初被操纵者们抬高到130，然后又迅速下挫到60，据说通过这样的价格上下波动运动，操纵者赚得了5000多万美元。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低价，也没有就此罢休，后来还是止不住下降了几乎一半，直到32.5的价位，下降的趋势才得以止住。

对于那些熟悉华尔街基本情况的人来说，即便简单地复述事件发生的经

过，都将是洋洋洒洒的系列故事；对于那些对股票市场感兴趣的人，或那些易引起更多的忧喜和悲欢，或承载了更多的幸福或悲伤、繁盛或衰微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证券报价机日复一日所讲述的系列故事更为有趣或精彩的了。但是，报价机就像丁尼生^②笔下的小溪一样，在工作时间将永不停止地流淌下去，因为股票市场和投机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1901年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业务量惊人的巨大。但是，他们仅仅代表这种投机精神，和那个时代的自我陶醉状态。那年上半年的销售量总计高达175 800 600股股票和面值637 100 800美元的债券，比1900年头6个月同期增长109 906 300股股票和346 900 700美元债券。

伴随价格的剧涨，投机总量增长，1月7日当天总销售量共计2 116 500股，到4月30日一路增至3 271 000股。接着，爆发了北太平洋事件，5月9日恐慌，当时股票比斯科特船长的树狸下降还快，其真实销售量更大，但是由于当时弥漫着激动、失落和惶恐的氛围，不可能记录下所有的东西，报价机仅仅登记了3 073 300股的交易。

突发而至的灾难震惊了整个股票市场，它吓退了资金贷款者，摧毁了股民的信心并引发了他们抛售那些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股票的大风潮，这场灾难令数千股民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华尔街的情绪巨变就像猛烈的地震一样令人瞠目结舌，厌恶之情及其后果十分严重。就在股票市场大震荡的前夜，投机的舞步还是轻捷热情兴奋的，“大人物”和小人物均是如此，大震荡的不期而至，令人联想到拜伦一首关于布鲁塞尔舞会的诗，说的是滑铁卢战役的前夜，大炮声在音乐声中响起时的情形：

开始舞蹈吧！尽情欢乐吧！

当年轻和快乐相会，今夜无眠，舞蹈到天明，

欢快的舞步追逐着奔放的时光。

灯光照耀着美丽的女人和勇敢的男人，

千万颗心幸福地跳动，当

音乐伴随淫欲膨胀而响起，

② 丁尼生（1809—1892），维多利亚时期代表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悼念集》、独白诗剧《莫德》、长诗《国王叙事诗》等。——译者注

温软的目光脉脉含情，秋波暗送，
就像是婚礼上的钟声一切都快乐进行。
但是，安静！听！一声闷响犹如丧钟敲响。
起来！起来！这是，这是大炮在开始轰吗？

幸运的是，在北太平洋恐慌中，本来相互敌对的金融家合作制止了这场浩劫。他们争相买进股票的控股权，导致了股票“垄断。”但是，由于囤积居奇相互竞买而哄抬上去的超高高价，因为缺乏卖方而停止。当北太平洋普通股的价格卖到了每股 1 000 美元的那天，股票交易所中的股价平均下跌了 15% ~ 50%，这些相互倾轧者们意识到需要共同合作来恢复股民信心并遏制这场严重冲击股票交易市场的浩劫。因此，J. P. 摩根公司、希尔 - 伯林顿 - 大北部证券集团、库恩·罗布公司、哈里曼联合太平洋集团的银行家们，就所买进的北太平洋股票达成协议。协议正式宣布后的第二天股价就大力反弹，但是当时肆虐横行的那场浩劫已经导致股票交易所宣布了一些破产信息。伴随复苏而至的是在新的卖出热潮下，又出现了同样的震荡，这场卖出热潮使得股票价格几乎像恐慌中一样低。接着，在信用激烈动摇，很多企业陷于瘫痪的危机中时，出现了危机常见的一个特征，重新复苏。

两派之间协议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北部证券公司，实际上它是由 J. P. 摩根公司和库恩·罗布公司为自己安排的，经一致的默许，摩根先生被任命为公司总裁。在这个智囊团或控股公司中，希尔和哈里曼公司，即这场矛盾的对头，发行了它们的北太平洋股票以及大北部股票，北部证券公司后来针对它们发行了自己的股票与之对换。

但是，在 1901 年，北部证券公司被美国高等法院认定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此时，分配资产成为必然，由此新的矛盾出现了。公司的董事们建议按照先前投放的比例，等额分配北太平洋股票和大北部股票，但是，联合太平洋公司总裁哈里曼投放了北太平洋公司最大的份额，即 7 800 万美元，他希望重新要回他所有的股票；换句话说，他既想把蛋糕吃掉又要完整地保留它。由于一旦同意，联合太平洋公司就可以控股北太平洋公司，大北部伯灵顿集团的总裁希尔自然表示反对，至于随后发生的诉讼，我们就都知道了，考虑到法律的极大不确定性，现在预言它的最终结果还为时过早。

在股票交易市场，1901年的4月是最活跃的月份，销售量累计高达41 689 200股，日均销量达1 812 600股。4月24日，不少于652 900股联合太平洋股票卖出。这些数据构成了对当时疯狂投机的实际注释。

新的一年来临，它以资本数量的极度膨胀著称，其资本总量远远超过了前一年，甚至超过了1899年，当时组建了很多大型的信托联合公司。最大、最严重的掺水合并是在美国钢铁公司发生的，它有508 478 000美元普通股，510 277 300美元优先股，304 000 000美元债券。重组新公司和在资本膨胀的基础上合并旧公司的热潮在美国各州流行，尤其是工业企业，它们似乎想象在奥萨山^①上再堆一座培里翁峰^②一样，要竞相在资本上一决高下。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目标显然是想把它们销售给股民，让可怜的股民上当受骗，从而遭受损失，因为无论是抵押品市场还是股票市场，很多新发行的股票几乎完全是一文不值的，其他原有的股票也遭受了非常惨重的贬值，形象地说，就像它所代表的摇摇欲坠的公司一样，它步履蹒跚，一副粗陋褴褛的样子，让人想起市道艰难。

在每一个州，都涌现了很多新公司。在新泽西州，1901年就新设了2 346家公司，股本4 773 702 000美元，与之相对照的是1900年新设2 181家公司，股本1 350 208 400美元。在纽约、俄亥俄和得克萨斯，公司工厂同样热衷于用虚拟的大股本机械地制造出很多新公司。

在美国，1850年前，商业公司和制造公司在任何实质形式上都未有明确的界定，直到1850年，它们才开始追随铁路公司的发展模式。1848年，第一部称为制造业法（the Manufacturing Act）的一般公司法在美国通过，公司开始在这部法律的指导下组织创建。这部法律设置了股本限制，并施加了其他一些约束条件，但是公司现在可无股本限制地合并个一千年。1850年和这个信用时代的对照，标志着美国在这段时期，在人口、商业、制造业、银行业、铁路建设和物质财富大繁荣上所取得的巨大和迅速的进展。

信托公司的成长是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金融法所允许的自由。在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法律非常严格地限制了公司的权利和特权，以

① 奥萨山，希腊北部奥林匹亚山的一个山峰，高达1 979.1米。——译者注

② 培里翁峰，希腊东北部一海拔1 601.9米（5 252英尺）的山峰。——译者注

至于这样的一些公司会感觉到在那里难以像它们在美国那样经营。因此，信托公司实际上除了在美国，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只有银行知道信托公司在这几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它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1882 年，美国此类公司的总存款额为 144 841 000 美元，1892 年，总存款额为 411 659 000 美元；但是，自 1897 年新工业合并时代开始之后，它们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攀升，在大城市里，新公司如雨后的春笋般涌现，在小镇上，也到处都有新公司出现。

作为银行的竞争对手，它们分走了银行的一些业务，因此阻碍或限制了银行的自然生长，迫使很多银行自此以后进行了合并。在 1902 年的 6 月底，它们的存款额高达 1 525 887 000 美元。10 年间，有了 1 114 228 美元的增长，达到了美国各国家银行存款总额的一半。在 1902 年 7 月 16 日，国家银行存款总额为 3 098 875 772 美元。此外，在纽约市，信托公司的存款超过了，确实超过了，各国家银行存款的总额，后者在 1902 年 9 月 15 日，累计高达 603 565 374 美元，而在 6 月 30 日，据它们向美国负责州银行管理机构的银行督察的半年报显示，信托公司的存款为 760 776 124 美元。这一比较非常具有启发性，它显示了这些钱的去向，揭示了信托公司是如何在损害银行利益的情况下发展繁荣起来的。

1902 年，有几个重要的因素或影响作用控制了美国金融业，塑造了当年金融历史的真实面目。这些因素包括在前一年谷物欠收的背景下，谷物丰收，并获得了一个好年景；美国银行资源过度紧张，难以满足新的信托和发行公债的企业多样化需求，当时，美国的资金和通货要用于常规贸易和一般业务；在外贸进口异常增长的同时，出口严重下滑；制造业用的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同时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升；大投机资本家努力拓展和保持对各自铁路、工业企业和事业的永久控制；受银行高利率贷款的资助，西部富有的新富股票操纵家，像“芝加哥百姓”和“匹兹堡百姓”之类，对铁路和其他股票的投机，像维苏威火山一样鲁莽而史无前例地喷发了；最后，股民再也不跟随他们继续买进股票了。这点符合我在呼吁停止疯狂投机现象上升时，关于保守银行和银行家的影响力的说法，这场投机在那年的 9 月底非常盛行。

1902 年，约翰·盖茨（John W. Gates）在共同投机的同事帮助下，买进了大量的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的铁路股票，这可以算是他从股票交易市场最后一次成功地捞取数百万美元的大手笔。自此以后，他和同事们在接下来的发

展中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但是，在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的铁路股票上，盖茨先生收到了J. P. 摩根公司支付的1 000万美元利润，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凌晨3点的时候，在发现盖茨先生实际上购得了该铁路股票的控股权时，J. P. 摩根公司的一个合伙人与他进行了谈判。

据说，很明显，帕金斯先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专门选择这个时点到来的，他发现盖茨先生在睡觉。如果现在给盖茨先生刚买的股票支付这样一大笔远远超过其买价的钱，这样的意图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恶作剧，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要做的事会陷南方铁路系统于混乱。他就像在瓷器店里的一头牛，还未来得及用牛角把玩赏鉴各种瓷器，就被人连哄带骗不计成本地弄出店门。

因此，当他对帕金斯先生说，“如果您真的非常需要这些股票，来控制贝尔蒙特董事会并保护南方铁路，那么，我就割爱吧，只要您高出我的买入成本1 000万美元。”帕金斯先生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达成了交易。本来，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和南方铁路公司都对这笔买卖很感兴趣，但最终，盖茨的股票还是卖给了亚特兰大海岸航空公司。

盖茨购买路易斯维尔·纳什维尔的控股权是非常大胆的投机，他的大胆，远甚于希尔总裁为大北部证券购买伯灵顿·昆西的股票，或穆尔兄弟公司购买岩岛的控股权后其公债借款和股票发生的大膨胀，因为盖茨只是作为投机来购买，没有任何管理这条线路的意图。他很幸运能够这样轻易地将这些股票卖给那些被他的大胆策划所吓住的人。

对比1901、1902和1903年华尔街的主要影响因素或重要影响作用，是非常有趣的事。1903年当年的股票交易量比1902年要少很多，但是所短少的量并没有1902年较之1901年所短少的量大。1901年是这段特殊的投机史中最活跃、最令人兴奋的一年。1903年的销售总量累计达到161 099 800股，与之对比的是1902年的188 497 600股和1901年的265 945 700股。1903年度各月中销售总量最大的月份是1月份的16 002 300，与之相应的是1902年4月的26 568 000股；1903年各月中销售总量最小的月份是11月份的10 731 000股，与之相应的是1902年6月的7 884 900股。

在1903年年初，钢铁贸易的指标还是看涨。收成还是很好，都卖了好价钱；铁路收入可观，铁路公司用于购置新设备和设备改良的花费很大，商业和制造工业的每一个部门都是一派繁荣的景象，钢铁贸易也进入了繁荣的顶峰。

确实，对钢铁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至于我们的生产能力不能够满足，于是，我们就像1902年一样大量进口了钢铁。

但是，在6月，钢铁工业遭遇了一次蓄势已久的闪电式变化。指标突然下降。需求的下滑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波及到各行各业，截至11月份，有些产品的价格相对于1月份下降了50%。自1899年开始的钢铁贸易繁荣在持续了4年之后宣告结束。然而，在年尾的时候，贸易开始恢复，据美国钢铁公司的收入报表显示，1904年钢铁贸易经历了一场缓慢但是稳步的增长。结果，高度膨胀的公司在1903年被迫停止公司股票分红后，优先股受鼓励继续以7%的比率分红，但是对于几十万由于高价买进这些股票，而后价格停滞不前，以致穷困潦倒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在1903年底，股票开始大规模抛售并即将售尽之前，市场重新恢复了相对稳定；1904年，我们总体上的贸易前景暗淡，场外股民很多都退出。但是，尽管铁路和工业公司两者的平均净收入呈现严重的下滑趋势，反映为贸易量缩减和因前些年过度刺激所造成的繁荣过尽之后或多或少的工业萧条。正如1901年是通货膨胀最肆无忌惮的一年，1902年，发生了一场对抗下跌反应的斗争，1903年，则见证并体验了一场由于时间拖延太长而更为严重的反应。

1903年及1904年早期的棉花市场，在纽约的丹尼尔·沙利（Daniel J. Sully）、新奥尔良的威廉·布朗（William P. Brown）和南部小集团的操纵下，出现了一场疯狂的不同寻常的多头投机，像往常一样亢奋着股票交易所。通过他们的投机操纵，并在棉花的统计定位和产量削减的推波助澜下，在交易量异常空前增长的背景下，棉价迅猛上升，从每磅8美分涨到每磅17美分，并频繁激烈波动。当沙利先生发现自己的资源不足以交割在股市下挫下卖给他的棉花时，他却公开计划着要将棉价挺至每磅20美分的新高。因此，在价格像火箭一样飙升之后，他就像火箭的燃料箱一样坠落下地，尽管之前他通过价格上涨已经赚取了数百万美元。对这场疯狂投机和棉花价格过度上涨的突然叫停，实际上很好，因为它造成了纺纱工厂的沉重损失和很多制造厂的倒闭。沙利的破产是一场过于冒险的风险投机的自然结果，它提醒我们，过火的投机可“载舟”也可“覆舟”。

观察其他国家的情况，我发现加拿大在1903年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比此前历史上任何一年都大。在农产品丰收和15万移民的刺激下，几乎所有贸易

和金融部门的业务都急剧增长。但是，在英格兰，英国政府债券的持续下跌至同一时期的最低点，反映了金融的低指标和代价惨重的南非战争的后遗症。而法国成为了欧洲当年度在金融和总体繁荣上的最佳表现。在德国，一场活跃的工业复兴将这个国家从先前因为过度投机和银行破产而造成的萧条中拯救出来。

关于这场新的工业联合，我们所关心的最大问题是，急速膨胀的资本和高额的费用如果经过适当的调整，是否会永远地处于一种效率、生产力、偿付能力、繁荣的最佳状态，还是会由于入不敷出而最终只是实现了资产的易手，或是像造船信托公司一样不幸地破产。同样的命运可能发生在很多其他大型的证券发行活动中，这些活动有太多掺水，还有欺诈和误传。其中有很多都无视或蔑视合法性，股票市场和所有的金融收益都暴露于诸多风险和灾难性的扰动中。这些风险和扰动与依赖于误导欺诈以及招股说明书和公司账簿的组织密不可分，而这些资料信息往往不能说明问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或除了问题之外什么都不能说明。

华尔街银行界应该制止急速膨胀的此类工业联合以及不必要的联合和出于权力、利润以及股票经纪的目的而滥发铁路股票的行为，这点我前面已经提到，并得出结论认为，新公司的掺水，股票交易市场的价格上涨，已经超出了安全点，外部股民所购买的投机性工业股和铁路股，已经超出了他们在一个跌市中所能承受的数量。

因此，他们论证说自己的购买力和购买的意愿已经近乎枯竭，股票市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些大胆的大投机者的逐鹿舞台，那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因为新信托和铁路的联合而一下子赚了个盆满钵满，赚头不下数百万美元。其中有些人在美国钢铁公司这个巨头才刚开始下海时，就把他们在置换工厂中所得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早早抛出，而成为了百万富翁。还有些人在进入华尔街拓展业务之前，先在西部实行了工业合并，他们通过这个过程赚取了大量的钱财，就像上面那些人一样。

这些大操盘手的经纪人手中的巨额银行贷款逐渐被收回，新的贷款条款排斥他们。没有了贷款，他们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买进并高速运作股票到畸高的价格。因此，他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岗位就像奥赛罗一样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成为折翼的老鹰。

1903年，大小操盘手的大举清盘导致了股票交易市场几乎连续的严重价

格下跌势头。很多富人受此收缩趋势和银行收回贷款所迫，将铁路和工业股票大举抛售。有相当一部分人损失了其所有的资本，而剩下的几乎所有人都将自己最好的资产拿出来卖，以保护其他实际上滞销的资产。

这段清盘和萧条的时期，令1904年的华尔街和美国到处可见贫穷的富人，拥有大量资产（房地产和个人资产，包括股票）但没有市场（除非能接受几乎跳楼的损失）的资本家。他们的政策自然是继续持有他们手头剩下的资产，等待风水回转，如果他们真能足够坚强地做到这点，那么他们无疑能够拿到自己的奖赏。在华尔街，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历史在重演，有着这样的希望曙光，他们就能够像这首老歌中唱到的那样愉快地说，“美好时光会再来，小伙子，只要再等待。”

同时，那些在通胀和投机的多事之秋活跃在华尔街的股民，较之其他人更要记住，在华尔街和其他任何地方，人们所经历的感情和观念的变化。

不论是华尔街还是外部人，都失去了他们对很多股市大鳄的信心。曾经，他们盲从这些股市大鳄的扩张计划，认为他们的操纵无所不能。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大鳄的权力和威信完全逝去，没有人会可怜地去对他们表示尊敬。华尔街的信徒们已经对这些旧日的偶像失去了崇拜之情。

华尔街和股民也对所有新的投机和新的铁路和工业债券和股票的发行，以及促销人员和相关集团的良好判断力和信誉失去了信心。欺诈、狡辩和过度投机，在法庭和其他地方到处盛行，打破了最愚钝最轻信的信徒们对于华尔街疯狂投机时期博得美国股民欢心的阴谋和阴谋家们的梦想。

由恶生善，从盲目的轻信和过度的扩张，到辨别不信任和严重的紧缩，为华尔街内外局势的健康、安全和良好铺平了道路，带来了好的影响。但是，同时一个坏信号值得注意。大公司由于不能推销新债券，它们要以5%~6%的利率水平从银行辛迪加那里大量借入1~3年的债务。这样的做法潜藏着危险，借款者在这些条款下借款很困难，违反条款的情况极有可能发生。但是，结果可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美国仍然像历史上横渡海洋的那一刻一样迅猛发展起来。

在我们大踏步的前进过程中，雄伟的步伐中没有任何唤起悲观的情绪。华尔街总是能够反映这个发展和我们在物质繁荣中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我们可能遭遇到的任何萧条，因为它不仅是美国和那个时代的重要晴雨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世界的晴雨表。

第 16 章

Chapter 16

华尔街沉浮录

华尔街领袖人物的生平写照

华尔街烟云，华尔街的沉浮变迁，可以通过简单描绘几位主要操盘手的事业和经历来很好地说明，这些人往往，尽管不能说全部如此，就像火箭一样跃然腾空，又像火箭上的燃料箱一样刹时坠落。

我下面不从华尔街的竞技场最早期的人物开始，而将从回溯雅各布·利特开始，他的名字至今还是股票交易市场最耳熟能详的 100 个名字之一。

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去世，当时南北战争正如火如荼，在 1857 年恐慌之后，他逐渐隐退江湖。他在战争爆发之后的通货膨胀浪潮中依然做空头，而被淹没和垮台了。

他是个古怪的人，外表、举止和操盘的方法都很古怪，但是，他的大名在华尔街享誉了二十多年。他在自己的事务所自学成才，1835 年开始独立股票操作。

1837 年，他名利双收，因为他大多数情况下以“卖空”股票为主要方向，所以他自然而然成为一个空头。恐慌的破坏力横扫了整个美国，价格直降为零。这使得他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一名空头，一名怀疑论的传教士和破产的预言家。他靠灾难发家，在那场难忘的资本回抽后的萧条年份，他变得

越来越富有。

从1835~1846年，他到了自己的黄金时期，没有人怀疑他在华尔街世界的领袖地位。但是，接着他碰到了一次严重的困境，而这并非因为他继续“空头”股票，而是因为他对诺威奇和伍斯特铁路股票的“多头”操作。他试图与波士顿集团一道控制它的控股权，并自己向集团约束自己，在总额25 000美元之内。不在90以下的价格销售股票。

他按照自己的承诺去推高价格，但是价格“一路暴跌”，就是不肯待在高位。因此，他交了学费，将股票尽可能在对他人最好的价格脱了手，损失了100万美元，要知道，那时候的100万美元可相当于现在的1 000万到2 000万美元。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的多头操作，这坚定了他天生空头的信念。

然而，不久之后，通过打破伊利股票的垄断，他从这场灾难中很快恢复过来（不止是恢复）。由于他主要是伊利股票的空头卖空者，而垄断集团买光了市场上的所有伊利股票。它们一天天把股票价格推得越来越高，但是，雅各布·利特毫不畏惧，他拒绝交割合约。他成了继续抵抗垄断者的唯一一位空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买进股票。华尔街的所有眼睛都在看着他，当时主流的看法是，他将被迫交割，最终会以惨重的损失甚或破产收场。

但是，那些垄断者们永远难以猜到的是，他竟然还另外伏有一手“锦囊妙计”，在他的合同快要到期交割时，正当他们以为他要缴械投降或失败破产时，他制造了一次新伊利的股权证大捆绑，通过交割这些捆绑的股权证来交割合同。这些股权证早就被发行给他以交换公司的可转换债券，而这点垄断集团并不知道，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一事，垄断集团也无从得知。

这样的奇袭和突然将军，华尔街是前所未闻，这场“垄断”被挫败了，它使得垄断集团士气低沉，给垄断集团带来了灾难，却给雅各布·利特带来了极大的利润和荣誉。后来，他几次在卖空操作中失利，然而，他总能设法以之后的成功来予以弥补。他作为债权人同样大度，他容易接受宽松的条款，以便让他的债务人有机会偿还。因此，尽管他富于攻击性，总是给市场上的对家投机者带来灾难，但是，他还是受人尊敬和喜爱。

他生来就是一位投机者。投机可以说是他每日的生活必需品，就像面包一样。他因为投机的原因而喜爱投机。他的抱负就是控制股票市场，他乐意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冒险。他曾经说过：“我注重过程多于结果，投机无论成

败，我都乐在其中！”

正是这种感情支配着他在华尔街流连忘返，但他的金钱，他成功的美誉，以及他的健康，却纷纷离他而去。他不欠债，但是也没有很多钱。他只是他过去的影子，一个名字，没有更多的东西。他仍然热衷于涉险小的操作，但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一天早上，他晕倒在证券交易经纪人行情室，就再也没有起来。

他说：“我贫穷地死去！”但是，从他的遗产和未交割账户中，他的家人成功地收到了 15 万美元，这些钱都是被他遗忘的，因为他在金钱方面总是粗心大意和随随便便，除了在投机方面有用之外，金钱对于他并没有什么价值。他可以说是守财奴的对立面，因为他从来都不愿意存钱。

给雅各布·利特的事业画上句号的是安东尼·摩斯（Anthony W. Morse），因为当利特在 60 出头做空头操作的时候，摩斯在投机圈就像疯狂的奔牛一样出现，当他还在罗德法庭的时候，他就以一种震惊董事会其他保守派的方式来哄抬股票交易市场的价格。他们认为他十足大胆。但是，摩斯预见到美国法币（它们也被称为绿钞）的战时发行将大幅提高股票的价格，因此，用句谚语来说，他闯入了连天使都不敢涉入的地方，真是胆大妄为。

他在这场美国历史上最疯狂的股票投机扰动（也许在未来也如此）中，成为了风暴的中心、枢纽和轴心。他是谁？一位俊朗的乡村小伙子，他身无分文地来到纽约，成为了股票经纪公司的一名办公室人员。然后，他娶了一位有一些钱的姑娘，诱惑她允许他为她做一些投机，并成功地为她赚了一些钱，足够让他在股票交易所买下一个席位，那时席位费用仅为 500 美元。

那是在 1862 年，那时候他还人微言轻，但是，他大胆、活跃的方式，很快就震惊了本地人，让圈中的老人感到不知所措。他迅速提高铁路股票的股价，显示他是时代新人，能够紧跟时代。如果他未在股票市场一开始就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他很可能会被扼杀在起步阶段，但是市场证明了他的正确性，证券交易经纪人行情室的老人们惊呼：“啊！这个小家伙比我们占先了，我们还未动手呢！”

他首先买下了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铁路股票，而且操作得非常轻松迅速，就像这是小事一桩。然后，他成功地掌握了俄亥俄到密西西比的铁路、岩岛、伊利和韦恩要塞，以同样夸张、惹眼的方式将它们的价格抬高。他在一天之内

使韦恩要塞的价格从 118 美元飙升到 152 美元。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因为他看到自己在一条正确的轨道前进，整个华尔街和股民都跟从他的走向。他将匹兹堡的股价从 65 美元令人兴奋地抬高到 108 美元，他出价 100 美元敞开收购所有股本整整“一年”。接着，他在 96~108 美元的价格售出全部的匹兹堡股票。在威廉姆大街的一层大办事处，来委托他的公司——摩斯公司代理股票业务的简直踏破门槛。到了 1863 年早期，他给了空头们沉重的打击，据估计，他至少赚了 125 万美元，他的事业兴旺成功仅维持了两年，在那段时间，他可能确实赚了异常多的钱。有很多人争相加入他组建的每一个坐庄集团，他的名声非常之大。很多人挤到他办公室门口的走廊上，想设法听到他讲话的内容，或了解他在做些什么，这样他们就可以照葫芦画瓢地照着做。如果他看涨某个股票，那么几乎所有打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会跟风，感到这肯定会是一笔好买卖。因为他过去总是对的，所以他在董事会中的经纪人同行，就像士兵和华尔街的乌合之众一样大部分都对他亦步亦趋。事实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华尔街上没有任何人像摩斯一样受到如此多人的拥戴。美国全国的股民都加入了华尔街的这场疯狂投机，此时他真可谓春风得意，是最为走运的时候。

一天晚上，在夜晚的交易中，摩斯出价 112 美元买进 1 万股伊利股，丹尼尔·德鲁卖出。接着，他出同样的价格再次买进 2 万股伊利股，德鲁卖出。一两天之后，德鲁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摩斯掌握了俄亥俄密西西比的控股权，他在两天之内就使价格从 49 美元飙升到 69 美元。

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纸币泛滥贬值，投机盛行，很多股票公司连轴转加夜班。同时，黄金投机也像股票投机一样疯狂，数百个采矿和石油公司新建起来，它们的股票在高价位交易，并且价格还在不断往上涨。而原先那些几乎已成垃圾股的旧股票，如巴克斯县铅股，伴随着其他股票的上涨也似乎迎来了生机。

神父和妇女都被拉入这场投机的漩涡，只要名字中有“金”字的股票就会像煎薄饼一样一抢而空。当所有股票都上涨时，买何种股票根本没有什么分别。摩斯推动投机到达了空前的高涨，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中，他将岩岛股价从 106 抬高到 149，为此，他买进了整个股本，那时只有 56 000 股。

财政部部长蔡斯先生给摩斯的运气画上了句号，他当时正设法阻止这场疯狂的通胀，尤其是疯狂的黄金买空投机。为此，他通过卖黄金换纸币并将纸币

封锁在财政部分局的做法，来紧缩货币市场。这个做法取得了理想的效果，通过银行收回贷款，引起恐慌，使得货币变得稀缺和珍贵，从而迫使持有股票的大投机商卖出，而此时，正是摩斯先生持有股票最多的时候，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多。

他的健康体魄似乎一下就垮了下来，看起来疲倦而憔悴，他设法卖出股票，这使得那些跟随者们就像温顺的羊群一样跟风卖出，股价在大量股民的交割潮下每况愈下。1864年4月18日，摩斯恐慌的黑色星期一，证券交易经纪人行情室的早交易期韦恩要塞的股价从153美元跌至119美元。接着，摩斯最后一次离开行情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的合作伙伴说：“游戏结束！”瑞鼎那天早上下跌了19%；匹兹堡，17%；胡德森河，23%；所有其他活跃的股票都下降了这么多的股价。

这场金融风暴，显示了摩斯的股票负荷实在太太，最终将他从股票交易所扫地出门。他知道自己已经毫无希望地被彻底毁了，他写下一份宣布摩斯公司歇业的通知，在离开之后的几分钟之内送到了行情室。这次的失利后果被证明非常严重，摩斯公司无法交割，也无法重新开张。摩斯不再是华尔街的领袖，他的很多客户在半疯狂状态中，向他冲过来，声嘶力竭地责难他。国王被放逐了，再也不要不回他的皇冠，也不可能有什么崭新的开始。

那天剩下的时间，在晚上交易的地方，喧哗一片。投机现象如此普遍，摩斯在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形象是多么受到拥戴，这场崩溃殃及数千名股民，包括很多妇女，狂乱、咆哮的暴徒涌入第五大道饭店，对于数百户人家，这是一个恐怖之夜。摩斯受到责难和诅咒，他的很多客户为了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而谴责他，就像他们在经纪人办公室亏了钱时一样。

接着，摩斯失踪了一年。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憔悴了，此后不久他就贫困地死去。再也没有人责备摩斯的不诚实，因此，他的这次滑铁卢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很少有华尔街的巨头在事业的起点到终点能够有安东尼·摩斯那么多朋友。

约翰·托宾（John M. Tobin）曾经是范德比尔特船长在斯特登岛渡船候船室的一个看门人，主要扮演的是黄金投机商的角色，在为期两年的摩斯战役中，也做过股票投机商，他见识过很多股市的沉浮。他在1864年摩斯殒落之后开始显山露水。据了解，他是哈莱姆股票垄断案中范德比尔特船长的代理，

掩藏在范德比尔特的光芒下，尽管他自己也是一位重要的投机者。

哈莱姆垄断案是一个难忘的事件。在 1863 ~ 1864 年的冬天，这只股票的卖价大约为 60 美元，范德比尔特是董事和大股东，而且对于哈莱姆，他还有自己的一个“大算盘”。尽管，一般人认为这条路线并没有很大的作用，除了运送牛奶之外。通过这个铁路项目提升股票价值，他将股票价格提升到了 117 美元。他原本指望从市下议院获得承租权，但是他们欺骗了他，在通过了一个有利的决议之后，他们卖空了这只股票，然后，又废除了这个决议，因此股票的价格下跌到 72 美元。这样他们利用范德比尔特大赚了一把。

接着，他向奥尔巴尼州上议院申请哈莱姆的特许权在百老汇铺设铁路。上议院委员们看到这里面的投机空间，他们做了一个有利于范德比尔特申请通过的报告，一得到这个消息，哈莱姆股票的股价骤然升到 150 美元。接着，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包括纽约市下议院大举卖空，认为这就是囊中之物；托宾为范德比尔特买下了所有出价的股票。1864 年 3 月 25 日，他们通过预先安排投票反对通过这个法案，哈莱姆股票跌至 101 美元。

哈莱姆的卖家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的名义利润巨大。但是，托宾仍然继续买进股票，在他的买进下，价格很快恢复。船长决心惩罚这些人。在 10 天之内，哈莱姆再次上升到 150 美元。一周之后，股价达到 185 美元。此后的 10 天，股价在 175 ~ 200 美元之间波动。丹尼尔·德鲁卖出了 3 万股，认为这支股票不可能在高位停留很长时间，股票交易市场内外的职业投机家们，基于同样的想法，参与了卖空的行列。但是，当摩斯恐慌在 4 月份席卷华尔街时，这只股票依然坚挺，就像沙漠中的金字塔，托宾依然继续为范德比尔特买进股票。

5 月份，哈莱姆的股价飙升至 300 美元。在 15 000 股股票必须交割的那天，股价停留在 285 美元，它们必须按照这个价格来交割。丹尼尔·德鲁答应支付给托宾 100 万美元来平仓，而他的索赔金额是 170 万美元。他威胁要起诉托宾的合谋罪。托宾从这次的垄断案中分得了大约 200 万美元的利润，这使得他的身价高达 300 美元之多。

范德比尔特船长暗自发笑，当取得了哈莱姆的控股权之后，他以 8% 的利率将哈莱姆租赁给纽约中央胡德森公司。哈莱姆一直到最后都被证明是范德比尔特的富矿财神，至今它仍是他的后代子孙最优秀的资产。在这场垄断案之

后，托宾看到联军将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于是又大规模地买空黄金。1865年初，他通过多头将股价从198抬高到211，严重侵害了“空头”的利益，接着，他自己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亏损了150多万美元。此后，他在股票市场连连受挫，几乎丧尽了手头所有的钱，此外还欠下了经纪人的债务。于是，他隐退回斯特登岛与姊妹一起生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来过华尔街。他以一种仇视的心态看待股市沉浮。与他同时代的公开交易所的克瑞（E. A. Coray）同样也得失良多。

阿狄森·杰罗姆在华尔街的事业比安东尼·摩斯要简单很多，但是，他依然可以说是光芒万丈。起初他做过干货商人，后于1863年初作为一位炒股者进入华尔街，在1863年剩下的那段时间里，他被誉为“公开交易所的拿破仑”，他在炒股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大胆和成功。他是约翰·托宾的朋友和经纪人，在哈莱姆买空投机操作中与约翰·托宾合作过，结果他从中赚取了很多的钱。首先，当范德比尔特船长与纽约下议院交往的时候，价格从60美元涨到117美元，他从中赚了一笔。后来，当范德比尔特船长要惩罚奥尔巴尼上议院委员们背叛行径的时候（他本人这样措辞），即在1864年垄断案中，他又赚了一笔。

他成为了一名杰出的领袖，有一大帮跟随者。直到他与自己组建的小集团在做密西根南方证券的买空投机，买得了它的控股权为止，这之前他似乎都所向披靡。他将股价抬得很高，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有把握。但是，该公司的财务总管亨利·基普是一位机警的炒股者，他一插手就将杰罗姆的成功化为十足的惨败。

亨利·基普了解一些杰罗姆所忽视的东西，即密西根南方证券的公司章程中有一个条款，允许公司董事增加股本。因此，他秘密召集了一个董事会议。会议投票通过增加14 000股股票。由于股票将来发行量可以增加，所以他反操作卖出股票，并借钱来进行交割，这些表现让杰罗姆认为，基普总体上还是密西根南方证券的空头。他和他的小集团因此继续买进，而基普则继续他的卖出操作，最后的结果是杰罗姆收回了他所借出的所有股票，以迫使空头平仓。对此，基普的反应是发行14 000股新股票，从而导致股价在一天之内下跌了20%。它使得杰罗姆在异常短的时间内所迅速积累起来的300万美元几乎全部丧失殆尽，也摧毁了他作为领袖人物的形象，尽管他被尊称为一个值得尊敬的

人。财富和名望的散去，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如此大的伤害，以至于第二年，他就死于一些无名的病症。他是真正被摧毁的人。但是，幸运的是，在那9个月看似成功的操作期间，他已经给妻子安排了足够勉强度日的积蓄。他的盛衰沉浮即使对于华尔街来说也是非常迅速的。

伦纳德·杰罗姆是阿狄森的弟弟，在华尔街和社会上都颇有知名度，在阿狄森出道之前很久，他曾是一位马车车夫，在阿狄森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待在华尔街。他的事业也显示出了令人难忘的盛衰沉浮。1863年，他是胡德森河铁路股票的大股东，当时的空头将这支股票的股价压低到了107美元。他为此组建了一个强大的小集团，做反空头利益的操作，买进了所有的股票，直到他持有了几乎所有的股本。接着，他逐渐抬高价格直到175美元。此时，股票变得稀缺，以至于他要將一些股票以每天5%的利息借给空头们来交割。空头们大约代表了5万股股票，他们发现自己孤立无援，以非常严重的损失平仓，而杰罗姆在他们身上狠狠地赚了两三百万美元。

他的名望伴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他成为了一位社会名流和金融大鳄。他一直在观察太平洋邮递，因为它在1856年接替了尼加拉瓜运输公司的位置。1861年，股价下跌到69美元，但是第二年，它的收入就非常可观了，其全部的40 000股股票中有26 000股由炒股者联合买进，这里面主要是公司的董事，他们将这只股票转给布朗兄弟公司，代替他们托管了5年。他们选择伦纳德·杰罗姆在公开市场买空股票。在他的操纵下，在他开始代表这个集团进行投机操作之后的第13个月内，股价升至160美元。那时，有很大的卖空投机利益，为了迫使空头交割，他将股价抬高到200美元，并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结果他们都交割了。

1865年，太平洋邮递的股本从400万美元增加到1 000万美元，然而它的股价还停留在240美元，每年支付的分红为20%。此后，股本增加到2 000万美元，但它的股价在杰罗姆的持续买空下走到了180美元。但是，1867年，他遭遇了惨败。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他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公司的收入直线下滑，财务报表显示公司资产从34万美元下降到22万美元。政府的纸币发行量迅速收缩，股票大量掺水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此外，杰罗姆还曾允允在160美元的价位买进旧的五年期联合股票。由于以上诸多原因，加上股票市场普遍的疲软，太平洋邮递尽管销量极大，但在他手上没过几天还是从163美元

跌至115美元，他实际上将自己手头的所有东西都败掉了，除了一些不动产。就这样被太平洋邮递毁掉之后，伦纳德·杰罗姆在华尔街风光难再了。他在华尔街再也没有什么声望，很快就隐退了。他在女儿伦道夫·丘吉尔女士伦敦的家中贫困地死去。他在华尔街经历了自己盛衰沉浮的全过程。

对于伦纳德·杰罗姆，在他赔钱之后，太平洋邮递就无足轻重了；对于太平洋邮递也一样。公司经历了它最繁荣昌盛的日子，股市上股票湿漉漉沉甸甸。它遭遇了交易量缩减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在1871~1872年间，股价跌至低谷，以至于董事们感觉到需要做出弥补的行动。因此，由于持有的股票不多，他们决定与其设法重新选举董事，不如索性放弃。1871年11月，他们退出董事会，给奥尔登·斯托克维尔(Alden B. Stockwell)任总裁掌舵的新董事会留下了空间。名义上，新董事会选择了他，但实际上是他选择了他们。

他那时候的名字并不为华尔街人所知，但是，他在伊利湖担任过蒸汽船上的伙计，最近他娶了缝纫机的发明者埃利阿斯·豪的女儿，从而获取了财富，成为豪缝纫机公司和威尔柯克斯·吉布斯公司的总裁，这些消息还是有人知道的。

1871年，他来到华尔街探寻新的发展，结果发现太平洋邮递股票跌至40，他开始积极地买进，这个举动带来了奇迹。奇迹逐渐显现，此时的他已经取得了股票和足够多的选举权，可以选举自己的董事会。利用118 000股的选举权，他选择了他自己，一跃成为了斯托克维尔船长。他的意志就是他的那些董事们的圣旨，好挖苦者称之为傀儡董事会。

凭借他所控制并代理的太平洋邮递公司的资产，他很快设法取得了巴拿马铁路公司的控制权，并成为了其总裁。在这次取得太平洋邮递公司控股权的行动中，他信誓旦旦，开始重新买空太平洋邮递股票。1872年10月，当公司的蒸汽船沉没并以惊人的频率燃烧时，他声称通过大量购买，它的资产得到了提升，收入超过政府补助金11%以上。他说，这将使得公司能够从1872年1月1日起支付股本的12%以上。接着，他请求奥尔巴尼法院授权将股本从2 000万美元缩减到1 000万美元，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但是，这个公司从来就没有让自己利用上这个权利，到现在，它的股本仍然保持在2 000万美元。

这只股价曾经低至40美元的股票，对于他那“牛气”的买空声明和操作起了反应，因为华尔街看到了他至少希望抬高股价的意图。在经过激烈角逐之

后，股价大约升至 107 美元，斯托克维尔船长成了那个时代华尔街引起轰动的人物。他成为了像伦纳德·杰罗姆一样的“头面人物”。他在麦迪逊大街和纽约市最繁华的一个地方拥有最豪华的一所住宅，然而，他当船长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他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太平洋邮递和前面提到的其他公司，而是抓住了铁路不完善的地方，如波士顿、哈特福德和伊利，买进了 3 万股的大西洋太平洋铁路股票，优先股价为 25 美元，尽管公司已经打印了股权证书，但是因为没有发行的法律授权，所以它的法律地位不确定。但是，这没有阻止这只股票短时间内在华尔街以高于成本的高价位短期活跃。

然而，没过多久，在太平洋邮递遭遇新损失和收入缩减的同时，它就名誉扫地了，波士顿、哈特福德和伊利股票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三家公司的股票都遭受了熊市的猛烈袭击，它们的股价全部下跌，斯托克维尔无计可施，他过去赚来的钱全部赔了进去。这种事态使他卷入了一场有关太平洋邮递公司的 27 000 股库存股本的纠缠中，作为一种妥协折中的结果，据说他写了一张借据给太平洋邮递公司要 1 140 000 美元，获得了豪缝纫机公司的批准。

在接下来的第二次选举中，他被从总裁职位上停职，新的董事会也被选举出来。他还从巴拿马铁路和大西洋太平洋铁路的董事会中退出，他失去了金钱和名誉。没有人穷得要向他致意。此后，他在华尔街做小操作，以此惶恐度日。他去世前不久，还作为统一交易所的成员在一笔小交易中失利。

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人。在描述他在华尔街的财富变化的过程时，他幽默地这样说道：“我第一次到华尔街的时候，人们这样问我，‘谁是斯托克维尔？’而当我在太平洋邮递的买空投机中赚了一些钱后，我被尊称为‘斯托克维尔先生’。在选任为太平洋邮递的总裁时，我的称呼又变成‘斯托克维尔船长’和‘华尔街领袖’，伟大人物等等。但是，当太平洋邮递破产使我也破产的时候，我又成了‘那个红头发的小混蛋’。”这就是华尔街的沉浮、华尔街的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写照。

不过，在华尔街所有这些重要的操盘手中，最引人注目的常胜将军要算丹尼尔·德鲁，但他后来也一败涂地、倾家荡产。他最早作为股票投机者所取得的成功，更令人惊奇，因为他是一位文盲，几乎没有学习过阅读和写作，只会用潦草难辨的笔迹签名。

他曾经是一位赶牛者，后来在纽约牛园的牛头客栈做老板，在刚进入华尔街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关于银行或股票交易方面的经历，他甚至从来不看报纸，但他一开始就成功地赚到了钱，然后，他与其他人一道将资本投资到胡德森河蒸汽船公司。他的这些投资很大，事实证明非常有利可图，尽管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样开汽船。

他的精明让他能够通过股票投机赚取了数百万美元。尽管他除了做过客户之外，对于股票经纪业务基本上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参与了股票交易。他的公司是德鲁·罗宾逊公司，这家公司多年来一直很兴盛，业绩很突出。在这家公司解散后，在德鲁事业的高峰期，他对一位估价2000万美元的朋友说：“我想16万美元就能平仓。”

此后，德鲁的精明和睿智看起来似乎逐渐令他失败。由于判断失误，他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但是在捐建德鲁神学院和其他卫斯理公会大学方面，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慷慨。然而，他并非捐赠现金，而是借条，并且他需要为此支付利息。结果，当他最终将手里的钱赔得一个子都不剩，并被宣告破产，没有任何资产的时候，这些借条也就一文不值。在他破产的时候，在他寄靠在儿子家里生活的时候，他去世了，他的去世就像任何一位华尔街的落魄人一样悄无声息。当他的钱离他而去的时候，他眼中已经变得空洞无物，心灵也空空荡荡。在华尔街，作为投机者，没有一个人比德鲁走得更远。

查理斯·沃里奇霍夫（Charles F. Woerishoffer）也是一位杰出的股票交易操盘手，他白手起家，赚得了大量资产，后来又因为在1884年恐慌之后买空投机时间过长而全部赔光。

詹姆士·肯尼（James R. Keene）是带着数百万美元的身家来到纽约的，这些钱是他在金山的黄金富矿被发现的时候，在加利福尼亚投资采矿股票赚得的，当时弗拉德欧布莱恩、麦卡伊和约翰·琼斯也赚得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当肯尼不断扩张投机领域之后，在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过度看涨投机股票和谷物，他赔光了所有赚来的钱。然而，由于有大公司雇用他们为他们操作股票，他又获得了一个崭新的开始，几经沉浮，他又有钱了。

亨利·史密斯（Henry N. Smith）是杰伊·古尔德早期的合作伙伴，在股票操作中他赚了五六百万美元，结果又赔光，在贫困中去世。费迪南德·沃德在华尔街短暂流星般的事业令人怀念，正是在它的吸引下，格兰特将军组建了

格兰特·沃德公司。爬得高也跌得狠，最后，当他败落的时候锒铛入狱，在纽约的新新监狱过起了铁窗生活。国民航海银行的总裁菲什，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好声誉，后来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这里，没有必要详细地介绍范德比尔特家族、古尔德、鲁塞尔·塞吉（Russell Sage）、亨利·基普、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和威廉·特拉维斯（William E. Travers），因为他们在投机生涯里没有经历过这种大的沉浮。但是，约翰·特雷斯（John F. Tracy），岩岛铁路公司 19 世纪 60 年代的总裁，在资产达到 500 多万美元之后，毁于股票投机，他不得不从总裁的宝座上下来，并在贫困中去世。赛勒斯·费尔德（Cyrus W. Field）也由于过多地持有了曼哈顿铁路股票而几乎倾家荡产。阿狄森·卡玛克斯（Addison Cammack），华尔街的大熊星座，去世时的资产相对于他曾经占有的资产而言微不足道。

华尔街不时出现的兴衰变迁到底有多么的激烈，我们只要简单回想一下黑色星期五的黄金合谋案，就可以大致推知。1869 年 9 月 24 日，黑色星期五给数千名股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导致股票交易所和黄金票据交易所以及黄金交易银行被关闭；1901 年 5 月 9 日的北太平洋恐慌；1873 年恐慌长远而持续的震荡。

前面提到的杰伊·古尔德公司在那个恐慌中值得回忆的那次失利，在很多人回想起来，与 1857 年恐慌造成的俄亥俄生命信托公司的破产一样生动。

对于华尔街兴衰沉浮的所有这些回忆，有助于提醒我们的读者谨记，易来之钱，失之更易。因此，在华尔街追逐万能的美元时，胆大还必须要心细。

第 17 章

Chapter 17

格兰特连任

总统职位的最佳人选，最有资格获得这项荣耀的人选 ◆ 这次的繁荣如何朝有利于格兰特的方向发展 ◆ 大金融家和投机商为了国家的繁荣和这位曾经拯救了合众国政府的将军，都站到了前面 ◆ 在库珀大学组织了一次公开会议 ◆ 为什么斯图尔特拒绝主持会议 ◆ 大会的结果，不考虑政党之争，这位候选人的朋友、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和新闻界如何看待选举结果

这里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我在格兰特将军的连任选举中所做的努力，当时，在他宣布参加连任选举的时候，各方面的很多政治家似乎都认为他注定要失败。在他以前的朋友和拥戴者之间，也存在着很严重的分歧，而早在费城大会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有人设法想要破坏他当选的希望。

政敌、失望的谋求官职者以及他们的朋友，这些人实施了各种政治手段，所有的策略和所持的偏见，4年之后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提名任何其他人都可能导致这个政党的失败。为了政党的活力、生计和自治，格兰特将军应该再次成为我们的选择，这点毋庸置疑。他已经经过了一个任期时间的历练，可以看到他的政策也很成功。格兰特若再次连任，不会带来大的风险，而在此时这种敏感、多变和不确定的条件下，若另选他人，另起炉灶，则可能殃及美国的最佳政治和经济利益；而若提名者是民主党人，那么这种另起炉灶的尝试将尤其危险。

当时南方人的心境不佳，不能赋予他们任何权力，让他们获得任何可控制政府事务的影响力。我认为共和党人应该提名一个很有成功希望的人，而我感觉如果我们再提名任何其他人士，那么结果都将非常不确定。

此外，考虑到他对于结束那场国家存亡之战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想到他在镇压叛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人更有资格获得国民的敬意。他的天才和勇气对于保存美国政府共和形式的福祉，将非常重要。为了这个福祉，人们再怎么表达感激之情都不为过。

这就是深藏人们心底的全部爱国精神，但是，一些感到恼火的政治家们采取了秘密行动，试图挫败人们的爱国精神，而且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危险的敌人。长期以来，这些合谋者中有人一直在暗中密谋颠覆政府的计划，他们试图在格兰特将军第一个任期到期后的前半段时间就投入组织。他们利用各自的权力，不遗余力地对公民的观点施加影响，来阻止格兰特的再次连任。

这些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地炮制着阴险丑闻，并公开刊登在他们资助的报纸上，此外还通过其他各种名声不好的媒介加以传播。

随着美国下一任总统选举的时间临近，这种观点越发在广泛程度和猛烈程度上变本加厉地鼓噪着。格兰特将军的再次提名问题都开始变得有点疑虑重重，甚至对于一些他最热情的支持者们来说，也是如此。民主党将大举接收共和党的地盘，似乎早已成为了一个先验的结论，而由于《论坛报》的恶意指控和贺瑞斯·格里（Horace Greeley）的候选希望，使得关于这点的焦虑更加强烈。因此，必须要付出积极的努力，采取必要的措施步骤，才能确保格兰特将军在选举大会上大获全胜。

我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当然，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因为，我相信契约的神圣，财富的稳定，经济的成功以及整个国家的繁荣，都取决于格兰特的总体选举结果。

如果读者（就像所有其他读者一样）想知道我有什么自私动机，那么我对此完全坦白。当然，我知道华尔街的经济将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而繁荣；当然，我希望分享由此带来的华尔街的繁荣成果。这就是我的自私动机，任何人都不能免俗。

我不愿意为官，曾经也有几次当高官的机会，但是都被我一一谢绝了；这

位人物给我高官也不能在经济上给我很大的补偿；而我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在我的事业中将会得到满足。

于是，我开始为格兰特的连任奔波。我用我自己的钱雇佣了很多的说客，设法了解代表性的实业家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与那些希望共和党胜利的人交流对此的看法。这些人每天都要向我汇报，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实业家们的心声，他们是美国经济的最大利益相关者，大凡要取得重要的发展业绩，他们的影响力总是能够感觉得到。我发出请愿书，并获得了许多支持格兰特观点和政治路线的著名商人和实业家的签名。下面是这份请愿书的题头：

公众集会

致支持格兰特将军连任的各企业家、银行家、制造商和其他实业家们：

在此签名者，希望公开表达他们对于尤利塞斯·格兰特在恢复家园和平，坚持国家权力，在世界范围内维护美国的国家荣誉的过程中所鲜明体现的睿智、忠诚、活力和坚定的爱国主义的最真诚的信心，为此，请务必邀请您的同道中人于 187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的晚上在库珀大学参加公众集会。

这份请愿书主要是此前几周时间我安排的个人游说的结果。我选择每天被邀请的人的名字，让这些人推动工作的进展，直到我把纽约市所有知名的企业都邀请到。在名单中下面这些人比较惹眼，他们的原始签名我现在仍然保留着：

威廉 E. 道奇 (William E. Dodge)	R. H. 麦克柯蒂 (R. H. McCurdy)
约翰 C. 格林 (John C. Green)	约瑟夫·希里格曼 (Joseph Seligman)
亨利 F. 威尔 (Henry F. Vail)	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乔治 T. 艾迪 (George T. Adey)	威廉·奥顿 (William Orton)
萨缪尔·奥斯古德 (Rev. Samuel Osgood)	
查理斯 P. 科克兰德 (Charles P. Kirkland)	
威廉 H. 弗格 (William H. Fogg)	彼得·库珀 (Peter Cooper)
本杰明 B. 谢尔曼 (Benjamin B. Sherman)	
休 J. 哈斯汀泗 (Hugh J. Hastings)	
罗伯特 L. 斯图尔特 (Robert L. Stewart)	

萨缪尔 B. 拉格拉斯 (Samuel B. Ruggles)
威廉·亨利·安东 (William Henry Anthon)
克特兰德·帕尔默 (Cortlandt Palmer)
E. D. 摩根 (E. D. Morgan)
乔纳森·爱德沃德斯 (Jonathan Edwards)
詹姆斯·比尔 (James Buell) 查理斯·尼兰德 (Charles Kneeland)
H. B. 克拉夫林 (H. B. Claflin) S. R. 康斯托克 (S. R. Comstock)
W. R. 弗米利 (W. R. Vermilye) 皮特·库克 (Pitt Cook)
WM. M. 弗米利 (WM. M. Vehmilye) 托马斯 J. 欧文 (Thomas J. Owen)
查理斯 L. 弗罗斯特 (Charles L. Frost)
奥迪斯 D. 斯万 (Otis D. Swan)
纳森内尔·海登 (Nathaniel Hayden) 乔治·奥蒲狄克 (George Opdyke)
耶西·霍伊特 (Jesse Hoyt) 哈珀·布拉斯 (Harper & Bros.)
威廉·巴顿·皮科 (William Barton Peake)
约翰 C. 哈米尔顿 (John C. Hamilton)
埃米尔·绍尔 (Emil Sauer) 乔 W. T. 罗德 (Geo. W. T. Lord)
捷克伯·奥图 (Jacob Otto)
萨缪尔 T. 斯基德莫 (Samuel T. Skidmore)
约瑟夫·斯图尔特 (Joseph Stuart)
乔纳森·斯德基斯 (Jonathan Sturges)
J. 斯图尔特 (J. Stuart)
WM. H. 范德比尔特 (WM. H. Vanderbilt)
托马斯·贾纳·安东尼 (Thos. Garner Anthony)
谢波德·纳普 (Shepard Knapp)
弗雷德里克 S. 温斯顿 (Frederick S. Winston)
WM. H. 阿斯平沃 (Wm. H. Aspinwall)
莫里斯·富兰克林 (Morris Franklin)
J. S. 罗克韦尔 (J. S. Rockwell)
WM. C. 布莱恩 (WM. C. Bryant)

现在，一想到这些人都与全能的死神挂上了号，真不禁令人难过。

这些名字将告诉我们每隔几年将有多少杰出人物逐渐地离我们而去。

那些签名并仍活在人世的人也很多。实际上，那些没有签名的人本不值得写下他们的名字。但是，为了委婉平和起见，我还是寻找到他们的签名，通过这样的做法，所有想要的人名都齐了。就这样，我们的力量召集起来了，下一步就是扰乱敌人的阵脚，通过显示隐藏在这次运动背后我们的力量、实力和热情，来鼓励我们自己的队伍。1872年4月17日，通过在库珀大学召集一次公众大会，我们将其向前推进。

就与会人数、精英和名人的层次来说，会议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功。会场人山人海，场外的会议则更是几倍的空前壮大。

刚开始，我们想邀请斯图尔特先生来主持会议。他曾经是格兰特将军的热心朋友，但后来由于他妻子的某位近亲未能获得海关的提拔，而变得隔膜和无动于衷。我花了好几天设法劝解，并想让他答应做会议的主席，但是他顽固不化。最后，我成功地迫使他承诺，即使不投格兰特的赞成票，也不能投格兰特的反对票，但除此之外，再想怎样安抚他也是不可能的。他真是个顽固执拗的典型，一旦决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作为外侨，因为经商的缘故，他本来不能获得曾经获得过的美国第二高位（财政部长）的荣耀。尽管如此，回想起这点，仍然不能勾起他足够的感激之情，让他忘掉拒绝其妻子的亲戚得到提拔带来的不快。

由于不能请到斯图尔特，我邀请了威廉·道奇来主持会议。他慷慨地答应了邀请，并确实做得非常之好。

至于副主持的阵容更是壮大，据说超过了纽约市在此之前所有会议的阵容。

我邀请了杰出的有色人种演说家弗雷德·道格拉斯（Fred Douglass）和宾齐贝克（P. B. S. Pinchback）到会，但是他们无法到会，因为他们要参加自己在新奥尔良的集会。雷尼先生也是有色人种，他演说非常精彩而有力。这是战后第一次有色人种关于纽约政治问题，在白人会议上的发言，或可能是北方的第一次发言。在此之前，有色人种投票选举格兰特受到质疑，因为贺瑞斯·格里（他的名字在有色人种中就像有魔法的单词）最近南下做巡回政治演讲，他既想得到有色人种的选票，因为他深受有色人种的爱戴，又想得到民主党的

选票，因此民主党派恨他。然而，古怪的命运使得他未能赢得任何一方。正如布莱恩对他所说：“没有其他任何候选人能够这样表现出强和弱两支截然对立的力量。”

由于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召开过会议，这就使得这次集会能够唤醒这个党派以及整个美国的所有政治家，因为在库珀大学有很多大人物出现，它粉碎了所谓独立派的期望，吹灭了民主党的星星希望。

为了显示此次公众会议对于参加1872年总统选举的政治派别的命运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那些对于选举结果非常关注的相关各方对此的印象，有必要公开他们对此的个人看法。此类性质的内幕往往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时间已经为它披上了一层公共财产的外衣，曾经它是一项非常宝贵的政治秘密。

在会议当晚发生的重要事件中，我清晰地记得有一个关于马萨诸塞州亨利·威尔逊议员的真实预言。很多演说家和其他名人在会后与我在联盟社团俱乐部共进晚餐，在向威尔逊议员（他有非常雄辩的口才）祝酒的时候，我提名他做副总统，他后来真的被选任这个位置。

这里，我冒昧地给读者介绍几封到目前为止尚未公开发表的信件，它们可以很好地说明我和我的朋友们当时所做的工作的价值，及那些对选举结果最为关注的人对此的看法。

从下面白宫发过来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对于当时事态的关注。

华盛顿特区，白宫

1872年4月17日

亲爱的克卢斯：

收到您关于纽约大会的几封有趣的来信，我已经转交总统本人，他已经非常感兴趣地阅读了它们。我没有写什么建议，因为我认为，您在这个位置，可以更好地认清形势和纽约市民的脾性。您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今晚大会的成功，我相信将是对您努力的奖赏。我们焦急地期盼大会报告尽快出来。您提到不知道迪克的名字如何使用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国会中展开了工作，正在收集在各州代表中支持格兰特将军连任的所有共和党成员签名的电报。我期望我们能早一点想到这个做法，但是我仍然希望我们可以及时收齐。我刚从白宫回

来，我将在此负责这件事。祝您成功。

您真诚的朋友，
贺瑞斯·波特
(格兰特总统秘书)

会后，总统秘书写了下面这封信：

华盛顿特区，白宫
1872 年 4 月 19 日

亲爱的克卢斯：

几分钟之前，我刚刚收到邮件，非常诚恳地对大会所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

这次大会开得光荣而真诚。我们昨晚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完整的会议记录。它对国会及其他地方产生了突出的影响。白宫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在贺电中签了名，但是大会开始的时间太晚了，因此这份报纸没有发给任何人。

您真诚的朋友，
贺瑞斯·波特

下面这封罗斯科·科克林 (Roscoe Conkling) 先生写来的信，我非常欣赏，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华盛顿特区，美国众议院
1872 年 4 月 19 日

亲爱的克卢斯先生：

作为一名纽约市民和一名共和党人，我要感谢您为我们国家和我们的事业，在筹备和推进昨晚的大会中所做出的努力。

大会的效果将是非常有益和影响广泛的。它非常及时，整个管理非常成功。我想，我们的朋友们都非常欣赏和感激您在此所做出的努力。

注意到您对于我们未来发展的教诲，我已经铭记心间。

您真诚的朋友，
罗斯科·科克林

会后第二天，从华盛顿来的纽约《先锋报》特约评论员说：

格兰特总统在今天早上拜会议员们的时候，对纽约昨晚的大会表现得很高兴，他认为这表明了共和党受到人民的欢迎。从可靠资料那里，他认定美国另一党派——民主党的许多重要企业家和银行家也都盼望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他们将其视为维持美国信用、抵制诸如金融危机之类的事件的最有把握的途径，而他们认为一旦他们自己的政党获胜，则非常有可能遭遇这样的恶劣后果。

下面是对格兰特这位曾经拯救了美国的英雄充满敬意的代表们的致辞和决议：

库珀大学格兰特大会，1872年3月17日。——致辞和决议

德拉费尔德·史密斯先生代表大会组委会宣读了下面的致辞，注意这是由我们的实业家中最出色最富有的一位准备的：

致 辞

在格兰特总统的政府班子的领导下，公共事务得到了非常明智、谨慎和充满爱国热忱的管理；我们的国际关系在谨慎地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的轨道上发展，虽然他们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心怀嫉妒；格兰特将军热切地强调对这个庞大的机构的包容，“让我们和平相处”已经愉快地实现；在正义和公平的原则下，联邦政府得以完全重建，繁荣大有保证；宪法经过种种修整，已得到了严格忠贞地遵守；国内恢复了宁静；人道精神也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印第安政策当中；美国国民收入诚实地上缴，公正地分配，因此，在国民的税收负担大幅减轻的同时，国家的信用也有了可观的增强；各行各业意气风发，投入社会建设事业；美国国土上每一个角落的和平、繁荣和幸福，正是对在平定叛乱，保全联邦政府中所遭遇的危险和所付出的牺牲的最好回报。

这是理想的正义行动。作为一名战士，他在战场上屡立奇功；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带来了和平，这个和平造就了美国历史进程中最光荣的上一个十年；这位战士和政治家应该受到他的人民最真诚的感激，在选举中获得连任。

这是美国之幸，人们明显地越来越看重政府官员们的职责和责任感。人们

普遍认为，位高权重者必然对自己的行为严格负责，诚信和能力应该是政府官员候选人的一个必备条件。在文官协会的报告中，宣布了符合此条件的总体候选人，这是及时和恰当的，理当得到国民的拥护。

在本届国会任期内，启动了很多旨在揭露政府部门腐败现象的调查。不满的共和党人和部分游散的民主党人，试图联合起来设法发掘能够证明总统腐败或知情纵容此类腐败的证据。正如丹尼尔那个时代，“他们总是伺机反攻”。但是，就像丹尼尔的敌人那样，“他们找不到任何机会或瑕疵，像他这样可靠的人，别人要想挑剔或诘难，简直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调查越是细致入微，他的廉洁品质就越昭如明镜。结果，调查所花费的成本超过了该届政府自当政以来，由于其成员的不诚信行为而导致的损失总额。

总统廉洁、光荣的记录，博得了公民的敬仰，赢得了那些真心希望政府稳健发展，希望保持国家诚信，资本安全、劳有所得和人人平等的公民的支持。

谋官者指望攀龙附凤，最终威威然而去，靠自己的辛苦努力发展起来的人则不可能有时间、有耐心来对此表示什么同情。究竟哪位议员比另一位议员更多或更少地受他的眷顾，这相对于总统选举这样的大事而言真是无足轻重。而且，任命政府官员是宪法赋予总统的特权。他没有滥用这个权力，他在总统任期内所获得的成功就是最好的明证。

相信格兰特将军的文官事业是他的军旅伟业的良好补益，相信他在战场上令他屡建奇功，在从敦纳森到阿波玛托科的广大区域上所向披靡的活力、远见和判断力，这些能够为他的新的职责如虎添翼。他拥有这些潜力，值得美国人民托付，我们在此祝愿他能够在连任选举中获得选民的全力支持。

决 议

决议委员会主席德拉费尔德·史密斯先生宣读了以下决议：

第一，出席本次会议以及以此名义开的短会的商人和商界人士，银行家和企业家，对于美国政府现任总统的睿智、才干、谦虚和诚信深感满意，与美国上下的同胞们一样，赞成现任杰出的领袖继续他的任期，继续他的成功和荣耀。

第二，合谋运动如果获得成功，其现实结果将是恢复民主党的权力。

第三，最近一次成功镇压叛乱之后，如果放任这样的恢复，将无异于历史上美国革命战争结束后让亲英的保守分子死灰复燃。

第四，共和党既然主要由那些在南方和北方攻击政府的人选举到政府中去，这令共和党的拥护者感到难堪，而他们也会不可避免地支持他们发展的现任当权者们示好卖乖。正如那些由南方人选举产生的北方总统们一样，他们获得的投票比南方人自己的政治家还多。

第五，爱国主义，曾经使得华盛顿成为他所创建的美国的首都，如今，爱国主义也使格兰特能够成为他所拯救的共和政府的总统。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最无瑕疵的文官治理经验与资格，深得人民信任。而且，鉴于其本人的英明管理，格兰特所获得的认可，也是对其诚信服务的最佳褒奖，符合公共政策的最广泛观念。

第六，为了批驳那些居心叵测的批评、毫无根据的指责，揭露那些华而不实的诱人承诺和五花八门的蹩脚理论，我们只要简单地罗列一下现任总统当政以来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及改革目前所带来的结果，就可以辨伪识真。现行制度的一些长期陋习确实不恰当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但现在已经走上了一条逐步扭转或消除的正道。国家外债大量削减，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好评。我们的外交政策已经实现了和平和民族联合。我们的总统，在印第安部落眼中，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仁慈“国父”，这个部落至今依然在我们的边界内徘徊。

第七，在赞美尊敬格兰特总统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出于政治的目的，在竭力毁谤格兰特总统，这种居心叵测的行为是无视事实的犯罪，是对那些尊敬和赞美格兰特总统的人们的诋毁。格兰特总统的私生活和公众形象一样纯洁，他既有坚定的信心，又能顺应公众的意志，他临危不惧，谨言笃行，他不爱宣扬和夸张，那些了解他的人最能证明这一点，他的表达富于见地，充满睿智和分析的力量，发人深省。

第八，本次会议的决议是：美国的绝大多数人民希望、盼望、要求重新提名和再次选择尤利塞斯·格兰特连任总统。

德拉费尔德·史密斯先生的演讲

各位公民：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格兰特总统将在费城总统选举大会上再次获得提名。同样清楚的是，这个决议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意志。一切都源自他这

个美国“粗人”身上蕴藏的自信，任何的歪曲毁谤都伤及不了他。他的对手声称这次的公决之所以有利于他，是因为公众受到政府官员的影响。但是，这样的解释是行不通的，因为政府官员比起谋官者而言远远要少得多。关于官员照顾这一点，现在的情况和特利兰德第一次说下面这句话的时候一样，即：每一位官员有一位感恩者，就有四十九位敌人。真实情况是占据高位是一项资源，但不是实力，对于任何政党，它实际上都是劣势。除此之外，格兰特将军非常有实力，他深受国民的拥戴，合谋是试图打败格兰特将军的孤注一掷的做法。人们原本认为民主党全体成员都会与共和党划清界线，但是，当民主党组织涣散的时候，它对自己的数千名成员也失去了影响力，他们可以并将乐意自主投共和党一票，他们将与我国爱国队伍中的这位英雄同舟共济。后来在这个城市里召集的合谋大会让人想起旧时的杂牌军，军官是白人，但下面的普通士兵是黑人。在这里，舞台上写的是共和党，但下面的观众是由民主党组成的。我们的这些不满的朋友们，与旧日的对手一道，炫耀着自己的独立，指责他们对我们的百依百顺。但是，他们错了。对国家忠诚，对政党真心，对朋友真诚的人才是最独立的人！基于这些简单的考虑，我接受本次演说和决议。

对于上述的致词和决议，我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我相信它们可以构成美国政治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精彩但至今未得到充分阐释的篇章。

不过，会议取得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是，第二天《晚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这家报纸此前一直对格兰特将军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它写道：

昨晚在库珀大学举行的集会，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政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可以非常鲜明地认为，是一次由试图重新提名和再次选举格兰特总统连任的共和党人组成的集会，然而，会议开始之际，与会的官员和演说家们还认为这是纽约共和党的公众集会，也就是说，根据集会的组织者和举办者的想法，现在共和主义的一个测试方法就是在那个政党给出任何提名之前，在政治上支持某位人物的声望。奇怪的一点就是：因为在此次会议的报告上出现了一些很著名的人物，他们有一些人倾向于提名格兰特以外的其他候选人，如果他们意图控制费城提名，那么他们怎么会支持（至少可以说是默许）此人提名呢？

这次会议的力量完全来自它的组织。会议所邀请的官员总体上说，都是我们在任何集会中所能想到的最杰出、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当然，其中

也出现了一些令同侪们感到玷污的人的名字，还有很多没有什么分量的人物，但是总体来说，在这个城市中，如此多杰出的、有代表性的名字出现在这么长的一串名单里是罕见的。与会的观众很多都是跟从这些官员们而来的。投票者主要是由这些尊贵、有思想的人组成的。

这项杰出的工作一直做到 11 月份，这时历史性的一刻到来了。

《纽约太阳报》写道：“我们认为亨利·克卢斯对于格兰特的成功连任所做的工作，比起任何一位纽约联盟社团俱乐部的共和党百万富翁来说都要多，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工作。”

在那个秋天还召开了另外一次集会。关于这次集会，还有期间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总统秘书在选举前的几天写了下面这封信：

华盛顿特区

1872 年 11 月 2 日

亲爱的克卢斯：

我们都非常感激您在选举期间发给我们的文档和信息。总统说上次库珀大学的副总统提名非常好，他已经看到写在报纸上了。这件事本身非常好。

我们从各方面收到的信息都很诱人，毫无疑问，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将在下周二实现。

如果我们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击败对手，那么它将是对我们努力的足够奖赏。

您真诚的朋友

贺瑞斯·波特

为了进一步表明本市重要的那些商人、银行家和企业家在活动中对于当时格兰特总统连任的兴趣，下面的这份公告起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有历史意义的作用。它以短小精悍的形式构成了金融史的重要内容：

公 告

关于美国国债经济状况，纽约商界发起公告。10 月 1 日进一步削减 10 327 000 美元。

以下签名者以及纽约的商人、银行家和企业家，为告知相关各方，特提交

下列公告：

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是尤利塞斯·格兰特，他得到一致提名参加5月底在费城举行的总统选举。

1869年3月4日，格兰特将军第一个任期开始之时，国债为2 525 000 000美元。今年9月的第一天，债券本金已经支付并消除了348 000 000美元，当日未清偿的结余债券本金，根据财政部正式公告，总金额为2 177 000 000美元。其中的1 177 000 000美元表现为需以黄金支付利息的长期国债，400 000 000美元是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

截至上次国会会议结束，年税收有所削减，以1869年利率计算，税收年削减情况如下所示：

国内收入税.....	82 000 000 美元
收入税（已取消）.....	30 000 000 美元
关税.....	<u>58 000 000</u> 美元
总共削减税收.....	170 000 000 美元

政府所削减下来的国债年利息金额超过了23 200 000美元，其中21 743 000美元是通过购买和注销6%的国债的方式削减下来的。

这是在美国财政部审慎、负责的管理下所取得的成绩，经过对此仔细的考量，促使下列签名者想要表达自己对于格兰特总统的坚定信心，相信再次选举格兰特将军担任美国总统，将最大地提高美国人民整体的生活福祉，增进国家经贸利益，保持国债的平稳。

纽约，1872年10月4日。

第 18 章

Chapter 18

特威德集团和纽约 70 人委员会

特威德集团在投机交易中拥权自重 ◆ 特威德和他的手下如何操纵货币市场 ◆ 特威德集团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而合谋导演了一次恐慌 ◆ 试图扶持民主党当选的密谋被击败，由于格兰特总统和鲍特韦尔部长从一位华尔街人那里得到警告消息，一场恐慌方得以避免 ◆ 70 人集团是如何产生的 ◆ 纳税人如何被博斯·特威德和他的手下吓得够呛 ◆ 这位狡猾的家伙是如何粉饰自己的 ◆ 将官位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 ◆ 作为 70 人集团的顾问，霍恩和萨缪尔·琼斯·蒂尔丹是如何起步的

在著名的博斯治理时期，特威德集团对于华尔街内外事务就有相当的经验。我曾经提到过他们试图通过紧缩货币供应来操纵市场，这在后面介绍华尔街名人亨利·史密斯（Henry N. Smith）的生平时，还将有介绍。

特威德集团经常高度顺承股票投机中的某些操纵者，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汉尼拔和圣约瑟夫的垄断案，它给博斯·特威德公司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此后的很长时间内都很少有人注意这只股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多年之后。这个著名的垄断案中又出现了一个叫约翰·杜夫（John R. Duff）的波士顿人，他通过他的纽约经纪人·哈奇森（Wm. J. Hutchinson）重新策划了这个著名的垄断案，但结果，可怜的杜夫几乎（姑且不说是完全）也遭到灭顶之灾。就此而论，我们大可公正地说杜夫先生不应该受到责难，因为政府股票交易委

员会经过彻底调查，发现他的问题主要来自极度不诚实，和对经纪人过分的信任，他对于此人太有信心了。

博斯·特威德和他的特别顾问们在操纵美国或纽约州的政治运动时，有时会对华尔街大加利用。在选举的时候，如果他们的对手恰好大权在握，那么特威德集团会同时收回该市所有的货币，在华尔街它们往往表现为临时贷款，从而在货币市场上制造一次紧缩。

特威德集团的管理者们通过某些存储城市资金的银行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些银行对他们的控制言听计从。

通过这样的方式，并且通过对当时执政的共和党大加指责，他们煽动起敌对势力对共和党的反对情绪，这些反对势力在投机中大赔老本，自然而然是对执政者深恶痛绝。他们由于赔了钱，所以很容易上当受骗走偏激之路，以为所有的因素都要为他们所承受的这种损失负责。为了慰藉自己受伤的心灵，急需寻找一个替罪羊作为具体目标，来发泄他们的报复心理。而且，对于这些失落的受害者，也没有什么比四处搜寻发泄目标那样令人煎熬的了。

特威德集团提供了这种长期的感情需要，填补了这些人由于在市场上站错了位置导致的长期以来痛惜空虚的心情。当投机者不断连“保证金”都被一扫而空的时候，除了投票权之外，他们几乎什么东西都需要，这时，他们就发现华尔街不能给予他们慰藉，特威德手下却大方地给了他们同情。特威德一伙将矛头指向当政的共和党人，指出共和党就是这个装满了邪恶，给他们带来了如此灾难的潘多拉魔盒的唯一主人。

因此，这些金融灾难都是特威德集团出于帮助其盟友上台的目的（当然，如果这些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得到了肥缺，则往往会回头孝敬博斯·特威德），而一手造成的。他本人则除了这些之外，并没有什么升官的打算。

那时候，总统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宾夕法尼亚方式的影响，它印证了一句政治格言：“宾夕法尼亚怎样，美国就怎样。”

1872年的春天，格兰特将军成为共和党连任候选人，同时，民主党候选人花落于贺瑞斯·格里的大局已定，此时，需要下大力气在华尔街制造恐慌了。特威德集团是这样打算的：在宾夕法尼亚州长选举的同时，推动恐慌开始出现，以此证明共和党统治下恶果累累，从而产生有利于格里先生选举的影响。

我获悉了这个政治投机密谋的暗示，将这个信息与参议员科克林先生进行了沟通，他当时正在第五大街饭店逗留。我告诉他，民主党在密谋一场旨在打击格兰特将军的恐慌。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但这确实非常像是特威德一伙做事的风格，他认为正好有理由给他们一个警告，他请我就此事去见一见摩根州长和乔治·奥普狄克。我在教堂会议上见到这位州长，我留下一张名片，让他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找我，因为我想让他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同样，我也给奥普狄克先生留言让他来找我。

摩根州长很快亲自出现在委员会办公室，我向他透露了这个信息和疑问。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对于此重大事件表现出应有的浓厚兴趣。对于特威德集团政治意图的报告，他显得有些怀疑，或者在他看来，特威德集团不可能这样老谋深算。因此，他严重地低估了彼得·布润斯·斯维尼的实力、资源和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位州长性情冷静，在没有很明显的证据的情况下很难说服他任何事情。我告诉他，我的信息非常真实可靠，我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如果华尔街上真出现了恐慌，那么我很担心它会对共和党的这场选举斗争产生严重的影响。

摩根州长约我第二天再见面详细商谈此事，进一步了解此事的原委。第二天我带着乔治·奥普狄克和克拉夫林先生一道去见摩根州长，此前我已经说服他们两位相信了这个政治密谋。

与此同时，州长也已经见过特拉维斯。特拉维斯作为一位对这种处境司空见惯的空头，也已经发现了市场走向崩溃的蛛丝马迹。州长已经自己说服了自己，知道了我前一天所说的话是正确的，麻烦正在酝酿之中。于是，他非常热心地参与讨论，商讨如何采取最佳策略来阻止这场阴谋，挫败民主党的狼子野心。

我提出建议说，由于时势不容丝毫耽搁，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或更多一些人，非常有必要去华盛顿拜访格兰特将军。州长说他不能走开，我和克拉夫林先生也走不开，因此，奥普狄克先生同意将这个重要的消息亲自带给总统，当然他本人也非常乐意这样做，只要我们能帮助他，同意写一封措辞严重的信给总统，阐明跟事态有关的各项事实。我们照做了，于是奥普狄克先生立即出发前往华盛顿。这是周五的晚上，他以比平常办事高很多的效率完成了任务，并于周日早上返回。他送信给我，告诉我说，他已经向总统解释了这件事，总统

对于他在谈话中和我们在信中所做的提醒表示特别感激，他立刻咨询了财政部长，决定周一收购1 000万债券，同时卖出1 000万黄金，以预防特威德集团期间在货币市场上兴风作浪，人为地制造紧缩，带来金融波动。

接下来，我发现这些参与合谋制造恐慌，想从中获取政治利益和经济收益的人，小算盘打得确实非常精。在现有法律条款下，黄金的价格可以抬高，出价最高者得之，得之者可以选择将他们的钱存在国家仓库，即第四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或者存在财政部分局。如果是存在财政部分局中，则将被封藏起来，财政部想要达到的宽松货币的效果，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影响而论就失效了。

因此，为了应付可能的货币紧缩，我的公司订购了全部1 000万美元的黄金，所用的名字是我办公室一位职员的名字。我们最终获得了800万美元，并将这笔钱存在商业银行和第四国家银行，通过这两家银行，货币又进入流通。

因此1 000万绿钞还有1 000万黄金就这样从财政部分局很快重新进入流通，迅速预见和击溃了特威德集团的阴谋。

在此次交易上，特威德集团完全“被打乱”，造成了市场的奇迹效果。合谋者完全被挫败，宾夕法尼亚选举在几天以后如期举行，结果共和党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如愿当选。

如果特威德集团设计的恐慌确实发生了，则结果可能就大不相同，格兰特的连任就会受到威胁。

在这次取胜之后，我开始开动脑筋设法瓦解他们。我看到他们的力量完全是金钱的力量，是他们通过官位掠夺而来的。我所确信无疑的一点是，这些在纽约财政分局坐收渔利的爱国者们，现在又试图以收买、偷盗或其他方式向华盛顿的国家财政部进军。

他们本来希望将他们在纽约市小范围的作为向大范围扩张，因为纽约当时因为资源所限已逐渐显得难以驾驭。

正是为了遏制这个政治掠夺者集团的危险企图，我创建了一个著名的70人监察委员会，并在第一次的会议上提名了65名成员。

因此，这个委员会在一开始就得到如此之多的市民支持，以至于它很快在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纽约市民多年以来第一次有胆量直面指责政治掠夺和暴政，反对用大棒统

治纽约市的政府官员。

然而，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只是怀疑存在着大规模的掠夺行为，但对此，除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嘀咕几句之外，没有人敢于公开谈论这个事实。究其原因，是由于害怕对此发表的任何评论会传到博斯及其手下的耳朵，从而自己的财产将可能被拉抬至虚高，导致相应要支付更多的税费，因此，没有人（可能有几位非纳税人除外）有勇气开口反对控制了纽约市命运的这位铤而走险的人物。这可以说是这个集团用来遏制纽约富人不友善批评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通过这样的做法，纽约市最有影响的一些市民变得麻木，遭受着这个巧妙的勒索方法的威胁而不思反抗。

特威德集团也确实有能力掩饰其成员的“流氓性”，达到欺瞒百姓的效果，这种能力在当今社会是难以想象的，除非有人已经经历过。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要讲述发生在 70 人委员会成立之前公开批判纽约市审计官理查德·科勒里（Richard Connolly）的事。他假装采取勇敢的阵线，坚持要通过一支由杰出、知名的市民组成的委员会来调查特威德部门。他指定了莫萨斯·泰勒、马歇尔·罗伯特斯和约翰·雅各·阿斯特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些人都无懈可击，他们是富裕而独立的市民，当时很难再找到三个像他们这样在社会上享有如此信心的人。科勒里和他的“朋友们”也似模似样地大胆调查起来，其结果是科勒里宣告无罪，保住了自己新一任期的政治生涯。这件事导致了此后任何人只要对特威德管理纽约财政问题的方式再有任何微词，都会遭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危险。

而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显示，特威德集团在被调查期间，科勒里很好地利用了这次调查，从纽约财政分局挪用了很多钱。

特威德集团现在在市政问题上居于统治地位，纽约市处于恐怖的统治之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70 人委员会开始运作的 1872 年的夏天，此后这些已经当家很多年的贪婪暴虐的硕鼠们很快被一个个驱逐出局，分散到全球各个角落。

在彻底驱逐这个寡廉鲜耻的掠夺者集团时，碰到了巨大的困难，因为他们拥有的人脉资源十分丰富而且有实力。当他们不能够再施展其霸权的时候，他们开始曲意奉承，极尽哄骗行贿之能事，以保存他们残余的势力范围。为了说明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我开始努力联系组建 70 人委员会的时候，一

个特威德集团的人在等我，他问我是否不会接受市财政总管的职位。我说：“当然，我对此不能马上做出决定，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空缺。到有空缺的时候，我还有很多时间考虑这件事情，到那时我会再做决定。”

我想从此类案例中抽取程序中的一些内部做法，因此这个回答蕴涵了一层我故意透露的模糊暗示，假装我可能会接受这个职位，以掩饰即将到来的大结局。我想，委员会最后的结果可以证明这种温和的附会手段的正确性，即：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挖掘出特威德管理方式的重要秘密，它有助于我们的市政改革。

第二天，又有一位特威德最信任的朋友来等我，他态度自若地告诉我说，市财政总管已经辞职，如果我能填补这个空缺，当局将非常高兴。我请他转达我对当局的由衷感激之情（那时的特威德已经失势），但我非常谦卑地拒绝了他的美意。我说，前一天关于这件事我非常认真地想了很久，由于我是70人委员会的成员，它是一个改革派的组织，因此我感觉在良心上不能接受这个职位。

这个职位需要马上有人填补，后来就转给了百老汇银行的总裁帕尔默（F. A. Palmer），这家银行曾经是特威德集团的一个存储城市资金的地方。

此后，纽约政府大部分官员都辞职，飞到不知道什么地方了。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有些去了欧洲，有些去了古巴，还有些去了风景宜人、天堂般的新殖民地，70人委员会作为一支改革的力量完全掌握了纽约市政。

特威德依然搬出了他最喜爱的那句质问，只是再没有那么颐指气使了：“您到底想要干什么呢？”他似乎相信了70人委员会再不是开玩笑。市长奥凯·霍尔（Oakey Hall）则依然很幽默地申明说，只要他在，一切都“OK”。

霍恩·萨缪尔·蒂尔丹（Hon. Samuel Tilden）大约在这个时候开始显山露水起来。由于威廉·哈弗美尔（William F. Havemeyer）的影响力，他入选该委员会，成为它的三个法律顾问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分别是亚伯拉罕·劳伦斯（Abraham R. Lawrence）和威廉·派克哈姆（Wm. H. Peckham）。蒂尔丹先生很快抓住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将自己推向前台，以一副伟大的改革者的姿态自居。如果不是因为70人委员会，我想这个伟大的改革者是否还能做出这样的成绩那很难说，他是否还有机会出人头地（或者说，试图通过他神秘咒语的魔法，将其他所有人咒离美国总统的宝位）也有问题。

第 19 章

Chapter 19

丹尼尔·德鲁

德鲁像范德比尔特一样，是一位典型的文化程度不高却成就斐然的人 ◆ 他所支配的钱财超过了任何一位美国人 ◆ 古尔德现身，德鲁逐渐没落 ◆ “既生瑜，何生亮。” ◆ 德鲁没落的预言 ◆ 他的 1 300 万美元化为乌有 ◆ 他是如何通过手帕戏法操纵“奥什科什”的 ◆ “丹尼尔大叔”麻烦的开始 ◆ 可转换债券的戏法 ◆ 1866 年的垄断案 ◆ 百万美元在一天中的失而复得 ◆ 一位在圈外投机但同时又从德鲁的经纪人手中买进股票的年轻人的有趣插曲

华尔街经历最富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丹尼尔·德鲁，也就是我们常称的“丹尼尔大叔”。此人再一次印证了通过执著地坚持一个理念、一种思维和一个目的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他的经历表明，接受教育并不是赚钱发财的必备条件。但是，正如我在另一章试图说明的那样，缺乏教育也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阻碍。

这点在德鲁和范德比尔特两人的经历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事实上，任何对德鲁和范德比尔特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赞成这样的观点：如果接受了一般教育或普通教育，他们可能永远成不了显赫的金融家。同样值得怀疑的是，以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资质来看，如果他们仍对“旁门左道”有特殊的偏好，他们是否有能力接受普通教育或者大学教育？很可能没有。恐怕没有任何一位老师能够将德鲁对股份（shares）这个词的发音从薄衣服（sheers）纠正过来；也恐怕

没有任何一位老师能够说服范德比尔特产生蒸汽的火车头部分不应该拼写成“boylar”。

语法教授们更可能会（失望地）发现，要说服范德比尔特先生“在下手前，不要告诉没有人你将要做什么”这句话中存在语法问题；或说服德鲁在打算减持股票时不能对他的经纪人说“给他们薄衣服”^①，这些将是非常无望完成的任务。他们似乎都像莎士比亚一样，认为自己的读写能力和其他能力一样，完全是与生俱来。他们显然认为，自己的金融投机才华完全来源于他们的天赋，而结果也证实了他们的这种解释。对于在投机领域落后于他们的人，他们无比地鄙视，而对于那些用独门妙法与他们竞争挣钱的人，他们异常地妒忌。德鲁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精明狡诈。尽管自己知识疏浅，德鲁却表现得十分重视他人的教育。为此，他在自己的家乡捐建了一所神学院。

对此，许多人并不愿意就此承认德鲁具有了某种较为慷慨和友好的品质。他们说，他捐赠的动机仅仅是为了沽名钓誉，就如同范德比尔特一样，是想让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

而另一个不太崇高的目的，看起来则有可能可以解释德鲁的真实动机。德鲁发现，宗教在当时的社会非常有影响力，而且他所熟知的宗教人士都有很好的背景。德鲁是想通过奉承迎合这些人来达到投机的目的。

他把神学院这样昂贵的礼物送给他的故乡，这件事本质上很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我对他的动机理解正确的话，他除了拖欠利息之外，还不得不拖延礼物的交付，这件事也奇妙地证实了其后来报应的正义性。

有一段时间，丹尼尔·德鲁所能支配的资金超过了华尔街的任何一个人，甚至超过了美国的任何一个人。据估计，他的财富有1 300万美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他在伊利公司任常务董事和财务总监期间，通过投机伊利公司的股票赚取的。因为他身处公司内部，他可以操纵市场，主宰每一个局外人在股市上的沉浮。

在德鲁的操纵下，华尔街人惊异地发现伊利股票常常是在一两天之内，涨落幅度就达20%~30%。

杰伊·古尔德就职掌管伊利的那一天是德鲁的末日，同样也是伊利辉煌的

① 原文“Gimme them sheers”，此处“sheers”实为“shares”股票的误音。——译者注

终结。

从这个时刻起，古尔德开始迅速成长为一个卓有成就的投机人士，而德鲁则迅速走了下坡路，直到德鲁发现自己再次跌落至投机商的最底层。难怪德鲁会这样评论古尔德：“既生瑜，何生亮”。

德鲁一再地遭遇损失，直至他的1300万美金如同雪花般化为乌有。他最终负债累累，心碎神伤地死去。他的晚年生活在忧郁中度过，但这也是对贪婪最有力的警示。这让我想起了一次宴会活动，其中的重要片断，我觉得值得回味。

记得这是一次晚宴，一次特意为一位年迈的绅士举办的，这位绅士当时正处于他投机事业和声望最鼎盛的时期。这是一个一团和气、相互恭维的群体，德鲁正是这个社交群体的首脑人物。由于他的1300万美金，他成为恭维奉承的焦点，被与会的不少人顶礼膜拜。

这样的场合约定俗成地到了演说的阶段。当他们围着餐桌走动祝酒时，祝酒辞激发了他们的辩才。

当轮到我演讲的时候，我也依样画葫芦，挑选了一些常用的赞美之辞献给了这位尊贵的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表达了相当的敬意。

“值此欢聚时刻，我们深为这位绅士巨大的财富而感到崇敬，”我说，“他掌控的现金超过了美国的任何人，而且对他来说，值得荣耀的是，这些全部来自于他自己的创造。他是美国繁荣和进步的真正表率。他的财富和温和的性情结合在一起，能让所有人都成为他的朋友。然而，我知道，他那蔚然壮观并还在不断增长的财富只有一个敌人，但这个敌人非常有可能导致他的破产。在此，我也要向尊贵的客人，德鲁先生，敬献上我的一句肺腑之言，在我看来，您应该当心您的敌人——‘贪婪’。”

这场令人难忘的宴会结束后，不过5年，丹尼尔·德鲁真成了一个破产的人。他的1300万美金全部化为青烟，一切就像海市蜃楼，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除了背后支离破碎的贪婪的人性。

人们在下面的诗句中讥讽了德鲁驱使宗教成为投机的奴仆的行为，这首诗发表在15年前的《纽约论坛报》上：

他是一个高高瘦瘦的乡下人，
他有辉煌也有失败，
“我对这些都不熟悉，
我只是在寻找丹尼尔·德鲁。”

我是一位葡萄园的陌生人，
我是来拜访我所追随者，
在麦迪森神学院，
丹尼尔·德鲁建造的神学院。

我是一位葡萄园的陌生人，
我需要得到的很少，
但我只要您一点点股票[⊖]，
我只是在寻找丹尼尔·德鲁。

再一次我看到那个乡下人，
在纽约、在华尔街的角落里；
他在寻找一只摆渡的船只，
而不是在寻找丹尼尔·德鲁。

他背着一个大麻袋，
上面印着优先 Q. U.。
他手中握着一些州的临时货币，
在风中微微颤抖。

在渡口的门前我又看到了他，
白色的帽子歪斜在他额头一边，
他支付了他的船费，

⊖ 原文是 “But I want sum p'int's on them yer sheares”。——译者注

用他优先 Q. U. 的记名股票。

来自阿肯色河的流言再一次回荡在我耳边，

“如果你想稍稍赌上一把，

尽管嘲笑平局中你手下的饭桶，

但是不要和德鲁进行这样的赌博。”

德鲁先生不修边幅，甚至到了邋遢的地步。他穿得像个牲口贩子，其实他原先就是做这一行的。顺便说一下，“股票掺水”这个重要术语就来源于丹尼尔大叔的行径，他为了让牲口在市场上多卖钱，想出一招，给牲口喂盐，这就让牲口非常口渴，渴极了的牲口就会大量喝水，这样等这些牲口牵到市场上出卖时，就显得更大更肥了。在遭遇古尔德和菲斯科之前，德鲁在生意场上几乎无人能占他上风。

对于那些试图以奸诈来取胜于他的人，他总是令人惊异地有很多办法来克敌制胜。

下面这个不错的故事很好地刻画了他在投机中的这个特点。故事的时间发生在德鲁在西北股票严重的积压下被逼着要平仓之时。对于这一坏运气他万分沮丧，而那些巴望着他赔钱的经纪人和投机商则幸灾乐祸。他们认为这可是抓住老丹尼尔狐狸尾巴的大好机会。接下来的几天，他成为了华尔街上戏虐的对象。有些年轻人只要一遇见他就开玩笑，当着他的面大声地挑衅嘲笑。他似乎对此不以为然，坦然受之，因为他总能保持旺盛的精力，但是对于把他当作嘲笑对象的那些轻佻年轻人，他还是要伺机报复的。他在等待时机。一天晚上，几位年轻人像平常一样在一个市内俱乐部取乐，这时丹尼尔大叔旁若无人地走进来。他看上去像在找人，虽然有人邀请他留下，但是他似乎非常急着离开，他显得有些激动和着急，似乎手头上有重要的事。他屡次从口袋里抽出一块大白手帕在汗津津的额头上擦汗。正当他准备离开时，一小块白色纸片随着手帕一齐被抽了出来，向旁边飘去，而丹尼尔似乎并没有发现。纸片落在一个旁观者脚旁，那人迅速踩住纸片。当丹尼尔离开后，那张纸片立即被这些人传看，上面是他亲笔手写的咒语：“只要是低于票面价格，无论在什么价位，你能买到多少奥什科什股票就买多少。”

丹尼尔的这些话给了这些年轻的投机商们以启示。当时每个人都认为奥什科什股票已经涨得过高，人们都已经流传着应该开始盘算卖空了。但是写在这张奇怪小纸片上的神秘文字使投机商们相信，一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交易使奥什科什的股价再次“冒空”。还等什么呀，赶快利用一下这个意外收获的珍贵信息吧。于是，他们联合坐庄，第二天买进了30 000股股票。他们按照事先的安排从德鲁的经纪人手里购买股票，而卖给他们股票的正是丹尼尔的新经纪人。不久，奥什科什股票开始以每天12个点的速度大跌。就这样，失之桑梓，收之东榆，丹尼尔大叔立刻从取笑他的人及其朋友那里大赚了一笔，这可比他在西北股票中的损失要多得多。那些人这时才发现自己糟糕地坠入了陷阱，被丹尼尔先生的手帕把戏给轻松愚弄了。

德鲁先生大约于1852年首次进入伊利公司的董事会，待在那里一直到1868年，他被排挤出来，几乎要破产。在伊利公司，他掌管着公司的财务处。

德鲁于1797年生于卡梅尔镇，皮特南县，比范德比尔特小3岁。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早年他常常从家乡将牲口赶到纽约。后来他成为这个城市“牛头”酒店的所有者。

他从未改变自己的着装风格，从做牲口贩子的时候开始他就习惯于这种装束。甚至在他的身家财产都达到了1 300万美元时，与别的许多富人总是喜欢拄着根金手杖四处炫耀不同，他依然总是拿着一把又破又旧的雨伞行走在华尔街。当他担任伊利公司的财务总管时，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他简直恨不得抓住一切机会操纵股票市场，而不管他人的权利和利益。许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股票市场的主导性空头。像范德比尔特一样，他对于轮船有一定的兴趣，但是伊利股票才是他获取巨大财富的主要财源。他获得了投机导演的称号。直到所谓的伊利战争爆发之际，人们都还认为他在资金上肯定是坚不可摧的。

1866年的“垄断案”，可以说是丹尼尔大叔麻烦的开始。而此前，他就像佩戴了幸运星，一直是福星高照，所向披靡，以任何其他金融家或投机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迅速积累起数百万家资财富。那年春天，伊利股票卖到了95美元。公司资金远远不够，公司要求财务总管进行必要的融通缓解。他早就等着这样做了，但是他需要贷款的抵押品。那时候，公司有28 000股未发行的伊利股票。公司还要求获得通过发行股东可选择的可转换债券来筹集资金的权力。

这是伊利管理的惯用伎俩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尔街早期的投机操作中，它拯救了雅各布·利特。所以，它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德鲁的原创。

由此，德鲁先生掌握了可用作抵押的 28 000 股未发行股票和 300 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他把这些作为抵押品，提前发行了 350 万美元的债券以缓解公司日益紧迫的资金需要。

当德鲁发现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时，他给华尔街的年轻投机商们又设下了一个陷阱。伊利股票一度被迅速地大量买进，而且那些急于想大赚一笔的购买者还发现，这只股票在 95 美元的价位上还显得十分坚挺。因此，这只股票变得日益供不应求。德鲁先生得到了大量的合同，投机商们想知道他到底会在哪个价位交割。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向上次那样，认为这个老狐狸这下恐怕真的要被逼着平仓了，于是纷纷为他即将面临的尴尬时刻暗暗幸灾乐祸，都沉浸在这一想法的喜悦之中。然而，正当猖狂的多头真以为自己将要成功地迫使德鲁陷入绝境的时候，他将 300 万债券转换成等价的股票，向市场抛出了 58 000 股股票，兑现了其所有合同，让贪婪的多头自食其果。

尽管华尔街的投机者们对伊利股票的确是曾经充满渴求，但由于过量发行，市场已难以完全吸纳。因此，多头还未能从来自伊利大本营的突袭事件阴影中清醒过来，这只股票就已经从 95 美元跌到了 50 美元，原本再大的利润连同保证金都被席卷一空，多头、囤积者等等所有诸如此类的人都被彻底击溃，多头们瘫痪了。

在此次交易中，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一天之内，有人赔了几百万，有人却赚了几百万。

人们称之为伟大的“政变”，它是德鲁操作股票中最辉煌的业绩之一。事实上，当时，它几乎使得先前所有此类操作都相形见绌，相比之下都显得黯然无光，这令其他华尔街的主要投机商是既沮丧又羡慕，既恼怒又忌妒，他们所遭遇的损失和陷阱令他们气得发疯，他们几乎被伊利公司这个财务总管的老谋深算给搞垮了。德鲁所取得的无可匹敌的业绩，让人们痛恨、害怕和敬畏。然后，他尝试淡出一段时间歇一歇，但是他的淡出期实在短暂。

关于刚刚提到的坐庄操作，这里补充一段小插曲，它非常具有丹尼尔操作的特点，值得我们回味。在伊利联合坐庄集团中有个年轻人，他并不知道这个

神秘圈子的内幕，他认为坐庄的目的是抬高伊利的股价，他觉得丹尼尔的信誉不错，何况在庄家中也有他的资金，所以他向丹尼尔大叔借钱购买伊利股票。这位乐于助人的财务总监不仅借了他钱，而且他的私人经纪人还将年轻人想要的股票卖给了他。他每天都能得到一定数量的股票，这些正满足了他的投机欲望。在上面提到的股价大跌之后，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和他的朋友中其他坐庄的成员一道找到德鲁，要求他作为坐庄集团的头，履行已达成共识的计划，把伊利的价格再抬上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次入市，把最近的损失再赚回来。

然而德鲁先生冷漠地告诉他们，庄家已经没有伊利股票，不想再要这些股票，到时候也不准备再购买这只股票了。

“我已经卖掉了我们所有的伊利股票，赚了一笔，”丹尼尔大叔说，“现在正准备分钱。”

因此，这个年轻人幸运地看到了当他用自己的钱在自己的账户上做看涨投机时，丹尼尔大叔却在另一个方向看顾好了他的利益，并且已经在最恰当的时机实现了这些利益。

就这样，这位被丹尼尔大叔取笑的业余投机商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也分得了足以弥补自身损失的钱，即他用自己的账户，以自己独立但错误的眼光在圈外的试验操作中所招致的损失。

如果他不是作为外部投机者而是直接作为庄家成员，那他本该已经从庄家获得可观的收益，但这样就难以收到“吃一堑，长一智”的效果，而从这次惨败中他得到了有用的经验，也得到了他所期望的在投机操作中的独立见解。

第 20 章

Chapter 20

德鲁一生中的有趣片断

德鲁早年生活的一些片断，他是如何开始赚钱的 ◆ 他向亨利·阿斯特借钱在俄亥俄买牛，然后历尽艰辛把牛赶过阿来汉尼山脉，受尽磨难 ◆ 他经营蒸汽船生意，与范德比尔特作对 ◆ 他的婚姻和家庭 ◆ 他建立和捐赠了几个宗教与教育的神学院 ◆ 在他的投机买卖失败后，他回到老家，但仍然活跃于华尔街的交易 ◆ 他希望通过范德比尔特来实现他人生的另一开端 ◆ 他破产，负债，一穷二白 ◆ 他突然但平静地死去 ◆ 关于他古怪个性的几个经典故事

我本来打算先大致描述一下德鲁投机生涯中的一些重要事迹。但转念一想，伟人们的生活事迹提醒我们，人们更想透过大人物的具体生活细节，去了解他们是如何让世界打上自己的烙印的。我们那些雄心勃勃的报纸媒体每天都在不断地鼓励着这种殊堪称许的好奇心。所以，在写德鲁的故事时，为了不使一般的读者掩卷之后大失所望，我必须努力给人们关于德鲁的一些常见问题提供解答。我必须考虑，在读者读完德鲁伟大的投机冒险历程后，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其中一个问题可能是，丹尼尔·德鲁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他是怎样开始赚钱的？

毫无疑问的是，德鲁是迄今为止华尔街最特别的人。他是一个具备美国人特有的节俭、企业家精神以及投机性格的奇人。对那些决心赚钱的读者来说，他多面而独特的性格中的每一面，都代表了一类人的兴趣点，大多数读者都有

此类的弱点。不仅仅美国国内的投机者，甚至全世界的投机者都对他产生了兴趣。正因为如此，我才要花大篇幅介绍他的性格特点。我认为，人们会对他的生活经历有浓厚的兴趣，这有助于本书长久的畅销，并获得好评。当然，他的生活经历也会使人们永远记住这个美国文明社会的绝妙产物，也只有美国的土壤和气候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人物。这些奇迹般的成功，会令老一辈的人为我们伟大国家这种惊人的发展能力感到目瞪口呆。

多数人的一生开端都是平淡无奇的。这可能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自己获得一个好的开端。就目前我对丹尼尔·德鲁有关事迹的了解来看，我发现德鲁少年时就有点少年老成。他在一个农场工作，只有在空隙的时间才能去上学。因此，除了当时的神学思想外，他没学到什么东西。一直到他15岁，父亲去世，留给他、他弟弟和他母亲一个贫瘠的小农场，让他们独自谋生。他父亲是英国后裔，而他母亲是苏格兰后裔。

17岁时，年轻的德鲁作为一名预备役士兵加入了为与英国进行第二次战争而招募的民兵队。

连队设在纽约对面的胡德森的甘赛伍特炮台。就在他入伍几个月后，美、英两国的冲突停止了，连队也解散了。丹尼尔回到家乡。他母亲已掌管了他不到100美元的人伍金。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范德比尔特船长也是利用这么一笔钱开始自己的事业，当时他的100美元是通过帮母亲开垦一块地换来的^①。

“我要拿回我的人伍金。”回家不久，他就对母亲说。“那些钱你打算用来干什么？”老妇人质问。由于苏格兰血统的关系，她和范德比尔特太太一样，对每一分钱都抓得很紧。她们天生具有很好的金钱感觉，遗传对她们儿子日后在金融领域取得成功有很大程度的决定作用。

“我打算买牛，然后卖到纽约。”丹尼尔回答说。

“你能保证不会亏钱吗？”她母亲又问。

“我肯定会赚钱的。”他答道。

起初，他在乡下买牛，然后卖到纽约。刚开始，由于资金有限，利润很

① 范德比尔特向他的母亲借了100美元来购买一艘帆驳船，这在1810年不是一个小数目。他母亲和他做了一个很苛刻的交易，母亲告诉他，如果他能够在他生日以前把一块未经开垦的3万平方米土地清理干净，并且犁好种上作物，她就会给他钱。当时离他的生日只有4个星期了，但范德比尔特把一些邻居小孩组织在一起及时完成了这个任务。——译者注

低。他很快发现，如果在俄亥俄买牛，他会赚到更大的利润。于是，他去找亨利·阿斯特借钱，去俄亥俄买牛，做投机生意。亨利·阿斯特是富尔顿市场的屠夫，他还是百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弟弟。虽然阿斯特认为他的生意有很大风险，但还是借钱给他了。他没想到德鲁很快就赚了钱，而且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基础。他在俄亥俄买牛，然后把它们赶过阿来汉尼山脉。他被认为是做出这一创举的第一人。那时候，这一趟旅途要花上60天，他经历了很多艰辛。有时候，在过山脉的时候，600~1000头牛会损失1/3。然而，由于俄亥俄的牛卖得很便宜，所以利润仍然十分丰厚。

在一个雷电交加、风狂雨暴的可怕晚上，他避雨的树被击碎了，他的马当场被压死，而他自己也被击晕了。但这并没有吓倒他，实际上，任何艰辛都阻挡不了他赚钱的决心。后来，他把生意扩大到肯塔基和伊利诺斯。

1829年，德鲁在24大街第三大道开了一个农场，还经营牛头客栈。1834年，他做起了蒸汽船生意，有了最早的两艘船——韦彻斯特号和艾默瑞号。它们在纽约和奥尔巴尼间航行，跟范德比尔特的航线竞争。德鲁将船费从3美元降到1美元，企图挤掉范德比尔特。两家的竞争十分激烈，以致人们来往相距100英里的2个城市只需要花1先令。德鲁又增加了新的船奥莱根号、佐治·罗号、艾萨克·牛顿号以及新世界号到他的船队。他成为范德比尔特船长的一個很难对付的竞争对手。

1840年，艾萨克·牛顿在胡德森组建了人民航线。德鲁成为了其最大的股东，并组建了圣约翰号、笛安·理查蒙号和德鲁号。后来，艾萨克·牛顿号被烧毁了，而新世界号则沉没了。

1852年，胡德森的铁路开始运行。德鲁拒绝卖他手中的股票。“你可以随意决定你自己的票价，”他对铁路公司的总裁说，“但你如果要越俎代庖定我的船票价格，唯一的方法就是买下人民航线。不过我认为你没有足够的钱能做到。”就像现在的高架铁路一样，铁道线仅仅刺激了交通。而德鲁在这场明显的竞争中，不是失败者，而是一个胜利者。他还控制了斯通灵敦航线长达20年之久。

1844年，德鲁在华尔街初次登台，比我要早13年。当我进入这个金融舞台时，他已经是投机界的一匹战马。他和他的女婿开了一家合伙公司，做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的生意。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而且有很高的信用度。公司经营了10年，直到他的合伙人去世才关闭。德鲁成为了华尔街最有胆识和最成

功的操盘手。

德鲁在25岁的时候与一个农民的女儿罗珊娜·米德结婚了。他和她生了3个孩子，威廉、约瑟芬（夭折）和凯瑟琳。凯瑟琳和浸信会牧师克莱普结婚，他死后为他的妻子留下了很好的生活条件。德鲁两个活下来的孩子看上去对他很孝顺，因此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丹尼尔大叔”后来会在贫困中可怜地死去。他的妻子死于1876年。

德鲁是纽约圣保路卫理公会教堂的成员。他捐了很多钱给宗教和教育机构，但像威尔金斯·米考伯一样，他通常以票据形式支付。这样，一旦他失去了巨额财富并且破产，这些钱就会体现在他的债务里面。他在卡梅尔建立了专为年轻女士开办的德鲁高等教育学院，花了250 000美元。他在麦迪逊建立了德鲁神学院，花了250 000美元，同时还捐赠了类似金额的捐款给它。后来他只是为神学院付了利息。他还增加了在康涅狄格州米道城的卫斯理公会大学以及圣经学会的捐赠基金。他追加了100 000美元给卫斯理公会大学的捐赠基金，但也只是付了利息。这一切都体现在报表上，列在他的无担保索偿权清单上。他在普特南郡拥有若干引人注目的大农场，但都做抵押了。

1876年破产后，德鲁希望回到老家，和他的孙子孙女们度过他剩下的日子。他的这些愿望表明，在他贪财的天性中，一些温情和美好的东西还是存在的。而且这让我想起考伯的感人诗句：

如果那是一种癖好，那就值得一些赞美，
我们珍爱儿时的嬉戏之所，
那情景依然动人，而心，却怎么像石头般麻木，
那感情，已逝去不再，那感情，已无人再能重拾。

他在1876年去了普特南郡，那时他正在生病。但不久，他就很高兴回到了城市。他说：“我和那些来拜访者之间有些麻烦，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了100岁，有些人说我年轻时赊欠了他们的牛，想要我付账，可我没有账本，怎能知道我赊欠了他们？那里太闭塞了。”他继续说：“你要隔天才能知道股票行情怎样。”

所以丹尼尔大叔又回来了，并留在了霍夫曼商行，在那里他能用到股票自动报价机，能够持续不断地收到股票价格的最新信息。他的首席经纪人大卫·乔斯贝克（David Groesbeck）先生。

对他来说，这座城市看起来仍有乡村所没有的某种魅力。在他晚年的日子里，他经常很懊悔地说自己由于年龄太大而不能重新收复他的财富。他说他渴望休息。没能力执行与宗教捐赠相关的计划是让他最揪心的了，重新回到华尔街很可能又一次得到幸运的机会，这样他就能按照原先的意愿来履行宗教义务，然而，他为没办法做到这一点而感到苦恼不已。

在破产日程表上，他的个人资产项目如下：价值 150 美元的手表和项链；价值 150 美元的海豹皮衣；价值 100 美元磨损了的衣服；130 美元的《圣经》和《赞美诗》等。

他在家庭支出方面很节约，但他招待朋友很大方，他在 17 街和联合广场西南角的房子对世界各地的卫理会传教士总是免费开放的。

在他去世的前几年，德鲁先生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做了如下公正、简洁、令人感伤而又令他尴尬的描述：

丹尼尔先生说：“我在赚钱方面似乎很受上天眷顾，在我甚至还不知道之前，我就该是个百万富翁了。我一直都很走运，但最近似乎不行了，我以为我从来都不会失去大把的钱。我像范德比尔特一样有雄心赚取大钱，我试过我所知道的一切办法，但最终还是被困住。除此之外，我喜欢赚钱的刺激，喜欢把钱捐出去，对此我很开心。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存了很多钱。华尔街是个赚钱的好地方，然而当我本应该做我应该做的事的时候，我不能放弃。我现在才彻底明白我本应该做什么，我本应该在 8 年或 10 年前就离开华尔街，并付清债务。在给各个学校和教堂 10 万美元时，我本应该付了这个钱，我本应该给我的孩子们足够的钱以保障他们生活富裕从而更好地抚养他们。然而，我并没有那样做，却只是给他们支付票据，仅仅支付了它的利息，我认为我自己可以用本金做得更好。然而，我现在却不能继续支付我捐赠给学校和教堂的那些款项的利息，这是我必须要承受的最艰难的一件事。”

德鲁先生继续说：“我给了儿子那个老农场，还有在普特南郡的另外少量资产，普特南郡是我出生的地方，希望这些至少可以让他独立。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富人，她丈夫死的时候，给她的五个孩子留下了大量的财产，我被选作这个遗嘱的执行人。信任和资产一样伟大，因此我有责任给德鲁家族、里士满院长、圣约翰和昌西·维博德（Chauncey Vibbard）提供保障，这一点我通过转让我们所住的房子和北河汽艇做到了。这些保障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整体，

我感谢上帝，我履行了人家给我的委托而问心无愧。当然，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女儿，在她的儿女和死去丈夫的帮助下已被供养得很好。我儿子的主营业务与船舶管理有关，他凭着这桩生意也生活得不错。”

在伊利股票垄断大战中遭遇灾难性失败后，德鲁在凯尼恩·科克斯商行做起了特殊合伙人。当这家商行倒闭时，即1873年大恐慌之后，丹尼尔大叔被迫转让。他已经连年亏损，在伊利股票垄断大战中，由于古尔德和菲斯科的阴谋，更是亏了大约200~300万美元，而在西北公司，贺瑞斯·克拉克（Horace F. Clark）和古尔德的垄断也使他陷于75万美元债务的困难境地。这次恐慌之后，他转让给伊利宾夕法尼亚公司的斯科特（Wm. L. Scott），但直到1876年，法律上才宣布他破产，他的债务累计1 074 131.83美元，而资产估计仅为746 499.46美元。

像范德比尔特一样，德鲁把这些账目记在了脑海里，并认为这整个记账的繁琐手续简直是一个该死的骗局。

他的失败，如果是在过去，定然是引起一场恐慌，但这次，却没有在投机市场中引起任何反应。在破产诉讼中被解除债务之后，他看起来又重新鼓起了勇气，并说：认为我完蛋了的那些孩子们，我迟早会让他们看到我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东山再起的。他开始对托莱多·沃巴什公司、加拿大南方公司、奎克斯尔沃公司和坎顿（土地）公司的股票感兴趣。

威廉·范德比尔特曾在德鲁的办公室做职员，他的金融知识最初就是在这里启蒙，他还仍然保持着对老雇主的友好感情。有时，范德比尔特会应德鲁要求给他“一点点”，而很少叫他还。据说，范德比尔特先生本打算到德鲁差不多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时候，重新给他的人生以新的开端。不过，德鲁没有等到这一时刻，就于1879年9月18日晚上10点45分在儿子威廉·德鲁的住所（东方42街3号）去世了。

德鲁的死亡没有任何的先兆。那一天，他的健康状况和平常一样，他于下午6点钟在联盟大酒店和劳伦斯兄弟（百老汇的经纪人）中的达瑞斯·劳伦斯（Darius Lawrence）先生一起吃晚饭。晚饭后，他回到他儿子的住处。大约9点钟，他抱怨说不舒服，但又不愿意其他人和他一起熬夜，他说如果他感到严重会打电话给睡在隔壁房的劳伦斯先生。大约10点钟，他去了劳伦斯先生的房间，说感到更难受了。劳伦斯先生迅速帮他叫了家庭医生，但在医生到达

之前，德鲁先生已经去世了，他死于中风。

在关于丹尼尔大叔的大量怪癖故事中，一个值得一提的怪癖与他的习惯有关，当祈祷未能使他平静下来时，他总是处于一种飘飘然的醺醉状态中；而当投机失利后，他总是习惯于用被子裹起来，躺在床上蒙头大睡。他有两个在华尔街的老熟人，很熟悉他那独特的习惯。在他去世那一年的某一天，他们到斯托范特商行去拜访他时，就发现了他那怪癖的习惯：他把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弄得屋子里空气很闷，而且他还用好几床双人毯子把自己也裹得严严实实。他的朋友买了一瓶香槟，但他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分享。当他们喝完了，又买了一瓶，并把那瓶留给了他，他们相信只有他一个人时，他很可能会毫不脸红地喝上几口。

还有一个故事，则刻画了丹尼尔大叔极其善于利用一些秘密及一些人对他的盲目信任的特性。战争期间，有一个叫加利福尼亚·帕克（California Parker）的年轻人，很有钱但不是很有头脑。他开始在临近票面价值时买进伊利股票，并把它抬升到 120 美元。他去找了德鲁，并告诉他，如果他能资助他一些钱让他把价格继续抬上去，他就让德鲁以低于市场价格 15% 的价格进入。德鲁先生看起来很和蔼地赞同了这位年轻百万富翁的建议。而帕克在他的鼓舞下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刻。第二天，帕克遇见了德鲁，德鲁告诉帕克说他筹不到钱了，并且看起来对帕克的失望也颇为难过。而与此同时，德鲁已经背地里指示他的经纪人卖空伊利股票，他知道帕克再也没能力吸纳这些不值钱的伊利股票了。市场开始走向低迷，德鲁成了独家报道新闻，而帕克则破产了，他从华尔街隐退，但总算变得更聪明了。

德鲁的外表看上去身强体壮，个子很高，肌肉发达，而在他后半生，他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反映了他深深忧虑。他的眼睛极其灵动，似乎总在闪烁光芒，走起路来也像猫一样稳健。总体来说，他行为举止和蔼、温厚，但又带有一种略显做作的谦逊，这种谦逊是为了缓解不满和怨恨，从而使他能够与各种各样的人游刃有余地交游往来，他经常被错认为是乡村的教会执事。

以上，我整理并重现了这位投机名流跌宕起伏、盛衰多变的投机生涯中的主要事件，在即将结束时，我真切地希望他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安宁，实际上，华尔街的普通投机者是很少或从来就没希望在“那个美丽的世界”中找到这样东西的。

第 21 章

Chapter 21

威廉·范德比尔特

公共价值观念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 ◆ 他尊重公众对于垄断问题的舆论 ◆ 他第一次管理铁路 ◆ 他如何改良哈莱姆铁路资产的 ◆ 他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显示出强大管理能力，直到有一天他当上了范德比尔特集团的总裁 ◆ 不知疲倦的工作者 ◆ 他注重一切细节的习惯 ◆ 他在 1877 年大罢工中所持的谨慎态度和所取得的良好结果 ◆ 通过说服和仲裁的方式解决所有的误解 ◆ 对待姐妹慷慨大度 ◆ 一位连襟对他的奇特感激之情 ◆ 就 100 万美元的遗产问题，向小柯尼尔妥协 ◆ 格雷斯通对于范德比尔特巨额财产的评价 ◆ 昌西·迪普与格雷斯通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 范德比尔特大厦和著名的舞会 ◆ 他的大艺术收藏馆 ◆ 范德比尔特先生拜访几位重要的艺术家 ◆ 他喜欢快马 ◆ 数家公立学校的捐赠者 ◆ 他给服务员学生的礼物 ◆ 尽管他关注公众舆论，但是他并不害怕威胁或勒索 ◆ “公众，见鬼！” ◆ 对于轻率印象的解释 ◆ 购买“镍盘”之路 ◆ 逐渐下坡的健康状况和弥留的日子 ◆ 他的遗嘱和 2 亿美元家产的明智处置方法 ◆ 这么巨大的资产对于公众的影响

下面的章节将按照辈分的次序介绍范德比尔特家族成员，前面已经介绍过范德比尔特船长，现在该简要地回顾一下威廉·范德比尔特的生平，尤其是他与华尔街的关系和他对于铁路大系统的管理，这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如果按照华尔街的定义，威廉·范德比尔特算不得是一位投机者。与其说他是投机者，

不如说他是投资者。他的投资往往对市场产生健康的影响。与沃里奇霍夫和其他同类人不同的是，他不是公共价值观的破坏者而是建设者，同时他还非常小心地避免通货膨胀问题。他也比较尊重公众舆论，会设法平息垄断过度膨胀带来的危险。从他销售纽约中央铁路股票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点。他的第一次铁路经历是与斯特登岛铁路联系在一起的。斯特登岛铁路全长13英里。这条线路管理不当，严重负债，并很快破产。由于威廉和父亲都对这条铁路相当感兴趣，因此威廉被任命接手这条铁路。船长想借机测试一下自己的儿子是否有能力管理铁路，于是他建议计划要秘密进行。斯特登岛铁路的接手圆满成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铁路所欠的全部债务付清，曾经一文不值的股票现在攀升到了173。威廉·范德比尔特于是被选举任命为这条线路的总裁。据说，就是在这个时候，船长开始纠正他对于“威廉管理能力”的判断偏差，而后者则不遗余力地满足苛刻父亲所提出的任何要求，任劳任怨地接受父亲所有的责难。在船长获得了哈莱姆铁路的控股权之后（这是他第一笔大的铁路业务），他让威廉做副总裁。作为父亲的助手，他进一步显示了管理铁路的才能，曾经跌至一文不值，被视为垃圾股的哈莱姆股票，在几年之内竟然成为了美国最有价值的一只铁路股票。可见，尽管看上去还默默无闻，但实际上，威廉·范德比尔特早在英明的父亲完全开始开拓铁路业务之前，就已经显示了自己作为一位娴熟的铁路管理者的能力。这几乎完全可归结为他的个人努力和英明判断，在短短几年之后，哈莱姆铁路就实现了双轨，种种改进将这只每股8~9美元的股票股价抬升超过了面值。船长非常高兴和欣慰地看到儿子管理哈莱姆铁路的才能，于是他又任命儿子为胡德森河铁路的副总裁，后来在纽约中央铁路和胡德森河铁路的合并中又在同一个层级上进行了合作。威廉的管理能力在接下来父亲所指派的每一项任务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果每一次都空前成功。威廉在范德比尔特铁路联合系统中正式担任副总裁之后，成为一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最大限度地透支着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这样坚持了好几年，结果在这个几世代都以长寿闻名的家族中，他却突然早衰死亡。他坚持事无巨细，让自己熟悉各个部门的所有工作，并亲自进行检查。他仔细地检查与这个巨型铁路系统金融部门有关的所有现金、支票和凭证，检查属于铁路上无数火车上的每一个引擎。除了亲自进行这种铁路“大普查”之外，他还形成了一个浏览大量信函的习惯，而对于信函，即使是那些家资不足他1%的人其实都是交给职员

去处理的。他要亲笔回复很多的信件，而金融界一般较温和的做法是授意给速记员进行处理。1887年1月，82岁高龄的父亲逝世。威廉·范德比尔特当时56岁，幸福地发现自己拥有了数额估计在7500万~9000万美元之间的大笔资产。其父剩余的遗产就多达1500多万美元。

父亲逝世之后，威廉·范德比尔特在管理遗赠给他的铁路方面，积极利用其行政大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877年铁路工人大罢工威胁要陷全国的铁路业务于瘫痪之中，后来眼看就要演变成为一场全社会性的革命了。在此紧急情况下，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判断对于一名铁路管理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威廉·范德比尔特先生证明他在这方面有着大大超越常人之处。实际上，就在碰到这个棘手的罢工问题之前，他已在平息货运斗争中的敌对矛盾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方案促使各条线路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了和睦共处。由于利率方面的斗争，铁路公司被迫要削减员工工资，这构成了造成这次罢工的主要因素。罢工者当中，仅纽约中央铁路和哈莱姆铁路就有12000人。他们的工资下降了10%，他们威胁说要铲平大中央铁路车站。范德比尔特先生尽管拥有非同寻常的勇气，但他并没有像宾夕法尼亚州那样火上浇油让斗争进一步激化，而是很明智地提出了一种友善的折中方案。他从萨拉托加发电报给他的总公司，指示拿出10万美元分给罢工的工人，并答应等到业务改善，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给他们上调10%工资。这个快速和谨慎的做法很快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结果，在匹兹堡发生小规模起义，艾黎哥亨尼地区^①发生流血冲突的时候，在纽约重要的铁路沿线上一派祥和景象。纳税人逃脱了原来将压在他们肩上的重担，暴力和流血事件也得到了制止。罢工的12000人有11500人已经返回了工作岗位，因此，他们很感激范德比尔特先生，相信他的诺言，这个诺言后来也如期兑现。威廉与其父不一样，他管理主要铁路线路的政策特点是平和。他愿意通过说服和仲裁的办法来消除所有误解，不愿意像船长那样战斗和征服。尽管他精于经济算术，精确地遵守着“不该付的不付”的习惯，但是，他在很多方面还是显得有点过于慷慨。他接受了自己的弟弟“小柯尼尔”的要求，答应给他100万美元利息，而实际上他的父亲只给他留下了带罚没条款的20万美元利息，若柯尼尔有异议，则罚没。威廉还

① 地名。——译者注

自掏腰包，捐赠给自己的姐妹每个人 50 万美元美国国债。关于这一大笔钱的分配还有一个好故事。据说，范德比尔特一天晚上坐着自己的四轮马车出游，随身带着这些债券，顺手将它们交给了幸运的接待员。又有一次，他的一位连襟看晚报，发现股票市场那天价格下跌了 1~2 点，于是他说：“威廉，根据今天股市的成交价，这些债券已经达不到 150 美元了，总额不足 50 万美元了。”“好的，”范德比尔特故作表情严肃地回答到，“我会给你一张支票补齐差价。”并当场开了一张支票，签了字。还有一次，他的另外一位连襟跟他到门口，说：“如果还能有更多的好东西，我希望别把我们给忘了。”据说，面对这些异常寡廉鲜耻的事件，他并没有恼怒，而是将其视为普通人的通病，一笑置之。

范德比尔特先生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位于第 51 大街和第 52 大街之间第五大道的一幢漂亮的宫殿，在这里，他从世界各地最著名画家的最伟大作品中，甄选了许多佳作来装饰这座宫殿。

他之所以不愿意参与投机，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把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看得十分神圣，认为他的职责就是让它增值和积累，因此很小心不愿意做任何可能危及它的事情。

继任纽约中央铁路和胡德森河铁路公司总裁的昌西·迪普（Chauncey Depew）先生有一次去伦敦访问，在一次给威廉·格雷斯通设宴的宴会上，他很荣幸地坐在格雷斯通的左边，他们讨论了美国 and 英国在铁路和金融管理方面的差异。在谈话期间，格雷斯通先生说：“我知道你们国家有一个人资产约有 2 000 万~1 亿美元之间，而且这些资产可以随时随意变现。美国政府应该没收他的资产，收归国家所有，因为一个拥有这么大力量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要是他将这些资产转换为货币，并封存起来，那么这将在美国制造恐慌，而且恐慌会像瘟疫一样向全美国和世界所有地方扩散，将伤害很多无辜的人。”迪普先生承认他提到的那个人的确存在，他就是范德比尔特先生，他拥有所说的这么多甚至更多的钱，但是，他用他惯用的温和劝说的语气回答说：“但是，格雷斯通先生，英国也有人同样有这么多的钱。”

格雷斯通先生说，“我想您指的是威斯敏斯特的杜克。威斯敏斯特的杜克并没有那么大的资产。我了解他的全盘家底，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跟踪他的情况。杜克的资产大约在 1 000 万~5 000 万美元之间，但是他的资产并不是可以随时变现从而可吸光国家流通货币的有价证券形式，因此，他虽然可能用来

造成些威胁，但因为它只是一种世袭的权力，一种拥有的乐趣，这种权力不可剥夺，在这个国家所有的重要资产都是不可剥夺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英国比你们在美国受到了更好的保护。”“啊，但是您是在英国，我们是在美国，我们不认为资产是危险的。”他脱口而出回答到。

要考察威廉·范德比尔特作为金融家的大才干，最好的证据就是他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资产在他控制和利用的七年时间内价值有了惊人的增长，他现在的资产价值是船长去世时的资产价值的三倍。

而公众所了解的他最大的一个金融操作败笔是对镍盘铁路的收购，因为它收购的时间来看，有点太操之过急。从现在比较确切的角度看来，如果他当时能再等一个月时间，这条铁路就可能陷入破产，他便可以随意玩弄于股掌之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海岸也会跟着出同样的牌。

这样的话，我相信范德比尔特先生将可以省下巨额的资金，也可大大避免晚年无尽的懊恼和精神压力，实际上这些正是加重他的疾病，导致他突然去世的原因。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已为时太晚，这构成了他晚年极大精神压力的一个源泉。他非常敏感，没有什么东西比赢得众人喝彩的一笔干净而成功的业务，能令他更为满足了，收购镍盘铁路是他的疏忽。这个失误，如果船长还在，可能永远都不能原谅他。

建造这条铁路的辛迪加，它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吸引古尔德或范德比尔特这两个资本大家前来给它兜底收购，而在它将工作重点转向范德比尔特先生时，实际上这已经是它达到目标的最后一步了。这个辛迪加为他设置了一个陷阱。辛迪加通过新闻和其他可能制造谣言的途径大造舆论，造成了一种假象，让人以为古尔德先生好像已经对这条铁路有所意向。而古尔德先生此时恰好正要去西部，这个辛迪加便邀请他通过这条铁路做了一次返乡之旅，然后煞费苦心散步谣言和报告，并千方百计让这些消息传到了范德比尔特先生耳朵里，结果给范德比尔特先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认为古尔德先生的此次出行就是想视察这条线路，要是自己不先下手为强抢先一步的话，恐怕这条铁路就要被古尔德收购走了。而这正是这个辛迪加所希望达到的效果，这也就表明辛迪加的阴谋已经大功告成。

这次收购唯一的就给湖岸公司带来了好处，因为它是平行线路，这条线路后来就转交给了湖岸公司。

这个计划当初的构想是以虚价建设一条铁路，然后按尽可能高的价格卖给范德比尔特先生，这个构想最终可以说圆满完成。我对这一点也感到很满意，因为如果这条线路没有在这个特殊时刻卖出，那么它可能落到其他人的手中，而辛迪加中建设这条铁路的很多人就都将破产，随后接踵而来的就可能是大规模的破产。范德比尔特先生的此次收购恰好避开了这个时间，它将破产的时间往后推至1884年的5月。

在范德比尔特先生去世之前的几年，他都处于一种非常虚弱的状态。而这件烦心事又刚好是在他身心都已经不足以承受如此之重的时候发生的，此时的他也没有足够的身心力量从中摆脱出来。突然的侵袭使他陷入轻度瘫痪，外显的唯一症状就是下嘴唇抽搐。此后，他一只眼睛完全失明，一年之后就去世了。然而，公众大多对此都不知情，眼睛失明也正是他放弃赛马娱乐的主要原因，赛马是他最大的乐趣，是他躲避世事困扰的主要途径。

范德比尔特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天，我给我的客户发了下面的这张公告信：

鉴于威廉·范德比尔特先生在华尔街业界的重要地位，我感觉自己义不容辞地负有向我的朋友和客户们就其逝世撰写并发布这张公告的责任，尤其是鉴于他的逝世可以说是华尔街的损失，而且是最大的损失，这一点必将在未来不远的时间内体现出来。范德比尔特先生在逝世的时候，无疑是世界上持有美国有价证券数量最多的人，他有无数的跟随者，他们也持有与之类似的资产，他们或多或少与他相互呼应，为其马首是瞻。如果他让他们买或卖，他们就会这样做。这些人现在失去了一位珍贵的朋友、顾问和他们所真正信赖的领袖。在一段时间，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种失去主心骨，令人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还会盛行，就像军队中指挥作战的将军遭到杀害一样。较之他同样杰出的父亲，范德比尔特先生是一位更为大胆的大操作者，因为他所涉及的产业和利益更为广泛。市场失去了一位能干的领袖，与很多其他大操作者不同，他总是整个国家利益的坚定卫护者，而其他大操作者虽然有时偶尔也能够卫护国家利益，但是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站在危害国家利益的一面。像威廉·范德比尔特这样璀璨夺目、机敏睿智的领袖人物再次出现恐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市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理由为它的巨大损失哀悼。幸运的是，范德比尔特先生活着看到了西岸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的联合，这两条铁路在迪普的英明领导

下，现在都已经远离了进一步的伤害。但是，南宾夕法尼亚的公司则未能如此好运，因为进一步的协商还未完成，它受到了范德比尔特先生去世的影响，恐怕很难有任何其他人有能力弥补目前两方面存在的和谐因素。因此，由于害怕的原因，这件事可能危及各主要铁路线的和谐，因为这些棘手的问题就像股票市场的身体里长的一个毒瘤。由于它能够将毒素扩散传输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不局限于现在所处的位置，所以无疑还需要一次娴熟的手术治疗，以预防由此导致的感染。

股票市场今天下挫，好像有人预先安排好了似的，现有情况表明，看来这样的姿态还将占主流，以平息范德比尔特先生带来的震荡。尽管价格有一定的下挫，但作为对范德比尔特这位美国金融队伍的大将军的最佳悼念方式，这还远远不够。然而，确凿无疑的是大量卖出的都是那些长期股票，它们在行市看涨的时候被买进，现在持有者因为害怕而想抛售，很显然，空头中买进者要显著多于卖出者，以便对前几天已经抛空的股票进行交割。考虑到范德比尔特先生去世所造成的实力损失，我认为此次市场的反应实际上还没有达到预期的那样大；此外，必须记住，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交易量很大，它表示现在参与股票市场的炒股者非常之多，已经浮现出了股票市场现在是多人参与这一特点，而以前则是单人市场，在此多人市场的情况下，失去任何一个再重要的人物，或五六个这样的人，或者死亡或以其他方式离开，现在都不可能给华尔街带来任何太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我一再说过，这个市场现在完全可以看做是世界市场，任何一个重要人物都不可能对其产生恒久的影响和伤害。正如尽管范德比尔特先生发明了固定股票价格的股票，但如果有人在战略部署规划方面胜他一筹，而他仍然原地不动，那么他也会因此痛失良机。我支持这个观点，既然范德比尔特先生已经不在尘世了，古尔德先生离开华尔街的计划就需要修改了，至少他还需要在舵手的位置上再逗留多一点时间。这样一个事件，证明了决定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华尔街的多头们，他们认为至少在过去一年古尔德先生有神人相助。对于他们而言，古尔德先生证实是一位勇敢和能干的领袖，现在他显然已经统领了各分支的力量，没有任何人对此有何置疑。这就足以激发他的抱负，并让他保持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或许可以这样。

关于威廉·范德比尔特，有一种比较普遍的错误印象，就是认为他对美术

没有鉴赏力，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在公众的心里还根深蒂固，只有少数非常了解他的人，以及他拜访过的著名画家除外。从这些著名画家手中，他收购了很多艺术品，并把它们装饰在第五大道的宫殿大画廊中，现在由他最小的儿子乔治照看。范德比尔特先生非常熟悉真正的艺术作品，他对这些艺术作品的理解广泛地得到了最高权威的认可。我很清楚，就在几年之前，这样的说法是会遭到大多数新闻报纸的讥讽的；但是，范德比尔特先生从来不购买任何一幅以他那种简单淳朴的鉴赏方式所不能理解的作品。他可能没有最高的想象力，难以跟上艺术家诗意般的想象，但是，他完全能够从一个常识的角度把握所有的实质内涵。

他没有假装热爱艺术，当一幅优秀的艺术作品展现在他的眼前时，他习惯说：“它可能是一幅很好的艺术作品，但是，除非我能够理解它好在哪里，否则我不会买它。”

关于他的谦虚和判断力，关于他对艺术品本质的忠实，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讲的是他去拜访宝诗龙（Boucheron），一位法国的艺术品经销商，他想去看特鲁瓦翁的作品，并把它买下来。作品的主题是一对公牛挣脱犁耙逃离耕田。专家们对于牛逃离耕田的做法很不满意，于是，问范德比尔特先生对此的看法，他说：“我对于这幅作品质量的了解程度，不如我对牛行为的理解程度。我数百次地看到过它们这样做。”在场的专家信服了他的判断，因为他比他们更了解牛。在法国的时候，他在枫丹白露拜访了著名的罗萨·博纳尔（Rosa Bonheur），她和他大概差不多大，他向她定购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令他十分满意。他让著名的画家梅索尼耶给他画肖像，总共 7 幅画将近 20 万美元。他在德国以 4 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位艺术家最伟大的一幅作品，“消息——德泽将军和被俘虏的农夫”，这令梅索尼耶大吃一惊，他已经多年未见到这幅作品，心里无限喜悦的画家对于他从德国人那里救回作品并带到美国的行为充满了无尽的感激。

范德比尔特先生对于音乐，尤其是戏剧的品位非常之高，他对于幽默有非常敏感的领悟力。

尽管他拥有的钱比任何一位名流都多，但范德比尔特先生及其任何一位家庭成员，都不曾表现出对结交社会名流的任何渴望之情。1883 年 3 月，在曼德维尔女士的建议下，威廉·范德比尔特夫人举办了一场著名的化妆晚会，这场晚

会似乎起到了恢复范德比尔特家族在上流社会中的社会地位的作用，让这个家族置身于这个社会阶层的顶端，即所谓的纽约精英社会。就晚会的花销、服装的华丽和新闻界的名流而论，这场晚会在历史上可算是绝无仅有的。它可能比不上巴比伦的亚历山大大帝的筵席昂贵，可能比不上克利奥帕特拉^①给奥古斯塔斯和马克·安东尼的款待高贵，可能比不上路易十四的宴会盛大，但是从每一个主要方面来看，考虑现代文明因素，我会毫不犹豫地，范德比尔特的晚会胜出了上面提到的历史上任何一次著名的节庆盛典。在这里，没有古代旧式贵族中流行的并在美国“社会中坚分子”中不断涌现的那种奢华淫欲。晚会还促成了阿斯特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社交联盟。两者的友好谅解是这样达到的。

在举办晚会之前的几周，威廉·阿斯特夫人的女儿卡瑞·阿斯特组织了一个化妆的夸德里尔舞，准备要在这个晚会上表演。看样子，范德比尔特夫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当着几个朋友的面说，看到阿斯特小姐这样卖力，她非常抱歉，因为考虑到阿斯特夫人从来没有邀请过她，所以她也不能邀请阿斯特小姐参加这次的晚会。这句话传到了阿斯特夫人耳中，她放下了自己庄严的架子，为此拜访了范德比尔特夫人，以一种风度雍容的方式为她以往的疏忽表示道歉。就这样，阿斯特一家被范德比尔特夫人热心地邀请到这次的化妆晚会，晚会上，阿斯特小姐表演了她排演好的夸德里尔舞。

范德比尔特先生的话题只要一转到他所喜爱的马，就会心无旁骛了。只要有人（他总是其中一员）在谈论骑马，他的舌头就会立即放松，变得如鱼得水，健谈起来。尽管，他总体上看不太爱说话，言辞也比较谨慎，但一旦话题是骑马，他就会变得像昌西·迪普^②那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起来。他不停地赞叹马的奔跑速度，就像肯塔基的老约翰·哈珀（John Harper）一样，他还似乎有阿拉伯人那样的嗜好，如果不是害怕新闻批评他怪异，他可能会和马睡在一起。正是他，引入了快马组合的风俗，他的第一个快马组合是父亲买的小侯普和他自己买的马金诺。这支快马组合拉着一辆顶尖的四轮马车，当时就取得了一个很出色的成绩 2.2325。

① 克利奥帕特拉，古埃及的女王，即埃及艳后。——译者注

② 昌西·米切尔·迪普（1834—1928），美国律师、铁路行政官和政治家，因其作为演讲者的机智和魅力而著称。——译者注

赛马队很快就出现了，其中的弗兰克·沃克先生（Frank Work）最为厉害。范德比尔特先生获得了一对更快的组合——爱尔丹和阿里·罗斯，在竞争的刺激下，将时间削减到 2.165。然而，沃克先生是一位勇敢、顽固的竞争对手，他很快就打破了这个纪录，几乎是毫秒之差，但这个差距在赛马或跑步当中就像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差。范德比尔特先生于是花了 21 000 美元在肯塔基买下了有名的玛蒂·S，它和爱尔丹组合，1883 年 6 月在弗利特伍德 1 英里的纪录为 2.155。

他后来又将这个时间缩短为 2.0875，将沃克先生和其他竞争对手绝望地远远甩在后面。最后，他将玛蒂·S 以 40 000 美元的相对低价卖给了罗伯特·邦纳，他答应不再让它参加赛马比赛赚钱了。而另外一个人则出了 100 000 美元，但是不接受这个条件。

同年的 8 月 12 日，职业赛马骑师墨菲在塔里顿的一次单马赛跑中骑着玛蒂·S 达到了 1 英里 2.105 的速度，并宣称他没有给它压力。他说他有信心将纪录改写到 1 英里 2.06 或 2.07 的速度，从而打破所有赛马的纪录，只要邦纳先生允许他这样做。

据专家称，范德比尔特先生是美国最佳的双马组合骑师，包括所有职业骑师或业余骑师。

范德比尔特先生的馈赠也非常慷慨而且次数众多。他在父亲馈赠的 100 万美元的基础上增加了 30 万美元，通过船长的妻子和大夫蒂姆斯，捐赠给了纳什维尔大学。他捐了 50 万美元给医科大学，他的姊妹斯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25 万美元。他花了 10 多万美元，将克利奥帕特拉之针从埃及搬到中央公园。他主动取消了给格兰特将军的 15 万美元支票借据，帮助他脱离了窘迫的困境，他给予白山（White Mountains）的服务员学生们的慷慨礼物将长久铭刻于这些被接济的心灵。

范德比尔特先生非常勇敢，事实证明无论收到多少恐吓信件，无论对方是多大来头，还是狂热分子，他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一封恐吓信改变自己的工作计划或日程安排，任何时刻他该在哪里就会出现在哪里，从来都不会因为任何一封恐吓信而改变。但是，他对于公众舆论特别敏感，他会想方设法改变公众对他和他的巨额财富的草率看法。

这种敏感，加上他对于公众反对垄断的观点的尊重，促使他于 1879 年以

低于市价 10 个百分点，按每股 120 ~ 130 美元的价格，将手头占有的纽约中央铁路的某控股公司总 40 万股中的 30 万股股票卖给了某辛迪加，这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是德克森·摩根公司、莫顿·布利斯公司、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温斯洛·兰尼尔公司、L. 范霍夫曼公司、赛勒斯 W. 费尔德、埃德温 D. 摩根、鲁赛尔·塞吉、杰伊·古尔德和伦敦的 J. S. 摩根公司。这只股票共支付的金额为 3 500 万美元。由于这个辛迪加主要代表的是沃巴什铁路系统，该资产的股票以及纽约中央铁路，都还有重大的提升空间。

此次史无前例的巨额股票交易发生的原因，用昌西·迪普的话可以简练地归纳为：“范德比尔特先生，鉴于议会和报纸的压力，得出结论认为，单独一个人控制像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这样一个大公司是一个错误，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筐中同样是一个错误，他认为出于他本人和公司的考虑，公司的所有权越分散越好。后来，他在辛迪加那里卖了这只股票，这只股票从而成为了美国分红有价证券中分布最广的一支股票，现在约有 14 000 股民，而在他卖出的时候，股民人数只有 3 000 人。”

范德比尔特先生在一次接受芝加哥报纸的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非常草率的话，“公众，见鬼。”这句话被广泛流传，遭到了各种评论和敌意的指责。尽管这句话在语法上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对于这句话中潜藏的含义还是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这句话让范德比尔特先生显得像一位蔑视公众舆论的暴虐的垄断者。但是，只要真实、简单地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就足以消除这个误解。他们争论的对象是开往芝加哥的邮递快列。范德比尔特先生正在考虑取消这辆快列，因为它不能盈利，因此在他看来这辆快列是没有存在价值的，他并不打算像一位慈善家那样来经营铁路。由于报道这句话的那次采访有着广泛的历史意义，我想在这里逐字地复述一下他们当时的对话：

“您为什么要取消这辆邮递快列？”记者问道。

“因为它不能盈利，”范德比尔特先生回答到，“我不能总是亏损来经营这样一列快车。”

“但是，公众认为这样做非常方便，非常有用。您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记者说到。

“公众，”范德比尔特先生说。“您如何知道，或者说我如何知道，他们就需要这辆快列呢？如果他们需要的话，为什么他们不来光顾，让这辆快列能经

营下去呢？这是我评判一辆车次是否有必要存在下去的唯一准绳。它盈利吗？如果不盈利，我就认为它没有必要存在下去了。”

“您是为公众服务或为您的股东服务吗？”记者坚持道。

“公众，见鬼！”范德比尔特先生激动地说，“我为我的股东服务。如果公众需要这辆快列，那为什么他们不来支持？”

我认为，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恰当的回答，其表达方式，如果联系当时真实的语境，并没有任何蔑视公众的含义。它只是直白地说明了他在敦促结束一件对于公众来说并不需要和实际上拒绝的事情。这句“咒语”本不应当特别关注，但是，这句关键的话对于记者来说，可能显得没有同情心，这句对公众舆论的冒犯之辞，本来并非是有为之，然而，由于他和编辑具有杰出的篡改歪曲才能，范德比尔特先生的话遭到了曲解，因此，这句话流传的范围比它们最初发行时还广，给这份报纸赚了大笔的广告费。这就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公众，见鬼！”的真实含义。

斯特登岛新村的陵墓是威廉·范德比尔特先生天才的另外一个显露。理查德·亨特（Richard M. Hunt）是一位建筑师。根据范德比尔特先生的指示，陵墓没有任何奇异的装饰，但是，同时就其宏大的规模来看，据说就结构的坚固和设计的宏伟来看，在欧洲和东方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能出其右。它40英尺^①高，60英尺宽，大约150英尺深。陵墓坐落在一个能最大范围鸟瞰海湾的高地上，能最清晰地观察到纽约州的全貌。这座陵墓和它坐落的21英亩^②的高地，大约花费了50万美元，地基完工时，风格即已显露出来，美丽的公路和人行道都已建成，花园里种满了各式鲜花，整个陵墓和周围的配套花费不下100万美元。

为了防止有人掘墓，范德比尔特家族采取了有史以来可能是最为安全的防范措施。陵墓终日有人看守。每15分钟就要闹一次铃，看守人就要做一次纪录，然后，每天早上送往位于中央大车站的办公室。

1883年5月，范德比尔特先生感觉到铁路的事务有些让他不堪重负，就辞去了中央铁路总裁的职位，到欧洲去旅行。詹姆斯·布特（James H. Butter）

① 1英寸=0.3048米。

② 1英亩=4 046.86平方米。

被选任中央铁路公司的总裁，他去世之后，由昌西·迪普继任。昌西·迪普是现任总裁，他做得非常出色。大约在去世之前的一年，范德比尔特先生停止驾驭快马组合，不再和其他人驾车出游时，就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他肯定敏锐地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虚弱，此时，他被迫放弃了自己强烈想要把握并驾轻就熟的大权。

范德比尔特先生的去世令世人震惊，尤其是华尔街人，因为很少有人意识到范德比尔特先生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885年12月8日，他很早起床，没有感觉到病情比一年前有所加重。他去沃德（J. Q. A. Ward）的画室，就医科大学理事会所定购的青铜半身像与之交谈。大约在1点钟的时候，迪普先生拜访他，结果发现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总裁罗伯特·加瑞特（Robert Garrett）先生也过来拜访范德比尔特先生，迪普先生为此放弃了拜访范德比尔特先生的机会。加瑞特先生在谈论他经由斯特登岛，跨越亚瑟·吉尔（Arthur Kill）进入纽约的设想。他们正在研究问题。范德比尔特先生坐在他的大扶手椅上，加瑞特先生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看起来，范德比尔特先生非常赞同他的计划。当他回答加瑞特先生的问题时，加瑞特先生发现他的声音停下来了，他的嘴角肌肉很奇怪地抽搐，很快他停止了说话和抽搐。一会儿工夫，他就向前倒下来，脸就要摔到地面，加瑞特先生抓住他的手臂，轻轻地靠在扶手上，把枕头搁在他的头下。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而这一切结束的时候，这位美国最伟大的百万富翁停止了呼吸。当家庭医生麦克林大夫到场的时候，他说范德比尔特先生已经去世，死因是他头上的血管已经破裂，就像范德比尔特先生经常念叨的那样，生命无常，转瞬即逝。

宣布范德比尔特先生逝世消息的那天，（在董事会后）股市预期会出现恐慌。华尔街最富有的几位主要股市操盘手联合坐庄，斥资1200万美元来抵御此次灾难。然而，并没有人要求这样做。在接下来的早上，出现了小幅反应，但在市场结束交易之前即已恢复。范德比尔特先生的股票及资产已经处理得非常之好，正因为如此，才得以在无需外部联合坐庄的帮助下（实际上更盛行的是落井下石，朝向相反方向的投机），得以躲过一劫。范德比尔特先生的遗体被运送到新村，毫不张扬地埋葬在陵墓中。

在有关年轻的范德比尔特们的章节中，大概算了一下，他们继承了2亿美元的巨额财产。

第 22 章

Chapter 22

“小柯尼尔”

科尼利厄斯·耶利米·范德比爾特的怪癖和他借錢的强大能力 ◆ 他对于格里利和柯尔法克斯有巨大的影响 ◆ 与小柯尼尔和著名的斯凯勒共进晚餐 ◆ 柯尼尔试图与杰伊·库克交好 ◆ 船长拒绝给格里利钱 ◆ “谁问你要了？”格里利反唇相讥 ◆ 柯尼尔娶到了一位热情、迷人的妻子 ◆ 她是如何感化这位顽固不化的父亲的

科尼利厄斯·耶利米·范德比爾特是威廉·范德比爾特的兄弟，人们常称他为“小柯尼尔”。科尼利厄斯·耶利米·范德比爾特之所以在这本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是因为他在我的很多金融界朋友中有其非常独到的一面。

柯尼尔是个怪人，他有一些非常奇怪的怪癖，这些怪癖以他的方式成就了他的天才。

他很擅长惹麻烦，老是指望其父——范德比爾特船长来搭救他，船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确实会这样做。当然，拥有这样一位父亲这个事实本身往往就能帮助他脱离困境，而无需船长大人亲自动手。柯尼尔就这样过着极尽奢华的轻松营生，结果很快千金散尽。但是，他还是继续没有节制地结交新朋友，而对于很多的新朋友来说，船长的大名就足以保证小柯尼尔各名目借款的安全性。小柯尼尔对这些新朋友的承诺是在办好某某事之后就还钱，但是这等美事只存在于这些借錢者的想象当中。

对于柯尼尔，仅仅依赖父亲，或父亲名头的银行还是不够安全。如果他完全倚靠父亲，那么他往往会感觉到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所倚靠的就像是一根柳条。柯尼尔有着煽动著名人物耳朵的特殊天赋，这些人会留意倾听他讲的悲惨故事，有些人则完全被他的游说所打动，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解救他于窘迫的困境当中。

这些可怜的施舍，很不幸，本来应该用来支付他的膳宿支出，却往往在这位借款者路经的第一个赌场挥霍一空，而女房东和洗衣妇们就只能无尽地等待。

在他已习惯施展哄骗功夫的这些特殊朋友当中，有斯凯勒·柯尔法克斯 (Schuyler Colfax) 和贺瑞斯·格里利 (Horace Greeley)。这两位著名的绅士似乎被他牢牢地控制住了。在他神秘的力量昭示下，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很少对他的任何请求说“不”，尤其是当他要借钱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巫师能够这样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猎物，当他向他们诉说自己承受父亲和哥哥种种假想的不公正的时候，他所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力量，无任何神秘的魔法棒可以与之对抗。在他们的耳中，这些故事永远都不会过时，尽管每次都是同样的故事，几乎没有指望任何变动。对于他们和其他一些受牵制的人来说，他复述故事不像其他普通人重复诉说一个故事那样单调。

对于智力一般，能力一般的人来说，柯尼尔是一个极端令人讨厌，受抑郁症困扰的人，但是对于那些天才们来说，他们被柯尼尔制造的假象所骗倒，对他虚构的受害者幻觉充满了最深刻的同情。与很多借钱不还的人不同，他并不因为还不起钱而信用受损，相反，他以此为基础，变本加厉，还不起钱似乎成为他继续借更多钱的有效借口。因此，他光欠格里利先生的钱一直累计到了5万多美元。

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对我说过，格里利先生去世之后的好几年时间，柯尼尔还偶尔会坐在那里沉思，泪水盈眶，尤其是在遇到经济吃紧的时候，他唉声叹气地说：“格里利先生去世的那天，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然而，说到他的信用，除了这种种缺点外，他还是表现得非常诚实，他将所欠的每一分钱，连带利息，都还给了格里利先生的女儿们。待与威廉结算之后，他获得了比父亲遗留给他的遗产还要更多的资产。父亲只是遗留给他的足以过上适合他的阶层和身份的一笔资产，并没有更多用于赌博和奢华的钱财。用这些钱，他还清

了在同样窘迫的情况下，所欠的所有其他人的债务，其所支付的金额甚至还超过了债务的总金额。

柯尼尔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一个令他成为成功的借债者的特点，就是他非常热心。他倾注所有精力于手头的事情，他的请求往往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如果他能够将同样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合法投机，那么 he 可以和父亲或者杰伊·古尔德一样成功。他肯定有看人面相的直觉，因为他似乎总能预先知道对方能给他借债。这方面他就像那位有名的猎人，百发百中。

我第一次结识柯尼尔是通过他的一位特殊朋友，斯凯勒·柯尔法克斯。当时柯尼尔由柯尔法克斯带领来到我的办公室，柯尼尔的目的是想让柯尔法克斯给他引见。他告诉我说他刚从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回来，他带朋友柯尔法克斯先生在他的家中玩了一周时间。因此，可以很容易推断出，当时柯尔法克斯先生对于自己的银行账户只有很少的控制权，此后一直是这样。

当天下午，我请这两位绅士在俱乐部吃饭。尽管柯尔法克斯先生本人口才也非常好，但他依然被甩在一边，而几乎让柯尼尔独占了话锋。然而，柯尼尔所说的大部分话很少有具体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在毫不吝啬地夸奖他的朋友柯尔法克斯先生。如果有人能够吹牛吹到天上去，或者说这种事情可能发生，那么柯尔法克斯先生在饭桌上就真正要飘飘然了。

这种毫无遮拦的谄媚似乎没完没了，毫无减弱的趋势，但是，我必须说，如此洋洋洒洒的虚伪恭维话似乎并没有碰壁，斯凯勒就像品尝一道点心，对此非常受用，似乎如此恭维丝毫不为过，它只是证明了小柯尼尔毫无疑问是他的人。它进一步展示了柯尼尔天性聪慧，能打动这位斯凯勒，向其成功地施加他独特的游说魅力。

当他谈论柯尔法克斯先生疲倦了的时候，下一个谈论的主题就是格里利先生，他对格里利先生赞誉有加。

此后，我经常碰到格里利先生，并告诉他说他有一位叫做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特的非常不错年轻朋友。他会意地笑着说：“是的，我认为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一直听到他说我的好话。但是，很遗憾，”他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他太缺钱了。如果他有更多的钱，那么他会是一位好小伙。”

正是上面提到的方式，他抢在格里利先生之前，利用了他的善良天性。他会对所有那些可能向格里利先生提到他的人说一番格里利先生的好处，从而

为他进一步的借债铺平道路。在柯尼尔称他为可靠、可信赖的朋友之后的几天，他屡试不爽地可以获得所需要的救济或更多一些的东西。

柯尼尔在发掘各种借债资源方面非常有天赋，他对此充满热情，有更好的动因。在拜访我的办公室之后的第二天，他再次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他的朋友柯尔法克斯先生已经坐早上的火车回华盛顿了，他邀请他同往，但是，由于他有事所以不能前往，所以他将出发时间推迟到当天晚上的火车。

他对我说：“顺便问一下，您很了解杰伊·库克吧？”

我说：“是的。”

接着，他说：“我和财政部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我想他可以帮助我。您能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吗？我也许并不一定用到它，”不过，他又用冷静的职业口吻补了一句，“但是，我希望我能在需要的时候用的上。”

我给他写了一封简短、不承担责任的介绍信，大概像下面这样：

兹向您介绍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先生，船长的小儿子。在他的请求下，我冒昧地介绍您们通过这种方式结识彼此。

您真诚的朋友

亨利·克卢斯

表面上，除了船长的名字，这个文档上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可以证明一个人的品性，让他兹以证明其信用。

但是，金融天才小柯尼尔还是完成了间接地证明自己信用的任务，几天之后，杰伊·库克给他寄过来的银行汇票开始像春雨般时停时歇地落到我的办公室。每一笔汇款的金额都不是很大，但是，累计在一起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正是因为汇款绵绵不断，所以如果不发电报给库克先生让其停止汇款的话，很难说这笔汇款还要累积到多少。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柯尼尔是在朗布兰奇，那是一个晴朗暖和的下午，他带着我在那里驱车游玩。他动情地诉说着他挥霍的生活，说多亏很多朋友常常过来帮助他，将他从无数的陷阱中拯救出来，要不是他们，他早就不幸地陷入这些陷阱而不能自拔了。他认为生命的延续对于他并没有很大的魅力，他说他希望这辈子剩下的一段时间足够长，使他能够清偿这些积欠就够了，他对此的态度非常坚决。必须指出的是，他最终确实完成了这项还债的任务，此后，了无

牵挂，哀伤地躺在地上，自己动手结束了生命。

现在，让我们带着仁慈的心，回顾一下那场发生在格林汉姆饭店的悲剧，但愿他的灵魂能够超越他那可怜的、饱受折磨的躯体，寻找到一个安息之所。

船长的遗言中有关科尼利厄斯的部分，完全显示了这位老人的特色，相关条款极其刻板严厉。他遗言上的这部分条款是这样写的：“我指示单独拿出200 000美元，这200 000美元债券所产生的利息将用于维系和支持我的儿子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一生的生计。我授权上述遗产托管人，除了上述条款之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将上述的利息转给他的赡养者，不时给予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赡养者他们认为适当的部分或全部上述债券的利息。但是，这些利息不能给予我儿子的任何受让人，或那些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同样受让权的任何借债人；如果我儿子要让渡或分配由上述债券的受益利息或由此产生的相关利益，或负有这样的责任，或试图这样做，那么上述债券的上述利息将从此停止为他所用，并在他以后的有生之年里，属于我其他的遗产继承人。待儿子科尼利厄斯去世，上述的200 000美元将遗留给我其他的遗产继承人。”

尽管这部分遗言的条款相当古怪，但是它的设计可以很好地迫使柯尼尔抵御其挥之难去的恶习，赌博。

如果允许遗产托管人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任何一期支付他全部的利息，那么如果他要通过预支他将来的收入，来偿还他现在和迫切的需要，那么这位受益人如果一下子挥霍掉，情况就严重了。这个条款表明船长至死都认为柯尼尔不适合像其他孩子那样对待，而是需要放在哥哥的监护之下。

这极大地伤害了柯尼尔的感情，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智力上比威廉还高出一筹。然而，现在没有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了，除了格里利和柯尔法克斯。

柯尼尔虽然总是指责父亲的铁石心肠，但他还是非常崇拜他父亲的能力，只要有人说一句诋毁父亲的话，他就会像向日葵花一样敏感。尽管他时常抱怨父亲的吝啬，但他还是一个虔诚的父亲英雄崇拜论者，就像托马斯·卡莱尔^①曾经推崇他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一样，他不知疲倦地到处宣讲父亲的业绩，对于这段历史他耳熟能详。对于古尔德和菲斯科，他甚至比他的父亲还要憎恶，他坚信古尔德和菲斯科在伊利垄断案的投机中想合谋暗杀自己的老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是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译者注

父亲。

当然，这只是他无数幻想中的一个，毫无根据可言，但是他却无法从脑海中消除这种错觉，他不能容忍任何与之相反的观点，就像很多在他病态心理中已经固化了的观念一样。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试图和他推理像古尔德这样的一位大人物是不可能去涉险谋杀的，结果他当时就癫痫病发作。

他永远都不会原谅父亲把他绑起来，关在布鲁明戴尔的精神病院。他在淘金热的时代曾经去往加利福尼亚，就像水手一样出海。他那时候才18岁。很快，他就回来，因为他不能适应黄金海岸争夺财富的激烈体力和脑力竞争。父亲扣留下他，结果发现他并没有精神病，只是可能有些行为古怪，于是就被放了出来，但是，他却把这件事牢牢记在心上，造成了他未来生活的抑郁和消沉。他脾气暴躁，还爱发牢骚，他就像个疯子，任何一位亲近的朋友越是想取悦于他，他越是难过，但是，和他相处如果不迎合迁就他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他就能给他最坚强的朋友们施加影响，结果近墨者黑，他们都陷入了像他一样恶劣的状态。

要想取悦这位古怪的病人，斯威奇医生的耐心往往要经受严格的考验。

在赌场以外，柯尼尔是个吝啬之人，他可以以极大的耐性坚持1美分的利益，就像平常人在10美元的利益之争时一样坚持。但是，在赌场当中，别说10美元，100美元他也不放在眼里，就像平常人过日子花掉1美分一样。法罗^①和基诺^②对他有强大的魔力。经常可以发现他在赌桌上癫痫病发作，此后就像一场死亡之觉，此时的他就像死尸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又醒来继续打牌。面对打牌的强烈嗜好，他似乎无力抵御只有沉溺。

当消息传到船长的耳朵，说格里利一直在借给儿子数百美元，有时候数千美元的时候，他不请自到，拜访了《论坛报》的办公室。他不拘礼节地直接闯进格里利的书房，格里利正在书桌上苦思冥想构思一份抨击某些政治或社会弊端的长篇演讲稿，船长直接质问这位查帕阔圣人（Sage of Chappaqua）：“格里利，我听说您把钱借给了柯尼尔。”“是的，”格里利透过眼睛片，用睿智而又夹杂着一丝同情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船王，说，“我借给了他一点钱。”

① 法罗是一种牌戏，游戏者对庄家一组牌中的顶张下赌注。——译者注

② 基诺是一种赌博游戏，与抽数码游戏类似，只是用计算机代替球。——译者注

“我给您一个忠告，”船长说，“您不用看着我，我不会还您钱的。”“谁问您要钱了？”格里利反唇相讥，“我问了吗？”

这场会面就这样结束了。船长从这个摇摇晃晃的楼梯上折身退出，去了斯普鲁斯大街，而格里利则继续用潦草的笔迹笔耕不辍。我想他们之间关于这个问题再也没有什么交流。格里利去世后不久，船长就给了他两个女儿一人1万美元。

船长很满意小柯尼尔和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威廉小姐的婚事，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从此开始崭新的生活，但是他注定要以失望告终。

关于他们婚前，船长和威廉小姐的会面有这样一个故事。

威廉小姐的父亲威廉先生到百老汇旁边第4大街船长的办公室拜访船长，他告诉船长说，他的儿子科尼利厄斯·耶利米已经向自己的女儿求婚，如果船长不反对的话，她愿意接受。

“您女儿有足够的绸缎衣服穿吗？”船长直截了当地问道。

“哦，”威廉先生显得对此有些敏感，他感觉船长有些高高在上，以富傲人，他说，“我告诉您，我女儿没有什么钱。她有一些像她这样身份的其他女孩子同样的衣服，但是她的衣橱既不宽敞，也不昂贵。”

“您女儿有足够的首饰戴吗？”船长继续说道，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威廉先生的解释。

“没有，先生，”威廉先生回答道，他开始感觉有些生气，他鼓足了可贵的傲气，反对他认为是在玷污自己平凡生活的质问，说：“我想向您说清楚，我们家境相对清贫，我女儿的确买不起首饰。”

“我之所以这样问您，”船长继续说道，“是因为如果她拥有这些昂贵的东西，那么我的儿子会把它们拿走，或者当掉或者卖掉，然后把钱扔到赌桌上。因此，我预先警告您和您的女儿，我对于此类事情概不负责。”

然而，尽管船长说了这些富于建设性的抱怨，婚事还是适时圆满举行了。

婚后，柯尼尔问父亲要钱建房子。“不，柯尼尔，”他同情地说，“你必须在我信任你之前，首先向我证明你值得信任。”

柯尼尔的妻子则较成功地向她的公公借到了这笔钱。船长给了她1万美元的支票。几个月之后，她再次来探望船长。船长很热心地接待了她，但船长预期她一定是再来借债的，因此试图酝酿着鼓足勇气来拒绝。因为尽管船长在生

活中表现得很坚强，甚至是冥顽不化，但是在这位漂亮的异性面前，船长就像剪掉头发的参孙（Samson）那样脆弱，就像换了一个人。

“噢，”船长说，他向儿媳致以一个亲切的微笑，“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爸爸，”她非常坦诚、爽快地说，“我们没有花掉所有钱，所以我给您送回剩下的1 500美元。”

船长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那片刻间，他还以为自己一定是在宗教集会上被施了魔法，那时候他常常去那种地方。但是，当钱放在他手上的时候，他发现这钱是真的。这件事为他和那可敬、节俭的儿媳之间奠定了温暖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维持到儿媳去世，儿媳在自己丈夫去世之前10年就过早地逝去。

有些人同情小柯尼尔，是因为他的病态或狂妄的性格，就像是他自己的疾病一样。在他向公众抱怨自己的贫寒，谴责这位老人的吝啬的同时，他每周要从父亲那里拿200美元。他的生活本应该宽裕，不仅能满足所有的基本生活所需，而且若能加以管理，还可以买得起很多奢侈品。

由于他好赌成性，如果父亲真的给了他7 500万~1亿美元；这将不仅不能令他在物质上有任何改善，而且还会变得更糟。

因此，船长将自己浪荡儿子的开销限制为每周200美元，这样的做法不仅是考虑周详；而且对儿子和整个社会都大有裨益。

第 23 章

Chapter 23

德鲁和范德比尔特

范德比尔特试图控制伊利公司，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抉择 ◆ 他竭力想迫使德鲁金融自杀 ◆ 同时操纵证券市场和法庭 ◆ 试图控制和制约德鲁 ◆ 伊利旗下的造纸厂和印刷厂自行制作了股票债券 ◆ 菲斯科窃取了账本并避开了法律的禁令 ◆ 德鲁向股票市场投放了 50 000 股的股票，范德比尔特受挫 ◆ “垄断梦”破碎，范德比尔特自食其果 ◆ 范德比尔特无比愤怒 ◆ 出于愤怒，他向法院提出起诉 ◆ 伊利派极不光彩地飞往泽西市 ◆ 德鲁背着范德比尔特的 7 000 000 美元穿过渡口 ◆ 范德比尔特试图与这些避难者联系 ◆ 一个侦探用钱买通“泰勒饭店”的一个服务生，替范德比尔特送信给德鲁，德鲁见信后过来谈判 ◆ 参议员马顿得到了两个派系的贿赂

在伊利事件显得有些轰动一时的那段历史中，与德鲁的投机活动有关的最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范德比尔特船长插手伊利公司的一次著名的集团交易。他的目标是控制伊利公司，结果却差一点把自己给搭上。经过一生中最漫长、最令人绝望的挣扎，他总算涉险过关。

为了解释清楚范德比尔特在“伊利事件”中是如何处理他与德鲁及其合作者之间关系的，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他所经手的另外一些著名的交易，有关更详细的内容在其他章节中有所介绍。

1860 年，哈莱姆铁路股票卖价还很低，每股价格仅为 8 美元或者 9 美元。

但是，到了1863年1月，当范德比特全面控制了哈莱姆铁路所有权以后，该股票股价上升到每股30美元，在同年的7月，该股票更是一路走高，一跃到了每股92美元。由于“垄断”效应的作用，到8月，哈莱姆铁路股票的价格更是涨到了每股179美元的畸高值。

次年，通过类似的操作，在1月时卖价还低于90美元的一只股票，在接下来的6月中却以每股285美元交割。德鲁参与了其中的一次交易，他的损失将近100万美元。

范德比特所持哈莱姆铁路股票的前景受到竞争对手胡德森河铁路的严重威胁。于是，他便通过买断对方竞争线路的股票来达到消灭竞争的目的。他是待到股票的价格与票面价格持平购买的。他很快便证明了在管理方面的超常能力，而且发明并显示出娴熟的“股票掺水”艺术^①，在短短的一段时间中，这只股票的价格上升到了每股180美元。

看到范德比特运用自己新奇、独特的金融策略，在过去两家公司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纽约中央铁路的管理层认识到“不知进退非真勇”，他们感觉到自己不能长久地抵御同样的命运安排，于是就把公司转让给范德比特，转让价格几乎是范德比特单方决定的，这一价格范德比特是非常诚挚地接受的，以充分肯定他们的良好判断力和敏锐感知力。

1867年年初，范德比特全面控制了纽约中央铁路。这三大铁路公司的合并完成以后，他那不知满足的欲望投向了伊利铁路。他试图通过精心设计的方案，来实现他意图通过华尔街投机机器，来获得伊利铁路所有权的目的。

他正是这样获得了胡德森铁路的控制权，全然不顾“闪电不会在同样的地点击中两次”这样的科学箴言。他对自己的能力太过自信，决意运用相同的手段，抢先对伊利公司下手。他首先尝试运用了制裁和并购的方法，但是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在股市中那神奇的预见能力和几乎无可挑剔的判断力，范德比特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在伊利铁路中所发起攻势的猛烈程度。他

^① 这里说范德比特发明了“股票掺水”操作艺术，与前文所说“股票掺水”源于德鲁的首次应用有点相互矛盾。——译者注

没有料想到当股市投机战自发地破土而出，越演越烈时，股票成交量会如此之大。其来势之凶猛，就宛如当年滑铁卢之战白热化时，拿破仑眼中惠灵顿后备军的那种势不可当的锐气^①。他还必须跟那些一直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投机商和金融界精英们相对抗。他第一次大胆的侧翼行动是试图以“垄断”逼德鲁就范。他像伊利集团一样懂得如何去操纵法庭。因此，他利用弗兰克·沃克获得了法官巴纳德的一道指令，利用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团阻止德鲁支付 350 万美元债券的利息，进而又对其作为伊利财务总监的资产账户进行了调查。几天后，法庭又有一项要求调查该财务总监从公司撤资的书面申请。

范德比尔特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其目的是想通过阻止 350 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被转换成股票，从而便于他在股票市场上取得垄断。因此，他借助法院之手，想逼迫德鲁陷入金融自杀（financial suicide）的困境。

通过下面的微妙手法，伊利集团成功地避开了法律，掩盖了公司股票和债券确实发行过量的事实。

纽约有个法令规定任何一家铁路运输公司都有权制作和发行自己的股票，来交换其所租赁的任何其他线路的股票。为了实施这个发行公司股票的计划，伊利集团获得了布法罗、布拉德福和匹兹堡这些相对价值较低的铁路。接着，伊利公司的管理层通过把旗下的线路出租给那些事实上由他们掌控的线路，来得到伊利铁路所需的股票发行量。接下来，他们在法律授权下，以交换的形式，自己印刷并发行了伊利铁路股票。

比如说，与他们合作变这个戏法的一条线路名义价值是 25 万美元，那么他们便以这条线路的名义发行 200 万美元的债券，并且债券所支付的受托人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在范德比尔特获得伊利铁路股票的垄断之前，他必须首先限制股票的发行量。否则，他垄断伊利铁路股票的想法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几百万美元就会打水漂。

① 拿破仑是个自信而又轻视敌人的人，他从未和惠灵顿交锋过，他相信惠灵顿不会在滑铁卢进行顽强抵抗。他期望一次进攻就能将惠灵顿赶下山脊，逼他后退，因此他根本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大规模的战斗。——译者注

范德比尔特船长要求德鲁将伊利公司 68 000 股资本金归还给财务部。据说这个量相当于伊利公司 1866 年未交割的交易额。这便是范德比尔特悬挂在德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①。

范德比尔特要玩儿一个双重游戏。他要同时操控法庭和证券市场，要跟这两方面的专家级人物，那些狡猾的对手们展开角逐。

当时在收购伊利公司方面有三个竞争对手，他们分别是德鲁所在的一方、范德比尔特所在的一方以及波士顿、哈特福德和伊利所在的一方。德鲁为了尽力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范德比尔特所施加的压力，在伊利董事会人员选举前，与范德比尔特在其私宅进行了一次密谈。他同意减轻对范德比尔特的压力，并给他在收购伊利公司方面更大的回旋余地。同时在另一方面，范德比尔特同意不再在法庭上提出对德鲁的法律诉讼。

在这之前，波士顿和范德比尔特已经协商好要把德鲁从董事会中驱逐出去。现在，范德比尔特改变了他的策略，他决定把德鲁留下来。但是，波士顿一方却似乎仍按先前的策略在行动。新的董事会选举表面上看没有了德鲁的份，但是不久又多出了个空位，德鲁又被吸纳到了董事会。之所以采取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是为了引开公众的注意力，这样有利于推进范德比尔特合并的目的。这个选举计划很成功，然而，尽管这个骗术构思巧妙，但还是远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标。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投机性交易。德鲁和范德比尔特秘密结盟，排挤范德比尔特原来的同盟波士顿。新的董事会选举出来，却没有了德鲁的位置，这让华尔街感到震惊；而更让华尔街感到震惊的是，第二天董事会里就制造了一个空缺，德鲁重新被选为伊利董事会成员。华尔街人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同时，波士顿方也四处探听，想了解其中的原委。出于范德比尔特的利益考虑，弗兰克·沃克被选入了伊利董事会。支撑伊利公司的董事会就这样形成了，此时的伊利公司处于一种士气低迷的状态。德鲁将负责管理整个董事会的运营，同时负责操控市场。

与范德比尔特合并的计划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因为伊利派说这个铁路大

① 达摩克利斯是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狄奥尼西奥斯的臣子，据传说，他被迫坐在上悬宝剑的餐桌旁，宝剑由一根头发系住，以此来暗示命运的多危。——译者注

亨只同意给他们分享利润的 1/3，而他们对公司的贡献却比董事会成员多一半以上。因此，当这个计划失败以后，范德比尔特决心继续投机之路，决定再次利用收购胡德森公司的手法从伊利集团手中夺过伊利铁路。他于 1868 年 2 月中旬开始采取行动。为了实现伊利铁路股票的垄断，他借助于法庭之手，试图控制似乎毫无节制的伊利公司股票发行量。

在前面提到，对布法罗、布拉德福和匹兹堡公司的租赁业务中，伊利派每年为公司增加了 140 000 美元收入。

此时，沃克先生又争取到了另一份禁令，这份禁令规定除此前线路报告中已经公开的 251 058 股之外，禁止伊利另外发行股票；规定还禁止伊利公司给任何其他线路债券做担保；德鲁则被禁止染指伊利公司的任何业务，直到他把 68 000 股的资本金归还了财务部为止。

由此，可以看出范德比尔特已经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来设法控制、制约德鲁这个投机老手。

这个案件定于 3 月 10 日在公正的巴纳德法官的法庭上开庭。尽管范德比尔特认为自己已安排好了一切，德鲁将被迫归还这些资本金并自行消亡，而范德比尔特就可以借此实现他的“垄断梦”，但没想到的是，他的美梦又被一个完全相反的法令给惊醒了。这个法令主要是站在伊利派利益的一面，由宾厄姆顿的法官波康签发，他终止了巴纳德法庭的所有诉讼进程。

随后，理查德·谢尔（Richard Schell）向法官英格拉汉姆请求，并获得了另一份有利于范德比尔特派的法令，先于法官波康中止所有的进程。

同时，伊利的董事们无视这一法令的存在，依然我行我素地忙着准备发行新股票，以防止当机会到来的时候，范德比尔特派的多头们可能会从伊利那里大赚一笔。

伊利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发行债券用于公司提升、拓展以及购买钢轨。这些债券可以不少于 72.5 美元的价格转换成股票。这些债券和股票中有 500 万股是由伊利的造纸厂和印刷厂制作的，它们将被用来与范德比尔特的货物和坚挺的现金纸币进行交换。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大难题出现了，这个大难题即便是对于大多数聪明的投机者来说也难以克服。于是，吉姆·菲斯科这个天才被伊利请来以铁腕手

法来解开这一戈尔迪难结^①。当时，伊利新的股份证书掌握在该公司的秘书手中，但他被禁止发行这些股票。早在星期六晚上，这些股份证书已经制作出来了。星期一，在位于西街的伊利公司办公室，这位秘书派了一名送信者把夹着证书的书送到杉树街的中转办公室。送信者拿过书就往外走。当他回来时，书没了，他显得精神恍惚，很显然是受到了惊吓。他说菲斯科先生当时已经站在门口，从他那里抢了证书就跑了！

此后，这些股份证书就待在没有禁令可以干涉它们的地方。第二天，秘书的桌面上发现了那些可转换债券。接下来的一两天，这些证书就在华尔街出现了。法官吉尔伯特发出命令，取消巴纳德法官以前的所有命令。这时，德鲁先生在证券市场上抛出 50 000 股伊利股票。这个大胆的举动令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从没想到德鲁会冒险藐视法庭，无视法律禁令使用新发行的伊利股票，所以他们在还没来得及检查它的质量或怀疑它的来源时就急切地把这个新鲜的诱饵吞了下去。

伊利股票的开盘价是 80 美元，后来又涨至 83 美元。当人们开始知道该股票一文不值这个事实时，它就跌到了 71 美元，但范德比尔特派继续大量购进该股票，使得股票价格很快又回升到 78 美元。然而，这个“垄断计划”被德鲁在证券市场上抛出的大量股票给打破了，范德比尔特很显然在此役中被打败了，他差一点全军覆没。这次垄断的结果让范德比尔特自食其果。一气之下，他又请求法院帮助。结果，伊利派被迫逃走，躲到泽西市。德鲁背着一个又重又大的毛毡手提包过渡口，这个手提包里装着他最近在这次垄断操作中从范德比尔特手中得到的 700 万美元。

古尔德和菲斯科通过不同的路线逃走。当他们这伙人躲在泰勒“堡垒”（泰勒饭店）时，为了躲避纽约法律的约束，他们决定不收与纸有关的任何东西，并给饭店的老板下了严厉的指示，说他们不想收到任何以信或便条形式出现的東西。除了通过这伙人非常熟悉的人外，所有的通信方式都被禁止了。饭店的服务员被严格要求遵守该规定，违者以开除论处。

当范德比尔特通过法院、立法机构和侦探设法寻找这些避难者的时候，他

① 希腊神话中的戈尔迪难结，神谕说，能解开这一结者即可为亚细亚国王，后来此结被亚历山大大帝解开。——译者注

发现了一个与德鲁通信的方法，尽管德鲁做好了重重的防卫措施。范德比尔特的成功恐怕会让现在一流的恐怖分子感到钦佩不已。他派一个人扮演临时侦探，以来自远方的西部商人的身份进入泰勒饭店，观察德鲁的一举一动，以便通过某种方式把便条塞到德鲁手中，这样他就肯定会看了。

这个业余的侦探观察了一两天，发现他唯一成功的机会就是当德鲁吃午餐的时候，那个招待他进餐的人肯定能把便条交给他。侦探见到那个服务员，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并跟那个服务员说，如果他被开除，范德比尔特会为他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那个服务员答应把便条交给德鲁先生。德鲁很生气，他把酒店老板叫来，这个服务员立即就被开除了。根据前面商量的结果，他接受了更高的报酬，开始为范德比尔特效劳。然而，范德比尔特的便条果然取得了期望的成效。那张便条的内容可能除了范德比尔特和德鲁外没有其他人知道。虽然德鲁的朋友试图恐吓绑架他，以此阻止他去跟范德比尔特见面，但德鲁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还是去了纽约跟范德比尔特见了面。他们之间的问题解决了，但古尔德和菲斯科还与范德比尔特在奥尔巴尼顽强地斗争，古尔德被拘捕了，他被告藐视法庭罪，还被范德比尔特的律师指控犯下大大小小的其他一些罪行。而德鲁却自由自在，没有任何苦恼地继续追求他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然而，作为伊利的财务总监，德鲁积极地参与了一些相关立法事务。他第一个察觉参议员马顿（他在组织调查委员会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委员会做调查报告之前，就事先获得了有形的认可。德鲁认为他在利用马顿，但其实是那位参议员在利用他，这位参议员仿照奥尔巴尼立法委员们最通行的做法，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范德比尔特，这位老兄也被这位马顿参议员利用了。当伊利派获胜，他们过量发行股票的法案通过时，可以看到马顿又站在这场立法闹剧中获胜的那一边，毋庸置疑，他可以获得 50 万股过量发行的伊利股票中相当的份额。德鲁就是利用这些股票，借伊利财务部之名，巩固了古尔德的力量，让古尔德去奥尔巴尼领导那场立法机构反对范德比尔特干涉伊利股票额外发行的战争。

第 24 章

Chapter 24

杰伊·古尔德

他的出生及早期教育 ◆ 在某乡村商店做职员 ◆ 他发明了一种老鼠夹 ◆ 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勘测特拉华州的土地 ◆ 完成一本书的著作和销售 ◆ 在宾夕法尼亚州，合伙经营一家制革厂，并很快从合伙人那里购得了全部所有权 ◆ 到纽约销售皮革，爱上并迎娶了某皮革商的女儿 ◆ 定居大城市，开始经营铁路运输业务 ◆ 从岳父手中购进了一条破产的线路，重组并销售出去后，赚得了可观利润 ◆ 从此，他开始通过经营铁路股赚钱 ◆ 他购进、重组并销售的方法 ◆ 他如何与菲斯科和德鲁联合操纵伊利铁路 ◆ 他在“黑色星期五”中的操作 ◆ 遭到范德比尔特船长的挫败，被迫交割平仓 ◆ 他从瓦伯什、堪萨斯和得克萨斯赚取了数百万美元 ◆ 他在联合太平洋公司中的投资 ◆ 他的建筑公司 ◆ 美国联合太平洋公司，及他购并西部联合太平洋公司的手法 ◆ 电报员罢工，及他与劳工工会的斗士们的重大会晤 ◆ 古尔德的第一次游艇出游 ◆ 他在这次出游中发生的一个非常幽默的故事 ◆ 他在铁路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 他对巴尔的摩和俄亥俄电报公司的收购

芬尼摩尔·库珀（Fenimore Cooper）、沃尔特·斯科特先生（Sir Walter Scott）、查理·狄更斯或大仲马，这些伟大的小说家，即使在他们人气最旺的时候，发自内心地推崇杰伊·古尔德式角色作为其小说的英雄人物，其读者也定会作者大加挑剔，说他们过分夸大了理性的程度，超越了小说所允许的虚

构范围。实际上，在这个国家进入金融发展时代之前，很少有小说读者能够有耐心忍受这种理性的歪曲。金融发展时代造就了一批华尔街叱咤风云的主角，同时也给日常的现实生活打上了严峻的主导性特征，我也在此时，开始在这块投机的大竞技场展开金融冒险事业。

在华尔街的这些主角当中，杰伊·古尔德是惹人注目的一位人物。在华尔街所有这些孤军奋战的人当中，他现在所拥有的第一桶金可能是最来之不易的。

杰伊·古尔德于 1836 年生于纽约特拉华州斯特拉顿瀑布地区。他的父亲约翰·古尔德是一位农民，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在 16 岁的时候，年轻的古尔德也成为一家杂货店的一名职员，这家杂货店离他的家有两英里远。在那里，古尔德一有空就专心提升自己在乡村学校所接受的一点点知识，晚上经常投身簿记学的研究。

正是在这家商店的时候，根据最可靠的记录，他表现出了激烈的讨价还价和牟利的禀赋。他的老板斯拉看中了一块土地，这块地据估计可以廉价获取，因此可以赚不少钱。他把自己的想法悄悄地告诉了几位商店中的朋友，被这位年轻的助手无意中听到。当老板真正要动手购买的时候，他发现年轻的古尔德先生已经先行一步，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

大概就是这次，有一个公司负责州土地的勘测，绘制正式的州地图，年轻的古尔德受雇为他们提供援助。掌握了基本的几何原理，天生对数字的悟性，使得他很快成为了一名公地勘测的行家里手，也使得他对于雇主们的作用愈发显得重要。但是，当时他有一个倾向，不太甘于做那种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光杆司令式老板，而想着雇佣和支配他人之体力脑力来为我所用，他尽了种种努力试图达到这个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出钱购买了这家公司，并写下了与绘制地图相关的一段州历史，在居民当中传播销售。

这种试图吸引所有关联各方注意力的天性，是他一生主要的志趣，并终生不去。在与勘测公司谈判之前，他就利用在杂货店的闲暇时间发明了一种老鼠夹，借助老鼠夹发明为他带来的收入，以及他智胜雇主所取得的土地合同，他在勘测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他们的老板。此后不久，古尔德开始对在宾夕法尼亚与资本家普拉蒂合伙经营一家制革厂产生了兴趣。又由于公司代销商伊斯雷尔·科斯的建议，普拉蒂建议散伙。古尔德劝诱查尔斯·路普及其公司购买普

拉蒂 150 000 美元的股份。该笔业务未达到路普的期望值，路普一时失望自杀身亡。在他死后，古尔德未能继续保有该财产的所有权，该财产被推销给 H. D. H. 斯赖德，从而，古尔德先生的宾夕法尼亚制革厂事业到此结束。

在去纽约的旅行中，古尔德先生受帝国城有助于业务拓展的巨大优势所吸引，跑到帝国城定居。他设法取得了一个有过生意交往的杂货商的欢心。此人带他去家中吃饭，古尔德先生与他美丽的女儿一见钟情。正如后来他的儿子乔治与伊迪斯·金顿一见钟情一样，两心相悦的结果很自然就是迅速成婚。这对幸福的组合似乎拥有了令人艳羡的一切，据公众的了解，古尔德夫妇的家庭非常幸福，从未发生过任何哪怕是最轻微的口角或打岔。

他的岳父拥有一家财务状况陷入困境的铁路的股份。他聘用自己的新女婿，看看他有何办法能够将自己从可能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他希望卖掉自己的股份。古尔德先生考察了这条铁路（他在少年时代就非常熟悉这个地区），他发现，如果不把股份卖给陌生人，而是给予良好的管理，那么这条铁路可能会有非常好的前景。于是，他不仅以市价购买了岳父的股份，还扩充购进了其他人的股份，最后获得了整个资产的控股权，然后将其倒卖给了竞争对手，获得了高额利润。

我相信这是古尔德先生的第一次铁路股交易，从那天起一直到今天，他投机的专长就是倒买倒卖铁路股份。正是在此类业务，而不是通常人认为的股票市场中，他赚取了自己巨额财富的很大份额。

他刚进入华尔街，就开始孤军奋战。此后，他与亨利·史密斯以及马丁合伙，公司命名为史密斯·古尔德·马丁公司。如今马丁进了疯人院，亨利·史密斯则成为威廉·莫斯公司百万美元破产案的罪魁祸首，现在靠妻子的补助金生活度日。而古尔德先生却仍然巍然屹立，他充分地享受并继续在发展着他的投机事业。不管对手多么强大，都未曾有人挫败过他；不管阻碍多么巨大，他都一一克服。

由于我前面已经非常完整地介绍了古尔德先生最伟大的一些投机交易，其中很大一部分在“首次披露黑色星期五的史实”一章的背景以及“范德比尔特船长的‘垄断’”里介绍过，这里无须赘言。

在“黑色星期五”事件中，有一笔聪明的交易值得一书，它归功于那笔交易的精明管理。在这笔交易中，有一位著名人物个人要对 4 500 000 美元负

责。那时，这笔钱是一个让人甚至都很难拉得动的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它并没有对他构成哪怕是很短暂的沉重负担。他只是一改往日的签名“J. G.”为“T. R.”，就娴熟地设法将担子转嫁到一家叫做伊利的公司那无动于衷的宽厚肩膀上。这里的大写字母“T. R.”是财务总监的英文缩写。利用这样简单而有创意的方法，这位精明的绅士消除了“黑色星期五垄断案”所“馈赠”给他的这个烂摊子的消极影响。

关于古尔德先生和范德比尔特船长之间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有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故事背景就设在范德比尔特家房子的客厅里。后者当时正竭力为垄断伊利做最后的努力，在此异常关键的时刻，伊利三能人联合执政（古尔德、菲斯科和德鲁），他们所采取的机敏政策让范德比尔特的最后努力终遭挫败。范德比尔特已经求诸于法庭，作为最后摆平他们的救命稻草。

他们已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了伊利造纸厂，使之源源不断地为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提供新股票，而这些经纪人还天真地以为他们将垄断这些源源不断的股票。当范德比尔特先生终于发现了古尔德的这个狡猾伎俩时已为时太晚，他没法补救，几乎要发疯了，只得诉诸法律来对抗这起代价高昂的恶作剧的主恶者。这些娴熟的金融家平素根本就不把法律当回事，要不然就是蔑而视之，要不就是利用它来牟利，但是，这次他们总算作茧自缚，最后不得不飞离本州，在泽西市的泰勒饭店找一个落脚处。

在他们临时背井离乡的那段时间，古尔德与范德比尔特一天晚上私下里见面，希望找出双方调解的办法。

范德比尔特随意地交谈了一段时间，但在谈话中间，他似乎突然昏厥，从座位上滚到地毯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看起来停止了呼吸。

古尔德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走到门口叫仆人，但是他发现门锁了，没有钥匙在里面。这使他提高了警觉，开始焦急起来。他摇晃着范德比尔特匍匐在地的身躯，但是他软弱无力、一动不动，间或有一声沉重的叹气，几乎窒息的呼吸，看起来好像都是最后一口气了。然后，范德比尔特又待在那里一动不动，保持这个姿势几乎半个小时。可以想象，这是古尔德先生所经历过的最为心焦的半个小时，他简直如坐针毡。

如果允许我沉醉于一名普通的故事叙述者的层次，我会在这里描绘古尔德的内心感受：他必然是郁闷地想到自己恐怕要上刑事法庭了，想着种种不良的

预示。他活跃的大脑很自然正在搜索着一种可最好地说明范德比尔特死亡的解释，要知道，这发生在屋子里只有他和古尔德两个人的时候；当时，在公众眼中，他们还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我认为，在极端焦虑的情况下，他应该会准备与自己的竞争对手以很优越的条件达成协议，只要能摆脱困窘的处境。如果可能，第三者如医生进来宣布这是心脏病突发，应该也是很好的机会。无疑，古尔德先生应该愿意为摆脱这样郁闷的可疑处境而支付一大笔钱。

范德比尔特假意晕倒的目的显然是在试探古尔德先生的勇气，消磨古尔德先生的意志。古尔德也似乎未曾怀疑这纯粹是一出骗局。然而，他的沉着镇定足以应对这种局面，他不屈不挠地忍受着煎熬，直到那个老练的家伙“恢复”了常态和惯常的活力。如果古尔德先生像那些容易激动的普通人一样，那么他在这种刻意设局下就可能做出非常愚蠢的行为，这无疑正中折磨者的下怀，会令他高兴不已。

古尔德购销铁路股的惯用伎俩就是买断两条或更多的不良铁路，然后将它们加以整合，并给整合后的铁路另取一个新名字，称之为一条充满希望的好铁路，能立马带来丰厚收益，让很多人相信这一切，然后大举发行股票，以一个好价格发售，以图进一步改进和提高资产的价值。经过所有这些最初的整改之后，如果有好买家出现，他们可以将铁路卖一个好价钱，它足以补偿古尔德先生所支付的所有劳动力成本和精英管理的成本。如果这些购买者不能从经营中获利，一两年之后往往就不得不进入清算阶段，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而此时，古尔德先生或他的代理们就非常可能又被发现在销售现场以大打折扣的价格再回购这条铁路。古尔德先生此后，将再次获得展示其管理才华的大好时机。他将有能力证明铁路在他的掌管下形势又一片大好，而一旦管理松散，则情况每况愈下。接着，他将着手再次重组，扮演此前同样的角色，只是较之有些微变化，每一次的后续重组，都可实现可观的利润。

要深入了解古尔德先生的所有伟大事业，需要太多时间，我所安排的篇幅也远不能展开。实际上，要公平地评述他在华尔街约四分之一世纪的商旅生涯中直接或间接经手并取得成功的种种谋划，需要大量的篇幅。对于一位仍然很年轻（尽管他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力充沛地享用自己智慧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由于生活工作实在忙碌，我仅有时间草草地描述古尔德先生兴盛事业的最突出之处。华尔街未来一定会有一些历史学家，在他身上大做文章。只有尽快着手，才会有充足的材料。无论是谁承担了这项工作，都不应该忘记伟大的文学界老兵萨缪尔·约翰逊博士关于传记材料的名言，他说传记材料一般会逐渐变少，甚至在有些时候有灭绝的趋势。古尔德先生传记的真实材料可能同样会遭受这样一个随时间逐渐变少的共同命运，尽管如此，他并不可能遭致完全被人遗忘的危险。因为，他已经给那个时代烙上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我一点都不想对它的原因说三道四，莎士比亚曾以此对类似情况做了解释，尽管某些用心不良、妒火中烧的人可能引用下面这句名言牵强附会：

恶事，在身后似乎依然不朽，
善事，却总与尸骨一同入土。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古尔德先生将在身后留下美名，实际上，现在看来莎士比亚的这句古话在古尔德身上要倒过来说了。他曾经犯下的各种可能的恶事似乎已被遗忘。只要他能像过去几年那样一直保持下去，他很有希望经受住大多数的指责。他现在主导性的倾向更多的是成为一名价值观的建立者，而不是破坏者。

他在铁路管理和建设领域卓绝的管理能力，使他得以让不毛之地草木繁盛，让沙漠盛开玫瑰，让数以千计的昔日幽居于欧洲茅草房或纽约经济公寓楼中的穷苦者甚至赤贫者，在西部和南部找到了幸福的家。他在改进土地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在扩充自身财富的同时，也为增加国家的财富及其国际威望，从而提高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贡献了力量。

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最近在这里写一篇介绍本国情况的详细报道，特别介绍了古尔德先生这个人物和其他一些百万富豪和铁路巨头，他们为国家的总体繁荣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似乎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正是在管理伊利铁路的时候，古尔德先生为自己的财富奠定了宽厚的基础。他与伊利的投机关系在丹尼尔·德鲁和范德比尔特船长的生平中描写得更全面。在与伊利公司的关系中，他所获得的金钱和影响力，让他得以在收购铁路产权中拓展自己的经营，他一度都快要控制横贯大陆的整个铁路的业务了。这发生在他控制电报设施之前。

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计划中，古尔德先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时被认为是很应当受到指责的角色，就外部业务来讲，这些计划被策划出来之后，便主要交由他的一个或多个心术不良的合伙人来管理。在这些项目中，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项目，即尝试夺取奥尔巴尼和沙土克哈纳铁路，在其中，古尔德先生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单独出现在公众面前。他的合作者小詹姆斯·菲斯科被分派到这个角色，他扮演得非常棒。在两颗闪亮的纽约律师界新星戴维·达德利·费尔德和托马斯·希尔曼的帮助下，伊利王子（吉姆·菲斯科的称号）几乎攫取了142英里的非常重要的铁路，控制了30 000股中的6 500股，这6 500股中有3 000股是非法获得的，法院最终是这样判决的。

菲斯科先生，尽管是伊利公司中沉寂的一员，他也控制了纽约州和纽约市高等法院的巴纳德法官。

奥尔巴尼和沙土克哈纳铁路对于伊利应该是一个珍贵的奖赏。它从位于奥尔巴尼的纽约首府开往位于宾厄姆顿与伊利交界的汇合处。在那时，伊利公司渴望成为中新英格兰公司成功的竞争对手，它决定垄断该区域与宾夕法尼亚两地的煤炭贸易。这142英里连线因此被两个大铁路公司认为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收购，值得孤注一掷。吉姆·菲斯科显示出了自己对其价值的真正了解，他组织了一家由纽约暴徒们组成的公司，自任公司的头，准备了大棒、手枪和巴纳德法官的一纸命令（这一命令是在纽约市获得的，而巴纳德当时实际在波基普西）。前往奥尔巴尼，强行接管了铁路办公室。他逮捕了铁路公司的总裁、秘书、顾问和接收者，每人责令交25 000美元的保证金。菲斯科先生通过伊利公司候选人选举的闹剧，已强制性地清空了奥尔巴尼和沙土克哈纳铁路公司控制层，给他的暴徒员工像股东一样的选举权。

这条铁路的总裁约瑟夫·拉姆齐坚决为捍卫权力而战斗，力图赶走这些侵略者。这个铁路公司他花了18年时间才建立起来，因此很自然是全心投入战斗。他也找了一位律师帮忙，罗切斯特的贾斯廷·达尔文·史密斯法官最终提出了一个有益于拉姆齐集团的决议，观点是“菲斯科先生试图通过他的暴徒们进行选举，这是对代理人投票权的巨大歪曲和滥用，是试图将公司会议变为一个无纪律、无法律和暴动的场所”。最终拉姆齐公司的董事们获得了法庭判给的费用，地区法院的庭外法官萨缪尔·塞尔登判定菲斯科方支付拉姆齐方92 000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拉姆齐方共由13人组成，这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伊利公司上诉，但是，早在上诉之前很久就听说奥尔巴尼和沙士克哈纳要永久租赁给特拉华和哈得逊运河公司，伊利集团的反对势力不足以诉诸法律，从而终结了这次大型合并案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这可以说是为数很少的案例之一，在其中，古尔德先生决心获取资产的控制权或所有权，但未成功。

获取他人资产的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方法，在古尔德先生这里实际上已经被提升到了精微巧妙的艺术的高度，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每次他都似乎有法律为其撑腰，其精彩的收购都得到了最高法院权威的支持。

他操作并将西部联合公司巧取过来的方式，可以说突出地显示出了他的方法和成功的秘诀。

在开始计划获取电报公司控制权的时候，他先创建了一家建筑公司，准备建一条电报线。这是一家毫不起眼的公司，资产只有5 000美元。它建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线路，这条线路与古尔德先生的西部联合公司的很多重要线路平行，然后开始削减价格，这导致那些老资格的大公司突然发现自己的利润已经减少到无利可图的地步。此时，它显然很想与竞争对手谈判；谈判的结果，缔结了一个利益联盟，古尔德先生控制了那个利益联盟。

“不可能，”当古尔德先生阴险的意图在解决方案出来之前的几个月前传到洛尔文·格林耳中时，他非常生气地说，“古尔德和他那些与我们平行的所有线路都将破产，我们和他和平共处的说法是最无稽的投机。”这位好脾气的博士那时掌控了西部联合公司的局面，或自认为掌控了局面，他蔑视古尔德及其同党试图谈判的努力。但此后的几个月里，博士心悦诚服地给这位他曾经蔑视过的小个子男人当起了二把手。

夺取西部联合公司之后，接下来就是关于电报公司的计划安排了。电报业整体垄断的这场争斗目前仍悬而未决，不过，现在看来，班尼特马克尼集团迟早是要屈服的，最终古尔德将会获得对新闻界的最高控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确实这样发展，那么他将成为投机界和政治界正邪两道的巨头。实际上，这样做垄断权力过大，将它托付给一个人的意志恐怕不太安全。尽管这样的做法从管理上讲可能是明智的，而且这样的话古尔德的野心也将满足，然而，这样的试验实在是太危险。

至于对本市高架铁路的控制，古尔德先生是在最近通过与赛勒斯·费尔德

先生的业务和投机关系获得的，由于日期太近，因此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注意，在此我也没有什么评论。我只能说，我担心我的朋友费尔德先生夸下海口不能收场，尽管一切毫无疑问与最通行的业务原则相一致，并严格地服从最高尚的铁路股票的操纵方法。然而，费尔德先生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谨慎的沉默。

从我的观点看来，古尔德先生是一个公众慈善家，他对于罢工采取了大胆而成功的反对立场。尽管西部联合公司在电报工人罢工事件中损失了50多万美元，让股东们感到十分震惊，但是古尔德先生毫不让步，直到罢工者被迫屈服。他在劳工骑士案中（Knights of Labor）利用同样的政策取得了同样的结果。在后一次罢工中，我在一封致客户的函件中如下解释了我对此的观点：

劳工骑士们已经在很大范围上，试验性地采取了利用强制执行来实现其已逐渐膨胀之要求的行动。这已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要明确的一点是，到底是资本还是劳动力，在未来决定一个国家将要使用哪些投入资源。对于资方而言，关于其自身资产控制的个人权利（不仅包括剥夺其自由）在目前是否将被剥夺，这不仅是对他的自由的剥夺，还可能将其资产价值暴露在将可能严重削弱价值的干扰之下，这是一个问题。而对于劳方而言，通过施压，他们是否就可以夺取自己的利益权力，并控制那些在每一个文明社会都得到保护的雇主最神圣、最不可剥夺的权力，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传统的主流劳资关系的颠覆性革命，这已经很自然地导致了经济事务的局部瘫痪，尤其是在那些合同期延伸到未来的行业中更是如此。如果是在以往，那绝对不存在任何过分的忧虑，担心此类完全无政府的活动居然能够获得成功，只要美国居民真正明白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在。但是，现在，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场斗争必定会带来社会两大阶级之间的抵触甚至是敌对情绪。它不仅必将妨碍很多一般性企业的运作，而且会阻碍那些对国家的发展有贡献的新企业的发展壮大，商业市场必将遭遇严重的困境。然而，从这个案例的本质来看，预测其最终的结果并不困难。骑士及其支持分子的要求（不论是公开表露还是暂时隐瞒的），是对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力的彻底革命，是对社会秩序的彻底颠覆，整个社会坚定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借口必须予以抵制在忍受和权力的极限范围内。

古尔德先生获取西部和西南部某些铁路的重大控制权的方式，在最近由太平洋铁路委员会在这个城市（波士顿和旧金山）开展的调查中非常全面地逐步展现出来了。古尔德先生的陈述，在 1887 年 5 月的日报上登载，可能包括同样正确、简洁的一个陈述，说明了某些铁路相关的总体安排和计划，以及他从中牟利的方法，这些方法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总体上，他的陈述非常平易、详尽并切中肯綮，后来对此有趣之事做过研究的证人们均未找到任何重要的矛盾之处。其内容如下（资料来源：《先驱报》，1887 年 5 月 18 日）：

昨天早上，一位穿着浅灰色商务套装，五短身材的矫健男人走进太平洋铁路委员会的会议室，很平静地坐下，将他那顶不太有光泽的丝帽放在膝盖上。

这位干净利索的谦虚绅士，有着一双明亮的深色小眼睛，他是一位百万富翁。

他掌握了很多关于会议的信息，他们为他们提供了预料之外的很多关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早期并购的内幕信息。

本来以为古尔德先生会是一位老谋深算、难以驾驭、易受挑衅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但是，他一出场就令人大吃一惊。他告诉委员会他患了头部神经痛，因此不能说话很大声。确实，有好几次可以觉察他的声音很微弱，只有两到三次时间，当他非常投入地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声音才较大。然而，不论什么时候，他的声音控制得很好，甚至不时有音乐般很令人愉快的韵律。他首次对太平洋铁路开始感兴趣是在 1873 年。他在市场上购买了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但是，1 美元的股价跌至 14 美分。他持有大约 100 000 股。在咨询了西德尼·蒂伦之后，他最终建议投资债券形式的流动债务，并以高出债券平均价值的价格购买了相当于百万美元的债券。1874 年，他成为一名董事，为常务委员会服务。他在 1874 年、1875 年和 1876 年期间继续提供指导，每年视察铁路两次。他对于菲斯科的讼案毫无兴趣，但是他知道讼案必将提出。他对于讼案中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更多的兴趣。

他在 1878 年开始对堪萨斯太平洋产生兴趣，但是他自认为是在 1874 年了解这个铁路公司的。他记得提出了一个建议，意图统一丹佛太平洋和科罗拉多中央铁路双方的利益。

在问到铁路的位置，而说明得似乎不太清楚的时候，古尔德先生将手插入

衣服口袋，说：“如果你不熟悉铁路的位置，我这里有一幅小地图。”

古尔德将这幅小地图拿了出来，所有的手都围着它，古尔德的食指在各州扫来扫去，完全无视州际商法的存在。他回忆说，早在1875年，就开始考虑并购的计划，但是，他说，那时候没有实施。他甚至跟斯科特讨论过进一步的打算。

连接科罗拉多中央铁路的这条小铁路是他建的，它部分上是联合太平洋和堪萨斯太平洋两者竞争的结果。在1878年之前，他不可能想到自己有堪萨斯太平洋的任何股票或有价证券。他对联合太平洋的股权增加到200 000股，发行的总股份为367 000股。这些事他已经记录成书。莫罗索尼先生也记录了一段时间。

问：这些书在哪里？答：我拿着。

问：在哪里？答：在我手中。

问：能给委员会吗？答：如果委员会需要，我很乐意效劳。

这是那天的第一次轰动，观众都笑逐颜开，似乎都被它的力量感染了。

到此刻为止，他已经敏捷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他似乎没有丝毫的犹疑，实际上，在当天的整个会上他都没有任何犹疑的迹象。以前的几乎所有证人都喜欢说的那些畏畏缩缩的语言，“我不知道”或“我记不住”或“我真不确定”，在古尔德这里，竟然从来没有出现过。而看似毫无保留、免费奉送书的举动更使得观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此后，只要他的叙述中有任何的差错，观众都会求助于这本书。在问到他买某某股是为什么的时候，他说书里面会解释。

“您的书里面还会说明经纪人是谁吗？”

“哦，是的，当然。”

关于他所反对的圣路易斯集合基金。

问：您与谁的意见不一致？答：我认为是和签约人不一致。

问：您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导致不一致问题最初有哪些原始迹象吗？答：如果要我告诉你们所有的细节，我会犯脑神经痛的，比此前犯过的要严重得多。

最初主张并购的是股票，而不是债券，很快就显示出来这个主张是行不通的。

问：此后多久有了新安排？答：我想是几乎立马就有了新安排。目标是将

各种不同的有价证券投向一类的有价证券。

问：您与其他人协商过吗？答：我与自己和其他人都协商过。我认为对自己是公平的价格对于其他人也一样是公平的。

问：您将债券给了谁？答：我想是给了委员会，但是我不知道给了谁。

问：但是，您不会将2 000 000美元交给一个您不信任的人吧？答：可能不会。

问：谁管账？答：我不知道。

问：您不记得了吗？答：我不会让自己的脑瓜记住这些过期的东西，但是我的书会有解释，它们给了委员会。

古尔德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表现得温和有礼，他嘴唇的线条缓和，足以显示这是一个微笑。

在稍后提到古尔德先生从“圣路易斯方”购买的有价证券时，有人问到他是从谁哪里购买的。

“我离开书无法说清楚，我的书上会有解释。”

“您是与圣路易斯中的哪一个人协商的？”

“我想是他们跑过来找我的。他们已经疲于奔命，想卖出去了，因此他们过来与我商量。”

“那么，您首先购买所有的有价证券，然后设法让其他人参与进来，是这样吗？”

“是的，我想有几位先生对此有所贡献。应该写一些书，必须应该有人来记录这些交易。我记得是这些人过来告诉我们想卖。我问他们认为想卖什么价，他们就给了协议上所报的那个价。”

“我只是说，‘我接受’，这就是关于这件事的始末。我记得就是这样。1879年，我约有了4 000 000美元债券。”

这次检查催生了堪萨斯太平洋公司的签章收入债券，有人提问古尔德先生铁路的情况怎样。他认为情况很糟。这条铁路有很大的内在价值，但是它的财务状况太糟糕，它的有价证券一路下滑。

问：您没有购买一点海外有价证券吗？答：我想我从一些阿姆斯特丹人那里以74美分的价格购买了200万股的丹佛太平洋股票。我在伦敦听说他们希望卖出。由于我没有很多时间，我害怕耽搁，本以为他们在想清楚是否卖出之前可能会花几天抽烟。但是，我错了。我早上过来去了阿姆斯特丹，洗漱完开

始吃早饭。12点钟，我就见着了他们，下午就返回。

当被问及他为此有价证券（他利用这些有价证券收购了堪萨斯太平洋债券）所支付的价格时，他拿出自己的文件，递给委员会一堆书写整洁的购销价格的报告。

他在1879年，以603 204.78美元的价格购进了圣路易斯和价值1 562 886.69美元的第一抵押权债券。

这些股票中，有价值617 000美元的股票，他以246 800美元的总价卖给了拉塞尔·斯基、F. L. 爱米斯、西德尼·蒂伦、S. H. H. 克拉克、伊斯拉·贝克、F. G. 德克斯特和伊利莎·阿特金斯。

1880年1月24日，他以价值956 779.76美元的债券和股票交换了联合太平洋同等面值的9 568股。

他为获得圣路易斯和丹佛太平洋59号清算人债务证书支付了60 695美元，1880年1月24日，将其交换了联合太平洋同等面值的590股。

1879年间，他向购进该股票的同一个人购进了8819股，卖出了3 806股圣路易斯和丹佛股票。1880年1月24日，他将手中所持的剩余5 013股以100 200美元的价值等面值出售。

与此同时，他以586 940美元购进了面值784 000美元的圣约瑟夫桥梁股票，将其中的150 000美元以112 500美元转卖给了塞吉和狄龙。

他还以6 000美元买进了4000股股票，至此，总计有成本为634 000美元的联合太平洋债券和4 000股总价值金额为480 440美元的股票。与合计6 340股的联合太平洋股票等面值交换，总计634 000美元。

古尔德这些有价证券都卖给了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那些董事。这些受害者在买进债券的时候本想持有这些债券一直到购并为止。“丹佛被称为搭配品，与债券搭配卖出。”古尔德说。

公司一购并，他就把27 000股的联合太平洋铁路股票转换为新股票了。

他同时还把他的联合太平洋股根据马萨诸塞州的特别法转卖给了其他方。这个法令允许在一只股票上搭配另一支股票，而不论是否有何内在关系。

“我发现了那项法令，”古尔德说，“就把这些股票换了一个人的名字。”“您从股票清单上看不出任何东西，”他继续尖声说道，“这年有很多股票被经纪人持有。”

购并之后，他开始在其他股票持有人当中分散所持股票。

“我断定，”他说，“如果有那么四到五个股东能代我走动一下，效果可能更好。”

问：购并后，价格上涨，这就强烈地刺激了这种想法，是吗？

答：是的，因为股价那时候上涨非常之大，以至于没有充足的股票流通。

这位证人讲述了请多吉将军和沙隆·汉弗莱（Solon Humphreys）提购并方案建议的故事。他们都是很公平的人，因此，他认为他们应该做出一个公平的报告。

当他们到西边做报告之后，他没有再与他们交谈。

问：情况怎么样？

答：嗯，他天真地答复，他们此时发现我的股份发生了改变。

问：发生了改变？

答：是的，我已经买进了密苏里太平洋股票。

问：多吉将军和沙隆·汉弗莱调查过这些铁路的历史吗？

答：我认为未来道路建设的重要性要比过去更强。

问：是的，但是，我想……

答：过去没有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评判标准。

问：但是，您难道不认为多吉将军和沙隆·汉弗莱……？

答：“一辈子，”古尔德先生热切地说，“我这一辈子都在做铁路交易，由于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我总是更多考虑他们的未来而不是过去。”

“这就是我的赚钱之道，”他说，“我最开始买进的第一条铁路，也有着一个非常糟糕的历史，但是，它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以10美分的价格买进了它的债券，最后以1.25美元的价格卖出。正是因为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前景吸引了我。我投资联合太平洋公司是为了赚钱。”

“那时，您不支持购并吗？”

“不支持，我的兴趣已经发生了变化。”

“您没有试图阻止它吗？”

“噢，我的反对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们都非常害怕。”

“谁？”

“阿米斯、德科特、亚特金斯和狄龙他们就此事从波士顿过来拜访我。他们

听说了我要拓展丹佛太平洋，与密苏里太平洋联结。他们说我为这项购并，同时很正确地评价了我。我拿出自己的100万美元支票退出，此后就要支付。”

“我现在就要支付。”这位证人说，声音急速地上扬，他很严厉地看着在场联合太平洋公司的人。

“我为他们支付了100万美元，但是他们不让我走出大门，直到我签署了同意实施购并的协议为止。”

“这份协议在哪里？”

“我想是在波士顿。如果我能够实施我的密苏里太平洋计划，我现在就有等值的资产了。”

“我不认为您有任何原因，可以抱怨它的利润。”安德森先生答道。古尔德先生半眯着眼睛，掩饰着扑朔迷离的眼神，一言不发。

他所签署的协议是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实施购并。1月15日以后，购并一事就铁板钉钉了，因为这位证人掌握了主要的利益。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再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领军人物了。”他说道。

在询问古尔德先生与荷马斯律师在购并期间的联系时，他问古尔德是否确认那段对话。

古尔德说：“是的，因为它已经烙刻在我的脑海中。”

“怎么会这样呢？”

“哦，我记得自己以10美分的价格脱手了很多股票，而这些股票几天之后就能够获得票面价值了。难道您碰到这种情况不会铭刻在心吗，安德森先生？”

听到此话，每个人都大笑起来，而这位证人尽管损失了一两百万美元，仍然纵情大笑。

关于丹佛太平洋股票，古尔德先生说，它实际上一钱不值，除非购并成功。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印章使它升了值。

“您认为受托人在托管过程中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吗？”有人问道。

“我认为这是唯一需要做的事，他们做得怎么样，看我的情况就知道了。我准备总有一天要亲自负责这件事，今天、明天或某一天吧。”

《纽约时报》，1887年5月19日

杰伊·古尔德昨天一天都给了太平洋铁路委员会。他的举止像往常一样冷静和镇静，他显得耐心十足，一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样子。然而，古尔德

先生尽管回答了几百个问题，但是吐露的信息却很少，有些模棱两可，让一些不是很精明的金融家很容易陷入困境。丹佛太平洋股票和它托管出去的方式是首先提出的问题。古尔德先生说，他认为这种方式对任何一个人人都最为合适。很自然，他希望丹佛太平洋参与购并，像他一样持有100万美元的证券，300多万的托管资金。起先，联合太平洋公司是否会接受购并还不明朗，但是对于特许权，它还是认可。“我想再说一遍，”古尔德先生说，“没有任何一个与联合太平洋公司有关联的董事或其他人能够从丹佛太平洋公司拿走一美元。我很高兴要为其盖棺定论。”

他那时的计划是构建一条从丹佛经由盐湖城和拉夫累地要塞到奥格登的线路。因为联合太平洋铁路沿矿区的北边跑和南太平洋铁路沿它的南边跑。在获得了密苏里太平洋公司之后，他看到了其中蕴涵的巨大好处，但是却被人劝说许诺继续购并另外的铁路。在他购并了密苏里太平洋公司之后的一个月，波士顿人变得激动万分，并获得了他的许诺。如果密苏里太平洋接通了，那么它会严重地威胁到联合太平洋。

有人问古尔德先生说：“根据华尔街的伦理观，您是否认为作为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您有绝对的责任去购买另外的产业，设计线路的拓展，而拓展线路有可能会损伤联合太平洋。”

“我认为这样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这就是我之所以脱手的原因。”

“您认为这是您对政府应负的责任吗？”

“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如果构建一条平行的线路，这将会对政府产生什么影响呢？”

“这样的线路应该彻底清除。”

瑟曼法案得到高等法院的支持，古尔德先生心里有一个计划，从奥马哈到奥格登构建一条线路，这条线路正靠在联合太平洋的右侧沿线。它为其他很多人带来了“旅行的机会”。政府试图挤压出该线路内在的收益。对于1500万美元的一条线路，可能需要花费联合太平洋公司将近7500万美元的成本。

“您没有致力于保护政府的利益吗？”

“我想保护它们。它们的立法行为伤害了自己的利益，将那些股东置于一
种危险的境地。政府拒绝履行自己的合同，现金被用于支付政府的联合太平洋
债务。我有这笔债券可以提出来支付。1877年和1878年，我向立法委员会出

价。当时的立法主席是埃德蒙先生。只有我一人出价。债券金额预计在1 500万美元到1 700万美元之间。但是，政府不会同意以这些债券来终结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古尔德先生想自己写一封辞职信辞去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职位。他辞职是因为他不能在充当公司董事成员的同时，与公司发生交易。他把辞职信放在总裁狄龙的办公室。狄龙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购并成功，那么它将与杰伊·古尔德发生大量交易，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那么就会将事情变得复杂。在1880年1月10日前，等面值买进圣约瑟夫和西部太平洋债券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堪萨斯中部也一样，以239的价格买进中部分公司股票也丝毫没有回旋余地。后面也是一样。”

科罗拉多中央铁路的租约被取消了，因为州法律禁止竞争线路的购并。古尔德先生不知道，多吉和汉弗莱的信要在1月24日上递到会议。他可能是在事情发生的当天被告知购并一事的。他也可能是在1月24日新公司的第一次会议上得知的。古尔德先生从堪萨斯太平洋的董事会退出一事被再次重提，在简单地介绍辞职原因的时候，古尔德先生说，他不希望混淆了托管人和董事两重身份。当他不再是一位联合太平洋的董事时，他感觉不再束手缚脚。有时，对方公司可能与他势难两立，此时他就不再适合担当一名董事了。他不知道鲁塞尔·塞吉就要接受他的辞呈了。

“在堪萨斯太平洋会议上，宣布了从你手中获得的一长串分支线路的名字。总裁狄龙说，公司已经购并了这些分支线路。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

“可能他指的是董事与我的协议。”

“但是，我们在账簿中根本找不到关于它的记录。您有可能会认为他指的是与那位波士顿绅士的协议，对吗？”

“非常有可能，但是，它没有自主权，直到明确是接受还是拒绝为止。”

古尔德先生开始解释他在处理周二上交的分支证券帐户之间的一些差异，以及审计官明克提交的一个清单。明克先生给出了15 162股圣约瑟夫和西部太平洋股票，古尔德先生给出了8 119股。古尔德对此的解释是，他要一些股票来建设黑斯廷思和格兰德岛。他保留了卖给狄龙和塞吉的15万圣约瑟夫债券，与他自己的股票一并移交。他的479 000美元堪萨斯中部债券和2 521股

在他购买密苏里太平洋的时候花了431 820.25美元。它们都投入479 000美元的购并。古尔德先生从奥利弗·阿米斯（Oliver Ames）和总裁波默罗伊（Pomeroy）那里买进了中央铁路，奥利弗·阿米斯和总裁波默罗伊从纽约过来，想引诱他去看这项资产。

“我认为它做得很棒，”他说。“后来，我了解到他们为了给我留下印象，一直乘飞机尾随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因此，我每到一站总能看到一驾飞机。不管怎样，我购买了这条铁路。”它总共花费了古尔德先生1 826 500美元。关于中部分支，它的股票由古尔德先生处理，卖价239，一听到这个价格，出现了一些骚动，但是，这位证人镇静地解释道，这条线路实际上是以每英里2 500美元的价格购进的，因此，股票要高于票面价值定价。

“这条线路已经赚到了红利吗？”有人问。

“我想没有。”

“累计收入已经超过了固定支出和管理费用吗？”

“我从来没有计算过。股票不总是完全取决于红利。我为我的密苏里太平洋支付了750的价格，并在这个价位上买进了4 000股。红宝石的价格自然要高于钻石，钻石的价格自然要高过玻璃。”

接着，调查转到了购并后的那些天，这位证人被问道，在股票转移到他那里之前，新公司是否会有集体行动。

古尔德回答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新公司的股票要发行了。”

“新公司是否注定要承担堪萨斯太平洋的此类责任？”

“哦，我想它应该承担堪萨斯太平洋的责任。”

“为什么您不选择用债券支付，而是选择股票呢？”

“我认为他们更中意股票而不是债券。在他们看来，我比较聪明，而我选择了股票。”

另一轮的问与答中回答了这其中的其他差异，但是，委员会并没有从中了解到什么新情况。“可以有把握地说，律师们得到了这些差值。”古尔德先生在回答了一系列问题之后咯咯地笑道。他在不同时候向堪萨斯太平洋投入了大量现金，来满足流动负债，很可能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来解释各个案例当中的问题。有一点这位证人一直强调，即只有通过协商和交易，否则没有任何一类人或特定的某些证券持有人能够感觉到于他们有利的歧视，这里给定其他人的行动。

在购并之后，古尔德先生说，他在联合太平洋分支路线中有少量业务。他对丹佛和南区非常感兴趣，但是起初他并不是很感兴趣，逐渐地他从总督伊万那里买下了整个铁路。“我现在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他愉快地说，看着分支目录的末尾。在联合太平洋的法律费用中，他知道没有哪项是真正法律的费用。

“谁是华盛顿铁路的法律顾问？”

“据我所知，施拉巴吉尔 & 维尔森是唯一的法律顾问。”

“您曾经因公司公务去过华盛顿吗？”

“去过，我自己付的旅馆费用。”

“您记得有谁因为铁路的问题从其他地方派往华盛顿吗？”

“阿希里法官和波普尔顿先生。”

“谁代表堪萨斯太平洋？”

“阿希里法官。我不知道他们在华盛顿还有什么人。”

“您为铁路的事情多长时间跑一次华盛顿？”

“瑟曼的账单没有着落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它通过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去过那儿。我带着它回来了。在劳工委员会面前，我很丧气。我感到很厌烦。”

“您知道是否有一些支出用于影响立法机关呢？”

“不，先生。我知道没有这项支出。”

“我们可以从哪里找到此类交易的记录呢？”

“我认为根本就没有此类的交易存在。”

“您记得在一次会议上，宣传一位华盛顿的奥德威先生因为堪萨斯太平洋的关系而得到任命吗？”

“没有，先生。”

于是，安德森先生念1876年堪萨斯太平洋会议的会议记录，古尔德先生记起沃达维先生的好朋友参议员罗林斯（Rollins），曾经请他写一封关于这件事的信。他不知道任何来信的内容。

“您记得有关动产信贷公司^②运动的一些讨论吗？”

② Credit Mobilier；1864年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成立的一家建筑公司，用作洗钱工具，以欺诈手段，将铁路的盈利据为己有。——译者注

“我看到一些股东，他们说将把自己的股票转给我们。而另外一些人则不乐意。信贷公司的股东指责说联合太平洋欠了他们公司很多钱。在判决下来之前，我成功地获得了转过来的大量股票。”

“您再想想您对联合太平洋公司的总裁和董事们的演说。”

“我希望自己处于提出诉讼的位置。”

“谁反对您提出的行动计划？”安德森先生问，他看到一次董事会的会议记录，说德科特先生“拒绝了古尔德先生提出的诉讼请求”。

“我认为整个董事会都反对提出诉讼，我自己一个人提出了诉讼。”

“这里有您另外一封致董事的信件，要求他们开始提出诉讼，反对动产公司在某些有嫌疑的合同下，全面报道所有的盈利等等。”

“我认为这是因为不同的合同系列。”

弗里德里克·阿米斯（Frederick L. Ames）先生，第一位证人被传唤进来，证明他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前股东，是霍恩·奥利弗·阿米斯（Hon. Oliver Ames）的表兄弟，州长。他早在1877年之前，就熟悉这条铁路和堪萨斯太平洋铁路的关系。“我个人对这条铁路的兴趣是在父亲奥利弗·阿米斯的引导下产生的。它的第一次红利是在1875年或1876年支付的。我不记得支付的比率了。我比较熟悉堪萨斯太平洋的条件。我认为股票在1877年并没有什么价值。杰伊·古尔德先生在1876年堪萨斯太平洋有价证券的买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了解他拥有大量的债券投资和未盖戳收入。我从来就不知道那些兴趣盎然的人各自的兴趣何在。我未持有任何此类的有价证券。我收到了每份5万的证书两份。我现在手头没有了，它们都转给了其他人。这些证书可能签发给基金中的每一个人。我想我给农业贷款和信托公司支付了10万美元。”

安德森先生：“您能够找到那些证书吗，明克先生？”

审计官明克：“它们不在我手中，先生。”

安德森先生：“很奇怪我们找不到这些证书的任何线索。”

继续，阿米斯先生证实，关于基金业务的运作方式，购并抵押的副本明显被引入。

他说：“我不记得我投资了此抵押下的383 000美元短期债券。我与此基金的联系限于前者或这10万美元。分担率和抵押率都一样。1879年，我是堪

萨斯太平洋公司的董事。我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向那些人发行债券，他们所要求的利率会夸大它100多万的负债。我不记得，1880年当债券价值达到94的时候，杰伊·古尔德以75的价格发行了2 950 000股优先股。我不知道任何此类的其他交易。我不知道堪萨斯太平洋铁路此时欠杰伊·古尔德2 000 000美元。所有董事都支持购并，只有杰伊·古尔德例外。他不乐意接受任何我们认为有资格的条款，并且似乎对我们所采取的路线显得非常激动。最后我们是在古尔德先生的家里收尾的。我不记得我们强迫古尔德先生签署了文件之后，才允许古尔德先生离开。文件由所有与会者共同签署。购并的基点是5 000万美元。”

当问道他如何解释联合太平洋公司支付红利的条件，即要求以销售股票来去除短期债券时，阿密斯先生说红利是基于净收入报告来宣布的，这条铁路非常可能已经赚了几倍多的红利，同时，它一直在构建铁路、借入资金和进行除此之外其他用途的投资，它们不妨碍红利宣布权。阿密斯先生还说，联合太平洋的董事们由于杰伊·古尔德取得垄断的事实，大都受牵制签署了午前宣布的协议。“我认为它受惠于联合太平洋，”他继续说道，“如果可能的话，我不会取消这个行动。由于我没有卖出我的堪萨斯太平洋股票，而是一直持有到现在，所以我并没有从购并中赚到任何好处。古尔德先生则赚了大约350万美元。”

狄龙法官交互讯问了阿密斯先生，从他的证词中证实他并没有从这个购并中获得任何私利。他说，他现在对于联合太平洋的兴趣要大于1880年，他现在是最大的股东。

杰伊·古尔德和他的铁路系统

下面的内容摘自1887年4月27日的纽约《泰晤士报》，它生动地描述了古尔德先生仔细检视他的铁路系统时的心境：

乍一看，很难想象，仅仅用了5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杰伊·古尔德就成为了第一流的铁路大亨，然而，这却是事实。1879年，他只拥有现在所拥有的西南铁路系统的核心，密苏里太平洋是瓦伯什在光大疆域上的竞争对手，他对于自己产业的最终命运寝食难安。加里森船长对密苏里太平洋有操纵的兴趣，

这家铁路公司当时是由他的哥哥奥利弗管理的。加里森船长与古尔德先生不一样，他自己本身不会反对就古尔德购买瓦伯什一事达成宝贵的协议。如果不是因为奥利弗·加里森的原因，他可能不会这样做。后者和本·刘易斯（古尔德的瓦伯什经理）是密友，加里森，作为密苏里太平洋的总裁，没有做任何伤害古尔德资产的事。但是，当刘易斯先生1879年年末的一天在纽约拜访古尔德先生，提出因为他所关心的其他利益的关系而要辞职的时候，古尔德立即看到前途凶险，并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刘易斯建议说，他通过购买密苏里太平洋的控股权来消除潜在的威胁。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长久贯彻。古尔德鼓动奥利弗·加里森，并出价150万美元购买加里森的铁路股份。加里森非常奇怪，说这需要咨询船长的意见。然而，他说150万美元的出价至少低了50万美元。当船长听到古尔德的出价时，他握着自己的手，笑着把价格提到了280万美元。古尔德还价200万美元，这是前一天他的买入价。船长解释说昨天和今天的差价就是80万美元。古尔德一言不发地退出了。第二天，他再次尝试。船长一直在犹疑中。他犹疑的结果是，第三天谈判时对古尔德的要价又提升了100万美元，现在是380万美元了。古尔德先生没有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他的话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延迟的危险。他说：“我买了。”他真的这么做了。由此，古尔德从一开始的不足1000英里，到现在控制了5000多英里，由密苏里太平洋、铁山和国际大北方以及它们的分支组成了一个严密的铁路系统。与资产的现值相比，他这笔便宜买卖就接近了古尔德先生设想达到的水平，从那天起，他几乎没有丧失任何一个拓展铁路资产的机会，加上那些虽然尚在图纸设计阶段，但肯定要建的铁路，他很快就要拥有至少6000英里的铁路了。

尽管总经理办公室在圣路易斯，古尔德也没有一条铁路经过密西西比河的东面（因为瓦伯什未被考虑到他的铁路系统里），但所有重要交易都必须通报古尔德先生并得到他的批准，否则不得处理。私人电报从圣路易斯的办公室发到西部联合大楼（古尔德的私人办公室），每天古尔德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坐在他那张不会超过25美元的办公桌旁。

每英里的铁路他都走过很多遍。这样的旅程，如果是第一次，也许是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那么肯定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古尔德先生走的次数实在太多，以至于他完全吸收了所有铁路带来的乐趣，而只有钱币和权力的响声能让他兴起。从他的专车科维离开圣路易斯起，他的行程花了整整3个星期，直

到他再次返回到那个炎热、肮脏的庆典城市。

当古尔德先生在返程路上的消息迅速传到圣路易斯时，铁路系统的每一位官员都拼命往脑袋里装信息，从奥马哈到加尔维斯顿，从沃思堡到圣地亚哥，都有异常举动。铁路系统的所有高层都是由古尔德先生或他所信任的官员择选出来的，因此，这些人只能卖命地为杰伊·古尔德工作，尽管在有些时候，他们的银行账户并没有显示出来。

后来，古尔德先生视察西南铁路。在旅途中，他总是由总监督克力根陪同左右。克力根在纽约出生，在西南部接受教育。从外貌上看，他们截然不同。干净利索、皮肤白净的总监督做事一个顶两个。在行为举止上，他们却非常相似，但是克力根比较坦率，古尔德则缺乏这种品质。他拥有像古尔德一样近乎完美的镇静沉着和不易激动的特点。无论他的感情是多么炙烈，他都始终保持低调门。他就像本活的铁路百科全书，西南铁路的地形特点（它的每一个角落细节）他都了然于心。他为铁路系统工作了30多年。从总监督那里，古尔德先生可获得他从分部监督和其他官员那里收集到的信息，但是在这次旅程中，古尔德先生坚持在每一个站点停车，包括克力根例行管理的站点。他总是有速记员随行左右。这些速记员包括打字员、监督员和跟踪同一个计划的分部负责人。

一到达规定要视察的车站，古尔德先生就问停车多长时间，回答可能是“一个小时”。古尔德先生看一眼手表，然后，跟随监督到处视察，他平静地倾听着监督与当地铁路官员的交谈，留意他希望听到的内容，而当监督谈及那些他后来要提供给他的下属的信息时，他就神游天外了。古尔德先生显得很没耐心，直到一个小时过去。但是，如果看到工程师的计划安排未准备就绪，在车上有人未能各司其职，他就会躁动不安，直到一切重新进入轨道，他才稍微安心。

他是方法的强力倡导者。每天早上，一天的工作计划就制定出来了，甚至在火车一早发车之前，他就已经安排好当天可以停靠多少站台，晚上到哪里停车。在三周的旅程中，他从头到尾都是在火车上吃饭和休息。晚上，就将科维开到院子最安静的地方，因为它的主人在晚上不愿意听到任何可以避免的噪音，尽管他在白天的时候像其他人一样可以忍受噪音。他的车总是显得很特殊，在晚上的僻静之处，远近的人们都过来看他的车孤独地隐身在这里。在他

的铁路所经过的农村某些地方，在很多农民眼中他就像马戏团的戏子一样令人好奇，如果他模仿詹姆斯·布兰尼（James G. Blaine）的举动站在站台上，那么就会吸引不少观众。他看来从来不渴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名声，他在旅途中的举止就像他在办公室或他的第五大道大厦时一样十分谦逊。就一些新闻记者所知，他甚至比自己用几千美元聘用而来的雇员更为谦逊，更为礼貌。

古尔德先生在旅途中碰到了一些奇怪但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有时也会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在第一次访问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的时候，他发现它竟然在一个岛上。与很多人一样，他原以为它是在大陆上。这次，很多市民被委派过来欢迎他，他也已经答应在一个旅店住下。委员会疏忽了为这伙人找车，在他的车到来之前，他们设法寻找车辆，来弥补这个失误，但这已是不可能做到的了。加尔维斯顿那天正在举行选举。那天很热，天热，选举更热，竞争中的各派相互攻击。一方出价20美元想要出租，但是被拒绝。委员会感到很绝望，这时古尔德先生出现，他嘲笑着这样的窘境，并且强调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不可攀越克服的大山。这是唯一一个铁路沿线的人们用于嘲笑古尔德先生的玩笑，因为加尔维斯顿的制高点仅仅高出海平面3英尺。这里的居民称有4英尺，他们谴责那些内陆人声称海浪高出加尔维斯顿3英尺的说法是侮辱。

在穿越位于休斯顿和加尔维斯顿之间的国际大北方公司时，古尔德先生只要环顾左右，就能够看到瓦伯什铁路的经理托米吉（A. A. Talmage）所拥有的土地。托米吉先生拥有16万英亩的广阔土地和大农场，尽管土地上的牛羊很少。这些土地，托米吉先生是以每英亩12.5美分的价格购买的，但是现在即使出价6美元每英亩，他也不愿意出手。如果托米吉先生除了这块土地之外没有别的产业，那么他的要价可能会被认为是过高。古尔德先生在其他地方也拥有一些土地，但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他在土地方面的级别要远远低于托米吉经理。乔治·古尔德在西南部可能拥有与父亲同样多的土地（铁路土地权未考虑进去），这些土地他时刻想待价而沽。在每一个农业灾害或畜牧灾害季节之后，总是会有这样的购销会。新来得克萨斯的人很可能会忘记灾年只是会偶尔发生，而在其他三个好收成的季节中所赚取的利润足以经受三个好季节中的一个灾难季节。他们可能在土地卖出去之后才听到这些说法，但是老居民不会提供只有经验老到者才能辨别的信息，直到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值得。

铁山铁路有一站叫做莫尔文，位于小石城以南44英里。随着汽车驶入莫

尔文，古尔德先生在一个狭窄的有轨铁路上看到（这里也有一个站台），这里有一个带钻石形状前灯的火车头。这个狭窄的有轨铁路从莫尔文开往温泉城。古尔德先生对此并不感兴趣，但是他知道温泉城铁路的一钉一铆都是由一个人所建造和拥有的，这个人和他一样，他们生命的第一步起步是由同一个人助力。温泉城铁路由“钻石乔伊”雷诺拥有，他数年前在纽约格林市普拉兹维拉镇凭借扎多克·普拉特（Zadock Pratt）的帮助跨出了自己的第一步。当时，这位年轻人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铁路的对面沙利文市。在宾夕法尼亚州，当时的杰伊·古尔德在普拉特的帮助下学会了如何用橡树和铁杉树皮浸青鞹革，而并未效尤华尔街的风格。雷诺和古尔德都得到了大约同时代的普拉特先生的支持。尽管雷诺现在不如古尔德有钱，但是，他得到了所有他想要得到的钱，古尔德先生常常说，获得满足感，并非一定要有5 000万美元。“钻石乔伊”是一位有钱人，他的很多时间都是在芝加哥和温泉城两地度过。在他第一次拜访温泉城的时候，他被迫从莫尔文上车。这次的旅行让乔伊感到失望，而温泉的发现让他欣喜万分。他发现有一个获得了从莫尔文到温泉城的铁路特许权，但是手中却没有钱。于是，他们之间就发生了铁路和钱的交换。雷诺建造并拥有了这条铁路和全部车辆等等所有的一切。这条铁路全长24英里。他从小麦交易那里赚了一点钱，但是在沙利文市却没有赚到钱。铁路开始运营之后，他向西行进，从威斯康星将小麦运往芝加哥。他总是用大布袋运送货物，在大布袋上做一个钻石形状的标记，在内侧则绣上他的名字首字母“J. O.”。据此情形，由于他的大布袋和贸易商标已经为人们广为了解，故他获得了“钻石乔伊”的绰号。因此，这个绰号并不像那些不很熟悉他的人所认为的那样，认为是因为雷诺先生喜欢珠宝，实际上，雷诺先生既富有又谦逊。

古尔德先生在视察他的铁路时就像火箭似的。通过这样的方式，古尔德获得了一些经验，比如，正如旅客所知道的，重型火车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前进时，与同样速度的单引擎汽车相比更为平稳。古尔德先生常常就是以50英里的速度开他的科维汽车，此时，据说他要从一边的座位换到另一边去，这并非是出于自愿，而是为了不改变表情。只要总监督克力根不伸手去够响铃，古尔德先生也不会抗议，而是毫无怨言地忍受着颠簸之苦，他悄无声息地在他最近的旅行中更换了引擎。因为他自己的原因，引擎跑得很慢，尽管在空气信号放风阀拉绳处有好几股力量。然而，当他发现正餐就要进行的时候，他把拉

绳打开，火车头突然猛冲向前。桌子上的东西被颠得稀巴烂。在下一站，引擎就提升到货运车的档次。

✓ 堪萨斯太平洋的回忆

在阿蒂默斯·霍姆斯（Artemus H. Holmes，他是堪萨斯太平洋公司的前任律师）的证词中，有很多关于堪萨斯太平洋公司的有趣故事，它介绍了堪萨斯太平洋股票是如何在七天之内从两三美元跃升到票面价值的。霍姆斯先生的证词如下：

从1873年到1877年，所有堪萨斯太平洋有价证券的市值都极低。堪萨斯太平洋股票每股更是低至2~3美元，实际上没有价值。土地特许经营债券1美元值10美分，丹佛支线大约为40美元，但是在1876年到1878年间，价格在50到70美元间波动。公司的第一个抵押债券低于面值，公司的信用缺失，股票滞销。希尼·狄龙（Sidney Dillon）当时是堪萨斯太平洋公司的总裁，急于想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在前任总裁的建议下，1880年1月17日在市高等法院向唐诺修法官（Donohue）提出一个友好的诉讼，以解决丹佛太平洋股票的所有权问题。托管人说，他们不能做任何有损于股票价值的事情。1880年1月20日，仲裁人贺瑞斯·鲁格斯（Horace M. Ruggles）倾听了陈述，两天内案子就结了，1月23日下了判决书，1月24日唐诺修法官签署法令，将这些股票转给古尔德派。霍姆斯先生说：“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购并事宜终于告一段落，但是之前我不了解它的任何情况，直到1月24日。”仲裁人鲁格斯判决29 000股无抵押的丹佛太平洋股票将转给堪萨斯太平洋。它投向了联合太平洋公司，29 000股购并公司的股票上交交换，以票面价值销售。有人尖锐地问证人，关于仲裁人鲁格斯的报告，他了解什么情况。有人问他是否知道是谁写的这份报告，或是否了解关于写这份报告的人的任何情况。

问：为了准备1月24日签署的法令，您肯定在此之前有所觉察，对吗？

答：没有。

问：要知道第二天就要发布法令了，您如果不知道结果那么如何准备呢？

答：我必须收回我刚才的回答。

政府官员帕蒂森问：我是否能够理解为，您是说，交换的那些股票在几天之内从每股2~3美元上升到等面值销售了。

霍姆斯先生说确实如此，于是有一个问题问他：

问：换句话说，狄龙先生在1880年1月17日宣誓过股票没有实际价值，而在1月24日，却等面值销售了。对吗？

答：是的。

这揭示了古尔德先生快速发财的另一个重要秘密。

古尔德第一次游艇出游记

关于古尔德先生第一次游艇出游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最近刊登在《费城新闻》上，至于它的真实性，有一位健在的见证人可以保证。它反映了古尔德先生以某些特殊的角度来看的特点，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位游艇俱乐部成员，他健谈的口碑就像勃艮第^①一样有名。在这位游艇俱乐部成员的住处，我注意到有一个小三角主帆游艇的漂亮模型。我不无艳羡地询问这个模型的主人，他解释说：

这是一条船的模型，我一生中最爽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条船上渡过的。这条船的主人是一位克鲁杰家族的成员。而令这条游艇妙趣横生的一件事就是：杰伊·古尔德的第一次游艇出游就是在这条船上，这次游玩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我相信他至今仍然会记得的。

克鲁杰是本州最古老、最有声望的一个家族，他们与其他纽约人通婚，如尼克博克家族、利文斯通家族和范伦塞勒家族，他们拥有邻州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所有土地。他的资产当中还包括一处房产，现在租给了老斯凯勒·利文斯通（Schuyler Livingston）的儿子。大约在1853年或1854年，杰伊·古尔德在宾夕法尼亚的鞣革工业刚刚破产。

年轻的利文斯通所出租的房产很少有进账，他断言需要有一位精明的商人来负责。于是，他登广告招聘合伙人。一天来了一位皮肤黑黑的小个子男人，

① 勃艮第是法国东南部地方的地名，这里指的是该地产的红葡萄酒。——译者注

他穿着黑色细布衣服，显得一丝不苟、异常整洁。他自报了姓名是杰伊·古尔德。经过一番谈判，古尔德先生成为了小山坡上大房子的客人。在他工作逗留的那段时间，越是竭力让他感到高兴，他看起来也越看好他与这群年轻朋友的合作关系。

一天，克鲁杰先生请杰伊·古尔德先生去坐游艇，并已准备好了他的游艇，也就是这个模型的原型。我们几个年轻人都协力在准备开船。匹克斯蒂尔（Peekskill）到了，我们所有人都进了这家旅店。

在沿路上行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古尔德先生神情不自在，他坐在甲板上不断翻来覆去，他扭动身子好像是要寻找一个较软的座位。当然，没有人对此发表意见，但是当我们上岸时，古尔德先生自己进行了解释。由于太阳的热量，汽艇甲板上的黄色油漆烤得焦干、模糊不清了，不久这位小个子男人就发现他的裤子上出现了干粉。他为此感到很不自在。他最后下结论说，他害怕自己的细布裤子会损坏，虽然现在还没有损坏，因此，他决定放弃这次旅行，坐火车回去。克鲁杰先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他保证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在一个百货商店停下，克鲁杰先生花了两个半先令买了一条牛仔裤。当我们上船的时候，古尔德先生就已经将它穿上了，对于这个结果他显得格外满意。

在我们从纽堡返城的路上，我们再次逗留在匹克斯蒂尔，并再次向这家旅店走去。这次，古尔德先生拒绝了拿一些东西的邀请，而宁愿呆在甲板上。我们在旅店呆了大约一个小时，突然克鲁杰先生想起来要一些铅白，年轻的尤金·克鲁杰（Eugene Cruger）和我一道随他去了商店，并带了一点铅白到船上。

“克鲁杰先生，您好吗？”商店老板向我们致意。还未等我们回话，他就很佩服地加了一句：“您的朋友真是太精明了。”

“您说谁？古尔德先生吗？是的，他看起来是个十足的商人。”

“对，我也要这么说！他太能侃价了。”

“侃价？”克鲁杰重复了一句，一头雾水。“您是什么意思？”

“什么，您不知道大约45分钟之前他到这里，把您给他买的裤子卖给了我。”

“天哪，不可能！”克鲁杰惊呆了。

“噢，先生，他确实这样做了。他走进来，告诉我说，他不再需要这条裤子了，而这条裤子还像刚买的时候那样好，我们讨价还价了一阵，最后，他同

意以两先令的价格给我，我真付钱给了他。这就是那条裤子。”

“我现在可以把眼睛闭上了，”这位快活的俱乐部成员开心地笑着（言谈举止中都透着笑意）继续说道，“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克鲁杰先生当时夹杂着困惑和怀疑的复杂表情。他沉默地离开了商店。他只是说了一句，‘好家伙，我来修理他。’我们回到家，谁也没有提这件事。在回去的路上，古尔德先生坐在他的手帕上。”

就在当天，克鲁杰先生也想好了他的计划。第二天，克鲁杰先生提议举行一次钓鱼会。古尔德先生拒绝前往。他扬言道，他对于小利文斯通的房产一点都不感兴趣，想坐当天下午的火车回城。但由于合同涉及了很多钱，他不能违反合同。他与自己的雇主展开了争辩，但是一时并没有什么结果。这位阴郁的小个子男人的神情看来依然非常果决。最后，彼此折中了一下，双方答应，由克鲁杰先生送古尔德及时赶到火车站。而且，克鲁杰先生必须绝对保证不能有任何闪失，古尔德特别强调道。

这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离开了纽约州新新监狱，这时我们看到了即将进站的火车在冒烟。我们本来是一路抓紧，但是在桅杆处的克鲁杰先生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放慢了速度；我们拉起了控帆索，向东岸航行。古尔德先生这次自己站着，抱住上风的舱口栏板，脸上充满了焦虑之情。此时，水面已经迅速变浅。我们在离岸边50英尺的地方，正对着火车站。克鲁杰先生报复的机会终于到了。

“松开主帆操控索和前帆操控索！”他大声叫道，“放下甲板！”

这个命令实在太爽了。控帆索嗖的一声从滑轮上解下来，一旁的水手滑出了系索栓，卡在中央甲板，霎时游艇发出刺耳的声响，船身摇晃，停止航行，搁浅在沙滩之中。看来这艘游艇注定要等到碍事的甲板吊起之后才能开始航行。

“什么事？”古尔德先生焦急地叫道。当然，他未识破诡计，因为他对于游艇的工作原理一窍不通，就像海象不懂得计算之法一样。

“恐怕我们要搁浅了，”克鲁杰先生装出一丝难过的模样。“小伙子，下来吧，我们一起来推。”

我们假装奋力地用长桨拼命地滑，而古尔德先生犹疑不决地屏息观看，他

的神情介于希望和害怕之间。但是，由于我们故意将长桨向船外倾斜，我们越是用尽力划，卡得越深。这位小个子男人的狐疑不止一点地冒出来，他对克鲁杰先生变得绝望了。

“我该怎么办！”他几乎哀号道。“我一定要赶上那趟火车！”

“那么，”这位开玩笑者故作严肃地说，“您必须淌水或游泳过去。”

火车已经逐渐映入眼帘，大概只有两英里远，不论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如果要做的话一定要快做。正如我前面说到，铁路大亨的早年时期经历了很多磨难，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地脱掉了他的黑衣服，仅穿着他那条刺眼的猩红色内裤，将他那件珍贵的细布外套抱过头顶，他躲在水里，尽管水本身很浅，但仍然达到了他的腋窝。接着，他开始向岸边走去。然而，只要他一想到要加快速度，他那双五短的瘦小腿就会以最幽默的方式前后划动。火车站站台拥着很多人，很快古尔德先生游动的奇怪身形就能够看清了。500多人哄堂大笑，笑声在水面上传到了我们耳中，女士们通红的脸蛋藏在遮阳伞下面或扇子后面，男士们则大笑地叫嚷。最后，淌水者到了石头墙的墙基处，一会儿就满脸疑惑（但已不太明显）地站到了石头上，他的一条大腿抬起，猩红色内裤就像是佛罗里达小海湾的海岸边满世界飘舞的旗帜，立刻空气中弥漫起尖声的大笑，我们现在也毫无顾忌地开怀大笑起来。玩笑的高潮就要到来，它几乎令这位不幸的受害者瘫痪下来。

克鲁杰先生下令：‘小伙子们，拉控帆索，升甲板。’随着游艇开出，在距离惊讶万分的古尔德先生只有不到10英尺的地方掠过，我们大笑着与他道别，建议他回家后，多吃些芥末。

他敏锐聪慧的大脑很快接收到了我们跟他开的大玩笑，他暗哑的脸蛋就像是画家的一幅素描画。但是，火车已经到达了车站，所有的旅客都已经上车，车轮开始慢慢地启动。古尔德爬上了墙，他的黑外套依然挂在墙头，‘请上车’的叫声响起，火车开始慢慢启动。当他在沙滩和石头上狂奔，被两位煞车手拽上后月台，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时，每一扇车窗都笑声一片。我们最后一眼看到他是在火车进入监狱隧道时。接着，在两边的铁路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一个猛子将自己的大腿扎进了裤腿，这时站台蹒跚后退，在他下面摇动。

“他还了克鲁杰先生的两先令吗？”这位作家问。

“还钱！”这位俱乐部成员应声到。他沉默了片刻。接着，他的眼中似乎灵光一闪，他慢慢地摇摇头，说了一句似乎离题的话：

“我——想——您——对——古尔德先生——不——很——了解。”

上述故事，我在尤金·克鲁杰先生的住所（利文斯通大道 1211 号）中交给了他，并顺便问到故事的真实性。克鲁杰先生是这样回答的：“我必须说，我很难想象是谁能够把握这么多细节，因为当时的与事者大部分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然而，不论说这个故事的人是谁，我们都不能否认您听到的这个故事确实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境。我那时很喜欢搞恶作剧，但是时间模糊了很多事情，记忆中也并非没有不那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古尔德先生收购巴尔的摩和俄亥俄电报公司，与西部联盟的合并成功，将他推向了世界上最大的电报垄断巨头地位，实际上他已经凌驾于竞争之上。事实上，议会是否会采取措施创立一家政府电报公司，以保证美国电报产业价格不受扭曲，这尚未得知。确实，西部联盟的确是抑制了价格水平的上涨，但是，通常认为这只是古尔德先生的权宜之计，因为他要向政府证明没有必要再创立一个电报公司，而一旦议会的注意力转移走了，价格又会上涨。

尽管我不同意政府采取没收西部联盟财产的过激做法，并且我也以评估以后的价格重新购买，但我确实认为议会的确应该采取某种措施，为全国的电报交流提供监管和保护性控制。我的意见是政府应该像调节器那样，而不是所有人那样进行干预，要注意避免可能演化为垄断的一切问题，还有铁路系统的连接。

古尔德先生在晚秋季节去了一趟欧洲，在那里佯装是为了健康、快乐和娱乐。他的秘密和最终的设计可能没有泄露，尽管他们已经是金融家和华尔街大亨们口中经常谈论的焦点。这个话题所实现的好处不仅是古尔德先生将自己的名片递给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一位代表，后者请信使转告古尔德说，欧洲不卖。

大约在 3 月的月末，他回来发现一些铁路，特别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系统，几乎陷入瘫痪的状态。

尽管我已经尽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古尔德先生的经历，但出于深深的谦卑之情，我省略了古尔德先生色彩斑斓的事业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我现在暂告一段落，这里就此打住了。

第 25 章 Chapter 25

肯尼的投机事业

他最初是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经纪人开始从事投机事业的 ◆ 一次在矿业股票上的成功投机，使他走上了成为百万富翁的道路 ◆ 他对富矿的意外投资 ◆ 他赚了 400 万美元之后，出发去欧洲旅游，在华尔街逗留，在这里，他和古尔德办了一家合伙公司，结果古尔德“欺骗”了他和其他人 ◆ 塞洛弗把古尔德摔在一条通道里 ◆ 肯尼独自离开之后又赚了 900 万美元 ◆ 此后，他莽撞地四处投资 ◆ 一个突然性的逆转，使他陷入困境 ◆ 在由古尔德和坎马克发起的一次卖空投机中，他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损失了 700 万美元 ◆ 他绝望地试图收回一部分资金，结果遭到了更多的损失，耗尽了他的 1 300 万美元 ◆ 他的慷慨豪爽，以及他与山姆·沃德的社会交往

华尔街有一人，其命运之跌宕起伏堪称首位，他就是詹姆斯·肯尼 (James R. Keene)，他的飞黄腾达之时和失势落魄之日都相距甚近。

肯尼先生是英国后裔，大约 48 年前出生于伦敦。在 17 岁时，他来到美国，在南部学习法律。1853 年，他搬去旧金山。在旧金山的律师行当实习律师时，他受理了几桩关于采矿的案件。这些案件使他开始熟悉采矿业。我听说，他也和一家西部报纸有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到加利福尼亚州后不久，他被那里的投机热潮所感染，放弃了法律行业和新闻工作，成为一名经纪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为了勉强度日，肯尼非常拼命地工作。他在西部荒原的

生存斗争使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医生告诉他，他必须停止工作，并且建议，如果他想要延长生命的话，最好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他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开始去东部旅行。这成为他身体健康和命运的转折点。

在出发之前，他经人劝说将几百美元投资在一个当时卖价很低的矿业股票上。漫长的旅途和常新的风景，几乎使他忘记了他的投资。并且，当时东部和西部之间的交通方式十分落后，所以，在他回到西部之前，他也几乎没有机会得知他的幸运消息。不妨举一个当时信息流通极慢的例证，假设说在1848年的1月19日发现了一个金矿，那么可能要到第二年的12月这个消息才能传到东部各州。在总统的年度报告中，官方发布了这个消息，它引起了极大的振奋。阿尔弗雷德·鲁宾逊（Alfred Robinson）先生带着大约20个同伴，坐上“约翰·本顿”号船，第一批离开纽约前往新的黄金国度。

离开西部将近一年的肯尼在回来时惊喜地发现，矿业股票的股价已经出现了巨幅上涨，并带动了他投资的那只股票股价上升。那个矿最后被发现是一个真正的富矿，而那只股票只花了他几百美元的股票现在价值已经超过20万美元。

如果不是当时肯尼的身体健康状况要求他离开这个投机之地的话，很有可能当这只股票上升到几千美元的时候他就将它转让了。

这次成功对于一个相当贫穷的人来说，不啻是一次辉煌的成就，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人为此感到骄傲。但是，这只是让肯尼更加渴望更大的成功。更大的成功，是他努力的方向。

当时的投机热潮非常猛烈和盛行。伴随着飞快的增长速度，连服务员们都迅速地变成百万富翁。肯尼先生在董事会上获得了一个席位，开始做大生意。

弗勒德（Flood）、麦卡伊（Mackay）、费尔（Fair）和欧布莱恩（O'Brien）是当时著名的投机家。投资之风迅速沿海岸蔓延开来，并很快地将其影响扩大到整个大陆。肯尼后来的投机也都获得了和第一次类似的成功，甚至实现了更高的收益率。

看到矿业股票上升幅度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和老丹尼尔·德鲁的看法一样，肯尼自然地推断，像这样上升得太快和太高的股票必然会下跌。然而，当时在黄金海岸很少有人会以冷静的心态去推理。而且，也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去卖空股票。然而，肯尼先生对自己的推断深信不疑，很勇敢地在市场

上大量抛出股票。

有一个强势集团对抗他的做法，因为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强大的辛迪加财团，有加利福尼亚银行的支持，他们是他的对手，对他十分怨恨。他们用尽了办法来打压他。然而，尽管他们十分努力，市场在肯尼卖空的压力下还是开始走低。很快地，所有证券都跌价，股票开始从它们令人眩晕的高处下跌，其速度甚至比之前它们上升到那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时还要更快。肯尼在这些股票的下跌中净挣了几百万美元。他在贝尔奇和克隆波因特矿股票上挣了 250 万美元，在俄斐矿股票上挣了超过 50 万美元。

于是，短短几年，这个曾经可怜的律师、记者、身体不好的场外经纪人，发现自己已经是几百万美元的所有者。他的名字戴上了风险的光环，他的巨额财富在两大洋之间的每个大街小巷和矿区尽人皆知。

当这个巨大的经济泡沫破灭时，当加利福尼亚银行破产时，当行长罗尔斯顿先生假装要在太平洋里游泳而实际上是自杀时，肯尼依然站在市场上正确的位置。

1877 年，肯尼先生为健康着想，前往欧洲旅行。他在华尔街做了一个友谊式的逗留，以便看看那里的生意怎么样。他发现这里的投机吸引力简直不可抗拒，就像穆罕默德向大山走去，被磁石般的魅力所深深吸引那样。^①

虽然肯尼在加利福尼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但来到华尔街他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他很快就发现加利福尼亚的策略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他开始卖空，但是发现他在旧金山使用的看跌的指挥棒未能奏效，市场并没有走低。当他卖出 1 万股某种股票时，市场上只是一小部分股价不明显地下跌了，而不是像他预计的那样暴跌。并且，市场很快就恢复了原状。肯尼先生很快明白，他这是在往筛子里倒水，徒劳无功，于是停止了如此挥霍他的加利福尼亚黄金股票的行为。

后来，肯尼和杰伊·古尔德联合坐庄，共同对抗西部联盟。肯尼和塞洛弗大批地卖出股票，但是一卖出就被一个或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吃进。他们都怀疑古尔德先生是一个阴险的合伙人，是他躲在幕后操纵人买进这些股票。塞洛弗少校对此事非常认真地思索，最后他的怀疑开始付诸于行动，通过暴力手段表

① 来自英语谚语。——译者注

现了出来。

一天早晨，塞洛弗少校和肯尼在证券交易所的后门，新街见面，并相互交换在这个问题上的大致看法，就像比尔·奈（Bill Nye）与他的同伴在牌桌上欺骗那位异教徒中国人那样。塞洛弗两眼充血地沿街走着，在新街和证券交易所的拐角处遇见古尔德先生。塞洛弗抓住古尔德外套的领子和裤子，然后把他丢在一家理发店前的通道里。

这个瘦小的先生迅速爬起来，安静地走向他的办公室，做了一笔交易。此次交易让塞洛弗损失了15 000多美元。这是他报复的方式。

之后，肯尼先生参与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电信联合坐庄，再次获得幸运之神的亲睐。人们常常说他在此次交易上损失惨重，实际上他在损失之前已经退出，对此我有确实可靠的证据。在和古尔德联手对付西部联盟的那次交易中，他和古尔德两人的共有账户净挣130万美元。人们都认为古尔德在这次交易中“欺骗”了肯尼，但那些都是很显然的事实。

肯尼通过观察投机领域，发现自1873年的大恐慌以来，股票价值就一直极大地贬值。他来得恰是时候，可利用这种趋势。他有400万资金支持他的投机，最初的一些损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倒似乎是适时地给了他一些启蒙教育。

华尔街当时为了推动投机的车轮高速运转，正好需要这种新鲜的血液。肯尼先生以异常快的速度熟悉了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最主要的那些股票。它们当时都降低到了恐慌价格。看到大部分这样的股票都到了真正的低价，肯尼大量买进。很快地，市场行情出现了转折，投机热潮到来，并一直延续到1879年和1880年，其间只有一些轻微的倒退。

从本书最后所列的表格可以看出，这次市场行情上涨幅度很大，利润也很高。

肯尼的几百万美元增加了一倍，后来又增加到原来的三倍。他肯定感觉自己像是现代的克利萨斯王^①了。

整整900万美元添加到他当时从加利福尼亚带过来的400万美元上。他被包围在巨额财富之中，打个比方说，他就像是来自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

① 克利萨斯（Croesus）是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吕底亚国极富的国王。——译者注

人眼中的北极星般耀眼。甚至在大洋彼岸的欧洲，他也声名大噪。

古尔德和其他的老投机家开始妒忌肯尼史无前例的成功。他似乎超越了基督山伯爵或丹尼尔·德鲁的贪婪之心所构想的那种最疯狂的梦想。他的成功也将塞勒斯上校所设想的利润变成真正的现实。他基本上都是投资于优质、可靠的证券，没有不可靠的纸面承兑票据或劣质的铁路股掺杂在他的有形资产之中。在当时的华尔街，没有谁的财富可以与他的财富的规模及积累速度相提并论。

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功，这在投机史上是空前的。不过，很遗憾地，我不得不说，这种非凡的成功到此为止。

在那个该他倒霉的日子，当时他依然把自己无限的兴趣投在股票上。然而当把自己的精力分散在所有的投资领域时，接连不断的胜利令他兴奋和忘乎所以，以至于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失败。他认为是命中注定的投机者，就像拿破仑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战争天才一样。他投机于当时出现的所有领域：小麦、猪油、鸦片和赛马。

肯尼想通过垄断囤积国家谷物来获取暴利，然而却成为他失败的一个信号。就在那个星期，福斯豪乐在巴黎战胜格兰德·普瑞克斯，肯尼却在投机竞争中被西部稳健的农场主击败了。农场主们把谷物投入市场的速度快于肯尼收购的步伐，虽然他动用了自己账户上的所有 1 300 万美元资金，以及他能申请到的所有贷款信用。

突然间，反转的趋势在投机的浪潮中开始上涨。坎马克（Cammack）先生很快意识到肯尼投资的行业和产业过分扩张。坎马克与古尔德进行了交谈，他们确信肯尼将很快陷自己的一些产业于脆弱、孤立无援的境地，因为他不可能顾及所有这些产业。这两个大卖空投机家联合起来，竭力抑制市场价格，并且每天还吸收新的力量加入。最终，他们的努力开始凸显效果，并且很明显他们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空头开始增多，多头趋于下降，并且当时后者的下降速度不可遏止。

银行家们开始胆怯，券商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而要求更高的利润。在这场卖空投机运动中，大量贷款放出，并成为这场运动中的一部分。社会萧条已经在所有部门开始显现，市场价格急剧下降，许多一直以来被看作可以视同固定资产的财富形势急转直下，被大量抛售，许多甚至变得一文不名。实际上，

这是一场普遍的恐慌。在这次大恐慌中，许多证券商卖出肯尼先生的股票。肯尼先生的小麦也以低价大量卖出，他卖出的速度非常快，甚至超过了当时买进的速度。

在那时，他的损失据说有 700 万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肯尼想努力挽回损失，却遭到了更大的，并且接连不断的损失。在他努力挽回损失的过程中，随着他变得日益绝望，他的损失也随之增大，直到他所有的财富几乎全部消失在他徒劳的努力上。

从肯尼破产那一刻起，整个华尔街便充溢着人们对他的无限同情，因为他是华尔街历史上最慷慨大方的人。不仅是投机行业中的同行，就连华尔街的档案记载也证实了他的慷慨取得了大家的认可。这份档案表明，本世纪初期在法国梧桐树对面的汤丁咖啡馆，证券商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此时是肯尼事业的辉煌期，没有人可以在慷慨上和他相提并论。

那些借助于他的慷慨和事业而变得富有的人不计其数。至少有许多华尔街的证券商依靠他的佣金从一文不名发展到腰缠万贯。许多人在事业初创时，办公室里仅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来为肯尼服务，现在他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但是，肯尼现在却变得相对贫穷，只能靠妻子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肯尼从一无所有到身价 1 300 万美元，现在他又回到了原点。有关肯尼的慈善慷慨的真实记录太多，尽管我非常敬重他，但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列举。

我将从他不计其数的慷慨事例中选取一件，来说明他如何变得如此受欢迎，家喻户晓。

在肯尼出现在华尔街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山姆·沃德在华尔街和华盛顿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并且他在欧洲社会也声誉鹊起。这位先生最初是靠跟阿斯特结婚而被迫家喻户晓的。他行踪不定，最后他来到了华盛顿，并在此游说议员。

当肯尼来到纽约时，这儿正充满着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由于财富的空前大幅缩水，大多数纽约投资者的资本向流水一样减少，在他们大量亏损的同时，肯尼赚取了他的 400 万美元。这次财富大缩水开始于 1873 年的大恐慌，一直持续到 1878 年。这时社会通过降低某些阶层而使每个人几乎处于平等的位置。财产，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严重的绊脚石而不是利益，许多人都希望

能够去除与其财产相伴生的责任，因为财产都被抵押出去了。每个人都感觉穷困不堪，事实也确实如此，只有少数幸运儿例外。

肯尼就是在这个最幸运的时刻来到这儿投资，当时几乎每件东西价格都非常之低。因此，他成为大家好奇的目标，就像他在旧金山一样，在我们中间受到关注。

肯尼来到纽约后最先遇到的熟人中有一个就是前来祝贺的山姆·沃德，这位伟大的社会公众人物。山姆·沃德立刻就看出肯尼的社会价值，这不仅仅在于他的钱财，更在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后者才是财富的真正代表。他越是看清楚了这一点，他与肯尼的联系就越紧密。最终肯尼认为山姆·沃德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充满爱心的那种朋友，称之为“胜过手足之情的朋友”。

无论肯尼出现在哪儿，虽然看似他一个人，但是我们确定您很快就会看到山姆·沃德的身影。

有一个关于塞内加的故事，当他看到一座房子要倒，而旁边没有人。他却问道：“女主人呢？”肯尼的出现也是如此，对于沃德来说，他很自然代表的是每位华尔街人和每位有德识之士的一种精神境界。

在新港、在伦敦、在德比郡或在普瑞克斯，无论是郊区还是市中心，情形都一样。无论肯尼出现在哪儿，山姆·沃德都会以神奇的速度出现，就像神话中的阿拉丁，只要他碰碰他的神灯，或摸摸他的魔戒，神仆就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对山姆·沃德来说，他这种对肯尼的自我牺牲和热情奉献得到了肯尼的认可，肯尼用实际行动回报了他。肯尼投资 5 万美元购买了固定收益国库券并将它们送给了山姆·沃德。这样，山姆·沃德就可以每年获得 3 000 美元的收入作为他的养老金。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事例，其实，肯尼给予了他新结识的好友数不清的好处。

一个太平洋沿岸的传记作家，在离开加利福尼亚一段时间后，对肯尼做了如下生动的描述。这段描述结合我上面提到的一些事情非常有趣：

在描写太平洋沿岸股票市场的杰出人物时，如果忘记描写詹姆斯·肯尼，那么这样的描写不能算是完整。肯尼是旧金山股票市场的自由操盘手，他敢于

冒犯巴拿马国王并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大量金银凯旋。在变现了他的大部分股票投资后，肯尼离开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决定去东方旅游，然后去欧洲，直到大西洋。这次长途旅行使他在太平洋恶化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康复。他是同家人一起去的。那些给他送行的人，本期待他会在一个月内，至多一年之内带着健康的身体、新的志向、新的目标归来。但是，他没有回到旧金山，因为纽约比他的故地给了他更大的吸引力。铁路股票、山姆·沃德等对肯尼来说拥有太大的吸引力。他很快就适应了纽约股票市场，就像一个人在一群贼中间也会逐渐变成贼一样容易。但是，似乎在每个问题上他都能做得最好。当有谣言说肯尼想把华尔街变成他的总部时，他在旧金山的老朋友拿出日历，并计算着肯尼归来的日期，他何时会突然回来寻找一份工作。有少数人对肯尼报以了不变的信心，他们知道他的勇气，了解他的能力。他们看着日历说：“肯尼已经走了，他再也不会回到我们这个小地方屈就了。纽约很大，华尔街很大，那儿正是肯尼想去的地方。”这些人是正确的，肯尼还是没有回来，他已经决心和华尔街最聪明的交易员决一高下。虽然初来乍到，肯尼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利福尼亚那些傻子，他们的居心叵测均未取得成功，即便是古尔德还有他的一路货色也不例外。他们只好放弃这一毫无意义的行动，在关键时刻，范德比尔特还不得不屈尊来向肯尼请教。

几年以前，肯尼在旧金山作为一名股票交易员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刚开始，他属于容易冲动、喜欢铤而走险的那种股票交易员，很引人注目。他为大公司做事并偶尔太过于自由放纵。后来，他平步青云，从最低层爬到了最顶层，从私人身份到了代理商，接着他又成为了公司的管理者，最后成为公司的老板。在股票市场没有一个人可像肯尼那样具有如此大的影响。肯尼有一群朋友，他们关系密切且肯尼对他们极为信任。肯尼慷慨大方，有时行为粗鲁，却有一副软心肠，容易被感动。他对每个朋友都乐于帮助，敞开心扉，难怪他被看作是股票市场中完美的人。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挽救罗尔斯顿（Ralston）死后的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行动中，肯尼做出了最大贡献。他在公司董事会上发起捐赠签名并让霍恩·威廉·沙伦（Hon. William Sharon）、D. O. 米尔斯（D. O. Mills）和幸运的鲍德温（Baldwin）每人捐了100万美元。这样，银行才得以应付眼前的急需并

最终化险为夷。

当肯尼遭遇失败的时候，他正担任一家联合企业的主席。当时，企业联合会购买了 2 500 万蒲式耳的小麦。如果当时企业都坚决持有而不抛出，他们将获利丰厚。但是，联合会中有一两家企业因为胆怯而将小麦抛售。这样，联合会解体，并且损失严重。肯尼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报纸，因为它们通过操纵小麦市场而威胁人们说基本的生活用品将严重缺乏，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陷阱的普遍恐慌。

肯尼接着也被迫抛出了自己的股票，这主要是因为空头的精心捏造的卖空阴谋。当他看到，如果他能坚持他已经持有了几个月的股票，那么现在他将来能获利 1 000 万美元时，他感到万分羞愤。

第 26 章

Chapter 26

维拉德和他的投机事业

著名的投机商重回华尔街 ◆ 在北太平洋公司收购案中召集了那家著名的盲资公司 ◆ 维拉德如何赢得北太平洋公司 ◆ 他采用了老范德比尔特的计策 ◆ 筹集了 1 200 万美元的证券资金 ◆ 维拉德从筹建盲资公司的操盘手到变成成功的铁路大亨 ◆ 从一无所有到拥有 10 亿美元，他的计划不断膨胀 ◆ 他采用发行掺水股的独特方法可与乔治·希尼相媲美

亨利·维拉德先生在他的故乡德国小憩了两年之后，又重回到华尔街。维拉德的回来，重新激起了公众对这位爱冒险的投机商的浓厚兴趣。在本书中，如果缺漏了这位先生大胆的铁路股操作手法，那么我对华尔街重大事件的回忆录将变得不完整。

维拉德先生投机生涯的巅峰发生在 1879 ~ 1884 年这 5 年时间，那时他利用一家盲资公司^①收购了北太平洋公司。

这里，我不再像一般的人物传记那样，对他一生的经历娓娓道来，直到他人生的这一高峰期。我会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地描述我们这位英雄事业上的这段最有趣的人生经历。

① “盲资公司” (blind pool)，盲资公司的股东大部分是一些抱赌博心理的小投资者，投资于盲资公司的目的就是希望公司能找到合并方，从而自己能从股价飙升中获取暴利。——译者注

对北太平洋公司的收购中，他采纳了老范德比爾特的计策，唯一不同的是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而范德比爾特总是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维拉德是组建俄勒冈州铁路和航海公司的主代理人。如同公司文件中所阐明的公司宗旨一样，这家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合并俄勒冈州轮船航海公司与俄勒冈州蒸汽轮船公司的业务，以及购买、筹建和操作铁路股。俄勒冈州铁路和航海公司的航线从波兰西部一直延伸至美国的沃卢拉汇合地。

然而北太平洋公司西向延伸其航线至塔科马港市终点站的项目，严重威胁了这项资产（公司）的市场价值。

维拉德先生向北太平洋公司的董事长比林斯先生（Mr. Billings）提议：北太平洋公司出资开拓到达太平洋海岸的航线，这样这条航线就可横越过俄勒冈州铁路和航海公司的航线。但是他的建议遭到了拒绝。

就在这危急关头，维拉德求助于老范德比爾特的计策，即设法收购足够的北太平洋公司股票，直到最终获得该公司的控制权。为此，他筹建了一家盲资公司，其中沃里奇霍夫（Woerishoffer）、普尔曼（Pullman）和安迪科特（Endicott）以及其他许多可靠的人士组成了盲资公司的首创阵容。他们斥资800万美元收购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在1881年的春季，这个集团一直在有条不紊地买进，这个操作一直持续到夏季中旬。当他们发现公司的资金几近枯竭时，仍然没有实现获得北太平洋公司控制权的目的。

于是，维拉德先生召开了一次会议，解释了这次事件，提议扩大集团的操作范围，增加公司的集资者。由于维拉德先生向集资者展示了巨大的利润回报预期，他成功地获得了1200万美元新认购。这次融资巩固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控股权。1881年9月，维拉德先生被选为北太平洋公司的董事长。

维拉德一夜之间从盲资公司的操盘手变成铁路大亨，某种程度上，在公众的眼中，这就如同米诺娃^①（Minerva）全副武装地从朱庇特的头上跳出来一样不可思议。

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价格暴涨，据估计维拉德和他的同僚们也以空前的速度累积了数百万美元。维拉德似乎实现了基督山伯爵的全部发财梦，他很快就成为可与古尔德、范德比爾特和亨廷顿（Huntington）相比的骄傲而危险的竞

① 米诺娃是掌管智慧、发明、艺术和武艺的女神；朱庇特是统治诸神主宰一切的主神。——译者注

争对手。

在他成功地借助盲资公司赢得了北太平洋公司的控股权之后的两年，北太平洋铁路竣工了，维拉德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非凡的成就引诱他大举拓展其他投资领域。尽管他之前已经习惯了节俭的生活，但是现在他变得挥霍无度了，他在第五十大街麦迪逊大道建造了一座官邸。

正当维拉德处于事业的颠峰时，他的处境突然变得尴尬。铁路的成本核算出来后，他发现误算了2 000万美元，他一下子从高峰跌落下来。维拉德的解释是工程师对铁路造价的估计是2 000万美元，而实际造价却高达4 000万美元。

这2 000万美元由盲资公司认购了，认购者获得了俄勒冈州铁路公司的股权。而这家公司本来就是为了开拓北太平洋公司的分支航线而组建的，因为北太平洋公司的章程不允许建造这条（分支）航线。

这就是维拉德先生的投机简史——从他掌权俄勒冈州到加利福尼亚的铁路（航线）到他一落千丈的危急时刻。然而，在他全身心投注在北太平洋公司之前，他的铁路史中还有一些更有趣的小故事。作为一名股票融资者，在铁路股管理这一重要领域，除了乔治·希尼先生可与之平起平坐之外，可能没有人比他更优秀了。他在赢取俄勒冈州轮船航海公司与俄勒冈州蒸汽轮船公司的控股权时所采用的谋略，充分地说明了他在这方面的卓越能力。当维拉德计划购买这两家公司时，他身无分文，但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请求两家公司给予他经营一年10万美元的期权，他们同意了。维拉德马上请来多位金融资本家，他们一起准备了俄勒冈铁路航海公司（以上两家公司合并后的名称）的合并文件。这家拥有如此响亮名称的公司成立时，没有任何资产，并且其前景也是一片黯淡。其创立者名单如下：纽约的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詹姆斯·弗赖伊（James H. Fry），阿特姆斯·霍姆斯（Artemus H. Holmes），克里斯丁·博斯（Christian Bors），W. H. 斯塔巴克（W. H. Starbuck）和查尔斯·布拉泽顿（Charles E. Brotherton），以及波兰俄勒冈州的W. H. 科伯特（W. H. Corbett），C. N. 李维斯（C. N. Lewis），J. N. 多尔夫（J. N. Dolph），保罗·舒尔策（Paul Schulze）和N. 蒂尔逊（N. Thielson）。名义资金600万美元，分为6万股。协议于1879年6月生效。

重组后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筹集运营资金。

在维拉德先生管理下的董事会正在设法解决这个问题。重组之后的几天，他们相聚在波兰，向纽约农场主信贷和信托公司抵押贷款，并在此抵押下发行了 6 000 份每份 1 000 美元的债券，归还期是 1879 年 7 月 1 日后的 30 年内，利息是 6%。

然后，维拉德先生把 10 万美元的红利给了合并的两家公司。他拿着他的期权、股票和债券来到东部，为证券的事奔波。据说，他把这些证券推荐给杰伊·古尔德，但被拒绝接受。古尔德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计划里，他清楚地看到这个项目的复杂性，因而他宁愿避免麻烦。幸运的是维拉德遇上了波士顿的小安迪科特（Endicott, Jr.）先生、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先生和其他对这家盲资公司感兴趣的人。

组建新公司后，那两家公司大胆投放市场的证券在证券市场上一直无人购买，直到下一年的 3 月。

在合并完成后，俄勒冈州铁路和航海公司的有形资产不超过 350 万美元，而全部债务却高达 2 100 万美元。它的组成如下：

原始股.....6 000 000 美元

掺水股.....3 000 000 美元

掺水股.....6 000 000 美元

有抵押债券.....6 000 000 美元

你可以看到每 1 美元资产对应 7 美元债务，股票的内在价值是 -20%，根本没有正的价值，也就是说，比无价值还要少 20%。

尽管这样，维拉德先生还是把这只证券列上了上市证券名单，通过细致准备的报告显示（公司）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回报潜力，他把公司股票推升至 200 点。当达到高位价格时，上面提到的 900 万美元掺水股被抛出，以防止出现不稳定因素。

正如这一章开头所描述的，这是在维拉德对北太平洋公司进行更大规模操作前，一次成功的预备性融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维拉德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希尼先生。正如我在上一章提到的，希尼先生尚未把公司证券列入上市证券名单，就在重组问题上无节制地发行了很多掺水股。

维拉德一开始就大量地采用了希尼先生的方法，同时在股价上涨至暴跌点时，大手笔地抛出掺水股。

也许在整个铁路股操作史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四两拨千斤。在公众面前，他似乎异常成功，腰缠万贯，而实际上私底下却囊中羞涩。

从1879年白手起家开始，他通过各种灵活的（融资）手法，成功地在一年之内拥有了350万美元的个人铁路证券资产，并以此为股票操作的保证金，在5年内成功地获得了北太平洋公司的控制权，融资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

第 27 章 Chapter 27

费迪南德·沃德

著名的诈骗王子的特殊才能和方法 ◆ 他是怎样欺骗那些精明的金融家和商人，获得著名的政界人士和主要银行领导的支持，从中搜刮走百万美元的？ ◆ 当代最狡猾的诈骗家 ◆ 这位诈骗者如何诈骗格兰特及其家庭的真相

要客观地评价格兰特·沃德公司的费迪南德·沃德在 1884 年的恐慌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只能说沃德的方法，与它的理念和实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信任游戏。沃德通过曲意逢迎、花言巧语，取得金融界和社会界一些杰出人物的青睐和信任，以此来增强信心。

他的外表富于魅力，举止矫饰得异常谦逊。他有极完美的掩饰艺术，而且有超常的说服力，从他的观点中似乎看不出任何自私的内容。他的社交天赋经过磨砺，得到了如此高的发展，以至于他能够令那些伤心的受害者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

通过利用对方的轻信弱点，沃德能从他们手中骗取数以百万计的资金来为自己私用。一些富甲一方的金融家成为他的受害者，完全被他承诺的高利率和各种产业的高收益所引诱。

沃德会查出那些在银行有大笔存款但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投资去向的人的名字和背景。他会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将钱从银行取出，然后通过他，将资金投向据称能提供巨大回报，但关系微妙且操作中要求保密的“政府合

同”。这样很自然地就省却了沃德介绍企业情况的口舌之劳，因为如果利润通过这样一个稳定的投资而有所保障，那么作为投资者是没有必要了解企业情况的。对他们来说，确保高额回报已经足够了。

这里我将举一个沃德欺骗手段得逞的例子。这个例子有较强的代表性，讲的是一个抵押了 5 万美元在沃德那里的人的经历：

这位先生打算去欧洲旅行，他抵押的那笔钱据说是在他旅行的那段时间转给沃德先生，在自己不在期间沃德先生可以以他认为最恰当的方式投资，获取最大可能的利益。

6 个月后，这位先生从欧洲回来，给格兰特·沃德公司的办公室打电话了解投资的进展怎样了。他见到沃德，然后谈到投资的事。

这位年轻的“金融界拿破仑”一见到他的客户就开始在脑海里回想这位客户的音容笑貌，因为令人称绝的是，他发展了一种在颅相学中被称为特性的才能，从不会忘记任何一张面孔，但是在这无比繁忙的投机中他忘记了这件事的背景，直到他看了自己的记录本才回想起来。然而，他离开办公室仅仅几分钟后，就回来告诉这位先生说，他的 5 万美元已经投资出去了，在他的操作下可获得幸运的回报，而这对于他来说是很自然、很普通的。他非常高兴在减去正常的费用之后能够给他 25 万美元的支票作为投资的回报。

这个人被这个意外的惊喜压倒了，巨额的利润煎熬着他的判断力。这是一个他从未幻想过的投资金矿，那夜他没睡着，全部心思都用在计算这 25 万美元，如果按照这 5 万美元同样的回报率来算，可获得多少利润。

不需要很多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另一轮同等回报率的投机，他将在接下来的 6 个月内成为一位百万富翁，而原始的投资额仍然完好无损。那么，他是否应该做这样的第三轮投资呢，看起来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他需要亲自打理自己的业务，他甚至可能都要按堆来堆放这几百万美元了。

这个幸运的投机者，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想法，未等到上班，他就乘高速火车到了沃德的办公室。当沃德来到办公室的时候，他笑容可掬地与自己的客户见过面，然后很潇洒地接过他的支票，并在他的记录本上做了个记号。

这次，这个投资者没等多久就知道了他的投资结果，它就发生在 1884 年 5 月 12 日的前几天。1884 年 5 月 12 日那天格兰特·沃德公司破产，华尔街的马林银行被宣布成为一次突然恐慌的第一个牺牲者。这样，妨碍第二次投资的

不幸恐慌也对第一张支票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当然沃德先生可以告诉他的客户说他对此概不负责。

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金融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沃德、菲什、伊诺克公司，恐慌还会发生吗？尽管答案只是可能，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即沃德先生必然具有一种对他人的很强的控制力，能够通过卓尔不群的接触方式来控制对方，能够在所有金融业务中对他们大加利用。被认为是投资专家的老奸巨猾的金融家们，虽然他们自己也精通所有讨价还价的策略，但面对神秘的沃德的出现却似乎都乖乖束手就擒。只要有一线的希望，沃德就会施展他独门的花言巧语欺瞒哄骗之术，占尽所有先机，而让其他人只能望洋兴叹。

沃德可以说是一个能读懂别人心思的人。当他将那张 25 万美元的支票交给前面那位先生的时候，他知道它还会回来。而凭借这张支票，他可以掏光那个人放着支票的口袋，迟早他都注定会将那张支票放回那个神秘的地方。毫无疑问，这不是沃德第一次尝试这种手法。显然，他经常这样做，他甚至可以更精确地算出受害者的机率，就像保险公司制作的死亡率表格一样精确。费迪南德遵从着一个规则，他能精准地指出例外情况，他的成功表明他的时间没有浪费在棘手的案例上。

沃德显示出非凡的老练，他能一眼看出哪些人足够好骗，会陷入他设计的陷阱，他还表现出了极强的操纵能力，能抓住恰当的时机袭击他的猎物。他的操作手法与意图极好地融合。例如，他知道这个人不会将钱用于其他的任何投资，也不可能让除了沃德以外的其他人操作，因为再也找不到其他人能给他这样巨大的投资回报。

然而，神奇的是，如此高额的利润回报，以一种看似有理的方式呈现的时候，竟然压制和麻痹了人们的怀疑之心。

沃德那似是而非的托词，在对付最顽固不化的怀疑者方面同样无坚不摧。所以，那些完全不懂商业和投机的人如此容易被骗子的阴险、逢迎的行为和诱人的诡计所害，也就不是什么怪异之事了。

沃德的说服艺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不仅能成功地猎获许多著名金融家的可用资金为自己所用，还有能力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活广告，帮他推销他的邪恶计划，将他们变成最佳客户，他们陶然自得，完全未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给那些邪恶的计划充当棋子，为沃德招徕客户。事实上，他们自愿成为了沃德的说

客，其动机很单纯，是为了感激他们的秘密经纪人和恩人。

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儿子就是这样成为了沃德阴谋算计的无辜受害者。

那些责怪格兰特将军的人未能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一旦与沃德那成熟老练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的金融诈骗相交鋒，即使是著名的士兵和能干的战术家，比之新招募的新兵也好不了多少。

在这场菲什和沃德两人的联合帐户上进行的信任博弈中，一个重大的关键点就是寻求知名人士的支持，为他们公司的信任度进行担保。这样的担保犹如替恶魔加上了天使的脸蛋和翅膀，能使他们实力增强，信用拓展。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引诱格兰特将军签署了著名的致菲什的2号信。正是这封信成为了诸多批评和评论的对象。以下是这封信的复印件：

华尔街2号

6号房间

1882年7月6日 纽约

亲爱的菲什先生：

关于您为格兰特·沃德公司的账户所制定的折扣事宜，我认为该项投资是安全的，我也乐意沃德先生以我的名义和影响获得他可以给公司带来的利润。

您真诚的朋友，

格兰特

这封信是写给国民航海银行的总裁菲什的，信上说他已经为格兰特·沃德公司预付了20万美元。他解释说：“据我理解，这些钱并不是用于其他目的，仅仅是为了支付谷物的贷款筹集资金，以便使政府践行合约。”

这封由格兰特将军签名的信，他的辩护律师认为“只是一封普通的商务信”，格兰特将军只是对沃德和菲什表示信任，就像任何一个人对其他人表示信任一样。

这确实是沃德按照菲什的指示写的信，然后让格兰特将军签的名。

去年7月份，在接受《纽约世界》的一位记者采访时，沃德是这样解释这封信件的签署背景的：

记者问：“关于这封由格兰特将军签名，写给菲什先生，有关政府合同的信，您知道什么情况吗？”

沃德很快回答到：“当然知道，我按照菲什先生的指示起草的，他请我写，建议我该写什么。他在格兰特·沃德的折扣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因为他很关心这个问题，并筹集了百万美元，他需要出示一些东西给国民航海银行的总裁科克斯先生以及另外一些需要向他们伸手借钱的人。合同是最重要的事，他说如果能够从格兰特那里得到一些东西来证明他对这个合同知情的话，对付那些人就会简单些。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封信是怎样准备好的。菲什给我大致描述了一下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由我来写。菲什先生检查了一遍，用他自己的笔迹做了些更正。信是很潦草地写在办公室里随手找到的一张纸上，按自己的意思修改以后，他把信给了我，让我交给出纳斯宾赛去复印。我不确定，但可能在我的文件夹中藏有这个草稿。我记得公司破产之后我还看过它。如果它仍然在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格兰特将军签名之前，菲什先生是知道所有一切的。将军习惯于签我交给他签的文件，而并不注意它们的具体内容。所以，当我让他签这份文件的时候他也没注意，没有任何的疑问。我清楚地知道菲什要它做什么，因为他告诉了我。而且，我毫不怀疑科克斯先生和其他借钱给他的人都看过那封信。”

第 28 章

Chapter 28

亨利·史密斯

史密斯先生怎样起家，并成为成功的操盘手 ◆ 他和特威德的集团有紧密的联系。他和那位著名的“老板”一起做了很多幸运的投机，通过运用城市基金来给货币市场制造压力 ◆ 与范德比尔特联合操纵处于崩溃边缘 ◆ 此时他向沃里奇霍夫先生的卖空投机方转变，又赚了一些钱，但是坚持卖空投机政策不仅使他受损而且拖累了威廉·海斯先生的公司

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亨利·史密斯，他是史密斯、库德和马丁合伙公司的一员，但从投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的重要性完全值得单独立传。

这位先生出生在布法罗，来华尔街之前曾在当地做过贸易。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来自布法罗的年轻人。他有一副希伯来人的长相，暗红色的头发，褐色的胡须，锐利深邃的目光中流露出自信。他在布法罗赚了钱，并且很幸运地在华尔街的第一次冒险中就赚了钱。史密斯是 1864 年股市恐慌中少数赢家之一。史密斯成为一个大胆的操盘手，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每次他按照自己的判断去操作的时候，都例无虚发地获得了成功。1873 年的股市恐慌使他第一次遭遇厄运，直接的原因是史密斯受到范德比尔特船长的影响，在他的劝说下购买了西部联盟的股票，那年这支股票急剧下跌，几乎毁了他。他损失了所有的钱财，除了纽约的住所和一支农场的股票之外，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勇气，他很快地恢复过来，并在华尔街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尽管投机有得有失，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史密斯很多年里总是能够把握市场的方向，终于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而且富有的投机家。

在各种投机操作中，他总能使自己讨得贵人的欢心，并且能调动与其实际资金额相比数额庞大得多的信用。

几年前，他在从欧洲回来的归途中遇到了威廉·范德比尔特先生。他们讨论起市场未来的走势，范德比尔特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买空的证券投资。他们达成协议一起联合坐庄。但是结果投资失败了，范德比尔特先生损失了几百万美元，几乎把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家产损失殆尽，这同样对史密斯也是一场灾难。

经历了这次挫折不久，一天，在他去朗布兰奇的途中，史密斯遇到了沃里奇霍夫先生，一位资深的卖空投资家。那时史密斯和范德比尔特先生仍然在做买空的投资。沃里奇霍夫说服了史密斯，使他相信自己在市场上的投资方向是错误的，认为他最好卖掉他持有的股票，和沃里奇霍夫一起做卖空的操作。

史密斯被沃里奇霍夫先生的建议还有他的真诚和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

这个资深的卖空投机家用了很多自己成功的例子来阐述他的理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他的理论在华尔街的操盘手当中被广泛使用。在这位空头的影响下，史密斯从他上次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从而卖空也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了，以至于他决定追随沃里奇霍夫先生的观点，并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除了上次意外的失败之外，什么都看不到了，他准备不计后果地追随该卖空专家。

史密斯对沃里奇霍夫的不变的信念几乎和伊格内修斯·洛亚拉（Ignatius Loyola）相似。在伊格内修斯·洛亚拉当选主教的日子里，这位杰出的耶稣教徒说：“如果圣父命令我在狂风大作的日子，带几个随从划一只敞蓬船驶向大海深处，我会毫不犹豫地按照他的指示去做”。

这样描述史密斯对沃里奇霍夫卖空理论完美性的衷心拥护一点都不夸张。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当他完全被一种偏执的感觉所左右时，无论是做买空还是卖空的选择，特别是后者，在华尔街的投资中很难去断定这个人在投机中他最后盲从的投机方向。

他判断的依据什么都没有，可能其他人判断的依据则更少。他是个坚定的多头或空头。史密斯被认为是股票市场的先知，当他说话的时候别人都不敢出声。

据我所知，自负和狂热毁了很多。这个毛病会被传染，而史密斯又是那种特别难以治愈的狂热分子。沃里奇霍夫把这种金融病传染给史密斯，但是史密斯的症状比沃里奇霍夫的严重得多。

像沃里奇霍夫先生一样，史密斯与市场决然抗衡，在1885年夏季的每次会议上，他都在不断地批评价格政策（他希望价格下跌），但是实际上市场价格在持续不断上升，间或有几次合理的反弹。当史密斯把自己的财富消耗殆尽的同时，他对Wm海斯公司的欠账也越来越多。在投机中由于价格不断上涨，这个著名的公司为了筹集足额的保证金，避免平仓，几乎变卖了所有可能得到的资源。

史密斯坚信卖空，以至于不仅输光了自己的钱，而且对Wm海斯公司负债高达100万美元，这是Wm海斯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其他几家小公司的破产。

史密斯到股票交易管理委员会，去申请延长他的成员席位时，做了以下的陈述：“在1885年的1月，我拥有140万美元，其中有110万美元现金和30万美元的不动产。但是在1886年的1月，我失去了所有的这一切，并且增加了120万美元的债务，其中对Wm海斯公司的负债达到100万美元。”

很多人都很奇怪，史密斯为何能够从一家公司获得如此一笔数额巨大的且没有任何限制的风险资金。我虽然了解那时的内幕，但我持同样的观点，亨利·史密斯对老海斯的本能般的吸引力或者说精神力量是所有灾难的根本原因。

海斯先生身体状况不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把公司的日常管理权交给了麦肯勒斯（McCanless）先生，公司的总经理，海斯先生的指令通过他能够得到准确的执行。

海斯先生在思想和身体上越来越虚弱，正因为如此，史密斯用他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说服了海斯先生接受自己的主张。

要想在华尔街打拼，一个人必须有独立的思维，能够坚决并坚持说“不”，这才能做大生意。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做后盾。

在一个已经决定的方式中，要果断地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没有一个健康坚强的体魄是难以做到的。对一名成功的华尔街经纪人来说，健康的体魄可以说绝对是很重要的，当形势需要时他必须这样做。无论是意志力还是身体的任何不足，都只能发出清楚但影响力很小的否定意见，结果会导致金融上的毁灭，海斯公司就是一个例子。

亨利·史密斯在特威德时代做了很多成功的投机交易，但是功劳要归于当地银行所拥有的便利，史密斯从他那些著名的同行那里取得了这些便利，他能够利用此便利来影响货币市场。

当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在纽约市政府掌权时，股票市场经常有很大的波动，特威德对这些波动负有很大的责任。当华尔街附近的一些傀儡经纪人逢迎着市政府管理者的美好意愿之时，特威德和他忠心的伙伴正在市政厅操纵。

特威德有三个著名的座右铭，其中之一是“掌握通向成功之路的权力”，另外两个分别是“他是人”和“你准备如何去做”。为了做到第一条，特威德控制了城市资金，包括城市储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这些是通过由上议院立法机构获得的特别豁免权建立的，它们在“老板”年代（Boss-ship）就已经归特威德所支配了。

由于这些资金受到了这样的控制，在货币市场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紧缩的影响。那时的城市资金一般为 600 万~800 万美元，被存放在“老板”的银行机构。这些机构表面上是由这些城市资金的财务总管所支配，而这些财务总管又受到特威德的掌控。

亨利·史密斯和财团里其他一些幸运儿能够从这些银行提取银行存款，制造社会的货币短缺压力，使货币市场突然紧缩，结果导致股市崩溃。如此激烈的波动对特威德集团外的很多经纪人、公司和金融公司足以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史密斯开车到第 10 国家银行，一个在黑色星期五里被套住的银行机构，从银行账户中提取资金约 410 万美元，然后他带回家锁上几天。同时特威德和他的伙伴从他们直接控制的资金中提取数额巨大的现金，这笔现金占流通现金的很大比重，总数接近 2 000 万美元。在那时候，这是一笔足以使货币市场感到吃紧的数额，华尔街的其他投资者为此感

到坐立不安。权力就是这样被一些肆无忌惮、没有道德的人所占有和运用。此时的史密斯认为他自己的身价至少有 500 万美元，但他在 1873 年的大恐慌中失去了绝大部分财富，主要是上文提到的由范德比尔特船长好心推荐给他的西部联盟股票。

我在前面谈到史密斯在黑色星期五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书中提到的场景和当时的影响，至今依然铭记在华尔街人的记忆中。

在另一章中，我将简要回顾特威德集团使用的一些投机方法，他们如何将政策玩弄于股掌之间以及如何企图去控制纽约的国家财富。

第 29 章 Chapter 29

查理斯·沃里奇霍夫

查理斯·沃里奇霍夫的事业及它对于后辈的影响 ◆ 这位华尔街卖空投机阵营的伟大领袖的特殊力量 ◆ 相对于其他那些价值破坏者，他在做法上的特点 ◆ 俾斯麦的进取思想，他职业生涯的一个主导因素 ◆ 对维拉德资产发起的猛攻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 他对于信友的捐助

查理斯·沃里奇霍夫的去世，让华尔街失去了一位在这里涌现出来的非常杰出的人物。沃里奇霍夫先生 1886 年 5 月 9 日去世。他的事业对于那些观察各国投机现象的人来说非常值得研究。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是那些能够执着于一个目标，致力于发展和完善推动自己前进的行为模式，并为此付出不懈努力的人，所能参照的。沃里奇霍夫先生具备很多男性和所有女性所不具备的特殊个性特征。他有极强的魅力，能够鼓动他人对自己的计划产生坚定的信心；也就是说，他有组织才能，这种才能成就了很多伟人，各行各业中，拥有组织才能的人都将为此受益。俾斯麦^①、格拉德斯通^②、拿破仑、格兰特，以及华尔街的古尔德、丹尼尔·德鲁、雅各布·利特和大小范德比尔特，尤其是极富进取精神的范德比尔特船长，这些都是著名实例。

① 俾斯麦（1815—1898），德国政治家，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译者注

② 格拉德斯通（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 1868～1894 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有人说沃里奇霍夫先生很幸运。确实如此，他确实幸运地具备了某种禀赋，他天生能够顺势而为，能够整合环境和目标的关系，能够导演（而不是跟从）与他相关的各种活动。他是华尔街卖空投机的领袖，或者说至少在那段他成就显赫的日子里如此，无疑，加速沃里奇霍夫先生去世的原因是投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关于这一点，他的传记作者有所忽视，即他在投机当中所表现的大胆是源于他的粗心和不精于计算。我相信沃里奇霍夫先生不会待到仔细算计清楚所有正反因素之后才下手，他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计算和对环境的把握两者的结合。

沃里奇霍夫先生关于职业原则的观点，与旧观点有非常大的区别。作为一名经纪人、商人和股市操盘手，他是“怀疑论者”，也就是说，他相信人类注定要失败，他对于美国那些为最大化国家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公司和企业没有任何信心。关于此人的特点可以细述，对此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或关于这个特点的另外一种说法，它说明了他对于发生在他周围的一切事务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即：沃里奇霍夫先生通过对积极发展中的美国所构想的各项计划的前景和可能性展开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必然以失败告终，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拨企业将逐渐失去光彩。也就是说，他看到并了解很多标志着铁路事业巨大发展的铁路公司，他断定，这些组织者过热的发展思路，必然随着铁路事业的发展而受制，铁路的盈利能力达不到预期值。因此，他卖掉了铁路股票，从一开始就将它们卖给了周围的人，让后面跟进的人坐享渔翁之利。沃里奇霍夫从来不会陷入古尔德或亨利·史密斯的陷阱。他具有德国式的民主斗争思想，他不加选择地出击，有时赔钱，有时能赚一点，他以自己奔放的热情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来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

一个持这种思想的人竟然能取得成功，这样的结果无疑对后面那些跟随者会造成有害的影响。此后，不管美国经济发展得如何成功，总能发现有人在看着跌的空头投机，而不是符合美国最佳利益的看涨式多头投机，其原因仅仅在于查理斯·沃里奇霍夫，他不相信并漠视自己生长于斯的美国制度的成长，却依然生存下来并赢得了大量的财富。

有着顽强而坚定的信念，坚持于某种行为或行业，突然发迹，后来发展迅速而稳健，沃里奇霍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出生在德国，沃里奇

霍夫最早是在奥古斯特·拉顿事务所开始其在华尔街的发展，后来他在拉顿·邦德公司成为一名出纳员。他于 1867 年离开这家公司，加入 M. C. 柯林根费尔德公司。1868 年，巴奇·舒兹公司的巴奇先生为他买下了股票交易所的一个席位。进入委员会之后一段时间，他结识了 L. 范霍夫曼公司一个非常有名的银行商号中的普拉特先生。沃里奇霍夫先生受托处理大单，尤其是黄金和政府国债。那时候，此类有价证券的交易量很大。后来，普拉特先生成为一名操盘手，沃里奇霍夫就像一名聪明的学生紧随其后。最后，他组建了沃里奇霍夫公司，他的第一位合作者是施罗姆伯格先生和舒兹，他们赚了钱便退出了。

沃里奇霍夫与华尔街的一些巨头们在很多操作中都有着联系，例如詹姆斯·肯尼、亨利·史密斯、D. P. 摩根、亨利·维拉德、查理斯·奥斯本 (Charles J. Osborn)、S. V. 怀特 (S. V. White)、阿狄森·卡玛克斯，最后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还有杰伊·古尔德。他与空头大哥阿狄森·卡玛克斯在投机方面和社交方面都有特别亲密的交往。沃里奇霍夫不仅是华尔街的大胆操盘手，而且参与了大型铁路的计划，因此他在投机中就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他所接触到的有北河建筑公司、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安大略湖西部公司、西岸公司、丹佛·格兰德河公司、墨西哥国家铁路公司、几家圣路易斯公司和俄勒冈越州铁路公司。他最初所有资产都疯狂买空，直到出现了麻烦，他对此感到愤懑，并进而转变成为不屈不挠的空头。他重拳出击，左右逢源，很快就收回了损失，并开始通过卖空投机赚取大量利润。据估计，沃里奇霍夫在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债券和股票上就尽收百万美元。

沃里奇霍夫似乎是第一位建议修建丹佛·格兰德河铁路的人。他从中为自己和他的朋友实现了巨额利润。股票一直上升到 110 点，并继续攀升到高值。公众被多头的美好“钱景”所诱惑。沃里奇霍夫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持有大量行市看涨时买进的股票，但是都卖光了，后来就退出了空头的大队伍。空头阵营将沃里奇霍夫奉为领袖，据说，他成功地在 40 的低点甚至是更低点平仓。1878 年，当市场由于重新恢复现金支付以及美国整体经济的繁荣而出现了大繁荣的时候，他组织了一个小集团联合买进大量股票，以空头的方式卖出小麦。此次交易，他赚了很多钱，成为了实力非常强大的百万富翁。他利用加非

尔德^①1881年被刺杀的机会，和同事卡玛克斯和史密斯一道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空头袭击，这次袭击可能是造成1884年金融恐慌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它发生的时间有些久远。

他在上面这些交易中所表现的敏锐洞察力，到1885年的时候背叛了他。他认为，由于小麦收成小，小麦的价格应该上升，股票的价格应该下降，但是结果却正好相反。失望和压抑引发了沃里奇霍夫的心脏动脉瘤，它毁掉了这位著名的空头，他的去世对于华尔街来说是一件幸事。

让沃里奇霍夫在德国和英国同时赢得操盘手美誉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他在1879年反对杰伊·古尔德、鲁赛尔·塞吉以及同时代的其他资本家、铁路巨头和金融家控制堪萨斯太平洋铁路时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他代表的是法兰克福投资者的利益，他一直在以80点的价位大量销售丹佛的延期债券给古尔德·塞吉辛迪加集团。然而，这个辛迪加知道他们有重要的影响力，于是他们宣布80点的合同终止，并说他们“在勘察完地基之后，得出一致结论，认为这支债券价值超不过70”，因此他们不会以更高的价格收购这支债券。沃里奇霍夫于是向金融界这位小拿破仑及其精明助手做出了侧面的行动。他似乎被他们撕毁合同的举动吓退，但是却没有过多的抱怨。他很快就发电报给英国和德国的债券持有者们，很快获得了这个辛迪加所需要的大量债券，并将它们存储在美国信托公司中。接下来，他就通知这个辛迪加说，他们不可能低于这个价格获得任何一份债券，来实施他们伟大的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计划。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很多法兰克福的投机者和投资者涌入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英国的资本自由流动，让投机者们抛弃了最初的胆怯。这次交易中，与古尔德·塞吉辛迪加集团有关的总交易金额大约为600万美元债券，从中沃里奇霍夫净赚了超过100万美元。经此一役，沃里奇霍夫声威鹊起，立即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远见卓识的投机者的美誉，而与沃里奇霍夫的名利双收相反，在此次交易中，古尔德和塞吉由于无视既定合同，最终自食恶果、自取其辱。

当亨利·维拉德向沃里奇霍夫推荐那个著名的北太平洋和俄勒冈越州铁路空头计划的时候，沃里奇霍夫再次证明了其伟大的智慧。尽管他被邀请与

^①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美国总统，于1881被刺杀。——译者注

其他很多已受维拉德欺骗很深的百万富翁们一道参与这个计划，但是沃里奇霍夫还是保持了谨慎和超然，他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沉着地观察着维拉德这副西洋棋的棋手。在那位有办法轻易向维拉德空头计划捐出2 000万美元的大人物看来，他那时候不是大头。当时，这些捐资者们被维拉德的空头计划煽动得热血沸腾忘乎所以，认为股价会像加利福尼亚淘金潮的时候找到富矿一样，能升至几百甚至上千点，此时沃里奇霍夫大胆地卖出了所有在买空时候买进的股票。此举就像当年詹姆斯·肯尼利用富矿达到最大能力和预期时一样，也是一个大胆的手笔。维拉德辛迪加决定整个将沃里奇霍夫排挤出来，为此他们组建了一个辛迪加，买进了10万股股票。在这个辛迪加中有很多百万富翁和杰出的金融家，相对于这个集团，沃里奇霍夫实力相对较弱，他必须独自应对。当年拿破仑的洛迪一战，在身后的五位将军的帮助之下，击溃了有好几个军团护卫的奥地利军队，这样的成绩，相对于沃里奇霍夫在此次投机中所取得的成绩来说，还只能算成绩一般。沃里奇霍夫非常冷静，就像只是在漠不关心地观望辛迪加的动向一样。辛迪加则积极地买进，并很快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2万股股票。股价继续迅速攀升，根据决议，这个被成功冲昏了头脑的投机辛迪加还要收购8万股股票。他们以为自己现在排挤沃里奇霍夫之战已稳操胜券，只待所需的8万股股票到手就一切OK，但是，沃里奇霍夫的经纪人恰恰就是将这8万股股票卖给这个大辛迪加的人。不久之后，这个辛迪加就感觉好像被电击了一般。很快，维拉德的计划开始破产。这个辛迪加进退两难，可是又无能为力。它想挤垮沃里奇霍夫，沃里奇霍夫也毫无怨言地承受。投机的必然法则此时开始产生作用，这位伟大的小空头净赚百万美元。这就发生在1883年。

在维拉德破产之后，沃里奇霍夫先生有一段时间变得保守起来，他此时开始相时而动，看到有机会赚钱就做一回多头，或做一回空头。当西岸铁路建成时，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动向。他在推动西岸铁路建设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时候，他的收益主要集中在做多头。此后，他转变成了一名最具破坏性的习惯性空头。他为此次的转变所赋予的解释是：铁路净收益逐年下跌，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价格还会不断往上涨。他将这个理论推演至极至，让美国的恢复势力很少甚至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他所成功领导的空头团队为此深受鼓舞。这些观点本身如果过于偏激，则会对股票市场产生非常消极

的影响，从而构成一个令所有价值发生贬值的强大力量，对投机产生抑压的作用，这种作用和影响一直持续到沃里奇霍夫先生去世后的好几个月时间。这位伟大的空头非常善于阻挠投机中的其他操盘手，他擅长通过聘请大量经纪人、频繁更换经纪人和变换行为基调，令其他投机者茫然不知所措，从而只能坐以待毙。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去世并没有造成比结果所证实的更为巨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他早去世一周的时间，那么他的去世可能会导致恐慌，因为他那时候卖空了20万股股票，而这些卖空帐户都是在股票交易市场宣布他去世之前平仓交割的。

沃里奇霍夫先生像詹姆斯·肯尼一样，有名的慷慨大度。据说，他赠了20多个股票交易市场的席位给那些忠实的经纪人，每个席位价值25 000美元。他送了一匹价值500美元的马给那位每天接送他上下班的马夫。他对待自己的雇员特别慷慨。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感觉到身体开始出现不适，于是决心去欧洲游玩，以图身体康复，但是，就像很多大操盘手一样，未待计划实施，他就已经积劳成疾，在43岁的时候英年早逝。唉，如果能得到适度的休息，会有多少有价值的生命可以得到延续啊！沃里奇霍夫先生的去世，对于那些急于在短时间内较迅速地累积财富的华尔街人来说，是一个严肃的警告。他的财富据估计在100万美元到400万美元之间。他身后留下了一个丧偶的女人和两个小女儿。

沃里奇霍夫只是具有投机天才，这些才是难以控制的，很难说对他人到底会有何影响。他无心伤害任何人，只是他的做法总是会给有些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只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听从赚钱天才的召唤，而并没有注意谁将在他的投机中遭受伤害。所有的卖空投机都包含着同样的原则。如果在投机之间有任何的差异，那么也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大额交易，就像沃里奇霍夫所涉及的那些交易一样，往往让那些不幸“中招”的人们感觉到更严重的后果；但是，这只能说应该归结为适者生存的道理。

沃里奇霍夫在美国的成功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会感到有些奇怪，但是对于他的家乡黑森州拿骚市赫劳镇的那些相对较穷的人来说（他1843年出生于此），他们可能会感到更为奇怪。美国是一个真正的充满梦想的梦幻般的黄金

城市^①，一个能够魔幻般地将一个农民的孩子变为富翁（一个远比孩子们所仰慕的贵族更为富有者）的城市。在发现这个国家的德国人当中，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是其中的一位。有谁能够预见这位1864年来到纽约的德国穷小子有此飞黄腾达之时呢？他那时候才21岁。他在法兰克福和巴黎有过经纪人的工作经验，但是初到纽约时他很穷。阿狄森·杰罗姆那时候在南方很有名，在战争时期，他在那里给同胞做帮手赚了一些钱，后来他在很多大投机中成为沃里奇霍夫的合伙人。D. P. 摩根那时已经在伦敦的棉花投机中赚了钱，他是沃里奇霍夫的另外一位合伙人。鲁赛尔·塞吉的财富要以百万美元来计。杰伊·古尔德和亨利·史密斯经历了黑色星期五的兴奋狂热，他们中的每一位，用俗话来说，都可以让这位德国穷小子完蛋。然而，财富的抓阄转轮出现了奇怪的偏转，他在业界所取得的威望，令他可以虎口拔牙，可以直面那些试图毁灭他的强大联合坐庄集团。当亨利·维拉德以沃里奇霍夫卖空维拉德资产价值为由，要求他辞掉俄勒冈越州铁路公司董事职务的时候，这个“财阀”（沃里奇霍夫常常这样叫它）立刻响应，戏剧性地提出沃里奇霍夫将毁掉维拉德整个高层的说法。

蔡斯·沃里奇霍夫（Chase F. Woerishoffer）体格轻盈，肤色较浅，中等高度，在华尔街上可能会被错认为一名银行职员。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对博弈游戏固有的热爱。据说，他曾经两次闯入朗布兰奇一家玩法罗牌的赌场；他会在轮盘赌和扑克牌上大赌出手。他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在圣诞节上，他给那些伙计们和小信差们的好处是有名的。在大投机的关键时刻，他有时表现得过于紧张，但是在那场与维拉德集团的难忘角逐中，他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冷静和镇定。他是德国粘液型性格和美国胆汁型性格的奇怪组合。在他的一生当中，有一件幸事就是他在1875年与奥斯瓦德·奥滕多佛（Oswald Ottendorfer，纽约重要的德国喉舌《国家报》^②的编辑和经营者）的继女安妮·尤尔（Annie Uhl）的联姻，据说，这给他带来了大约30万美元。

1886年5月13日，我给客户发了下面这份公告单，特别提到了沃里奇霍夫的去世及其影响，我想在这里值得再现：

① EI DORADO 西班牙语意即梦幻中的黄金城市。——译者注

② 德国的一家重要报纸。——译者注

股市的未来将是自然市场，它将随着自然因素发生上下波动；待自然市场完全实现之时，公共力量的参与就会不可或缺。而这一因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排挤在华尔街之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迫于某种强力，其操作的自我判断基础被严重打乱和搁置。这样，让人感觉到这个市场不再是令人放心的冒险之所。而这个强力就来自沃里奇霍夫，他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空头的领袖和首脑，他是价值巨大的破坏者。他的做法就是毁灭信心，打击股市上一切显示出某种活力前景的股票。他的影响力比较大，因为所有的场内交易商都转而信任他并成为他亦步亦趋的盲从者。这样说来，他的去世也使整个空头队伍失去了领头者，从而处于一种士气低沉的状态，就像是一艘失去方向舵的船舶行在大海中。沃里奇霍夫先生是一位和善热情的人，在家里，他温文可亲，对朋友他坦诚相待，对待错误他宽宏大量，因此，作为一位绅士，他的去世是一大损失，但是就国家繁荣而论，他的去世又将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利得。他的去世，现在已是一个无力回天的事实，让股票交易市场再也感觉不到沃里奇霍夫先生那种无所不在的作用和影响。在他活着的时候，不论此时的情况下做多头有多大的保障，公众和近一半的交易协会成员，都由于害怕沃里奇霍夫先生的虎威，被唬住而不敢买进。多年以来，股市的多头们一直要想方设法来对付沃里奇霍夫先生的大胆和强势姿态。当多头自认为要联合起来迫使市场遵循他们的意志振奋起来时，作为他们努力的结果，沃里奇霍夫先生就往往会给他们当头一棒；他总是重复着惯常的轨迹，导致振奋股市的努力最终无功而返。如果一万股股票不够，他会翻四倍；实际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在至少20万股的股票市场上充当巨额合同的空头。作为一名操盘手，他似乎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特别之处，正是由于具有这个特点，他往往能异军突起、绝地逢生。在华尔街再次出现一位有如此决断力和决胜欲的可取代沃里奇霍夫先生的人物，可能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同时这除了让操盘手现在更为安全之外，华尔街现在一切也变得更为简单。作为一名操盘手，沃里奇霍夫先生做到了狡兔三窟。他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投机事业，他不仅如饥似渴地攻击着股票市场，而且对那些于自己有利的每一个市场都不放过；有时可能是在谷物市场，有时可能是通过黄金，有时可能是通过伦敦市场来操作。他将投机把玩于股掌之中，实际上，他把握环境的能力到了一种能让他人感觉到力量的程度。沃里奇霍夫先生的好友卡玛克斯先生尽管往往也做空头，但是他和沃里

奇霍夫先生就有很大的不同，也不令人害怕，因为此人一般都要得到可靠的信息才卖空股票，而且卖空的程度也有限。如果他发现市场没有随着他的销售而下挫的话，那么他会在损失发生的第一时间设法解脱。这样的做法给他带来了安全。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常常会卖出一万、两万或三万股的股票，然后回头，而不是像他的朋友沃里奇霍夫先生那样选择一个位置，一直坚持不变，然后无情地恫吓市场直到最终符合了他的意志。因此，现在多头不再害怕，只要他们对操作的判断有力。对于华尔街的投机者和投资者来说，他们的未来要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光明，公众会再次站到台前，由此，投机的活力将大大增强。

第 30 章 Chapter 30

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美国人

我是 50 多年前从英格兰来到这个国家的，原打算只做短暂停留。在还刚刚对这个城市的公共建筑方位和主要街道有个朦胧印象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它们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存在什么样的可能性，谁有勇气来争取，来参与这场财富和地位的角逐。我喜欢这种熙熙攘攘的生活方式，这与我的祖国那种缓慢和舒适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无法从这种想法中解脱出来，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纽约找到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地，最后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很幸运，我有几封有分量的引荐信，因此我的社会背景比较惹眼也比较有利。过了几年，国内战争爆发了，它的影响更增加了我对这片为自由而飘动的旗帜的热爱，这份热爱甚至超过了我对于祖国的热爱，我成为了一个热情的美国人。我很幸运交往到那个时代的很多重要人物，他们激励着我向他们靠拢，我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他们对于我年轻心灵的影响。我刚到纽约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归属大西部了），到处都是--望无际的草原或是茂密的森林，但是甚至在那个时候，我周围的当地人百折不回的精神，就令我向往着征服这片荒野，让它到处鲜花满地，果实累累。那时候很少有百万富翁，诚实坦率，加上热爱工作，是一个年轻人成功的必要条件。美国政府真正是民享、民治的政府，它让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找到了这片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乐土。这里不需要应付什么世袭贵族，这里只有智慧和勇气的贵族；这里没有什么数世纪的传统，横亘在你与他人权利上的摩擦之间。这个国家人口增长很快，移

民很受欢迎，很多欧洲国家的上层都被吸引到了我们的国家。穷人家的孩子可以成为世界领袖，这个事实证明，任何有志于尝试，有勇气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人，都有成功的希望。在这个国家，议会经常通过而且现在仍在继续通过一些有利于守法者生存和发展的法律。在法律面前，不论是贵族还是族系，都不能保护违犯了法律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发生因为领土之争而起的斗争，无论我们的国旗在何处飘扬，这都是基于道德良知与毫无争议的权利。

以上是对我为什么成为了一个美国人所做的一点简短说明。这里我只需要补充一句，我情不自禁地成为了一名美国人，虽然我没有想过要这样。